拥抱世界的港湾 连接天下的彩虹
HUAXIA MAGAZINE
广东省侨联主管主办 | 广东省优秀期刊
国内统一刊号 CN44-1771/D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003-7373

華夏

双月刊
ISSN 1003-7373
04
2020 年
4 月
总 217 期
定价：¥30 HK$40 NT$128 $20

独家策划

南有嘉木

岭南这片土地，曾经的断发文身、龟群鹤立、“南蛮鴃舌”之地，
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客家人大海朝宗的文化家园。
虎门销烟濡染了近代史的曙光，远离中原政治倾轧的繁华商埠，
成为哺育近代精英的种子场——帝王独裁体制的掘墓人。
这片濒临港澳的土地，在思想观点上总是领先东方。
这片非凡的热土，必然会有非凡的故事。
——刘迪生









006 陈剑晖 徐南铁 郭小东
改革开放与
广东文艺 40 年

068 陈中
一本时政新闻杂志
是一个时代的体温

080 丘树宏
孙中山文化：
一个重要的国家命题

109 张应龙
输入与输出：
广东侨乡文化特征散论

拥抱世界的港湾
连接天下的彩虹

《华夏》杂志创刊于1985年2月，由广东省侨联主管主办。《华夏》面向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发行量最大时超过30万册。《华夏》为双月刊，2018年入选广东省第五届优秀期刊。

广东拥有3000多万海外侨胞，3000多万归侨侨眷，广东省侨联永远是侨胞的温馨家园。《华夏》站在东西方文明的高地上看世界、看中国、看广东，围绕“拥抱世界的港湾，连接天下的彩虹”的办刊宗旨，以“侨”为中心坐标与纽带桥梁，藉由“侨”的眼界和语境，以“人文”为主线，承载家国情怀、弘扬中华文化、记录侨海风云以及探索东西方文明交融。



国内统一刊号 CN44-1771/ D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003-7373

社址：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140-148号广东侨联大厦6楼
邮编：510620 **电话：**020-38879808 **邮箱：**gdqlhx@163.com

客家山歌入梦来

文 刘迪生（《华夏》杂志总编辑，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客家山歌，也是民歌的一种吧。尽管“工农兵占领舞台”的时代，有《刘三姐》将山歌表现得有如“才子佳人”般的杨春白雪，究其质地还是不敢恭维的。白居易在《琵琶行》里干脆说：“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

然而，囿于各人的生存阅历和童年记忆，有如舌苔一样，与生俱来的传承，骨子里的基因链条，决定了一个人的终生嗜好——即审美情趣的固化与偏执。

鄙人，毋庸置疑，作为客家人的孑遗，对客家山歌情有独钟。它来自客家人，一个具有显著特征的汉族民系——汉族是在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阔、影响最深远的民系之一。

客家人因从中原地区南下迁徙而产生，一群又一群皈依未来的圣徒，他们穿过灵敏而温暖的黄昏，步出黑色的伤痕，重整一度破裂的希望。迁徙给了客家人坚韧的品性！在偏僻山区，勤劳的客家人开垦自己的土地，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客家人，除了迁徙而来的人，还有不少是原在岭南地区上生活的百姓。可以这样说，客家人的祖先是融合了古代中原民系和古越诸族而最终形成的。

不同的血脉和智慧造就了不同的文化和艺术。客家山歌是客家人用客家方言吟唱的民间歌曲，是客家人的口头文学，它富有客家人的语言特色，乡土生活气息浓郁，形成民歌中独立的一支。

客家山歌自然天成，一草一木都为之传唱动情。客家山歌继承了《诗经》三百篇的风格，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主题和地方特色，富有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大胆而又收敛，泼辣而又温柔。

“要唱山歌只管来，拿条凳子坐下来。唱到鸡毛沉落海，唱到石头浮起来。”

“要唱山歌就来唱，唱到日头对月光。唱到麒麟对狮子，唱到金鸡对凤凰。”

平淡、悠扬、轻快、圆润——宛如金鸡、凤凰引领午夜的舞蹈。有客家人的地方，空中就有客家山歌回响。顺着流浪的步伐，歌唱的钟声催生着如火的霞光。

“三月莳田行对行，阿哥莳田妹送秧。阿哥莳田望割谷，老妹连郎望久长。”情人长相守，永远不分离。客家山歌唱着恒久的爱情，唱着客家人的顽强不息。客家山歌是客家人不倦的心跳，是客家人滚烫的心灵之歌，是客家人生命历程最真挚的内在的精神折射。

“生爱连来死爱连，唔怕官司在眼前。杀头好比风吹帽，坐监好比逛花园！”细雨轻抚的夜，一曲曲山野小调，滋润和抚慰着客家山村夜的心脏。当风儿轻轻吹起，当树叶簌簌响起，有情的人儿把歌唱，哥方唱罢妹作答，郎情妹意两心悦。

心灵的歌叹，常常让文艺珍品浸透或贯穿忧伤的情境；历史的传承，每每令客家山歌悠扬深远，传唱不衰。客家人就像个生生不息的生命体，她的遭遇、命运都会烙下深深的创伤印记，源源不断地渗入心灵。歌词的基本结构依旧是七言四句体，一、二、四句押韵。

“客家山上好风光，山歌圩日闹洋洋。八方乡亲来欢聚，山歌一唱开心肠。”这具有《诗经》遗风的天籁之音，自唐代开始，已有千年的历史。客家山歌有小调大曲，有大情小欢。有音外音，韵外韵，有味，有趣，有妙。它的朴实无华，它的高亢激越，它的悠扬缠绵，诉说着客家人的历史和变迁。歌声中，蕴涵着客家人心灵的观照。聆听客家山歌，并通过它走进客家人真实的心灵世界，走向可期许的未来。

华夏
HUAXIA MAGAZINE
2020年4月　双月刊　总第217期



电影《雅马哈鱼档》　编剧：章以武　黄锦鸿

独家策划

南有嘉木

陈剑晖　徐南铁　郭小东

006　改革开放与广东文艺40年

程　露

065　摹写时代风采　彰显广东精神

陈　中

068　一本时政新闻杂志是一个时代的体温

丘树宏

080　孙中山文化：一个重要的国家命题

张应龙

109　输入与输出：广东侨乡文化特征散论

陈启文

120　从东江到香江

《华夏》编委会

编委会名誉主任：黎　静
编 委 会 主 任：邵　瑾　曹堪宏
编委会副主任：杨春华

总　　编　　辑：刘迪生
副　总　编　辑：钟敏仪
总 编 辑 助 理：赵阳欢
广东采编中心主任：祝顺祥
北京采编中心主任：白　羲
香港采编中心主任：董榕辉

台湾采编中心主任：林　峥
美国采编中心主任：邝小平
新西兰采编中心主任：萧　萧
加拿大采编中心主任：赵　文
调查新闻中心主任：莫华杰
品牌推广中心主任：林建兰

目录 CONTENTS

世　宾

136　深沉的脉动 ——广东当下诗歌创作状况

陈桥生

141　鸿雁于飞 ——追寻唐前岭南的文明进程

郭　珊　黄楚旋

168　张九龄：清正“尚直”的诗人宰相

叶曙明

176　山与海之间

艾　云

188　120年前的戊戌烟云

梁　莹

193　黄埔军校与华侨华人

彤　子

199　陈家祠（节选）

林伦伦

221　《汕头华侨捐资兴学记述（1949—2018）》前言

李宏新

224　最早的潮商

江　冰

229　梅州客家：有围屋有耕读，还有侨商与海洋

安石榴

235　深圳私人地图

视觉设计：广东阅客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美术编辑：卢萱舒
文字编辑：钟小敏
社址：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140-148号
　　广东侨联大厦6楼
邮编：510620
电话：020-38879808

邮箱：gdqlhx@163.com
国内统一刊号：CN44-1771/D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3-7373
广告经营许可证：440000100021
发　行　范　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承　印　单　位：深圳市精彩印联合印务有限公司
定价：¥30　HK$40　NT$128　$20

广东省侨联主管主办
华夏杂志社编辑出版

独家策划
EXCLUSIVE FEATURE

南有嘉木

岭南这片土地，曾经的断发文身、龟群鹤立、“南蛮鴃舌”之地，
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客家人大海朝宗的文化家园。
虎门销烟濡染了近代史的曙光，远离中原政治倾轧的繁华商埠，
成为哺育近代精英的种子场——帝王独裁体制的掘墓人。
这片濒临港澳的土地，在思想观点上总是领先东方。
这片非凡的热土，必然会有非凡的故事。


龙岩
泉州
漳州
厦门
梅州
台湾海峡
河源
潮州
揭阳
汕头
深圳
汕尾
香港

主编　陈剑晖　徐南铁　郭小东



改革开放与广东文艺40年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　组编



陈剑晖，现为广州大学文学思想研究中心资深特聘教授，曾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编辑出版系主任、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中心主任。学术兼职有：广东省文史馆馆员、广东散文学会原常务副会长，广东省现代文学研究会、广东省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系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鲁迅文学奖散文奖终评评委，《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编委。出版有《散文文体论》《现代散文文体观念与文体形态》《诗性散文》等 8 部散文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刊发表论文 200 多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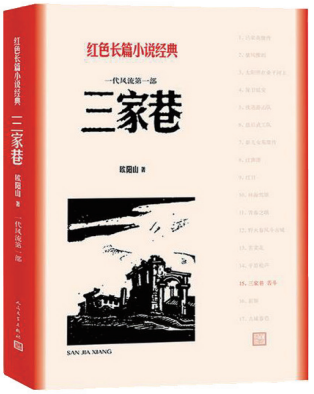
徐南铁，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文学院院长，开放大学湾区文化研究院院长，广东省政协文史专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曾任广东省文联副主席、岭南美术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有多种文艺作品行世，包括散文、报告文学、影视、诗词、摄影、书法。获得过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文艺奖）等。





郭小东，广东潮阳铜钵盂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文科二级教授、国家一级作家。历任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现代作家研究会会长、广州国际中华文化学术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国现当代文学省级特色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首届“广州市十大杰出青年”。著有《郭小东文集》22 卷、《中国知青部落》三部曲、《中国知青文学史稿》《想象中的时间》《当太阳成为河流》《风的青年时代》《红庐，雅加的沉香》《1966 的葵》《非常迷离》《非常迷惑》以及中国往事五部曲之《铜钵盂》《仁记巷》《光德里》《桃花渡》《十里红妆》等，作品多次获奖。

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和排头兵，40年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拂下，广东以改革促发展，以开放促改革，实现了思想大解放，社会大变革，经济大飞跃，生活水平大提高。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广东的文艺工作者意气风发、精神振奋，他们满怀热情投入到讴歌改革开放，讴歌新时代的大合唱中，从而迎来了广东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然而，由于历史、现实、文化和地域的诸多原因，也由于缺乏宣传，缺乏梳理总结，广东文艺一直以来被严重低估、忽视乃至遮蔽，甚至一度有“文化沙漠”之说。有感于此，我们认为，以“改革开放40年”为切入点，以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为主体，立足于广东改革开放的前沿，出版一本旨在总结广东改革开放40年文艺的成就与经验，既具开放意识与现代视野，又带有文学史性质的描述与研究结合的专著，不仅能更好地展示广东文艺的实绩和力量，让“广东文艺”发出更响亮的声音，而且有助于配合推进省委提出的“岭南文化创新”的战略构想，增强广东文化的自信，提升广东文化的影响力，促进区域文化发展，从而在当前建设广东“文化强省”的进程中发挥积极的文化效应。



《三家巷》 作者：欧阳山



《艺海拾贝》 作者：秦牧



《香飘四季》 作者：陈残云

回顾、追溯40年广东文艺创作，我们欣喜地看到，无论是文学、影视、戏剧，还是音乐和美术，广东的文艺创作有不少走在全国的前列，有的甚至成为国内文艺的风向标。这一方面得益于广东经济建设方面的改革开放；一方面取决于广东文艺工作者的开拓进取精神和文化品格。他们传承了近现代以来岭南先贤那种“独领风骚，敢为天下先”的优质文化品格，敢为人先，敢于成为“吃螃蟹的第一人”。于是，他们顺应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用一系列带着“海韵”、“珠气”和“渔腥味”的小说、影视和音乐美术，在中国内地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飓风，创造了许多的“全国第一”。他们以丰茂且特色鲜明的创作，无可辩驳地向外界表明：广东不但是全国经济的领头羊，广东的文艺创作在不少方面一直引领中国文艺的潮流，有的甚至是中国文艺创作“航母”的发动机。

就文学创作方面来看，广东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时期出现了欧阳山、秦牧、陈残云等大家，以及《三家巷》《香飘四季》《艺海拾贝》等一大批名著。改革开放40年来，广东文学创作方面虽尚未出现欧阳山、

秦牧、陈残云这样的大家，但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一是文学理论上，提出了“社会主义悲剧论”“批判现实主义”“中国当代文学现代化”等问题。著名的关于“朦胧诗”的争论，也是由广东发起。二是大力引进并推广金庸等的武侠小说，是通俗文学兴起的发源地。三是打破禁区，敢为人先出好书。不少获国家级大奖的作品，在别地出版不了，后来都由广东出版社推出，如 1980 年 11 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啊，人！》等。四是提出“南方城市写作”，并有一批创作实践支撑，特别是“打工文学”，更是广东的特产。五是报告文学大放异彩，有不少作品获全国大奖。六是打造了“粤派批评”这张文化名片，现“粤派批评”已成为“现象级”的全国性文学事件。七是网络创作和评论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影视是广东改革开放40年广东文艺的骄傲，也是改革开放在文艺方面最为有力的体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情满珠江》《英雄无悔》《公关小姐》《和平年代》《雅马哈渔档》，到新世纪的《潮起南方》《骡子与金子》《长征大会师》，广东影视一方面高扬主旋律；一方面又突出多样性，同时在主旋律与多样性的统一中融入地方色彩，从而形成了南派影视的品格和特色，在中国当代影视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广东的音乐尤其是流行音乐，一直引领着全国流行音乐的潮流。可以说，改革开放 40 年，也是广东流行音乐发展的 40 年。这 40 年来，广东为中国流行音乐提供了许多新的思维和新的实践，是其他省市所无法比拟的。在整个中国流行音乐发展过程中，广东流行音乐扮演着一个发动机和桥头堡的角色。许多新鲜的音乐念头，许多传唱大江南北的歌曲（如《涛声依旧》等），都是在广东流行乐坛产生的，这些新鲜的念头和歌曲影响着中国流行音乐的进程，引导着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

20 世纪以来，受革新思潮的影响，广东在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漫画等很多门类都有出类拔萃的大家，他们代表了时代前进的方向和艺术前进的方向。广东美术体现了艺术革新的先驱性、对外开放的包容性和多元互补，具有革命精神、创新精神、开放精神的鲜明特色。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美术随时代精神的变迁，日益呈现出多样性态势。从对形式主义的自觉强调，到对艺术本体语言的深入探索，再到对文化社会的多视角关注，艺术家们面对现实、关心现实、表现现实，通过作品反映世相风貌，折射追寻意义的不同姿态。而唯一不变的，是他们依然延续着自己的立场去书写历史。虽然探索追求不同，但他们把时代、传统、地域文化等多种因素熔于一炉，形成自己的绘画语言，也体现了时代的特色，从而奠定了广东美术在 20 世纪中国美术史中的重要地位。

广东改革开放 40 年的戏剧创作，也和其他文艺门类一样取得许多个“全国第一”。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特区人》《南方的风》，到《裂变》《急流》《大趋势》《沙湾往事》等。广东改革开放 40 年的戏剧创作不仅描写了改革家和普通人的感情观念的变化，更主要的是通过这种变化的描写力求体现改革开放的一种历程与标志，因此更富历史的深度及现实的力度。整体观之，广东改革开放 40 年，戏剧创作在题材、风格、表现手法上追求多样化，戏剧创作和演出十分活跃。这时期内，戏剧已成为大众最为关注的舞台艺术样式。

本书既是广东的文艺发展演变史，也是广东人的心灵史和精神史。因为广东的每一个经济奇迹和文艺奇迹，都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改革开放的故事每一天都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既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也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因此，本书试图从文艺这一特殊的视角切入历史，不仅

让读者认识了解改革开放以来这40年间，广东的文学、影视、音乐、美术、戏剧等文艺领域的发展路径和成果，而且通过挖掘、呈现各种文艺现象、文学事件，文艺现象背后的社会心理、时代心理、审美趣味和精神的变迁，使这一段历史更有厚度、温度和深度。比如，《雅马哈渔档》《情满珠江》《外来妹》等电视剧是如何在广东兴起的，它们背后的社会心理、审美趣味是什么，它与改革开放又是什么关系？再比如，流行音乐为什么会率先在广东兴起，并引领全国潮流等等。

本书以描述和述评相结合为主要叙述方法，既强调学理性，又兼顾可读性。本书作者团队既包括在国内享有相当知名度、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化和文学研究的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也有高等学府的研究学者，这为将本书打造成高端学术精品这一总体要求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改革开放40年来广东文艺的发展，提高他们阅读的兴趣，本书将以描述性为主要叙述方法，兼顾学理性和可读性两方面，尽量回避过于“学院化”表述，

2018年11月27日，“享口福·赏粤剧”庆祝暨南大学建校112周年感恩答谢会



用鲜活优美、灵动诗性的文字来探讨改革开放、岭南传统文化与现当代广东文艺问题，使不同层次的文学爱好者喜欢阅读这本书。这可以视为本书的特色。

《改革开放与广东文艺 40 年》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和岭南文化的大背景下诞生的。在新时代，我们认为广东文艺要更上层楼，广东的文艺工作者要秉承改革的理念，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心灵，既要写出物质的岭南，更要写出精神上的岭南。比如，写出边缘人群的现代生存经验和精神困境，包括他们的苦恼、压力、困惑、矛盾、无力、无奈甚至绝望，等等，还要写出异质精神对岭南文化的渗透、影响与改造。总之，广东的文艺要获得一种深度模式，一方面要立足岭南现实生活，注重南方经验的挖掘；一方面要坚持个人的体验，要有独特的生活视角，要有生命的投入，有感情的温润，有精神性的维度。此外，还应有自觉的文体创新意识，这样才能创作出既具个性色彩，又具精神维度的文艺作品，才能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迎来一个生机勃发的广东文艺的新时代！



第一编

改革开放与广东文学

主　编：陈剑晖
副主编：程　露　林馥娜
陈　鹭　刘茉琳

改革开放的故事开始于1978年，它有一个标志，那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的春潮催生了中国新时期第一个文学思潮——伤痕文学思潮的崛起。其时，广东的文学创作也不甘人后，陈国凯的中篇小说《代价》《我该怎么办？》，吕雷的短篇小说《火红的云霞》《海风轻轻吹》，分别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奖。尔后是刘斯奋的长篇小说《白门柳》斩获茅盾文学奖。在文学理论上，广东于1978年12月29日以《南方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头版刊登了《砸烂“文艺黑线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创作》一文，这是全国最早以党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的批判“文艺黑线论”的文章，极大地推动了全国文艺界的思想解放运动。不但最早批判“文艺黑线论”，在改革开放之初，广东的文艺大旗还多次飘扬在国家队前头。比如，在全国率先提出“社会主义悲剧论”“批判现实主义论”；在国内首次引进白先勇、金庸、梁羽生、琼瑶等的小说，不但使刊登其作品的刊物《花城》《作品》《广州文艺》《南风》一时洛阳纸贵，而且促进了通俗文学的兴起。可以说，广东就是通俗文学的发源地。还有，诸如著名的关于“朦胧诗”的争论，也是由广东发起。再者是打破禁区，敢为人先出好书。不少获国家级大奖的作品，在别地出版不了，后来都由广东出版社推出，如《人啊，人！》等。至于“打工文学”，更是广东的特产，网络创作和评论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而“粤派批评”这张文化名片，现在已成为“现象级”的全国性文学事件。

本版块将从整体上，全面论述改革开放40年来，广东的文学理论、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文体的发展、特色和所取得的成就，以改革开放为引领，有选择、有重点地对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或特点进行评述。

第一章　文艺“第二次解放”的突破口、立足点和前沿阵地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这是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也是中国文学的转折点：它宣告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标志了一个新的时期的开端。当代中国在这个节骨眼上经历了“第二次解放”。

面对浩劫十载留下的一大片废墟，迫切需要的是拨乱反正——这是当时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部门的工作核心。文艺领域是重灾区，加上文艺作为意识形态的特殊性，更亟需拨乱反正。在这个时候，文艺理论批评充当了偏重于政治控诉直至政治批判的锐利武器。

“文艺黑线专政论”既是“四人帮”进行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一个重要武器，又是他们套在广大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身上的沉重的精神枷锁。不砸碎它，文艺不能复苏，更遑论发展繁荣。但它毕竟是“四人帮”在文艺战线上营造的一个顽固堡垒，它有司令部，有队伍，还有整整一套理论主张。而且，不仅有“文艺黑线专政论”，

其实还有“文艺黑线论”。在粉碎“四人帮”之初，要摧毁“文艺黑线专政论”和“文艺黑线论”，殊非易事。

广东文艺理论批评先行一步——冲破黑暗，寻求解放，显示了它自身引人注目的理论胆识和理论力量。

1977 年秋，中共广东省委召开全省文艺创作会议，继续深揭狠批“四人帮”及其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同年 11 月，省文艺创作室和《南方日报》编辑部联合召开文艺界座谈会，愤怒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在这种形势下，广东省文联恢复活动，并于 1977 年 12 月 6—7 日在广州举行第二届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同时决定恢复五个协会广东分会的活动。广东成了粉碎“四人帮”后最早恢复文联和各协会活动的省份。这无论对于进一步深入揭批“文艺黑线专政论”，挣脱精神枷锁，还是对于活跃和繁荣新时期的文艺，都提供了一种组织上的保障。《人民日报》为此专门发表了一篇题为《把文艺活跃起来》的短评，对广东起率先作用的做法予以赞许。

1977、1978 这两年间，广东文艺界还批判了诸如“三突出”、“根本任务论”和“一个作家一个批评家”及其作品或理论，清算了“阴谋文艺”，也为给“四人帮”打成毒草的文艺作品如《三家巷》、《苦斗》和《艺海拾贝》等进行了艺术上的平反。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广东文艺》杂志于 1978 年 6 月号开设了《冲破“禁区”，正确描写爱情》的专栏，发表了杜埃、陈残云等七人的文章，显示了广东文艺批评敢于冲破“禁区”的敏锐和勇气。

拨乱反正的深入，使广东的整个文艺很快就回归到正常的轨道上去。创作又开始活跃起来了。文艺理论批评在“破坏”之外，还尝试进行建设。比如，刚刚复名的《作品》，从 1978 年 10 月号开始，到 1979 年 1 月号，连续四期展开了关于陈国凯的短篇新作《开门红》的讨论。先不论这场讨论本身水平的高低，它毕竟是新时期广东文艺理论批评第一次正面的、建设性的文学论争。它重开了讨论争鸣之风，在当时，无论是对创作还是对文艺批评自身，都是一种很大的促进。

“四害”甫除后的头几年，广东成了全国文艺界向“文艺黑线专政论”展开进攻的突破口、立足点和前沿阵地。甚至可以说，新时期中国文艺理论批评的第一线曙光，是在广东这片天空上亮起的。仅此，当时广东的文艺批评就具有实践上的、理论上的执牛耳般的重大意义。这一阶段，是广东文艺理论批评的第二个高潮期。

1978 年 12 月 5 日，人们盼望已久的广东省文学创作座谈会隆重召开。茅盾寄来了热情的贺信；刚刚复出的周扬、夏衍、林默涵、张光年应邀参加会议，首先在广东亮相。会议讨论了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艺术的任务；1978 年 12 月 29 日，《南方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在全国最早提出否定“文艺黑线”论，对文艺界思想解放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揭批“四人帮”在文艺创作中的流毒的前提下，探讨了发扬艺术民主、贯彻双百方针、繁荣文艺创作等一系列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建设性的问题。周扬的长篇报告《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引起了人们热烈的反响。广东，一时成为全国文艺界关注的中心。

在创作上，广东也与全国的文学思潮相一致，出现了一批揭批“四人帮”的作品，像《姻缘》《我应该怎么办》等还引起了全国的注意。有人把这些作品称为“伤痕文学”。于是，“伤痕文学”，或者说是揭批“四人帮”的文学，便成了文学批评一时的话题。

几乎与此同时，《作品》展开了“对揭批‘四人帮’的小说创作的讨论”。这是一场非常及时、十分重要的规模更

大的讨论。讨论集中在两个重要问题上。一是歌颂与暴露的问题，其中不可避免地牵涉到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问题。二是真实性和典型性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都关系到对当时文艺的整体评价。讨论是活跃而且有深度的。讨论中，也吹进了“歌德与缺德”式的“左”的冷风，但受到了广东文艺界人士及时、坚决、积极的抵制。黄培亮、沈仁康、黄树森三人撰写的总结文章《总结经验批判极左繁荣创作——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看法》，站得高，看得远，乃高屋建瓴的力作。它是整场讨论在理论上的总结和升华，有助于人们正确看待当时文艺界出现的种种问题，正确估价整个文艺形势，它本身便是这场讨论的一个重要收获。这场讨论，以它的卓有成效，加入并推动了当时全国性的文艺思潮，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其时广东的另外一个重要刊物《广州文艺》也进行了两场讨论。一场是关于悲剧问题的讨论。以饶芃子的《谈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开端，黄伟宗的《关于悲剧的悲剧——悲剧讨论有感》压轴探讨了一个现实而又敏感的问题。另外一场是与此相联系的关于创作方法多样化的讨论。讨论的核心是黄伟宗《提倡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方法的多样化》一文，后一场讨论与湖南《湘江文艺》围绕黄伟宗的另一篇文章《论社会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所展开的讨论互相呼应，颇有声势，也由于讨论的问题尖锐敏感，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也随着作家们在创作上从政治控诉向自觉的艺术探索的转变，中国文坛出现了现代主义思潮。其创作上的标志：一是意识流小说；二是朦胧诗，理论上则有三个“崛起”。广东文艺界面对这一思潮，在创作上只是略有所动，在理论争鸣上则与全国一致。这是1981—1983年间的事。1980年年底，杨干华就在《羊城晚报》上发表了《“山药蛋”与“意识流”》的文章，《作品》于次年2月号转载，并同时登出了于逢《意识流向何方？——致杨干华同志》一文，对“意识流”基本持否定态度。而1983年在《广州文艺》上发表的陈剑晖的长文《试探近年来我国文学中的现代派》，则是在融合传统文化与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础上，对现代派文



广东文学杂志《广州文艺》《作品》《花城》

学作了热情的肯定。此文发表后，《羊城晚报》发表黄展人和吴世枫的《关于“现代化文学”的质疑》与《评“革命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结合”论》等文，就现代化文学问题展开讨论，《新华文摘》在“学术动态”中予以报道。之后，《广州文艺》编辑部组织了部分评论家、作家举行座谈，整理出发言纪要：《正视“现代派”文艺思潮在青年中的影响》。

理论的争鸣更多还是集中在朦胧诗上。早在1980年，广东的章明即在《诗刊》上发表了《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最早提出“朦胧诗”的概念。此后几年间，有关朦胧诗的讨论会不断。1980年5月，《在新的崛起面前》向诗坛发出了挑战，同年冬天，广东省十多位诗人参加了《南方日报》副刊部的座谈会，对“现代诗派”展开讨论，然后以专版发表了纪要；1981年3月，《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发表后，作协广东分会诗歌组举行多次讨论会；1982年1月，《花城》编辑部召开西苑诗会，进一步对“崛起”诗论及“朦胧诗”进行批评，并发表了《西苑诗话》；1983年1月，《崛起的诗群》问世，为此，作协广东分会诗歌组在6月初举行“天鹿湖诗会”，在8月中举行“大沥诗会”，对三个“崛起”及广东省作者的一些文章展开了较系统的批评，并以《我们和“现代诗派”的分歧》为题在《当代文坛报》上发表了座谈纪要。1983年11月，《作品》编辑部邀请了省、市部分老、中、青诗人、诗评家举行座谈会，对照学习《邓小平文选》和《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对三个“崛起”及其在广东的影响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批判，发表了《是“崛起”还是倒退》的纪要。众多的座谈会以外，有一定规模的文学上的论争，是《作品》从1981年1月号开始的“关于‘朦胧诗’及现代派的讨论”。这场讨论是以老诗人黄雨的《新诗向何处探索？》为肇端的。现在看来，讨论中尽管也有不同观点的交锋，甚至有像林英男《吃惊之余》那样才华横溢的文章，但最后又以发端者的《评现代派诗论中文版》一锤定音，便有一边倒之嫌，整体上来看，广东文艺理论批评对现代主义思潮是持抵制至少是保留的态度的。

到了1984年，改革，作为一种社会现实已经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整个国家真正走上了正常的经济建设的轨道，文学也走过了它“一身兼数职”的时期而进入正常的而轰动效应也渐弱的真正的文学阶段。对于广东的文艺理论批评，如果说在这之前基本上是参与和响应全国性的文艺思潮的话，那么，从现在起则开始关注自身，有了自己的话题。1984年，我们愿意把它看作一个转折点。也是在这一年，作协广东分会成立了以郑江萍为主任，饶芃子、黄树森为副主任的评论委员会。

这种转变基于广东两方面的现实：一方面，广东是得风气之先的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另一方面，广东的文学创作开始落后于全国，广东的文艺理论批评也相应地展开了两个互相联系的话题：一个是关于改革文学包括特区文学的问题；另一个是探讨广东的文学创作如何突破，如何建立自己的特色。后一个话题实际上延续至今，它的具体内容特别是理论探索我们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只作简略的描述。

1984年下半年，《当代文坛报》、《花城》和《特区文学》三个单位联合召开了“84文学与改革研讨会”。会议历时五天，围绕“改革”这一中心议题，交流了文学改革的信息，回顾总结了特区题材的创作，探讨了文学与改革的关系。杨应彬到会作了《文学要努力反映改革的形势》的讲话。同年11月，《作品》发表了《时代的风，吹拂着文学的船帆》的座谈纪要。

广东省文联的刊物《广东文艺界》在试刊第一期（1984年第1期）发表了青年作家伊始的《被呼唤的文学和文学的呼唤——文学的试验》一文，由此引发了“关于广东的文学创作如何突破的讨

论”。这个讨论在《广东文艺界》上持续了整整一年，也得到了《特区文学》等报刊的响应。很多作家、评论家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体现了广东文学界企望摆脱落后、“走出五岭山脉”的焦灼。正在这个时候，1985 年 10 月 9 日，作协广东分会第一届（1979—1984）文学评论奖揭晓。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广东省首次举办的文学评论评奖活动，而作为专项文学评论奖，在全国也是第一次。《欧阳山及其创作断论》等十三篇佳作获奖。萧殷、杜埃、黄秋耘和楼栖四人被授予“荣誉奖”。这是广东批评界的一件盛事。1986 年 3 月，老作家吴有恒在《羊城晚报》上发表了《应有个岭南文派》的文章，提出建立“岭南文派”的设想，产生了一定的反响。同年下半年，《当代文坛报》一改刊即抛出“这里的文坛静悄悄么？”的“岭南之谜”，进一步探讨广东文学的现状与出路。这期间，对广东作家作品的评论也很活跃，对与广东文学关系密切的一些文学话题亦十分关注：作协广东分会、《当代文坛报》等单位先后召开了《天堂之门》、《急流》、刘西鸿作品、《流动的雾》、《胭脂河》、《天堂众生录》、《商界》、《长路》等作品的讨论会，还举办了一次“86 文学与现代文明研讨会”。对广东文学创作的讨论，逐渐扩展和深入到文化的层面，这主要是指《当代文坛报》从 1989 年开始的关于“珠江大文化圈”的讨论。

总的看来，新时期的广东文艺理论批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前进的；但它与时代的关系不像文化大革命前那样表现为被时代所裹挟的“紧跟”，而是开始有了一定的“主体意识”，因此在追随时代的同时实际上也思考时代，在时代的发展中做出自己的选择，在不断的选择中一步一步朝前走。

新时期的广东文艺理论批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前进的；但它与时代的关系不像文化大革命前那样表现为被时代所裹挟的“紧跟”，而是开始有了一定的“主体意识”。

第二章　“经济文化时代”和广东文学特质及走向的讨论

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地，也是经济特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试验田，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文化的转型，促使广东的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走出书斋，告别空谈，不但融进气势磅礴、日新月异的时代大势中，而且回答和讨论了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现实问题。这些现实问题主要有：

一、“经济文化时代”应有怎样的文化与文学

1984 年 11 月，《当代文坛报》和《特区文学》联合召开“文学的改革与改革的文学”座谈会，在全国率先探讨了商品经济运动中文学的地位与价值，以及由商品经济运动所引起的人生、人际、人伦关系的变化，调整与转型的关系的缔造，最早发现并解决了文学与商品经济的理论误区。此前，黄树森在 1984 年《当代文坛报》的“主编手记”中，已发表系列《评“经济文化时代”》的文章。他从一评直至四评，列出了《经济“蛊惑”文化》《世俗“暴动”精英》《时尚“非礼”高尚》《科学“调戏”艺术》等命题。值得注意的是，1988 年《当代》杂志连载广东作家钱石昌、欧伟雄合作的中国第一部正面反映市场经济的长篇小说《商界》，接着又有广东作家彭名燕创作的中国首部反映经济特区改革风云的长篇小说《世纪贵族》问世，影响广泛，领先全国“经济文化时代”文学潮流。评论家金岱教授以

《经济文化与人本文学》为题，连续发表了三篇论文，从人本学的高度论证经济文化时代的文化与文学的本质维护，提出了在经济大潮中如何坚持和建设精神绿化等重大而实际的文化课题。评论家李凤亮教授的《金岱写作的现代性立场》一文，对这些课题做出了深层次的发挥。

1988 年广州市作家协会成立后，扩充了文艺理论批评队伍，对黄锦鸿、宁泉骋反映改革开放生活的系列报告文学《南风畅想曲》进行了座谈。反映新时期商品经济生活的长篇小说《商界》发表后，理论委员会与省、市有关单位联合举办“商战文学”座谈会，省、市作家及评论家就“商战文学”的崛起、发展势头、影响与危机等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与会者认为，“商战文学”是开放改革时代的必然产物，是广州作家的优势。它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较早发轫于广州市作家章以武、黄锦鸿的中篇小说《雅马哈鱼档》，及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随后是钱昌石、欧伟雄合著的长篇小说《商界》以及张瑞龙的长篇小说《南中国人》。作者们敏锐地捕捉改革时代瞬息万变的信息，直接正面描写商品经济活动，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前惊心动魄的经济风云；在人物形象上突破了单一的奸商形象，塑造了丰富复杂的各种商界人物形象，反映了新的生活现象，有较深刻的内涵，体现了作家的艺术胆识。有的与会者也认为“商战文学”的名称不够科学、不够准确，提出质疑。这次会议对“广”字号的“商战文学”的成就、隐伏的危机及存在的不足，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为繁荣广州市的文学创作，推动城市文学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二、应如何认识改革开放前沿地与岭南文学的探索

广东文学界在新时期反观自身、试图从脚下的文化土层里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支点：这种意识是越来越自觉的。这既是一个从寻求突破、“走出五岭山脉”到清醒南北文学之不同、建设岭南文学的现实进程，也是一个从文学的讨论到文化的探索的逻辑进程。

新时期较早自觉地思考岭南文学特色的，是陈剑晖、郭小东二位。1982、1983 年，他们即陆续在《文学评论》等刊发表了《岭南散文风格初探》《试谈岭南散文流派》《岭南小说风格论》《再论岭南小说》等论文。他们以历史条件、传统文化、时代精神、政治气候和经济生活、地理环境、气候习俗作为根据或参照，在南北文学的对照中，从题材、主题提炼、表现手法、人物塑造、情节安排、地方色彩、艺术风格等方面来把握和论述岭南散文、岭南小说的独特风格。陈郭二位的几篇文章，是对岭南文学这一独特现象的理论概括，具有较浓的学术性和一定的学术价值。

正当陈、郭二位进行这样的学术探讨的时候，一个现实越来越不可回避：广东的文学创作落后了！若把这一现实与广东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又走在全国前列的另一种现实相对照，落伍感更沉重了。从 1984 年到 1986 年，广东文学界都在寻找突破的出路。无论是“广东当前的文艺创作如何突破？”的讨论抑或是“这里的文坛静悄悄么？”的发问，都贯穿了这样一种思考。它在思路上基本上遵循这样的“逻辑三段论”：正视现实→增强信心→力求突破。人们注意到广东作家感受力不敏锐、理解力不深刻、艺术修养和理论素质不富足因而概括力和表现力不强；也注意到广东文艺批评之薄弱。要突破，就得解决好这些问题。而所谓“突破”，就是要取得全国其实主要是北方文学标准的认同。

随着对广东自身越来越深刻的认识，随着地方文化意识的渗透，人们开始清醒：南北文化不同，南北文学亦不同。1986 年 3 月，老作家吴有恒提出“应有个岭南文派”的建议。《当代文坛报》地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它在 1986 年第 11 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南北文学何须求

同》。1987 年第 2 期又发表了黄秋瀛的《认同的困难》。这是一篇重要的文章。它宏观而深入地从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之差异这个角度审视问题，建设性地提出：“粤军重要的并不是讨论要不要加入寻根行列的问题，而是重新审视岭南的历史与现状，找出岭南与岭北的对比差，真正潜下心来，写出真正能反映岭南当代文采，反映岭南在改革开放的浪潮冲击下，心灵的蜕变、拓展的过程，写出真正的‘岭南人’——而不是穿牛仔裤的陕西大汉，也不是徒有岭南 ×× 公司经理‘名片’的香港人！”这是用以审视岭南文学的价值标准的一次深刻调整。这时，文能发表了《艺术与商品的逆向对流——对当前文艺现状的思考》和《踏着太平洋文学浪潮走来的珠江文学》两篇文章。他敏锐地抓住了“商品”这个幽灵，把它与文艺联系起来，思考了两者逆向对流的关系；他提出“珠江文学”这一概念，根据它的文化土壤来把握它的内在气质，并对它的未来作了热情、开阔的展望。这是富有时代感的思考。1987 年年底，郭小东从洪三泰的报告文学《中国高第街》敏锐地感受到一个信号：南方精神再度崛起。到了 1988 年，《当代文坛报》又专辟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学格局”的专栏，着意探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动中文学的选择，发表了张绰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文学》等一些文章。那几年张奥列对广东文学现状的反思以及从最新的创作实践出发的对都市文学的呼唤，也自成一家之言。

倘若说，这些还只是岭南文学在寻求突破、做出新的选择的过程中的思考，那么，1989 年《当代文坛报》开展的“珠江大文化圈”的讨论，便是种更加自觉的文化建设意识的体现。就已发表的近二十篇讨论文章而言，作者们一方面更有意识地更实证地从南北文化的反差中检视、疏理珠江文化的历史源流，描述、研究它的现状和特点，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他们不是为检视而检视，为研究而研究，而是着眼建设，面向未来，努力在中国文化与珠江文化、历史与现实、传统与时代等纵横交错的关系中寻找珠江文化——珠江文学的最佳支点。讨论中出现了像《种包容性的移民文化》（梁昭）、《近水则灵》（吕嘉健）等佳作。但是，总的看来，很多文章尚停留在罗列史料、描述现象的层次上，缺乏思辨色彩和理论深度。因为从地域到文化再到文学，中间存在着一些中介，文化的深刻内涵，或许就隐藏在这些中介里；由地域因素一步跳到文化乃至文学，所能得到的往往只是一种简单的比附、一种大而无当的浅显考虑，且极易滑入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误区。诚如《近水则灵》一文所言：“特定的人文地理环境影响到人种的精神性格，这需要作缜密的文化分析。”

谈起对岭南文学的探索，不能不讲到岭南作家作品的评论。由谢望新、李钟声合著，于 1984 年出版的《岭南作家漫评》即是这方面的突出成果。它是我省第一本专论本省作家的评论集。它共收入 27 篇评论，包容甚广，论述面宽，多数是作家作品论，其中，有对欧阳山、秦牧等老作家的研究，有对韦丘、岑桑等中年作家的评论，但更多的是对吕雷、伊始、张雄辉、丁小莉等一批青年作家的及时追踪和热情鼓励；涉及三十位作家的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样式的一百多篇作品。该书的作家作品论，不仅做到深挖每一部作品的思想，弘扬其意义，而且十分注意对每个作家的艺术风格、艺术个性以及艺术得失作细致入微的把握。作家作品论而外，还有三篇属于宏观扫描的文章，像《评〈花城〉创刊三年的中短篇小说》一文，视野恢宏，纵

横捭阖，洋洋洒洒二万余言，颇见功力。《岭南作家漫评》的最大特点是快速追踪、积极反映、“近距离”地评论作家作品，现实感强烈，显露出实际批评的鲜明特色。这样的评论，对作家有相当的指导意义。

第三章　“文化热”及其引发的地域文化研究热潮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现代西方文化学的传入，中国文坛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兴起了以“寻根文学”为起点的“文化热”。这类作品，以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小鲍庄》，阿城的《棋王》，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郑义的《老井》等小说为代表。它们大多以古老的农村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碰撞的故事，反映和寻觅阻碍改革开放的民族文化之“根”为题材，由于别开生面地触及现实和历史的实质，所以影响很大。又由于以同样视角审视民族文化劣根面的政论电视片和余秋雨散文《文化苦旅》的广泛影响，使“文化热”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一个重大文坛热点。这个热点的发端“寻根文学”，虽然很快潮退，但其所掀起的“文化热”却日益蔓延深化，扩展至整个文艺创作、文艺批评、文艺研究领域。如各种创作方法和流派，都不约而同地向这“热”点深化，各种地域性的文学（如“西部文学”“乡土文学”“岭南文学”“特区文学”）、领域性文学（如军旅文学、经济企业文学）也都朝着这个热点深化。“文化热”引发的地域文化热，尤其是对岭南文化、南方文化和珠江文化热潮的引发作用，是无可否认的。突出的事例是：

南北文化不同，南北文学亦不同。随着对广东自身越来越深刻的认识，随着地方文化意识的渗透，人们开始清醒：

一、岭南文化和“珠江大文化圈”

黄树森从 1997 年秋至 1999 年冬，以时任广东作家协会《当代文坛报》主编的身份，利用该刊每期有中心并有“主编手记”的方式，发表以“走笔岭南”为总题的系列评论，倡导岭南文化。分列题目是：一、走向岭南文化新时代；二、不甘边缘的岭南文化；三、岭南文化：崛起于近代；四、现代文化史上的岭南；五、岭南文化：走向现代；六、岭南文化：从冲突走向对话；七、岭南流行文化的勃兴；八、严肃文化：岭南文化的又一旗帜；九、当代岭南文学热点透视。黄树森又于 1999 年至 2000 年，以《当代文坛报》每期都发表“编后偶记”的方式，连续发表“珠江大文化圈”锣鼓之评论，分列题目是：之一、东西南北之“文化神秘地带”；之二、向两个极致挺进：大都市现代文明之状写与大众流行文化之确认；之三、以长篇小说为载体写中国商界运动的“第一人”；之四、以长篇小说为载体逼近中国改革史诗品格的优秀之作；之五、拿破仑从另一高度征服世界；之六、论“文化杂交”。黄树森还主持编著《叩问岭南》系列丛书，以及彰现岭南各地古今“九章”文化系列书系的出版，如《广东九章》《东莞九章》等。此后，江冰的《论广东文学“本土叙述”的苏醒》，梁凤莲的《拓展地域文学的创作资源》等倡导广东本土文化，也引起学界的关注。

二、新南方文学

郭小东于 2004 年 4 月 3 日于《羊城晚报》发表《新文化运动：呼唤新南方文学》一文提出，新南方主义文学构成有两个因素：一是广东已不再是原来的广东，泛珠

三角而地域边界模糊，异烁涌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广东，26年间广东涌入大量外省移民。本土文化在移民带来的文化氛围中渐次消解，从而形成一种新的人文形态。二是广东文坛满目是来自外省的文学青年。他们在外省完成学业，带着一种异地的文化情结和乡土的童年记忆进入广东，他们构成广东文学的新南方主义板块，在最近几届的“新人新作”评奖中，已难见到广东本土作者。这是一种必须面对无法回避的情势。南腔北调的作家构成，是新南方主义文学的题中之义。而乡土与童年记忆始终是作家的创作之母。以多年形成的南方文学风格和书写形式标准，是无法衡量这一板块的文学创作的。新南方主义文学标准于是应运而生。新南方主义背景下的广东文学，已不是旧派现实主义创作，而是现实对心灵的呼唤，是对日常性的异度颠覆，对经验的另类想象。近年被认为的广东文学新秀都是新移民，所写几乎都是他们过往的事，其创作都烙印着非广东的文学记忆。这也许不是我们当下期望的广东特色，但相信终将演化成所谓新南方主义的内容，催生一种新的广东文学。新南方主义文学背景下的作家们，尽管移民心态各异，创作各有千秋，但是，他们小说中的情感纠葛，都与都市的新生活状态有关。他们都偏执地努力于建立一种破碎、颓废、焦虑、困惑的精神结构。所谓先锋，所谓后现代，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是否应该实现这样的过程：建立在爱之上的文学批判；道德与伦理的文化意识；物欲与清洁精神的理性沟通。这三点也许正是新南方主义物质形态下生活模式的文学记号。在这个精神记号下的文学集结，正是广东文学姿态的全新彰显。

三、南方文化

谢望新于1992年春，以答《当代文坛报》记者问的方式，提出《南方文化论纲》。要点是：一、南方文化区别于各种地域类型的南方文化的主体精神与基本特征；二、南方文化代表作家、代表作品的被忽略及被歧见，恰好证明这种文化生存形态的现实存在；三、为南方文化的发展与强壮，提供优良的外部环境；四、南方文化正从创作群体、创作实践与理论批评各个方面体现出来；五、南方文化是一面耀眼的旗帜，但不是唯一一面旗帜。文中首先指出：南方文化首先是但又不仅仅是一个地域地理概念，更是一个历史概念和人文概念。它鲜明地区别于其他地域地理类型的文化。以广东为典型代表的南方文化，既区别于地域地理意义上的大南方文化，也区别于大南方文化中的“海派”文化，区别于以“京派”文化为典型代表的内陆文化、中原文化，区别于港台文化，区别于海外华文文化。南方文化就其本质而言，是开放式的。既对整个世界开放、也对中国内陆开放。不太追踪和迎合非正常非历史契合性的虚拟的“潮流”“思潮”，勇于和擅于求真求实求新。一方面，它既保留了民族文化血缘、亲情的历史联系与渊源，具备民族文化吸纳、同化与扬弃的能力；另一方面，更具有个性的差异，形成了自身独立的文化精神品格与文化人格力量。地域性与超越性，时空性与超前性，个性与时代趋向性相结合是其基本特征。

四、珠江文化和海上丝绸之路

黄伟宗自1991年发表《论珠江文化的典型代表陈残云》之后，一直倡导珠江文化。他于1992年被聘任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

至今，连任五届达 25 年之久，一直负责组织多学科专家进行珠江文化工程，坚持走“五个结合”（即：参事文史工作与学术研究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田野考察与文案研究结合、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结合、文化研究与多学科交叉研究结合）之路，以“走万里路，写千字文，著百种书”为方针，在“走万里路”考察研究的同时，提交“千字文”参事建议，主编和编著了几十种《珠江文化丛书》，包括三百万字的大型史著《中国珠江文化史》，确立了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并列的珠江文化体系，受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同志致信表扬。

第四章　新文化批评热潮

随着改革开放的迅速和全国城镇化地域的扩大，在 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大批农民工拥入城市，尤其是在经济特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改变了城乡的社会成分结构与经济文化形态，同时也改变了都市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社会生活与社会心态都发生巨大变化，促使许多新兴文化文学现象的产生和发展，特别是相应的新文化批评也应运而生。之所以统冠之新文化批评，主要是考虑其对象都是新兴的文化文学现象的批评，即使是对传统文化文学的评论，都是以新文化为视角的分析、以新文化内涵为重心的探寻，以新文化为参照系的评价，故谓之新文化批评。具体表现在：

一、新都市文学的批评

新都市文学，以张欣、张梅、刘西鸿等女作家的作品为代表，其作品尤受注目和欢迎。由于分别多次举行专题研讨会，所以许多评论家都参加过评论。较有影响的是英年早逝的中山大学教授程文超，他在《欲海里的诗情守望——我读张欣的城市故事》一文中指出：“今天的中国都市既是文明的消费中心，又是文明的消解基地——那里活跃着人生的各种欲望。都市，那是欲望的百宝箱、欲望的焚烧炉、欲望的驱动器。在这被驱动着、燃烧着的欲望里，一些属于文化的东西被烧毁了，一些属于文化的东西在火中生成着。很容易使人想起那句名言：一切都被颠了一个个儿，一切又都刚刚开始。这是太具诱惑的一块宝地，文学探寻的诱惑，文化思考的诱惑。张欣无疑抓住了这块宝地。近年来张欣的都市故事吸引着众多读者，成为都市文学风景线上的重要景点。张欣对当下都市的独特书写，昭示着都市文学创作的一种新走向。正是对这一走向的发现，使我产生解读张欣的冲动。一个敢于直面当下都市人生的作者，其都市叙事一定透露出时代文化精神变化的某些信息。”所以，他激动地说：“张欣不写都市，张欣便不是现在的张欣；都市而无张欣的小说，都市便会失去一片五彩的精神天空。”（程文超：《此岸诗情的守望——我读张欣的都市故事》，《文学评论》1996 年第 3 期）所以，如果说张欣是新都市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作家的话，那么，称程文超为新文化批评的典型代表之一，是当之无愧的。青年女评论家郭冰茹《关于“城市文学”的一种解读》一文，对城市文学的历史缘脉和概念的发展进行了翔实的考察论证，大有助于新都市文学的发展。曾在广东工作多年的评论家张柠教授，先后发表的《黄咏梅和她的广州故事》和《睡眼惺忪的张梅和一

广东作家群像


欧阳山


陈残云


秦牧


金敬迈



谢望新


吕雷


廖琪


杨克


张欣

座忧郁的城市》两文，以两位女作家的个案，对新都市文做出了精到的解读。

二、特区文学的批评

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广东开办的经济特区，深圳本是宝安县一个只有 5 万人口的农村小镇，珠海也本是中山县一个渔村小区，成为经济特区后，短短时间即变成了新的城市，是名符其实的新都市，有独特的经济文化，独特的社会结构，独特的生活方式，独特的文化形态，也必有富有“特味”的特区文学。当时青年评论家张奥列在《一种新的文学形态——特区文学初论》一文指出：特区文学的“特味”，不只是特定的题材，特定的生活内容，也不是特定的表现形式，而是特区人特有的社会文化意识。特区文学的取材角度可以是多向的，表现手法也可以是多样的，但都离不开从特区的特定文化形态上把握精神与物质的复杂关系，揭示特区生活的内在节奏，探究特区人的生存能力。特区的文化形态有别于内地。特区，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部。特区文化，是以民族传统文化为根，以世界现代文化为体。它的某种观念形态和政治形态，如伦理道德、人际关系、社会规范、政治体制、管理体制等，是民族的、体现中国国情。而生活的某种行为方式，如娱乐方式、消费方式、交际方式、就业方式、商品经济活动方式、信息传播方式等，则是现代的、新潮的，适应国际惯例和世界潮流。所以，特区有特殊的文化形态，特殊的文化意识，特殊的心理结构，特殊的行为价值，构成特区与内地有别的人文景观，为特区文学提供了深层“特味”的表现依据。此外，于爱成的《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谈新城市文学——以深圳文学为例》，以及申霞艳的《如何书写现代城市——以邓一光的深圳书写为例》两文，不约而同地从点到面地探讨特区文学深化课题。王素霞的《深圳意象论定稿》，从文化意象上论析了特区文学的“特味”形态，评论家李钟声对特区文学的现状与发展提出《沉淀·思索·起飞》的建议，切合实际而富有远见。

> 大批农民工涌入城市，改变了城乡的社会成分结构与经济文化形态，同时也改变了都市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三、打工文学的批评

随着改革开放城市化建设的发展，大批内地人特别是农村青年涌入城市，“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成为流行口头禅，使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东，成为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的主要目的地，形成了举世瞩目的打工潮，震动文坛的打工文学应运而生。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宝安《大鹏湾》、深圳《特区文学》开始发表一些反映打工生活的文学作品，随后在其他打工者聚集密度较大的佛山、江门、东莞、中山等地的文学刊物，如《佛山文艺》《江门文艺》等杂志，都大量发表打工文学作品，推出打工文学作家，推进了打工文学的发展，逐步形成为一种“打工者写打工”的文学现象，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学形态和作家群，同时也引发了对打工文学的新文化批评。打工文学首倡者杨宏海在《“打工文学”的历史记忆》一文中，说他在 1991 年发表的《打工世界与打工文学》一文中，便提出了“打工文学”这一名称。杨宏海在这篇文章还谈道：2007 年，深圳邀请刚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首位中国作家莫言前来参加讲座，莫言在这次讲座中说：“我感觉打工文学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而且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文学水准。这里边已经有了新人的形象，有人的尊严，人的价值。”2011

年，第九次全国文代会期间，莫言接受《深圳特区报》记者采访时又说：打工文学“笔下的文字是有温度的，通过对最柔软与最坚硬、最温暖与最无情地对比，触摸到人性最容易受到震颤的部分”。莫言对打工文学的评价提到人性关怀的高度。从杨宏海的叙述可见，打工文学从开始发现到莫言的评价，都是着意于新文化批评的。此外，论评打工文学的文章还很多，近 30 年来几乎年年都有论评问世，论评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有报刊述评，有小说论，有诗歌论，有散文论等，较有代表性的评论有谢有顺的《分享生活的苦——郑小琼的写作及其“铁”的分析》，柳冬妩的《“打工散文”：来自底层内部的身体书写》，胡传吉的《未知肉身的痛，焉知精神的苦——王十月小说论》，徐肖楠的《双重生活与独立写作——魏微的小说创作》，谭运长的《期待更加广阔的视野——关于“广东打工文学作家群”》，这些文章都程度不同地具有新文化批评风彩。

四、女性文学的批评

评论家江冰教授在《论广东女性写作的文学史意义》一文中提出：1990 年后，广东女性写作崛起，一方面是张欣、张梅等人小说渐成全国影响，一方面是“小女人散文”形成普遍关注并在命名上引发争议；两者互为映衬，相得益彰。20 年过去，除了张欣、张梅依然在大陆小说道路上前行，“小女人散文”倒是偃旗息鼓，成为文学史中令人怀念的“不长的片段”。细想下去，小说散文两路人马的出现，也是应时回响，可谓一个时代的产物。1990 年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呢？20 世纪 80 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盛极而衰，社会一下到了一个拐点，市场经济全面铺开，人的欲望迅疾打开，传统价值观溃败伊始，知识精英全面边缘化，一些原本坚固的东西仿佛一夜间烟消灰灭。于是，在人才一拨一拨“雁南飞”——广大内陆区域还处于一种风气转型的调整之时，广东，尤其是广州、深圳却仿佛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一如广东气候，鸟语花香，没有冬天，岭南文化的地气对接天时，广东原本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观念显现活力，与内地的犹豫彷徨比照，广东如鱼得水如沐春风地欢天喜地。于是，至少以下几点促成了女性文学的异军崛起，大致可以归纳成三个元素：都市、女性、日常，还与地域文化息息相关，地域文化使然。简而概之，历史传统、地缘优势、时代形势，构成的天时地利人和，使得广东人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恰逢其时地成为时尚，成为标榜，成为万众瞩目的时代先锋，成为重新构建的新的文化语境在 20 世纪 90 年代，广东女性文学的这种表现不但先行一步，而且几乎是唯一的。江冰之说，无愧是对 20 世纪 90 年代广东女性文学的新文化批评之高论。此外，英年早逝的女评论家陈志红，以发表《他人的酒杯——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阅读札记》一文，倡导女性主义批评，并以论著《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知识女性》《自由的缪斯》，全面地显示了她的女性批评实践，其新文化批评印痕也极其明显。

五、城市新文化现象的批评

（一）通俗文艺

评论家谭庭浩在《都市文化与通俗文艺》一文中指出：都市文化与通俗文艺曾有历史因缘。在当代现代化进程中，都市化导致个性与自由的受压抑和个体对自由的追求，这种追求有时表现为“梦”。通俗文艺，就是给都市里的大众制造的这样一个多彩的梦，更多地作用于受众的感官，使受众获得的一种层次比较低的快感、快逸，使受众的本能得到满足、宣泄、转移和某种程度的升华。武侠小说、惊险影片，某种舞蹈姿势，球类竞技，其引发人们兴趣，成为群众娱乐之事者，缘由莫不在此。时至今日，通俗文艺中最受欢迎的，也还是言情、武侠两类。琼瑶的几十本所谓“言情小说”，曾令多少芳心初动的妙龄女孩如痴似

醉，梁羽生、金庸的新派武侠小说，又使几多血气方刚的少年郎挑灯夜读、废寝忘食。那里是一个清纯、浪漫的世界，是一片非现实的自由天空，是一个本能于此获得了满足和滋润的“梦”。通俗文艺是为了满足受众的需求而出现和存在着的。所以，它带有一定的被动性，这是由受众的特性决定的，在作者、作品与受众之间，存在着一种“供求”关系，有为“市场”经营的意味，有商品性，但它又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是受众为了满足自己消遣娱乐需要的精神物品，是一种沉入其中当下获得宣泄和瞬间快感的精神剂。所以，它具有商业性、消遣娱乐的一次性、流行转换性和非个性化、非作者化倾向。在中国它还渗透着浓厚的道德训谕因素。要认识到通俗文艺在文化整体格局中的价值和意义。这些见解，可谓从文化上抓住通俗文艺要领的新文化批评。

（二）网络文艺

评论家张德明在《审美日常化：新世纪网络诗歌侧论》一文中指出：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以来至今随着新诗与互联网的携手并肩，网络日益成为当代中国新诗最主要的创作平台、发表领地与传播空间。据不完全统计，每天在国内 400 多家大小诗歌论坛与网站上发表出来的新诗，总数达到 4000 首以上（不包括在多家诗歌网站与论坛重复张贴的诗歌作品）。以此推算，每个月出现在网络上的诗歌新作数量要超过 10 万首。而今，随着资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许多诗人又纷纷在互联网上开设了自己的个人博客，博客也因此成了当下多数诗人张贴自己新作的最重要场域，毫不夸张地说，每天借助博客而面世的诗歌都是成千上万的。如此可观的诗作数量似乎向我们表明：网络就是新世纪诗歌的一个催生婆，它将无数诗歌爱好者、创作者的创造激情与发表欲望煽动起来，让那些诗歌的“婴儿”纷纷降临到互联网的界面之中，降生到无限敞开的赛伯空间里。互联网正在创造着中国新诗的当代神话。而在张德明看来，异常活跃和繁盛的新世纪网络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审美日常生活化的高度统一，从而带来中国新诗的某种美学革命。可见这是一种很现代、很先进的文化现象，虽然在早些年已有网络小说出现，如奇幻小说、穿越小说、耽美小说、架空小说、修真小说等，但总不如网络诗歌那样易于呼应、易于成潮，所以这种文化现象值得格外关注。

（三）网络文艺批评

学者苏桂宁在《网络文艺批评的领域拓展》一文中指出：20 世纪末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互联网，给中国社会的公共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拓展。网络技术在不断改变着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也改变中国的文化结构。互联网成为现代中国社会文化重要的集聚平台。网络文艺批评由此而生，并已经在当代文学批评中广泛运用，成为当代文学活动的主要组成部分。面对新的文艺形势，网络批评的研究意在广泛深入地发掘新的文艺元素，理清新的文艺关系，发现和协调新的文化关系，以便对当代文艺发展有新的认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网络技术的出现给文化传播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它在诸多领域以及各个环节上都给文化传播提供了非常强大的技术支持，尤其是对批评话语权的重新配置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另一种文艺批评格局

也由此出现。以网络媒体重新组织文学以及文化批评在大众文化网络时代是非常突出的。众多的批评者和接受者聚集在一起，在网络平台上讨论文艺问题，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文艺批评状态。这种状态所显示出来的就是网络批评权力的重新配置。传统批评由于受到纸质媒体的门槛制约，也因此形成了垄断化的格局，批评的权力只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在大众文化的背景下，众多的批评者加入了批评的队伍，使人员发生了变化。网络批评的出现导致了批评话语权的转变：精英批评的话语权受到影响，精英批评不再是唯一的声音，大众批评的声音可能会形成合力整体地影响到批评的走向。不过，大众文化的去中心化未必一定会使精英的批评话语受到削弱。相反，因为更多的人关注文艺、关注批评，网络传播媒介强大的传播功能可能会使精英批评拥有更为广大的空间。这是非常贴近时代脉搏的见解，是非常有见地的新文化批评。

六、文体分类文学的批评

（一）小说文体批评

文体分类文学的批评是传统批评方式之一，但在新时期以来的粤派文评中，尤其是自 20 世纪末以后，以新文化批评进行文体分类文学批评的现象越来越多了，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的批评，或者是对某时某地文学现象的概论或成就的总评，或者是对个体作品或作家的评论，大都以文化为视角或透现新文化的色彩。例如，时任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的蒋述卓教授，发表对广东近年来中短篇小说创作总评文章，题目就是《异质文化交流与碰撞的结晶》，开笔即申明：从改革开放使广东成为“中国最为庞大的移民地区之一”，移民作家成了“广东文学创作的核心力量”的实际出发，从“作家的成长与地域文化之间存在着永难厘清的复杂关系”上，探寻广东地域文化为这些移民作家提供了怎样的精神资源，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怎样的审美契机，探究广东新移民作家群崛起的现象中，隐含了怎样的文化信息和审美追求。可见这篇总评论文，首先立足的是文化视点。二十多年前，尚是青年的评论家张奥列，在《岭南文学的流行意趣——广东小说创作态势》一文中指出：广东作家喜欢捕捉时代的足音，但不大注重对文化意蕴的开掘，因此作品也难以深化。最近有些青年作家开始意识到这点，创作逐渐流露出一种文化意向，但广东小说创作总体格调的明快、轻灵、风趣，与五光十色、新奇变幻的南国生活相吻合，这是长处，或许同时也是某种局限，影响某些作品进入哲学、美学的高层次。不过，作家可能根本无意作此追求。广东文学显示的是一种平民化倾向，基本上属于大众文化。时下文坛花样翻新，这未尝不是一种创造。这是以文化参照系评析广东小说创作与北方作家的差异及其文化特点之高论，可见广东兴起的新文批评已有较早时日。老评论家张绰《从文化视角看黄谷柳》可谓这类批评之作家论代表作（值得特别介绍的是：张绰是张奥列的父亲，两父子都是评论家，两代人同为广东文学评论做出了贡献）。再者，现任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林岗教授的《论丘东平》，刘卫国的《丘东平“战争叙事”特征新论》，以及粤籍著名评论家杨义教授的《华南文化勃兴和本土作家特色》等文，都是这类文体的新文化批评佳作。

（二）散文文体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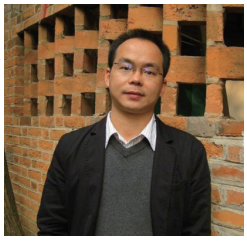
新时期以来，随着散文观念的更新突破，当代散文的文体获得了空前的解放。面对着这种“破体”甚至“失范”的创作态势，华南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剑晖发表题为《散文观念的突破与当代散文的前途》一文，面对当今“破体”与“失范”的当下散文，从“大”与“小”、“优雅”与“粗野”、“真实”与“虚构”、“在场”与“出场”四个方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散文创作进行反思。他认为，只有多一些现实意识和文化意识，并立足于传统，立足于现代的大视野和当代散文创作的实际，才能脉准当代散文的症结所在，才能找到突破方向。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便发表了《论秦牧散文的艺术风格》（《文学评论》1981年第1期）等散文研究文章，特别是与郭小东合作的《岭南散文风格初探》（《文学评论》1982年第2期）一文，产生了较大影响，被多家报刊转载。文章指出：岭南散文已形成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流派。这个流派，是因其有独特的历史条件和传统文化的因袭形成的，除了受到时代精神和政治气候的制约外，尤其受到地理环境和气候习俗的影响。从自然环境来看，岭南是“清绝之地，秀丽之乡”。这里有水碧沙明的自然景物，有秀丽的丛林、涂涂的溪流、青翠的山野；有清新的空气、明净蔚蓝的天空，四季如春的气候。而这一切丰富多彩的大自然的形象，不仅能够引起岭南散文作家的想象和柔情，而且陶冶着他们的文笔情趣，为他们创造共同的文学风格提供了环境基础。是的，岭南散文正是明丽的景物、温和的气候与南方人民那种明朗乐观、秀丽多情的情操结合起来的产物。再从人情习俗方面来看，岭南地区自古以来便有清谈的风尚，而分布散落于城镇乡村的茶楼酒馆、榕荫葵棚，则又是夏天或饭后谈天说地的好场所。这种风气日复一日，



黄树森

林岗





李德南



唐诗人

滋生蔓延，自然也就影响到岭南的文风。正由于环境风气的造化，所以，虽然受到同一时代精神影响，岭南散文却不同于北方散文。这也许就是杜甫的所谓“造化钟神秀”吧。这些以散文笔法写的评论文字，不愧是情文并茂的新文化批评文章。

除了研究广东散文，陈剑晖的“诗性散文”理论和中国现代散文文体研究也颇受关注。他先后出版了《散文文体论》《现代散文文体观



张培忠

念与文体演变》等13部专著，并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散文的文体变革》（2001年第5期）、《中国散文理论存在的问题及其跨越》（2005年第1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2009年第2期）、《文学传统的借鉴与当代文学的振兴》（2017年第11期）等4篇长文。在《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散文的文体变革》一文中，他对文体进行了新的界说，将其划分为“文类文体”“语体文体”“主体文体”“时代文体”四个层次。由于其论文富于问题意识和原则性，发表后有15篇被《新华文摘》转载，其中有3篇作为重要文章上了《新华文摘》封面。其成果获得第一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第二届、第四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办）；教育部第三届、第四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奖项（教育部主办），提升了粤派批评的水准和影响力。此外，李德南的《另一种文化大散文——以熊育群的作品为例，兼谈文化大散文的写作伦理》，散文家艾云的《寻找世界的彻底性而非通俗性——关于筱敏的写作》，也都是值得一读的新文化散文批评。



蒋述卓

（三）诗歌文体批评

评论家向卫国在《世纪之交广东诗歌崛起的文化生态考察》一文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广东诗歌渐趋繁荣，一系列重大的诗歌活动都与广东有关。这一现象既反映了诗歌的多元化走势，也是广东的良好诗歌生态环境作用的结果。广东诗歌的文化生态特征主要表现在：海洋文化与亚热带地理气候的人文影响；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强势与政治宽松环境；外来诗人及其与广东本土诗人的融合带来的诗歌生长新因子；世纪之交广东诗歌的崛起。”这段短短的文字，精炼地概括了广东诗歌崛起的新貌，同时也显现了诗歌文化批评的风采。评论家陈实则以《历史与现实之间》一文，对同是广西籍移民广州的诗人杨克的诗作进行了全面论析，对杨克诗歌创作的发展轨迹及其特点的论述到位而翔实，尤其是指出杨克诗作虽然运用不少现代西方手法，诸如诗中时空的左跨度交叉，不规范的诗行，反语法的句式，结构和修辞欧化等，明显地受到外国诗歌的影响。然而其根本仍是立足于本民族的，其诗作出自他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整体审视，出自他对广西民族精神性格的理解。这是他对

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摸索和追求，他对文学新观念的敏锐感应和进行创作的厚实而深广的基础。显然这是以新文化批评切中杨克诗作根基的精辟诗论。温远辉的《唯有诗歌，是时间和生命河流的归宿》，透过对广东诗人陈陟云作品的分析，新颖而深刻地阐述了诗歌是透过时间与生命河流达到诗性世界之独特途径的重要原理。龙扬志的《贫乏时代的诗性思考——东荡子浅论》，以对诗人个案的分析，透视了时代的诗性文化现象。还值得注意的是诗人黄礼孩《风中的诗歌事业》一文，叙述了他自己如何“坚信做一些他人想不到的东西，会让诗人看到诗歌不一样的生存状态”之文化理念，创办纯粹民办的《诗歌与人》并一直坚持二十多年的切身体会。由于这个杂志，每一期都有明确的“主题”，是专题性诗刊，又由于它对中国当下实力诗人的广泛掌握和团结，几乎每期都出彩，目前已成为我省在海内外最具影响力的民间诗刊。尤其是它先后打造出“70后”“中间代”概念，是首创的诗歌断代史概念，也是断代的文化概念，具有为中国诗学和史学做出代分的重要意义。可见黄礼孩《诗歌与人》的实践，不仅以文化理念开拓了民办诗刊的生存空间，开拓了诗歌文体的新天地和新文化现象，也开拓了诗歌的新文化批评。2003 年 9 月，诗评家朱子庆长篇评论《广东：一个诗歌大省的新的崛起》，证实了这个评价，也揭示了珠江诗派和珠江文评走进新时代的欣欣向荣。



谢有顺



黄礼孩

第五章　关于“粤派评论”丛书和“珠江文派”书系

2016 年夏天，暨南大学中国文艺评论基地、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羊城晚报》等单位联合举办“文学评论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生成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的近百名学者和文艺理论批评家与会。会上，陈剑晖教授作了《“粤派

批评”的可能性》的专题发言；居鄂的粤籍评论家古远清教授则以“学术相声”的形式，提出应当有粤派批评。随后，《羊城晚报》于2016年6月5日推出整版的“粤派批评”讨论版，发表了陈剑晖的《“粤派批评”已是一个客观存在》一文，并配发了洪子诚、杨匡汉、蒋述卓等著名学者的赞同或反对意见，受到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慎海雄的肯定，并针对《羊城晚报》这一版作了批示。随后，广东人民出版社邀请陈剑晖教授策划并实施出版“粤派批评”丛书，后又有蒋述卓、林岗、郭小东、宋剑华、贺仲明等著名学者加盟任总主编和执行主编，这样，“粤派批评”丛书便于2016年年底正式启动了。《粤派评论丛书》计划出版50本，第一批18本已于2017年年底出版。丛书分两个方面：一是文选35本。精选近现代以来各时期35位最有代表性的粤籍批评家，每人出一本代表性文论集，分四个版块出版。分别为：“大家文存”“名家文丛”“新锐批评”“新世纪粤派评论”。二是专题著作15本，如《“粤派批评”发展演变史》《“粤派批评”与现当代文学史》《中外粤籍批评》《“粤派批评”视野中的“打工文学”》《“粤派”网络评论》《“粤派批评”纪事》《文学地理学与“粤派批评”》《“粤派批评”与港台及海外华文文学》等。

从目前的态势看，“粤派评论”口号的提出以及围绕这一概念的讨论与出版，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一次较有广度和深度的文学事件，甚至“是一个现象级的文化现象”（引自“粤派批评·陈桥生工作室”成立致辞）。其根据是：一、《羊城晚报》自从2016年6月5日打出“粤派批评”的旗号后，迄今已组织了几十个版面讨论“粤派批评”，并成立了“粤派批评·陈桥生工作室”，慎海雄全程参加了2017年12月1日在珠岛宾馆举办的“‘粤派批评·陈桥生工作室’成立暨研讨会”并作了指示。

二、“粤派批评”第一批18本书出版后，广东省文联、广东文艺评论家协会与中国文艺批评家协会，于2018年1月13日联合在北京举行“粤派批评研讨会”，中国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仲呈祥等专家学者给予充分肯定。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指出，流派要有旗帜，要旗帜鲜明地写出理论主张；要有围绕着理论主张的一大批作家和批评家的著述和成果；要代代相传，形成一支重要力量，做出突出贡献。若从这三个方面来看，“粤派批评”有自己的优势和特色。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庞井君认为，“粤派批评”早已形成其独特气质，“广东的文艺评论家、文艺理论家思想活跃，著述颇丰，既重视传统文化的积淀、积累和积蓄，又注重针对现实、面向未来的实践性、开放性和创造性，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三、2017年6月27日，《文艺报》理论与争鸣版，整版发表了古远清《“粤派批评”批评实践已嵌入历史》，这意味着关于“粤派批评”的讨论从广东走向了全国，成为当下文艺评论界一道亮丽的文学风景。四、自从《羊城晚报》打出“粤派批评”旗号后，各相关文艺部门纷纷召开“粤派批评”研讨会，仅省作家协会便召开3次相关会议，共议粤派评论的历史与现状，共商今后发展大计，以期“粤派批评”掀起更大热潮。

在“粤派批评”如火如荼展开之际，2015年夏天，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在佛山南海区委区政府鼎力支持下，与广东旅游出版社合作，联合进行《珠江——南海文化书系》工程，被列入广东省原创精品出版项目。这个工程项目，计划编著三个书链22部论著，倡导珠江文明、珠江文派、珠江学派。所以，它是与“粤派评论”齐头并进、展翅齐飞的另一个广东文化与文学现象。相信这两套书系的完成，将标志着广东的文艺批评和理论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甚至有可能迈上新的高峰。

第二编

改革开放与广东影视

主　编：郭小东
副主编：易文翔

第一章　复苏与探索

一、电影生产的恢复与重建

1976 年 10 月“四人帮”被粉碎、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电影的发展状况与全国总体形势一致，走向清理积弊、恢复生产的阶段。

1966 年至 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都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冲击和破坏，电影事业也遭受巨大的摧残。当时全国百姓只能观看“三战”（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和“八戏”（八个“样板戏”），电影艺术严重退化，整个行业几近崩溃。广东的电影业，以 1956 年年初筹建、1958 年正式投产的珠江电影制片厂为代表，文化大革命前拍摄的《南海潮》《跟踪追击》《七十二家房客》《大浪淘沙》等故事片，赢得良好口碑，确立了广东电影在中国影坛的地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珠江电影制片厂与国内其他电影厂一样遭受厄运，全厂停止生产搞运动，老艺术家方徨、陶金、王为一等被污蔑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影片《南海潮》《逆风千里》等被打成“毒草”，电影创作整体瘫痪，从 1966 年到 1974 年八年时间，珠影厂没有拍一部故事片。“四人帮”粉碎后，全国开始拨乱反正，各个电影厂的生产开始恢复。

1978 年 12 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1979 年，在全国第四届文代会上，邓小平在祝词中承认文艺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明确提出“不要横加干涉”“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邓小平《在第四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祝词》，载 1979 年 10 月 31 日《人民日报》）。1979 年春《人民日报》开展的“怎样把电影工作搞上去”的讨论，创作和理论界就电影与戏剧、电影与文学、电影的民族化、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电影的创新、电影的艺术特性等内容展开讨论，在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的促动下，电影业开始摆脱极“左”思潮的影响，开始对“文化大革命”和前“十七年”展开反思，电影创作突破旧有模式，重新遵循艺术创作规律，探索艺术表达手法，形成了艺术恢复的整体氛围。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珠江电影制片厂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陶金、王为一等艺术家重新回到工作岗位；1977 年将革委会领导体制改为厂长制，集中清理积案，重新调整创作题材规划，这一年没有拍摄故事片，拍了几部新闻纪录片。随后几年，故事片产量开始提升，文化大革命前故事片年产量平均不足 5 部，1978 年完成了 5 部故事片，1979 年摄制了 7 部艺术片（5 部故事片、2 部戏曲片），第一次超过建厂时所设置的 5 部标准，进入 20 世纪 80 年

代后，则远远超过这个标准，这一时期的电影创作、生产，为新时期广东电影的第一次高潮奠定了基础。

二、电影创作的复苏

珠江电影制片厂恢复生产，大批下放劳动电影编创人员调回电影工作岗位，他们很快投入电影的创作生产，电影厂的产量迅速赶上 20 世纪 60 年代初水平，1978 年出品 5 部故事片：《同志感谢你》《春歌》《斗鲨》《不平静的日子》《蓝天防线》。

《同志感谢你》（陈鹰导演）围绕城市清洁队成员工作、生活，通过他们的思想交锋和碰撞，传达“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职业高低”的观念。影片体现了阶级斗争观念，穿插忆苦思甜的内容，仍有一些旧的痕迹。《不平静的日子》（于得水导演）通过江南炼油厂两种力量的对抗揭批



故事片《同志感谢你》海报

从左至右：故事片《斗鲨》《不平静的日子》《蓝天防线》《春歌》宣传海报









“四人帮”罪行，反映人民群众与“四人帮”做斗争。与前两部城市题材不同，《春歌》（陈岗导演）属于农村题材，通过两对青年的婚事反映农民的团结、农村的欣欣向荣。《斗鲨》（陶金导演）、《蓝天防线》（王为一导演）属于反特侦破片，分别讲述解放军在陆、空两个领域粉碎瓦解敌特分子阴谋和破坏行动。

从上述影片的主题可以看出，在中国政治历史转折初期，电影创作虽然开始恢复，但长期以来依附的思想意识并不能迅速改变。新的思想体系尚未建立，旧观念、旧传统暂时无法被完全取代，政治上清除旧弊更多的是采用原来的套路，电影创作也不可避免沿袭旧有的模式。因此，复苏初期的电影有着某些趋同的创作倾向，并持续影响了三五年的时间。

复苏初期的电影创作，为了迅速找到电影与市场的结合点，一些电影人从自己擅长的战争、反特题材入手，如《蓝天防线》《斗鲨》以及后来的《雾都茫茫》（张波导演）、《与魔鬼打交道的人》（林岚导演）、《东方剑》（王进、胡柄榴导演），这些反特、侦破题材电影，通过惊心动魄的故事吸引观众，这些影片对于长期以来艺术接受匮乏的观众而言，重新感受到故事、电影的魅力，是一种久违的重逢。战争题材的影片，如《山乡风云》（方荧导演）、《一个美国飞行员》（王为一、王毅导演）、《白龙马》（黄粲、黄丹彤导演）、《海望》（刘洪铭导演）、《梅岭星火》（卢珏导演）以及改编自同名小说的《山菊花》（陈鹰、邢吉田导演，李平分、陈鹰等改编）、《三家巷》（王为一导演，王为一、曾炜改编），也是这一时期一大类型，这些影片将观众带回历史，唤醒民族意识，容易产生共鸣，在当时受到观众的青睐。

清除“四人帮”遗毒及迫害，是当年首要的政治任务，复苏初期的电影创作顺应时代政治变化，清理“四人帮”祸害、反思文化大革命是最大的主题。在电影中具体表现是对“旧”的否定以及对“新”的向往。对“旧”的否定主要集中在城市题材影片。这些影片主要是揭批“四人帮”，控诉、反思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伤痛。反“四人帮”的政治概念电影，将旧有的套路稍加转换，从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抓生产，变为反对借抓革命破坏生产，从批判对象是厂长、工程师变为革委会副主任、工会主席，如《不平静的日子》，这部影片的宣传教育意义大于艺术上的追求，是政治要求的“急就章”。在伤痕、反思文化思潮的渗透下，之后几年的电影创作，出现了一批文化大革命题材的作品，如《海外赤子》（欧凡、邢吉田导演）、《恶梦醒来是早晨》（王祺导演）、《他爱谁》（冼碧莹导演）、《扬帆》（詹相持、石斌导演）、《在这块土地上》（徐丹、王毅导演），等等。

对“新”的向往主要体现在农村题材作品，与《春歌》有着相似的风格。如《回头一笑》（张良导演）、《皆大欢喜》（罗树淇导演）、《张灯结彩》（曹征、蔡元元导演）、《喜鹊岭茶歌》（于石斌、洪平导演）等，多为喜剧风格，表现新风战胜旧习，团结、向上的新风尚。

这些影片虽然在艺术上尚未完全摆脱旧传统，但可以看出，广东电影及电影人开始努力打破束缚、尝试多样化的艺术表达。比如王为一，在《一个美国飞行员》以当年赴华助战的美国飞行员视角回顾抗日战争，以第三者的身份讲述战争，复原历史的真实面貌，增强影片的真实感和历史感；在《三家巷》中，将小说原著的地域特色影像化，向观众展示了一幅幅浓郁岭南风情的画卷，他的创作较之文化大革命前的作品更具有观赏性和开阔的艺术视野。再如《喜鹊岭茶歌》，是国内第一部反映畲族

生活的故事片，将民歌融入电影，使得故事更民族化、生活化。在主题表达上，广东电影创作也有比较鲜明的自主意识。如反思的影片，《回头一笑》中“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生产队长最终悔悟，《噩梦醒来是早晨》女教师成人之美的举动，《扬帆》中不记前仇的歌唱家等，都彰显着人性的光辉，在痛定思痛之余着眼于未来，较之单纯控诉的作品更贴近时代的要求。又如《海外赤子》以海外华侨的故事独辟蹊径，以海外侨胞悲欢离合的故事反映爱国华侨心系祖国的赤子之心，“四人帮”的戕害能阻碍一时，却永远无法割断血脉的相连。一曲《我爱你，中国》把海外游子眷念祖国的无限深情抒发得淋漓尽致，传唱至今。影片和歌曲都成为经典。影片荣获文化部 1979 年优秀影片奖，1983 年获首届广东鲁迅文艺奖。此外，在回望历史的作品中，历史人物传记电影《毕升》（于得水导演）塑造了一个勇于冲破封建桎梏、破除愚昧迷信，为人民造福的毕升的形象，影片被中宣部、文化部选为首届全国百部爱国主义优秀影片；通过两姐妹命运在新、旧社会对比控诉旧社会、歌颂新社会的《梅花巾》（张良导演）努力探索影片结构上的民族形式，将故事与演唱结合，并融入苏州的刺绣、评弹、园林等民族艺术与地方特色，在反映生活和艺术手法方面有新的视角，影片荣获菲律宾第一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金鹰奖，1983 年又获得第七届开罗国际电影节金像奖，这是珠江电影制片厂第一部获得国际奖项的电影。

总体而言，在复苏初期，广东电影创作在题材、风格、样式方面力求多样化，有的影片冲破“三突出”原则的束缚，恢复中国电影现实主义传统；在表现形式方面，学习和借鉴新的表现手法，开始新的艺术探索。

三、电影的新探索

1979 年之后，经历了拨乱反正的过渡与恢复期，廓清文化大革命影响，电影人摆脱“左”的窠臼，重新认识关于“政治—艺术”的关系，确认电影是艺术成为复苏初期中国电影探索的主要目标。这种探索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方面，从思想意识上破除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形成的“工具论”的电影观念，使电影回归艺术；另一方面，从美学角度孜孜不倦地探寻电影的艺术特性、艺术本体，使电影在获得艺术名义的同时拥有具体的艺术内涵。广东电影在艺术这种探索进程中，创作出了不少风格焕然一新的作品。

（一）《春雨潇潇》

《春雨潇潇》由苏叔阳编剧，丁荫楠、胡炳榴导演，魏铎摄影，珠江电影制片厂出品，1979 年上映，是国庆 30 周年献礼片之一，1979 年荣获文化部青年优秀创作奖。

影片讲述护士顾秀明护送伤病员乘火车离京南下，其丈夫冯春海身为公安人员，按上级命令追捕“天安门事件”的“反革命分子”陈阳，截停了火车。顾秀明根据通缉令认出伤员即是陈阳，但正直善良的她决定保护这位英雄。在老年女诗人许朗、假小子女演员、出租汽车司机、老工人张伯伯等人的帮助下，顾秀明与自己的丈夫斗智斗勇，经过思想斗争的冯春海最后“倒戈”，为陈阳发放了通行证，夫妻二人在雨雾中相拥。

《春雨潇潇》的与众不同在于影片的人物设置、戏剧结构以及镜头运用等方面。影片选取社会政治冲突仍然激烈，“四人帮”势力仍然猖獗，但人民群众已认清其面目，反抗力量暗流涌动的时期为背景，以人民默悼周恩来总理为基调，讲述了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们因同一信念团结起来保护“四五事件”中的英雄的故事。片中的人物，列车长、旅店工人、假小子女演员、出租汽车司机、通风报信的邻家小姑娘，他们的言行，表明了各自的态度，集中体现了在那看似喑哑的、“于无声处”的年月，人民群众并非不分是非黑白，

一个个普通人以自身的行动对“四人帮”进行反抗，说明民心总会倾向“光明”和“正义”。即便是冯春海这个人物，编剧并未以脸谱化的方式贬低他，“追捕”过程中的细节表现他的尽职尽责、明察秋毫以及沉着、稳重的个性，他的转变，影片没有直白地表现，而是通过妻子的劝说、众人的态度、他自己的觉悟以及他对妻子的爱等等因素潜移默化地实现，他在蛛丝马迹中发现群众维护“逃犯”，没有揭穿，可见在他心中有“法”与“情”的权衡。最后面对“逃犯”陈阳，他掏出来的不是手铐而是通行证，这是人民群众的“胜利”。可以看到，与政治概念先行、敌我界限鲜明的影片不同，在这部电影中，没有绝对的反面人物，所有人身处政治漩涡中，却能出于本心，遵从本善，使影片流露着真实感人的人情味。

在戏剧结构上，影片围绕着帮助陈阳“出逃”展开，陈阳的命运始终牵引观众，冯春海的追踪使得这个过程一波三折、跌宕起伏，而冯春海、顾秀明夫妻二人最终的“对决”也令观众“期待”。各种悬念构成戏剧冲突，逐渐达到高潮。最后在渡口，顾秀明误认为早已在此等候的冯春海是来抓捕陈阳而狠狠地甩了他一巴掌之后，冯春海掏出通行证这一行为，使得本以为会面临的一场前功尽弃的绝望的悲剧，瞬间转换成了正剧。当顾秀明再次伸手轻抚丈夫刚刚被打的面颊时，这一幕足以唤起观众“人同此心”，与剧中人物一样，悲喜交加，难以言说。这种结构方式，可以说是对文化大革命遗风和“样板戏”模式的一次突围。

《春雨潇潇》更独特之处在于它诗意般的意境美及其电影艺术的镜头运用。编导在情境抒写人物的心灵之美，描写真实、深沉、自然，每个人物都充满内心的矛盾，处于思索、判断的状态，并引发观众的思索与判断；影片富含诗意的意境美，春雨潇潇，隐喻着愁情哀愫，又孕育着万物生机，与主题呼应，构成一幅富有形象寓意的抒情画卷。在镜头运用上，摄影魏铎“充分地发挥了长运动镜头的真实、连贯、运动性强的特点，用变焦镜头、移动车和升降机相结合的方法，以及强调画面构图中的前景设置，大量利用了雨和

电影《春雨潇潇》海报



烟的效果，造成抒情的意境。在光的运用上，使画面的暗部层次得到充分显现，追求真实、自然的生活气息”（丁荫楠、胡炳榴：《风格——一部影片的个性——〈春雨潇潇〉导演小结》，《电影导演的探索》第 285 页，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1 年 8 月版）……如此种种，影片形成了独特的象征性影像系统，令观众耳目一新。

（二）《逆光》

《逆光》是由丁荫楠导演、秦培春编剧、魏铎摄影，珠江电影制片厂出品，1982 年上映的影片。该片荣获 1983 年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

“逆光”二字，隐喻时代大潮流中的逆向思考。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社会进入新时期，一派欣欣向荣的姿态，“伤痕”之后的文艺创作极力拥抱经济发展带来的改变。这部电影却以一种“另类”的视角“逆光”观察，以造船厂一群青年人的工作、生活展现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状态、生活压力、情感归宿以及各种社会矛盾、思想冲突，反映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在物质、精神双重追求上的种种困惑，谱写了一曲转型时期的深沉的都市交响曲。影片直言不讳地道出发展进程可能出现的隐忧，如拜金主义、崇洋媚外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因 1000 块钱的诱惑抛弃男友转投有钱人怀抱、公交车售票员叫中国老人给外国青年让座的“自我矮化”行为等；又如如何正视物质追求的问题，共青团员大会批判廖星明与外国人合影，是受物质诱惑丢祖国的脸时，廖星明所说的“正是人类对物质文明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才带来社会的发展”“如果我们这一代把追求和向往化为创造力，那么未来就有一个富强而美丽的祖国”，这些都引人思考。影片通过新旧时代的交替（如“我心中叠印着”“一个古老的中国与一个现代的中国”），两种思想的交锋，两种命运的对比，爱情的选择是物质还是精神，是现实还是理想等各个角度的探索，将多重主题交织在一起；通过对青年群体心象的塑造，深入人物内心，完成了一次对时代的追问。

这种追问，在影片中是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的，“我”不断地通过念白传达着主观感受与理性思考。夹叙夹议的叙事方式，将叙述者的回忆和叙述者当下的叙述融为一体，形成时空交错、虚实结合，于是讲述、回忆中人和事的写实性，当下叙述的抒情性，以及展望未来的哲理性，三者有条不紊地呈现出来，这是电影叙事与艺术表现手法上新的探索，打造了影片独具一格的气质，同时呼应了“逆光”这个片名。影片最后的那首诗：“朋友啊朋友，你可不要忧愁，/ 你说生活像沙漠，因为你心上没有绿洲，/ 先做个绿色的梦吧，才会有金色的秋；/ 你说地上有阴影，因为你总低着头，/ 挺起胸来，迎着太阳走，/ 把黑色的阴影抛在身后”为“逆光”这一主旨作了最好的注脚。

《逆光》艺术探索另一个的亮点在于摄影。摄影魏铎在《春雨潇潇》中已经展露了不同寻常的艺术表现能力，《逆光》则是更上一层楼。首先，造型恰当，用光合理。造型上，如运用城市空镜表现万物苏醒、春意盎然景象，接着人流、车队、雨水、伞群，潇潇春雨中生活征程开启，艰难与希望并存，告别过去，迎向未来；又如“春天踩着湿漉漉的脚步走来了”，这样一句诗意的文学语言，摄影师巧用造型——丝丝细雨、湿漉漉的地板、撑伞的人群等，将抽象的文字具象化。在光处理上，如将主人公廖星明的轮廓光与高耸的建筑物对照，喻示“欲与天公比试高”的心气；又如男女主角在逆光中倾诉衷肠，身披金色余晖，呈现逆光的别样美。其次，在气氛烘托、色彩匹配以及节奏上，把握精确，如刚出熔炉的锻件的金色光芒映射在笑容上，与如火如荼的劳动场景熨帖；又如夏茵茵与廖星明第一次见面，廖星明感觉夏茵茵像自己代写情书照片中的女子而多看



电影《逆光》海报

电视剧《乡情》海报



了她几眼，结果令夏茵茵误以为遇上坏人，急于想摆脱，这时，两个街头小痞子闯进画面，镜头从夏茵茵的脸部急速拉出，近景切为远景，“交个朋友”话音落下之时，镜头迅速切换到夏茵茵快速逃走的脚步，镜头节奏与人物心理吻合，流畅而极富表现力。运用镜头远近切换、阴暗对比，衬托人物内心世界、反映人物心理，是这部影片摄影的一个特点。

可以说，魏铎在《逆光》中，以追求艺术美的“逆俗之光”，推动新时期电影在影像美学和镜头语言表现方面新的进展，正如金鸡奖评委会评语所概括的：“魏铎同志在《逆光》的摄影创作中勇于追求，巧妙地掌握技术，发挥了摄影造型的表现力，在塑造人物、突出电影的时代气氛和生活气息上起了重要作用，特授予最佳摄影奖。”

（三）《乡情》

《乡情》由胡柄榴、王进导演，王一民编剧，珠江电影制片厂出品，1981 年上映。该片荣获文化部 1981 年优秀影片奖，1982 年第五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影片的故事并不复杂：革命战争年代匡华、廖一萍夫妇将儿子寄养在老家，由农村妇女田秋月抚养，取名田桂。后来田秋月又收养了女孩翠翠。两人青梅竹马，长大后决定结婚。这时候，已在城里身居要职的匡华夫妇打听到了儿子的下落，田桂知道自己的身世，按照秋月母亲的要求，回城见亲生父母。廖一萍见到儿子后，决定将儿子留在城里，并试图通过给儿子介绍女友的办法让田桂断掉思念，不成功后，同意田桂接翠翠进城，却不同意田秋月进城，田桂为难。为了成全田桂与亲生父母团聚，田秋月送田桂、翠翠进城，到匡家后，意外发现廖一萍是自己当年舍身救出的姐妹。她没说出这件往事，默默离开，当匡家夫妇从半边木梳认出田秋月就是当年救命恩人，

带着田桂、翠翠开车追到火车站，田秋月已乘车离去。

故事发生的时间点选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20世纪50年代前期，那是一个万象更新、朝气蓬勃的时代，与之后一二十年相比，是一个和平美好的时代，影片所塑造的农村妇女形象——田秋月，忠厚善良，与美好的时代背景、美丽的田园乡村叙事空间共同构建了电影的情感基调，这是《乡情》成功的重要基础。

编导对“乡情”的眷恋，是通过城乡两种空间的对比实现的。在影片中，乡村既是主人公的生长环境，也是电影语言风格的形成语境，更是故事的叙述境域。清冽柔和的南方水乡，绿草如茵的湖滩，纯朴善良的村民，自然环境与人的精神世界和谐一致，这就是片中人物所坚守的、编导所眷恋和追寻的乡间风土人情和纯真质朴的浓浓乡情。与之对照的城市空间，影片通过田桂的视角展示出来。本准备登记结婚，却牵扯出身世，农村放牛娃田桂突然成了城市高干子弟匡少华。这让田桂骤然处于城乡两个空间、两个家庭、两个母亲之间。在这里，城乡空间成为田桂的身份象征。翠翠送田桂进城，远景镜头将夕阳下摇桨泛舟的画面定格在观众心中，仿佛也跟随着田桂离开了那个世外桃源。随后，镜头切换到城市，以车中田桂的视角，几个远景镜头，展示出正在建设的大楼、钢筋水泥、厂房烟囱、城市雕像、高耸钟楼、街道汽车等城市建设图景符号。身份的突转让田桂极为不适，血缘至亲未能立刻缓解他对环境的陌生。另外一个在城市空间下异化了精神空间的人物就是田桂的生母廖一萍，她与田桂的乡村养母田秋月形成了鲜明反差。廖母占有欲强，不同意养母田秋月进城。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结构，在两个母亲身上体现。影片的矛盾也集中点也在于此，田桂在城乡两地进退维谷，他最终归属哪一个母亲、与哪一个姑娘成婚等感情问题是影片的戏剧冲突。在表现这些戏剧冲突之时，影片着重刻画人物的情绪与心理，将传统戏剧注重形体上的动作性转而注重于人物的内心和思想情绪的表现上，深厚的情感渗透着沉重的、悬而未定的乡愁怨诉，极具感染力；而田秋月不计回报、成全他人的行为更让人感受到无私之爱，影片最后，伴随她深情的画外音，出现一片澄净蔚蓝的广阔天空，“天”与“人”合一，将母爱升华为无限的大爱，桂花清香，感人至深。

《乡情》与《逆光》有着相似的艺术追求，在电影美学上，《乡情》努力将传统戏剧冲突与现代电影风格的结合，完成了一部具有浓郁民族文化传统的抒情写意影片；在主题上，《逆光》“古老的中国与现代的中国”“叠印着”的新旧世界冲突，《乡情》中以城乡冲突呈现，并以“饮水思源”



电影《虾球传》海报

的乡情表达了“寻根”的意旨，这在日后成为丁荫楠、胡柄榴等中国第四代导演的一种重要的叙事模式。

四、电视剧创作萌芽与第一部粤产连续剧

1959 年广州电视台开播，其是全国最早的三家电视台之一（另两家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广东台在开台后不久就开始自己制作电视剧。第一部电视剧是 1960 年播出的《谁是姑爷》（王维超编导）。由于电视技术条件的限制，即还没有磁带录像设备的情况下，在演播室里演出并即时播出的电视剧，是电视直播的单元剧。“文化大革命”前广东台演播了 40 多部电视剧，“文化大革命”到 1978 年，全国文艺处于低谷，许多电视台停播，广州台虽然坚持播出，但除新闻外，只能播出一些样板戏和舞台小节目，电视剧创作衰弱。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在改革开放中逐渐恢复元气，电视事业也打开了新局面。1978 年 5 月，原北京电视台改名为中央电视台，并取得了独立的法人资格，中国电视媒体的管理体制改革开始启动。1979 年开始，我国的各级电影公司和文艺演出团体停止为电视台免费提供节目，促使电视台自主创作。1979 年，广州电视台改为“广东电视台”，次年成立电视剧团，恢复电视剧生产，播出文化大革命后第一部儿童电视剧《小哥俩》，并推出第一部广东独立创作电视剧《黑牡丹》（王维超编导）；1981 年、1982 年，单本剧《神圣的使命》（与中国广播艺术团电视剧团合拍）、《水乡一家人》获全国第一届、第二届优秀电视剧奖（1983 年定名为“全国电视剧飞天奖”）；1982 年播出广东制作的第一部电视连续剧《虾球传》（8 集），这也是中国大陆制作的第二部电视连续剧（第一部为中央电视台制作的 9 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

《虾球传》为黄谷柳所著长篇小说，于 1947—1948 年在香港《华商报》“热风”副刊上连载。小说以二战结束后的香港社会为背景，横跨香港、内地两个空间，讲述了流浪儿虾球如何从一个香港贫苦少年成长为内地游击队小战士的故事。《虾球传》在“五四”以来同类题材的作品中独辟蹊径，在艺术上打破了“五四传统形式的限制而力求向民族形式与大众化方向发展”。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总崩溃前的最黑暗的日子里，《虾球传》的出现给窒息的文坛送来了春风，在当时的国统区特别是华南地区广泛流传，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被认为是“大时代写照”的一部作品。

电视剧《虾球传》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由耿明宸、高纮、潘浩导演，张木桂改编。作为广东电视台的第一部、全国第二部电视剧作品，加上将丰富的小说内容转入容量较小的电视剧所面临的难度，导演回忆当年是怀着忐忑的心情创作这部剧的，将其视为“一次自不量力的冒险”。怀着这样的心态，导演基于两种艺术形式之间的差异对小说进行了一系列改动：故事情节上“删繁就简，使之线索单一，矛盾更尖锐”，情节的详略与顺序也有所调整；形象塑造上则力求“以最简练的场面塑造人物”，并对部分次要人物进行了“合并”，以使形象更加鲜明（《粤派电视：张木桂之论·剧·文》，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编，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6 年，第 57-60 页）。原著中的地域特色在电视剧中得到了很好的保留，粤港市井生活、人情风俗、地理环境以及人伦关系、道德观念在剧中有所展现，因此，《虾球传》的制作和播出，确立了广东电视剧独立的审美价值。

电视剧《虾球传》播出后，红遍大江南北，开创了当时内地电视剧的收视高峰；主题曲《游子吟》风靡全国，唱到海外，成为经典曲目。这部电视剧的版权随后被香港电视台收购，成为第一部打进香港、东南亚地区的大陆电视剧。“粤产电视剧”时代由此到来。

第三编

改革开放与广东音乐创作

主　编：陈小奇
副主编：李广平

从南方吹来的经济改革之风，起于青萍之末，却挟着南中国海的气韵，在中国内地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飓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不仅是全国经济的领头羊，广东的流行乐坛也一直是中国流行音乐“航母”的发动机，是中国原创流行音乐的摇篮和最坚实的创作根据地；它充分体现了广东这一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音乐文化精神：开放自由的探索精神、海纳百川的文化气象、多元民主的公民意识；造成了岭南流行音乐的辉煌业绩，这是天时、地利，更是人和。

总结改革开放 40 年，也是广东流行音乐发展的 40 年的历史，这是我们这一代音乐人的责任和使命。这 40 年来，广东为中国流行音乐提供了许多新的思维和新的实践，这是其他省市所无法比拟的。在整个中国流行音乐发展过程中，广东流行音乐扮演着一个发动机和桥头堡的角色。许多新鲜的音乐念头，超过近百首传唱大江南北的歌曲（如《信天游》《涛声依旧》《弯弯的月亮》等歌曲），都是在广东流行乐坛产生的，这些新鲜的念头和歌曲影响着中国流行音乐的进程，引导着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

考察某个地区或者某个时期的文艺创作，有两个重要的指标：一个是创作群体，一个是创作实绩。岭南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早的受益地区，40 年来在流行音乐的创作实践过程中，确实硕果累累：出现了群体性的创作团队、涌现了大量优秀的歌曲作品。在这 40 年的创作历程中，出现了作曲家李海鹰、解承强、兰斋、毕晓世、张全复、徐东蔚、朱德荣、王文光、吴国材、刘克、李汉颖、吴颂今、许建强、捞仔、杨虹、林静、姚晓强、姚峰、毕晓笛、邓伟标、陈辉权、丁宁、浮克、宋书华、关键、高翔、金旭庚、何沐阳等职业的音乐制作人和专业的作曲家；出现了陈小奇、郑南、李广平、陈洁明、杨湘粤、苏拉、樊孝斌、陈树、梁天山等优秀的词作家。在 20 世纪 90 年代流行全国的歌曲作品中，几乎半数以上来自岭南流行乐坛，作品在后面篇幅里会有重点分析。这种现象，确实值得细细考察研究，因此，本版块将尝试在多个方面多角度探讨这个文化现象。

第一章　歌从港台来

1978 年，中国正式迈开改革开放的步伐。而中国流行音乐在中国的重新起步和发展，是改革开放的文化产物，这一文化产品的发展历程，与港台流行音乐的影响是密切相关的。而广东原创流行音乐从萌芽、发展到形成重要的创作基地的系列文化进程，与台湾和香港流行音乐的影响更是密不可分的，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这个文化互动与生成的过程。

从音乐演奏与演唱形式上的影响和学习：

20 世纪 70 年代，台湾和香港流行歌曲的传播路径是通过回乡的香港同胞以及台湾同胞携带卡式录音带和香港电台的播放，开始在广东省各地蔓延传播开来；邓丽君、刘文正、许冠杰的录音盒带在 1978 年到 1979 年前后被大量带回广东，

受到年轻人的追捧；其次是香港电视节目在珠江三角洲的广泛被收看从而让香港粤语歌曲作为电视剧主题曲插曲而进入千家万户。

1977 年，当时在广东省歌舞团工作的毕晓世组建了全国第一支轻音乐队——紫罗兰轻音乐队，并于 1977 年的 5 月 1 日正式在广州市举行了首演: 演出了由毕晓世重新配器改编的乐曲《蓝色的爱情》和《送你一枝玫瑰花》，拉开了广东流行音乐的帷幕。紫罗兰轻音乐队的成员由毕晓世（后来成为多首流行歌曲的作曲家）、韩乘光（作曲家、歌星杨钰莹的制作人）、余其铿（打击乐演奏家，后来是广州乐团团长）、蔡妙甜（著名歌手）组成。

当时，以台湾歌手邓丽君演唱的大量从 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滩就开始流行的歌曲以及刘文正演唱的台湾最早的一批创作歌曲、香港歌手许冠杰创作演唱的拥有强烈平民意识的粤语民谣歌曲、罗文演唱的香港最早一批电视剧插曲和原创以及填词歌曲、关正杰演唱的电视剧插曲等的歌曲最为流行，台湾以及香港音乐人对歌曲的演奏、编曲、填词等创作手法，开始逐渐被广东音乐人所模仿与学习，最早的体现自然是乐队演奏的现场演唱方式的逐渐普及。

1978 年，广州东方宾馆花园餐厅成立了第一家由广州本地歌手演唱港台流行歌曲的音乐茶座，同时组建了一只较为完备的轻音乐队：由当时在广州民间曲艺团担任作曲指挥的吴国材先生领衔，歌手有刘欣如、李华勇、陈浩光等人；乐队的爵士鼓、电吉他、弦乐、管乐等齐备，初步形成现代电声乐队的完整形态。其后，广州的爱群大厦、华侨酒店、白云宾馆、大同酒家等音乐茶座如雨后春笋般长生出来，形成了流行音乐最初的规模效应，培养了大批演奏、演唱、编曲的音乐人。同时，香港歌手罗文也会偶尔到广州，欣赏并指导李华勇等歌手的演唱技巧与风格，言传身教，使广东许多歌手获益匪浅。

可以说，广东最早一批歌手的演唱方式，都是从模仿香港或台湾歌手的形式中起步的：最有名的是“广州罗文”李华勇，他也是第一个在剧场开个人演唱会的广州歌手、“广州郑少秋”陈浩光、“广州刘文正”吕念祖、“广州苏芮”张燕妮、“广州邓丽君”刘欣如等；以及王家兴、王强、张海莲、陈少雄、汤莉、黄河、周兵、薛莹以及后来获得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冠军的广东歌手陈汝佳（模仿徐小凤起步）等早期广州乐坛的优秀歌手。

而音乐茶座的勃兴，也培养催生了广东早期的第一批音乐人如：作曲家吴国材、王文光、卢庆文、解承强、李海鹰、许建强、兰斋、刘克等；填词人陈小奇、蔡衍棻、刘志文、许军军等；编曲人丁家琳、司徒抗、金友中等。

从创作上催生了广东最早的一批原创歌曲。

香港研究流行音乐的学术界普遍认为：许冠杰先生作于 1971 年的歌曲《铁塔凌云》（作曲许冠杰、填词许冠文、演唱许冠杰）是现代意义上的第一首香港粤语原创流行歌曲。20 世纪 50 年代从广州移民香港的许氏兄弟，皆是香港艺坛的中坚人物；毕业于香港大学心理系的许冠杰，更是成为香港流行乐坛的开山人物。旋律脱胎于粤曲曲调的《铁塔凌云》正式发表于电视节目《双星报喜》，后收入 1974 年出版的许冠杰专辑《鬼

许冠杰专辑《鬼马双星》封面



马双星》中广为人知。此后许冠杰一发不可收，以平民视角口语化形式创作大量粤语流行歌曲，反映香港社会日常生活与社会现状，讥讽时事彰显小人物的人性尊严和深刻反映香港现代化过程中的市民性格，深受民众欢迎。

而台湾自从校园歌曲勃兴以后，大量校园歌曲开始涌入内地市场，而广州成为第一批接收台湾歌曲的地区。邓丽君、刘文正之后，苏芮、侯德健、罗大佑、齐豫等歌手的歌曲开始在南粤大地流行开来。广州最早的唱片公司如太平洋影音公司、中国唱片总公司广州分公司开始生产第一批盒带，大量翻唱专辑开始进入市场。

1978 年，出生于一个音乐和粤剧家庭，毕业于广州音专（即后来的星海音乐学院）的吴国材先生，受到香港流行音乐“时代曲”启发，当时担任广东民间曲艺团的作曲和指挥一职，他与蔡衍芬先生合作，创作了广东省第一首粤语流行歌曲《星湖荡舟》（吴国材作曲、蔡衍棻填词、陈浩光王莉演唱）。此歌经过电台的大力推广，在珠江三角洲一带非常流行，但因为是粤语演唱的缘故，没有能够走向全国。随后，吴蔡二人继续合作，创作了《碧血黄花》（吴国材作曲、蔡衍棻填词、陈浩光演唱）等歌曲。

而广州最早的一批填词人因为翻唱歌曲的盛行也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在中唱广州公司任职戏曲编辑的陈小奇开始了大量填写英文歌曲、粤语歌曲，甚至改写一些台湾歌曲的歌词的工作；李广平、陈洁明、杨湘粤也从此时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随着粤港台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化和频繁互动，从 1985 年后开始，香港著名音乐人黄霑、向雪怀、林慕德；香港著名吉他手、编曲人苏德华；台湾著名音乐人侯德健、林秋离、涂惠元等等经常会到广州，用开讲座和录音以及演唱会等工作的形式与广东音乐人展开交流活动，从粤语歌曲的填词艺术、粤语歌的创作潮流、台湾唱片公司的运作模式、流行歌曲的编曲手法、演奏技巧、推广手段等方面，省港台的深度合作就此拉开。可以说，广东音乐人习惯的流行歌曲写作模式：比如说先出旋律后填词的创作手法、从民族民间音乐素材中吸取营养、歌曲创作的平民意识和公民意识、编曲演奏技巧的重要性和与时俱进的新潮特质，都在广东音乐人的学习模仿和创作中体现出来。

1979 年 1 月成立的太平洋影音公司和同年年底成立的中国唱片广州公司一起，在盒式录音带大量制作发行这个商业背景的推动下，广东第一批原创音乐人就此诞生：陈小奇、刘志文、许军军、西彤等填词人开始了创作生涯。其中，以 1985 年广东原创歌曲的第一次大赛“红棉杯”，也是全国第一次的流行歌曲创作大赛为标志，广东原创流行音乐开始全面登场，广为人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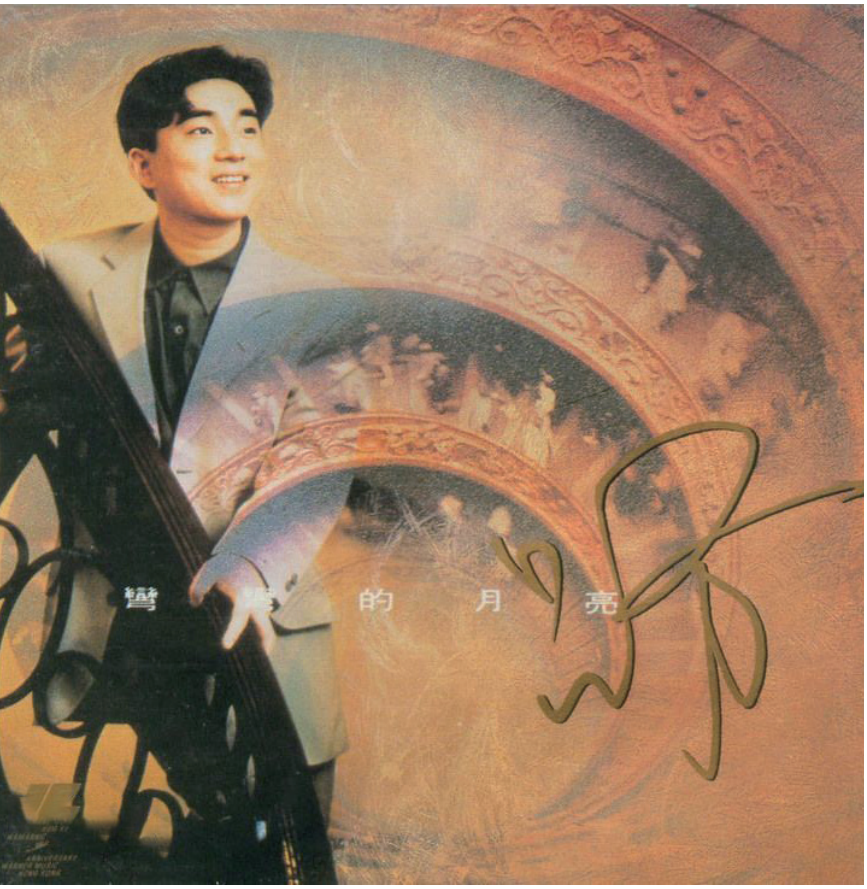
与香港乐坛交流最多的广东音乐人是王文光和许建强。王文光（1961—），出生于广州，1975 年毕业于广州音乐学院管弦系，原来专业是小提琴演奏专业。他最早在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做音乐制作人，为引进的日本电视剧《排球女将》《血疑》等配写音乐，是广州最早一批编曲人之一。许建强同样生于广州，早年经过严格的钢琴演奏训练，后来开始职业乐队的生涯。他们都是因为在音乐茶座与流行乐队的演奏、指挥、录音编曲工作中与香港音乐人多有交流，而学习到许多的制作经验。

与台湾音乐人和唱片界的互动与交流更为频繁：侯德健索性在广州购置房产居住下来，与广东音乐人展开深度合作，此事后文细数。除了广州的唱片公司大量引进台湾原版唱片之外，1990 年太平洋影音公司还首次把“亚运歌曲”专辑版权出售给台湾唱片公司，实现了互通有无的唱片版权贸易。

1989 年到 1990 年间，由珠江经济电台主办的“音乐冲击波”节目，联手南海明珠影音公司和新时代影音公司等唱片公司，推出了四十多首广东原创的粤语歌曲，该节目以“创作自己的歌、宣传自己的歌手”为主旨，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粤语歌创作与演唱人才。特别值得欣喜的是，

从这个节目诞生的歌曲《My Shirley》（王文光作曲、许建强填词、廖百威原唱）后来由时任宝丽金唱片公司音乐监制的向雪怀先生重新填词，交由李克勤演唱而走红香港歌坛，

专辑《弯弯的月亮》封面



实现了广东歌坛第一次“反哺”香港歌坛的行动。随后，由李海鹰创作的《弯弯的月亮》（李海鹰词曲，陈汝佳、刘欢演唱）被香港填词人潘伟源填词由香港歌手吕方翻唱，受到热烈欢迎；由许建强填词作曲的原名《愿你把心留》（许建强词曲、陈汝佳演唱）的粤语歌曲，后来由香港创作歌手黄凯芹翻唱改名《晚秋》而走红粤港两地；由王文光作曲、潘伟源填词的歌曲《还我真情》由香港巨星谭咏麟演唱后，成为一首红遍香港和广东等粤语地区的经典金曲；由王文光作曲、陈少琪填词的歌曲《真实的谎话》同样由谭咏麟演唱，这两首歌都收录于谭咏麟 1995 年出版的专辑《实在男人》中。后来，王文光还为港姐朱洁仪的专辑写过《对手戏》（作曲王文光、填词梁天山）。

1989 年，香港永声唱片公司出版《开天辟地》专辑，收入《信天游》等内地十首原创歌曲；1990 年，香港永声唱片公司出版《翻天覆地》专辑，收入解承强、毕晓世、张全复多首作品；1994 年，台湾著名歌手苏芮出版《变心》专辑，收入陈哲词、毕晓世曲的《生疏的情感》一歌；1995 年前后，台湾歌手辛晓琪翻唱了陈小奇词曲的《涛声依旧》，收入其在滚石唱片出版的专辑中。这些，都是粤港台流行音乐交流成功的成果。

在演唱人才上的互动与交流。

1985 年，出生于广西百色后定居于广州和香港的歌手罗文，受广东省对外艺术交流中心的邀请，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办了 7 场个人演唱会，并且出版了演唱会的实况录音盒带，这也是香港歌手第一次在内地举办个人演唱会，引起极大轰动。这是一场从舞台到录音的生动的教材，许多歌手从中取经学习到不少的演唱艺术包括舞台表演的模式。

1988 年，在香港亚洲电视举办的“未来偶像争霸战”中，广州歌手李达成获得冠军，



专辑《Hins' FIRST》封面

随即签约香港华纳唱片公司，成为广东第一位签约香港唱片公司的歌手，他并于 1990 年在广州体育馆举办三场个人演唱会，成为首位在广州开唱的本土歌手。他演唱的粤语歌曲代表作有《田园交响曲》（王文光作曲、蔡衍芬填词）等。

1989 年，广东电视台与香港无线电视有限公司合作举办“省港杯歌唱大赛”，首届冠军是广州歌手汤莉，亚军是广州歌手廖百威，季军是香港歌手曾航生，其后多名广东歌手也出自这个比赛，如古璇、林萍、麦子杰、王佩、谢若琳等；其中，麦子杰和王佩都分别与香港宝丽金唱片公司签约成功，在香港发行过专辑。

省港交流最成功的歌手应该是出生于 1981 年的张敬轩。他出生于广州，1998 年在广州自己制作了首张专辑《Hins’FIRST》引起乐坛关注；2001 年签约广州“几何娱乐”公司；2002 年开始与香港环球唱片公司签约，其后开始事业的腾飞阶段。2008 年开始，张敬轩获得香港多个排行榜年终奖项，开始迈向香港一线歌手的行列，成为第一个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广州歌手之一。其后，他在省港两地每年都会举办自己的个人演唱会，并发表多个专辑，成为香港和广东最为优秀的创作歌手。张敬轩的成功与“几何娱乐”借助香港唱片公司的国际性运营理念和造星手法最为成功的案例；当然，也和他自己卓越的音乐才华和演唱才能密切相关。

摇滚乐队方面，因为语言的因素，广州在接受香港乐队文化方面的影响更是巨大：Beyond 乐队、太极乐队、达明一派乐队等在广东都有大量追随者，他们都在广州深圳等地举办过演唱会。受到他们的乐队文化潮流的影响，广州深圳两地产生了多支摇滚乐队。其中来自顺德的“丰收乐队”深受香港 Beyond 乐队的深刻影响，乐队队长吉他手、主要的创作人和主唱陈辉权早期的创作就是粤语民谣摇滚歌曲，多年后他甚至写了一首致敬黄家驹的歌曲《致家驹》，非常感人；“丰收乐队”解散后，吉他手陈辉权（作曲、编曲、吉他演奏、歌手）、贝斯手梁天山（音乐监制、填词）都进入流行音乐创作体系，成为岭南乐坛重要的创作人。还有比较成熟、拥有一定影响力的“吹波糖乐队”，他们于 2008 年 1 月 1 日在香港正式发行了乐队的专辑《青春残酷物语》，以流行摇滚的曲风引起省港乐迷的极大关注。并且在香港和广州都举办了自己的摇滚演唱会。

在流行音乐的运作机制上，台湾香港歌坛给广东歌坛极大的启迪与参考。

20 世纪 80 年代以及 90 年代，台湾和香港音乐人经常会出现在广州的录音棚或者唱片公司中，与广东音乐人频繁交流，让他们不仅仅学到了音乐制作的经验，还有更多的关于流行音乐的运作知识。

其一是版权所有的意识。无论是唱片公司还是创作人，广东流行音乐界都是最早关心版权所有意识的觉醒者，虽然法律意识还不够严谨，但是广东音乐人很早就知道歌曲有版税分成这个说法，当然能否实施是另一回事。在录音制品的版权归属、歌曲的版税分成、歌曲不能卖断版权、电台播放歌曲必须付费等问题上，广东音乐人都有过向台湾香港音乐人学习取经的过程。而黄霑先生、侯德健先生更是在这方面现身说法，大声呼吁，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与学习。

其二是唱片公司的运作机制：正是从台湾和香港国际性唱片公司身上，我们学习到了很多唱片公司的运作规律：比如要与歌手签订录音合约、与歌手签订演艺经纪合约、唱片公的宣传策略、拓广营销渠道的商业订货会、面向全国的发行策略等，都是早期广东的唱片公司得以在全中国占据半壁江山的商业成就的基础。

其三，最重要的一点是台湾香港的音乐制作人和创作人给我们在创作上的启迪：必须拥有自己的原创歌曲，而且以普通话歌曲为主，以中国市场为主的创作导向，从而促使广东的音乐人警醒过来，从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形成一个创作高潮，影响波及全中国，为中国原创歌坛的历史，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第四编
改革开放与广东美术创作

主　编：许钦松
副主编：王　嘉
陈向兵
张新英

第一章　改革开放40年来广东美术概述

一、1978年的新机遇

改革开放的春风，给广东美术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1978年，广东美术领域有这样四件事：一是1978年3月21日至25日，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分会与广东省文化局联合召开“广东省美术创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省、市和各地区、部分县美术工作者代表98人。会议由黄新波代表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分会，联系广东实际作了《砸烂枷锁，阔步前进》的发言。会议还传达和研究了文化部关于建国30周年全国美展美术创作的通知，经过小组讨论，最后由胡一川作了小结，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繁荣美术创作”。二是1978年5月23日，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分会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6周年，在广州举办“广东省美术作品展”。据记载，这次展览“展出国画、油画、版画、门画、年画、宣传画、漫画、连环画、雕塑等各种美术作品340件。其中大部分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作品（包括已逝世的作者25人，其中老画家占17人）这个展览受到观众的赞扬，展出40天，观众达到30多万人次。湖南、湖北、江西、广西和香港、澳门的美术界曾来参观，给我们以很大的鼓励。”（注释：资料来自于美协广东分会办公室编《美协广东分会工作汇报》，发表在《广东美术通讯》1978年11月，总第1期）三是1978年8月3日至9月4日，广州市荔湾区文化馆为了紧密配合新时期总任务的宣传，在文化公园举办了“宣传新时期总任务美术、摄影、书法展览”，展出美术作品60多幅，观众5.6万人次。四是1978年11月，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分会编辑出版《广东美术通讯》（内部刊物），后来改为《广东美术简讯》《广东美术家简讯》《广东美术家》《广东美术家通讯》等名称，至今仍然是成为广东美术界的信息刊物和信息交流平台。

1978年是广东美术领域取得了大发展的一年。1978年5月举办的“广东省美术作品展”，共评选出一等奖12件、二等奖13件、三等奖11件，共36件获奖作品。不少作品，至今都还是家喻户晓的优秀作品。其中一等奖的作品包括唐大禧的《海的女儿》（雕塑），潘鹤、梁明成的《大刀进行曲》（雕塑），汤小铭的《鲁迅在广州》（连环画），黄新波的《春华长艳》（版画），杨纳维的《长空雁叫霜晨月》（版画），黎雄才的《韶山朝晖》（中国画），陈金章的《枣园春晓》（中国画），尚涛的《战地黄花》（中国画），林宏基的《烽火少年》（油画），冉茂芹的《战士的歌》（油画），王肇民的《杨桃》（水彩画），刘昌潮的《新翠》（中国画）。二等奖的作品包括林墉的《八路秧歌进村来》（中国画），王维宝的《秋》（中国画），鸥洋、杨之光的《不灭的明灯》（中国画），关山月的《井冈山》（中国画），林丰俗、梁世雄、陈洞庭的《遵义曙光》，王玉珏的《烈火燎原》（中国画），余本的《秦岭》



水粉画《华主席到水乡来》 作者：刘秉礼



雕塑《大刀进行曲》 作者：潘鹤、梁明成

（油画），汤小铭的《抗日战歌唱彻太行》（油画），余国宏、汤集祥的《弹破夜空》（油画），陈衍宁的《一件小事》（连环画），许钦松的《个个都是铁肩膀》（版画），滕文金的《羚羊》（木雕），林载华的《红军的故事》（剪纸）等。三等奖的作品包括蔡克振的《忽报人间曾伏虎》（宣传画），黎林、周树桥的《泪飞顿作倾盆雨》（宣传画），梁照堂的《人民的心愿，革命的武器》（宣传画），刘秉礼的《华主席到水乡来》（水粉画），唐大禧、林毓豪等的《南京雨花台纪念碑》（雕塑），林毓豪、林国耀等的《哨》（雕塑），张惠蓉的《英魂长在》（中国画），黄安仁的《南海涛声》（中国画），黄安仁的《天涯海角尽欢腾》（中国画），李金明的《无微不至——朱总司令在转战途中》（油画），郭绍纲、蚁美楷的《胜利的节日》（油画）等。

二、广东美术的两个阶段

改革开放40年来，广东美术的发展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至1999年，第二阶段从2000年至今。这种划分方法来自于岭南美术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的“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年书系”，以及2017年



雕塑《海的女儿》 作者：唐大禧



油画《战士的歌》 作者：冉茂芹

先后在中国美术馆和广东美术馆举办的“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该展览是由文化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为指导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文化厅、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美术馆、广东美术馆为主办单位。在展览的相关文章中，对于改革开放40年的广东美术有很多阐述。梁江在《南粤百年，其命惟新——广东美术100年略论》一文中谈道：

1978年改革开放，广东作为南大门在全国先行一步，历史又一次给了广东先机。而广东美术界出作品出人才的成绩也每每走在全国前列。这是广东美术走向繁荣和多元发展的新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历了对文化大革命美术的清算和反思，西方各种思潮流派汹涌而入，文化理想主义、虚无主义和激进主义的种种焦灼和躁动纠缠一起。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更早显现出应有的文化自信。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长足发展，对美术领域的创作走向和艺术生产结构均产生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老一辈艺术家焕发艺术青春，关山月、廖冰兄、黄志坚、陈卓坤、王肇民等人都有突破性发展。文化大革命后期崛起的一大批人成了广东美术界的骨干和创作主力，他们在几届全国美展都获得引人注目的成绩。新崛起的一批人，艺术上正走向成熟，大大充实了广东美术界。许钦松、黎明、俞畅、林若熹、方楚雄、林永康、李劲堃、安林、黄增炎等一大批人，都是在20世纪后期开始承担重任，成为最活跃的美术家。与他们年龄相仿的这批人，体现了开放改革40年来广东美术多元、多样化发





油画《胜利的节日》 作者：郭绍刚、奴美楷

展的特征，这是一个艺术创作姹紫嫣红的“双百”时期。广东美术在 21 世纪迎来新的辉煌。人才奔涌而出，影响推及海内外。历经改革开放 40 年的巨变，文化和各种文学艺术门类回归本来的社会位置，新的秩序、新的艺术格局开始形成，重视语言个性，强调艺术风格，追求艺术创造中的个体价值，讲求社会效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已经成为众多美术家的共同取向。现今，更新一代的艺术家正在成长，艺术百花园中鲜活的生长、重组和嬗变成为常态。美术创作领域在艺术观念、语言手法、材料媒介、图式风格诸方面均出现显著变化，在当代多向发展的格局中，呈现出前所未之见的创新性、学术性新质。

在当代广东美术的一片茂林嘉卉中，人们可看到传统型艺术、写实型艺术和实验性艺术多元并进的和谐发展态势。更有一点是明确的，当代广东美术呈现出前所未见的多样繁盛格局，张扬中国文化精神的一直是主流。美术是属于人民的。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部分，美术创作的价值核心与内在逻辑必然遵循中国文化的本体规范。

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时代与社会的走向，与百年广东美术的起承转合息息相关。广东是一块热土，印证着当代中国的崛起。在我们面前，尚有一些并未了结的重要命题，诸如深化改革开放，传统往现代转捩，于市场化的语境中怎样恪守作品的文化品位，在全球化大趋势中如何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等等。传统是活着

的传统，在连接和传衍中它会被赋予新的内容。文化艺术要不断创造和积累，不断增添新内容，传统才会更充实更有价值。而这，正是广东美术家以及所有当代美术家面前的紧迫课题。

南粤百年，其命惟新。民族精神是当代中国文化的魂魄。惟有立足于文化传统的传承光大，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精神体验，中国艺术才会具有真正的现代性，才会有源源不绝的创造活力。我们所期盼的新一代艺坛大家，也即是那些纵横捭阖傲立潮头的领军人物，那些天马行空苍松拔地的一代俊杰，也将被推上 21 世纪之前沿。

三、广东美术的新开始

胡斌在《艺术变革与多元探索的新阶段——改革开放以来的广东美术》一文中谈道：

1978 年 12 月，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中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重要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的重要进程。这一历史事件也往往作为讨论中国美术的时间节点处于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东，经济建设更是进入突飞猛进的发展阶段，而文化艺术也相应地取得了繁荣发展。思想的解放与社会的变革营造出宽松的时代氛围，使艺术创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中外美术交流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扩大，再加上特殊的地缘关系，新时期广东美术界是现出了以变革创新为主导的局面。彰显时代精神，反映当下生活，揭示当代人的精神面貌，以及强调艺术家自我的观感与诉求，成为艺术创作的重要依据；多元化的新状态，折射出改革开放的文化活力……自 1977 年年底开始，曾一度被打乱的美术体制恢复运转，广东省美协、广东画院、广州美术学院等相继恢复。省级美术创作研究组织也逐渐建立起来，遍布全省各地，有序地推进相关美术创作和研究活动。老一辈美术家再度活跃，而中青年美术家也把握时代机遇，迅速成长为美术界的新兴力量。从思想历程上，我们可以看到，从先前高歌猛进的革命颂歌转到对伤痕的追忆与反省，再到受国际现代思想与艺术浪潮影响的艺术变革与多元探索的阶段性转变。(注释：胡斌《艺术变革与多元探索的新阶段——改革开放以来的广东美术》，发表在《广东美术百年作品集》，岭南美术出版社 2017 年 7 月出版。)

改革开放 40 年，是广东美术创作的重要发展阶段。广东美术从“伤痕美术”走向“南方新气象”。1976 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中国美术从毛泽东时代向新时期改革开放时代过渡的关键点。“四人帮”被打倒，全国上下一片欢腾，王维宝的《人民胜利了！》（中国画，1976）无疑喊出了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心声。而 1977 年 12 月，广东省美术家协会恢复活动。1978 年，广东画院恢复工作；在 12 月 5 日至 1

中国画《人民胜利了！》 作者：王维宝



日举行的广东省文联第一届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上，黄新波继续当选为主席。随着老一辈革命家的相继复出和对“两个凡是”以及“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的彻底否定，在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协的领导和主持下，广东省的美术创作借助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36 周年的“广东省美术作品展”和“庆祝建国 30 周年全国美展”，也进入了一个对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文化历史的全面反思“伤痕美术”时期。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三年，是拨乱反正，贯彻“双百”方针取得显若成效的三年，老一辈美术家再度活跃，而年轻一代美术家也朝气蓬勃，迅速成长。1980 年春天，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分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关山月当选为主席。和其他各行各业一样，广东省的美术创作在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四、崭新的80年代

20 世纪 80 年代无疑是中国社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计划经济向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过渡的重要时期，广东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们的观念从以前的单一封闭逐渐走向开放，这为广东的美术事业开辟了更为宽广的道路。全省广大美术工作作者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的生活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勤奋创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当然，随着对外艺术交流的日益频繁和西方各种艺术思潮的涌入，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那种对西方文化艺术的回应问题在这个时候也重新凸现出来。对个人价值的重新发现、对中国文化的反思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对传统文化某种意义的回归，都深深地影响着广东美术家们的创作。

如果说，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的“文革美术”创作，是以年轻美术家的政治激情为主要依托，那么，20 世纪 80 年代广东地区的美术创作，则主要是围绕 1984 年的“第六届全国美展”和 1989 年“第七全国美展”来展开的。尤其是“第七届全国美展”，广东的美术创作有一种异于以往的文化沉思倾向，收获也是空前的，仅在中国画方面获奖的优秀作品，便有赖少其的《孤云与归鸟》、王玉珏的《冉冉》、李劲堃的《大漠之暮》、黄国武的《金龙宝地》、林若熹的《春夏秋冬》、安林的《藏女》、伍启中的《康有为》、周彦生的《岭南三月》、万小宁的《木瓜花》、梁如洁的《桑田》等。在这一届全国美展中，其他画种的获奖作品如许饮松的《潮的失落》（版画，1989）、肖映川的《潮汕农家》（版画，1989），唐大禧的《创造太阳》（雕塑，1989）等，也在全国范围形成一定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国家文艺政策的调整，这一时期有许多老一辈艺术家和中年艺术家改变以往的创作状态，转向绘画本体包括在绘画语言方面的个性化探索，如关山月、黎雄才、赖少其的山水画创作、王肇民的水彩《大叶紫薇》以及“静物系列”等，都取得相当高的成就。此外，以及“巴基斯坦组画”，也有相当的影响。



中国画《春夏秋冬》 作者：林若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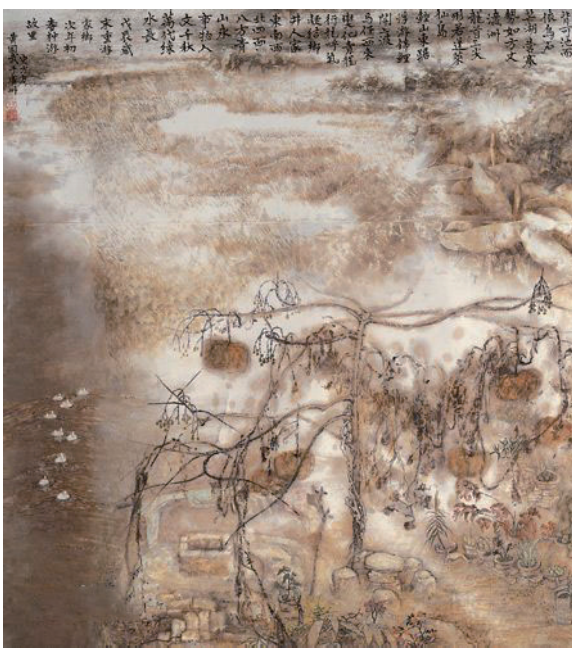
当然，这一时期的美术创作成就与党和政府在新时期对美术事业的关心支持是密不可分的，如旨在推动广东省文艺创作、繁荣广东省文艺事业而于1981年设立的广东省综合性文艺最高奖“鲁迅文艺奖”，对直至现在的广东美术创作，都起着有力的推动作用。

另外，广东是著名的华侨之乡，毗邻港澳。这一时期，省美协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借改革开放之风，经常开展与港澳台地区，以及与海外美术界的艺术交流活动。这些交流活动，对我省美术创作无疑有着深远的影响。

中国画《大漠之暮》 作者：李劲堃



中国画《金龙宝地》 作者：黄国武



五、90年代的新高峰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广东美术在“消费时代”与新的大众化发展方向上，进入了又一个多元并存的时代。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我国处于深化改革的历史转型期。广东的美术事业也正像 1990 年当选为省美协主席的汤小铭所说的那样“处于转换机制的重大变革时期”；到了 1995 年广东省美术家协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林墉当选为主席的时候，则是面临全省机构改革全面实施的关键时期。这个时候“无论是面临的情况，所碰到的矛盾，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比过去多一些，也更复杂一些”。但是，随着“主旋律”与“多样化”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成为国家文艺政策的规范表述，这一时期广东省的主流美术创作主要还是在这一前提之下，以及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上义理论的指导下，在省委的关心和支持之下、围绕着省美协的组织工作而展开的。广东的美术家们对于“主旋律”有过谈论并形成较为深入和开放的理解、认为“主旋律”应该是“代表着时代的精神状态”和“时代的心声”，表现在题材上，除了革命历史题材外，同样也可以是健康向上的日常的生活状态，表现在学科本身上，则是建构一种与时代新精神相适应的艺术语言。

1989 年之后，市场化经济社会模式仿佛在一夜之间便深入人心，1992 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了历史性的讲话，以及接着党召开的十四次代表大会，更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这对包括美术家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有深刻的影响，文化英雄主义的时代也在这个时候渐渐远去。此时，广东省提出了 20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振奋人心的宏图大略，而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出台，急速发展的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有声有色的氛围，促使广东的美术事业



中国画《〈诗经〉—长歌清唱》 作者：林蓝



林墉为刘斯奋《白门柳》所创作的插图



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艺术是生活的反映，新的时代新的生活必然会在艺术家的作品中有所映射。如果说，其后出现的刘斯奋“都市人物系列”是以精英的文化心态来对新的都市世俗生生活进行解读的话．那么，以黄一瀚为代表的“卡通一代”年轻艺术家的创作，则是对这种都市消费时代的新世俗化和新大众化的文化回应。此外，“实验水墨”艺术家群对中国画“现代形态”和“全球化语言”的探索也值得我们注意，他们的作品或可给予人们某些新的启示。

这一时期美术创作的繁荣，美术展览和交流的频繁，与广东美术馆的落成也有很大的关系，而广东美术馆的开馆与落成，又是与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历任领导和老艺术家们的奔走呼吁，以及广东省委、省政府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分不开的。1997 年，广东美术馆在二沙岛建成开馆，几代人的愿望总算美梦成真，广东的美术家终于有了真正的美术博物馆。广东美术馆充分发挥我省处于改革开放前沿和相中外文化交汇点的优势，加强文化交流和交往，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文化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在推动我省美术创作不断向前发展方面，无疑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六、开创的新世纪

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和美术家们历来关心社会，热心为人民大众服务，积极支持公益事业，乐于奉献，在这经济消费时代也不例外，如协助中央电视台举办“功在千秋——捐助老年教育事业”活动（2000），为驻澳门部队军营创作了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张思德、雷锋等一批英雄塑像（2001），与省书协和省摄办联合举行“众志成城抗非典——广东省美术书法摄影家献爱心艺术品拍卖活动”（2003），等等。此外，长期以来，还大量参与了各种赈灾、扶持、助残、助学等活动，为广东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广东省的美术家队伍是在不断壮大之中的。1956 年协会刚成立时的第一批会员共 163 人，而到了 2005 年 11 月广东省美术家协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时，这支队伍已经相当地壮大了，共有省美协会员 2583 人，其中全国会员为 425 人。这次大会选出新一届的领导班子，许钦松当选为主席。新时代的新气象新变化，也蕴含着新的契机。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朱小丹同志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省美协不仅要发挥党和政府联系广大美术家的桥架和纽带作用，而且要探索发挥美术家面向大众、面向社会、面向市场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同时，朱小丹同志还希望“新一届美协领导班子在历届美协班子打下的良好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职能作用，紧紧围绕建设文化大省、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按照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改进工作机制，提高服务水平，增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不断开创我省美术事业繁荣发展的新局面”。这番讲话，既是党和政府对广东省美术界新的要求和期望，也是广东美术创作发展新的动力。

2000 年的到来，因为广东美术界持续不断的努力，多种艺术文化汇聚此地，生根发芽，枝繁叶茂，令广东的艺术探索在保留原有传统特质的同时，又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多元性以及与世界艺术对话的能力。这个时期的广东美术，一方面是以弘扬主旋律为主导的创作，始终恪守“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艺术宗旨，始终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艺术方针；另一方面，则是以强调个人在艺术语言，思想观念等个性方面研究探素的创作，始终秉持岭南文化不断进取、“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意识，始终依托以弘扬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为背景的时代精神。正是凭借“主旋律”与“多样化”的双擎驱动，令新时期

广东美术的历史快车稳健穿行，亦令新时期广东美术事业得以繁荣发展、再筑高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与后动优势。

有担当、有魄力的广东美术家，一直都以弘扬主旋律为主导，在艺术创作中时刻把握时代的脉搏和人民的心声，一直保持精品性和经典性的创作意识，一直坚守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个人创作的精神命脉、重要源泉和坚实根基。可以说，积极推进反映时代精神状态的主流美术创作是广东美术界贯穿整个新时期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任务。

在聚焦主旋律创作，特别是历史画材的创作多年之后，广东老一辈艺术家所积累的创作经验既启发了年轻艺术家，同时也促使他们展开新的思考。关于历史解读的角度、叙事的方式、表现的语言等，都成为新的时期广东美术家思考的重点。为了消除对历史的概念化解读和表现，广东美术界开展了多场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例如，2016 年，经中宣部批准，由中国文联、财政部、文化部共同主办，中国美术家协会承办的“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本创作工程”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许饮松的中国画《长江揽胜》，黎明的雕塑《六祖慧能》，林永康的油画《黄道婆》，黄启明、顾亦鸣、罗海英合作的版画《夏都二里头》，林蓝的中国画《〈诗经〉——长歌清唱》，夏天的雕塑《张骞出使西域》，赵红雨、张晓东合作的版画《六祖慧能说法图》，范勃、郭祖昌、罗奇合作的油画《广州十三行》，李新华、吴诗中、车海峰合作的中国画《武王伐封——牧野之战》共 9 件作品全部通过验收，极好地反映了当代广东美术家对社会历史的深入思考。画家们以匠心独运的构思、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和精湛的造型艺术语言，创作了这批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中华史诗作品。2011 年，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文化厅、广东省文联和广东省美协联合主办的“百年风云——广东近当代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经过将近两年的等备，组织创作了 104 件具有民族精神与广东气派、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精品力作。这是新时期广东举行的最大规模的历史题材专题美术创作活动。2009 年，由文化部、财政部共同组织实施“百年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广东美术家梁明诚的雕塑《重庆谈判（毛泽东与蒋介石）》、潘嘉俊的油画《孙中山与黄埔军校》、张绍城的油画《淞沪抗战》、黎明的雕塑《邓小平在联大发言》、方瑞的中国画《洋务运动》等作品，历时 5 年完成创作，展现了艺术家们精湛的艺术技巧和精妙的艺术构思。2008 年，当举世震惊的“5·12 汶川地震”发生后，广东 145 名油画家迅速行动，以极其真挚的情感和超乎想象的创作速度，完成了全长 57.6 米的巨幅史诗油画《地恸·重生》暨《“5·12”表情》，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该作品成为唯一一件被国家博物馆收藏的“5·12”赈灾题材作品，在国家博物馆长期展出。

新时期的广东美术家一如既往，把强烈的历史责任感、高度的艺术使命感、高涨的创作热情以及专注创作的精神投入历史画创作中，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和超越，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合乎时代气息的艺术语言和表达方式，融入民族审美情趣，走入生活，使作品达到更高的境界，继续以优秀的作品和平静的心态面对风云的变幻、历史的考验，在传承与发展中，再创广东历史画创作的新辉煌。

新世纪，社会生活本身的变化渐渐培育出对过去及现在社会生活主题的重新思考，在再现和表现的艺术方式中，美术体现出其他文化现象所不具备的力量。从作品的角度，所涉及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的各个层面一定包含了艺术家本人的态度，一切文化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在延续着过去，无论以继承的态度或者反思的态度，艺术家所思考的内容和层面均体现出新的方向。

第五编
改革开放与广东戏剧

主　编：陈中秋
张晋琼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转折，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征程。到 2018 年，中国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走过了 40 年。改革开放 40 年，既是中国拨乱反正，思想大解放，中西文化大交流大碰撞时期，也是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并逐步完善的时期。在这 40 年里，中国在文化艺术领域同样发生了日新月异、翻天覆地的变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试验田、先行区，充分发挥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始终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魄力勇立改革开放的潮头，不仅创造了广东 GDP 总量继 1988 年以后连续 30 年一直高居榜首，领先全国的骄人成绩，也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第一章　文化先行数“第一”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与广东经济腾飞所取得的成绩相匹配，广东戏剧也创造了无法尽数的“第一”。

一、“拨乱反正”占先机

打倒“四人帮”初期，全国的首要任务是政治上、组织上的拨乱反正，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7 年的文艺如何评价尚未有结论，没有完全解冻。而广东却在文艺方针政策上“拨乱反正”。先走一步，不仅否定了“文艺黑线专政”，还在全国第一个彻底否定“文艺黑线论”（注：“文艺黑线”的代表性论点是所谓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 30 年代文艺的结合”以及所谓的“黑八论”：“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和“离经叛道”论）论。正是在这种背景和气氛下，周扬、夏衍、林默涵、张光年等当时尚未正式平反和复出的文艺界几位巨头纷纷南下，云集广州。广东文艺界当时以自己政治的敏锐、思想解放者的勇气而瞩目全国。

1977 年，广东戏曲界在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罪行，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重建戏曲队伍，首批恢复戏曲表演团体 65 个，共有人员 5200 人；到 1982 年，剧团发展到 133 个，人员达到 8300 多人。几年内还陆续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及以前在反右等历次运动中受迫害的戏曲界人士和错误批判的戏曲作品平反，恢复名誉。中共广东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经调查复示有关部门，省委同意省委宣传部及省文化局的复查意见，即“把帝国主义思想打下去，把优秀民族遗产拿出来”等口号，都是符合中央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的精神的，对《山东响马》的争论和发言都是正常的。有些意见是有益的，应该撤销当时对戏改领导干部的处分。此外，还为一些表演

艺术家和知名演员举行纪念活动。

二、组织机构率先恢复

广东省文联文化大革命后最早恢复活动。1977 年 12 月，广东省文联召开一届二次扩大会议，宣布恢复文联和各协会主席职务。经过长达十年的沉寂，广东省文联和各文艺家协会又重新组织起来。广东是全国最早恢复文联活动的一个省份。1977 年 12 月 24 日，《人民日报》载文报道广东恢复文联、文艺家协会的情况，并发表评论肯定广东文艺界“三个活跃”（思想活跃、创作活跃、演出活跃）的局面。1994 年，广东成为全国最早成立文艺批评家协会的省份。2004 年，广东文艺职业学院改制成功，成为全国文联系统唯一一所全日制普通高校。

1978 年，广东粤剧院、广东潮剧院、广东琼剧院和广东汉剧院恢复建制，健全了演出、研究、舞台美术制作等机构。几所戏曲学校恢复正规招生办学后，至 1981 年已为各剧种输送五百多名毕业生。不少地县的剧团还开办学馆和演员训练班，自己培养人才。

重新恢复、健全的中国剧协广东分会和广东省戏剧研究室等单位，在繁荣创作、活跃评论、开展研究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979 年全省建立地、市一级的戏曲工作室，研究室和文艺创作室十七个，共有一百二十一位研究、创作人员。

三、“解放思想”为人先

1978 年 12 月 9 日，周扬应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同志的邀请在广东文学创作座谈会上发表题为《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的长篇报告，提出和阐述了新时期文学艺术的任务、歌颂与暴露、社会主义文学和它的同盟军、艺术的形式和风格、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文学艺术的领导等六大问题，第一次就新时期文学艺术问题发表了“系统意见”。周扬提出：我们的文



粤剧一代宗师、红派艺术创始人——红线女

学特别要歌颂那些在各条战线上用各种方式抵制和反对林彪、“四人帮”，坚持工作和学习，坚持生产劳动，坚持科学研究，不怕打击，不怕坐牢砍头，表现出大无畏精神的千千万万无名英雄们。天安门的革命诗歌，就是“四五”英雄们以无比的革命义愤，用血泪凝成的集体创作，是光辉灿烂的政治诗篇。《于无声处》第一次把这种英雄人物搬上舞台，这是文艺战线上的一个勇敢的突破，一个值得庆贺的成功。……也是它受到观众欢迎的原因。话剧《丹心谱》，短篇小说《班主任》等作品，也都是写反对“四人帮”的斗争的，也都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对这类作品，即使其中还有某些缺点和不足，轻率地称它们是“伤痕文学”、“感伤主义的文学”或“暴露文学”，而对之采取贬低或否定的态度是不恰当的。我们正需要有更多更好的揭露林彪、“四人帮”的作品，否则我们怎么能表现我们这个时代的尖锐复杂的斗争，并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呢？（节选自周扬《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

《人民日报》1979 年 2 月 23-24 日）。

四、“规划部署”求佳作

1978 年 2 月，省委决定恢复广东粤剧院、广东汉剧院、广东潮剧院、广东琼剧院等省级戏剧院团建制。同年 6 月，省委宣传部批转省文化局《关于我省逐步恢复上演优秀传统剧目的请示报告》。广东话剧团（1984 年更名为广东话剧院）及省直属院团开始正常的演出活动，各市、县剧团也开始走上正轨。

1979 年 1 月 19 日，省文化局印发文化部《关于奖励优秀剧目、节目、美术作品的通知》，决定由省文化局、中国戏剧家协会广东分会（简称省剧协）主持建立戏剧（包括皮影、木偶）评选委员会。同年 12 月，省文化局在广州等地举办广东省 1979 年专业戏剧分片演出。同年 5 月，广东省文化局在广州召开全省戏剧创作座谈会，研究戏剧创作问题，制定创作规划。各地、市文化局抓创作的领导和专业剧团作者共 80 多人参加了座谈会。1979 年 8 月，广东省文化局在广州召开地区（市）文化局局长座谈会，学习、贯彻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商讨 1980、1981 年文化艺术事业发展规划。1979 年 8 月，广东省文化局在广州召开戏剧研究工作座谈会，总结广东省 30 年的戏剧工作，讨论戏剧研究工作规划。1979 年 9 月，广东省文化局印发《关于加强戏曲、曲艺上演节目的领导和管理工作的通知》。1979 年，海丰县白字剧团、海丰县西秦戏剧团先后恢复建





中国传统戏剧粤剧粤曲服装

制。广东粤剧团在全国出访艺术团体中率先实施商业演出，赴香港公演 34 场，场场爆满，载誉而归，标志着广东涉外文艺演出市场的形成。

1979 年 10 月 30 日，以肯定和倡导“新时期文艺”为主题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祝词》里说：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列宁说过，在文学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周扬的主题报告《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则延伸了邓小平在四次文代会《祝词》中文艺“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思想，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新时期文艺的新口号，阐述了新时期文艺发展的基本任务，阐述了文联和各协会的职责和分工。周扬认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性质，“从根本上说，也就是文艺和人民的关系”。1980 年 7 月 26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最终替代执行了 30 年的“文艺从属于政治”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

1980 年秋，广东省文化局召开会议贯彻全国戏曲剧目工作座谈会精神，决定采取召开戏曲创作会议和剧本讨论会，制订剧本上演、刊用的稿酬暂行规定，给予剧团排演新剧经济补贴，扩大剧本发表园地等措施，有效地促进了戏曲创作演出的繁荣。

1981 年 5 月，省文化局在广州举行全省戏剧调演第一轮演出。为提高剧本创作水平，广东每年举行一次剧本评奖活动。1983 年省文化厅在广州主办广东省新编剧目观摩调演，参加调演的有 7 个剧种 23 个剧目，文化部艺术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电台及福建、四川等地派代表到广东观摩指导。这次调演标志着广东戏剧舞台的全面复苏。

这时期现代题材的戏剧作品成为创作、演出主流。话剧《神州风雷》及粤剧《乱世缘》《几番风雨几番晴》是直接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话剧《十字街三重奏》和采茶戏《人生路》直接反映新时期的生活。为纪念东江纵队成立 40 周年，广东粤剧院三团和广东话剧团还分别创作粤剧《红玫瑰》和话剧《港九传奇》。广东话剧在全国率先创作直接表现改革开放题材的作品，如《南方的风》《特区人》《裂变》。

经过几年努力，产生了一批比较优秀的剧目：粤剧《三脱状元袍》、潮剧《袁崇焕》获文化部举办的全国话剧、戏曲、歌剧优秀剧本奖。这两个剧本和粤剧《洛神》《粤海忠魂》《兰苑恩仇》《家》《陈铁军》、潮剧《澎湃》《恩怨宋家妇》《张春郎削发》、广东话剧《花灯案》、《广东案》，正字戏《换乌纱》、雷剧《陈琼放犯》、粤北采茶剧《称心花》等，分别获得广东省鲁迅文艺奖或广东优秀剧本奖。

整体观之，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广东戏剧在题材、风格、表现手法上追求多样化，戏剧创作和演出十分活跃。这时期内，戏剧成为大众最为关注的舞台艺术样式。

五、演出兴旺

在思想开放的领导的支持下，在各类行之有效的文化政策的扶持下，这一时期广东的戏剧创作和演出空前活跃。一大批优秀剧目和著名演员获得“解放”重登舞台后，曾经引起轰动，戏剧演出繁荣兴旺。全省表演团体（绝大多数是戏曲剧团）。在 1977 年共演出 2.5 万场，观众 3800 多人次，收入 520 万元；到 1979 年共演出达 3.7 万场，观众 5000 万人次，收入增至 1100 万元。1977 年年初演出的剧目是清一色的现代剧，下半年才上演少量古装戏。1978 年 6 月，中共广东

省委宣传部批转同意广东省文化局关于逐步恢复上演优秀传统剧目的报告。舞台上传统剧目猛增。为了全面贯彻“三并举”的剧目政策，推动新时期戏曲发展，广东省文化局自1978年后每年都举行艺术会演或戏剧观摩演出，并与中国剧协广东分会联合举办戏剧作品评奖。戏剧剧目的日益丰富，使粤、潮、琼、汉几个剧种从1979年开始恢复赴港澳和出国进行友好访问演出。在1980年，全省（不计海南）各级国办的专业艺术表演团体达到173个，其中戏曲团体有116个，全年演出4万多场，观众达4977万人次，演出收入有1000多万元。新时期的拨乱反正，使中国戏剧从此进入了新的繁荣期。随着整个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转型与开放，社会变革深刻而有力地进行，社会的文化环境和思想观念开始日渐走向宽松和谐，戏剧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广东戏剧界也乘先行一步的改革开放的春风突破禁区，先行起来。

六、对外交流开放早

1979年10月，广东潮剧院一团65人赴泰国、新加坡演出，这是广东戏曲团体“文革”后第一次到外国演出。广东最早成立现代舞团，曾经为中国现代舞在国际舞坛上摘取了第一枚金牌。早在1981年，广州杂技团创作的《顶碗》《滚杯》向高难度技巧突破获得成功，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杂技界第一个走出国门的杂技团。1981年9月23日—29日，美国杰罗姆·罗宾斯舞蹈团一行22人到穗访问演出，这是中美建交以后美国政府派出的第一个访华演出舞蹈团。1982年6月11日—8月7日，广州粤剧团55人赴美国、加拿大演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粤剧团首次赴北美演出，这次演出得到侨胞的赞赏和外国媒体的高度评价，纽约亚洲艺术协会和联合国交响乐协会还为红线女颁发了“杰出艺人奖”。广东省文化部门还承接了援建刚果人民宫剧场舞台设备、电影放映设备的任务，先后派出4名舞台灯光、电影放映技师前往传授舞台操作技术。1989年，肇庆粤剧团应邀赴英国伦敦演出，这是粤剧首次在西欧演出。

1990年后，广东省对外文化艺术交流的质量又有新的提高，1999年，双向交流的数量曾上升到全年出访387批、4239人次，接待来访449批、6362人次，首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外双向文化艺术交流人数年超万人次的记录。广东省对外文化艺术交流，已同世界五大洲120多个



广州红豆粤剧团欧凯明老师



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正常、友好的联系和往来，外国也先后有 9 个省、州和 45 个城市来粤与有关政府缔结了友好省、州或友好城市关系。广东省历年派出参加各类国际艺术比赛和民乐、声乐、合唱、杂技、钢琴、手风琴、舞蹈、少儿艺术等项目，累计已获得近百个奖项。杂技、粤剧、潮剧、现代舞等艺术品种在港澳台地区和欧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地已建立了较稳定的演出市场。广州交响乐团进入欧洲金色大厅演奏等，都取得成功并产生巨大影响。

七、院团改革先试行

1983 年 2 月，时任中国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到深圳、广州、佛山、南海等市、县视察、指导工作，并就文化宣传文化艺术管理体制改革等问题发表了讲话。省文化局转印发县以上文化部门学习。1983 年 2 月，广东省文化局召开地、市文化局局长会议，讨论文化艺术单位管理体制改革问题，研究安排 1983 年工作任务，出席会议的有各地、市、部分县文化局和省局直属单位负责干部 60 多人。1983 年 5 月，广东省人民政府批转省文化局《关于文化艺术单位管理体制改革问题的报告》，要求各地、市、州、县认真贯彻执行。

1984 年 1 月，广东省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省话剧团等三个文艺团体体制问题的批复》：一、同意将广东话剧团改称为广东话剧院，并将该院的广州话队、普通话队调整为喜剧团、实验剧团

广东海丰西秦戏《马援伏波》



和儿童剧团。二、同意将广东歌舞团改称为广东音乐舞蹈艺术剧院，并将该院的舞蹈队和广州乐团部分轻音乐、民族音乐的人员调整组成舞蹈剧团、轻音乐团和民族乐团。三、同意保留广州乐团，将原广东歌舞团的交响乐和合唱音乐的人员充实到广州乐团。

1985 年 6 月，广东省文化厅在广州召开市、地文化局（处）长会议。会议传达了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精神，着重研究艺术表演团体改革问题。1985 年 9 月 25 日—26 日，广东省文化厅召开市、地文化局（处）长会议，汇报、讨论艺术团体调整问题。

1986 年 4 月，广东粤剧院重新调整，新组建的三个演出团体是：一团、二团和青年团；1986 年 6 月，经省编委同意，“广东音乐舞蹈艺术剧院”易名“广东歌舞剧院”，原该院的民族乐团中广东音乐部分划归广州乐团管理。

1987 年 9 月，广东歌舞剧院舞蹈团作为省直第一个艺术团体改革试点，率先实行团长负责制和团长任期目标责任制，易名为“舞剧团”。1987 年 10 月，广东省文化厅发出《关于厅属企事业单位在深化改革中提名、选聘干部问题的通知》。1987 年 10 月，广东省文化厅通知，为适应深入改革的需要，广东歌舞剧院试行院长负责制。1988 年，广东省文化厅直属单位在完成评定任职资格的基础上，实行了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和兑现岗位职务工资。

1988 年 3 月，厅直属院团改革座谈会在肇庆市召开。1988 年 7 月起，广东省粤剧院试行院长负责制。1988 年 10 月，广东省人民政府转发《国务院批转〈文化部关于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意见〉的通知》。1988 年 10 月 29 日—11 月 1 日，全省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座谈会在广州召开，会议讨论、制定了《广东省直属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方案》。时任文化部部长王蒙到会作了指示，肯定了佛山青年粤剧团、海康县民间职业剧团的管理办法以及海丰县白字戏剧团改革经验。1988 年 12 月，广东省文化厅向各市、县人民政府、文化局发出《关于印发〈广东省直属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

1989 年，广东省粤剧院、广东省歌舞剧院、广东省话剧院实行院长负责制和院长聘任制，广州乐团实行团长负责制和团长聘任制，广东粤剧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和校长聘任制。同时在各院、团、校成立体制改革领导小组，负责制定各单位的体制改革方案并实施。1989 年 3 月，广东省文化厅向省直三院一团发出《广东省直属艺术表演团体待聘人员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1989 年 7 月，省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复，同意广州乐团民乐分团及其 16 名事业编制划归广东歌舞剧院。1989 年 12 月，省文化厅召开省直三院一团体制改革总结交流会议。至此，广东省文化厅直属单位的第一轮院团体制改革宣告结束。广东省内各地市院团陆续也开始了院团体制改革。

八、扶持政策促创作

1986 年 1 月，广东省第一个与企业合作的戏曲演出团体——广州新时代粤剧团与广东运动饮料厂签署合作协议，易名为“健力宝粤剧团”，体现戏剧团体新的运作机制。

1989 年 3 月，省文化厅出台《关于省直三院一团创作人员优化组合的意见》，明确提出，创作机构或实体，必须实行优化组台，其编制为现有创作、舞美人员的 60%，最高不得超过 80%；由各院（团）长聘任或招聘创作机构和实体的负责人；创作机构或实体，均应首先完成本单位的创作和设计、制作任务，在完成本单位任务后，可以面向社会开展有偿服务，并向院（团）上缴一定比例的稿酬和劳务收入；参加创作机构或实体的人员，与院（团）内其他受聘人员一样，采取固定工资加浮动收入相结

合的劳动报酬制度。

在进行戏剧团体体制改革的同时，省文化厅尝试运用经济手段鼓励戏剧创作。1985 年 6 月 4 日，省文化厅转发文化部《关于〈付给戏剧作者上演报酬的试行办法〉的通知》。1987 年 5 月 16 日，省文化厅发出《关于组织群众戏剧巡回演出活动和实行演出“超场奖”的通知》。8 月 31 日，首届中国艺术节在北京举行，省文化厅决定：对赴京参加首届中国艺术节获得好评的广东潮剧院（演出《张春郎削发》）、广东音乐曲艺团、广州杂技团、广州民族乐团、陆丰皮影剧团等 5 个表演团体和个人分别颁发奖金 2000 元。为激励戏剧作者，1988 年 7 月，省文化厅决定对 1988—1989 年全省戏创作的剧本分别发放 500 元至 1000 元的创作补贴。1990 年 5 月 14 日，省文化厅发出《关于继续组织群众戏剧“一条龙”巡回演出活动和实行超场奖的通知》。1990 年 8 月省文化厅嘉奖五华县采茶戏剧团自编的现代戏《竹山路弯弯》上演 276 场，并给予奖金 5000 元。1991 年 1 月 10 日，省文化厅发出《关于嘉勉话剧〈情结〉上演百场的通知》。2 月 6 日，广州市文化局通报嘉奖《情结》剧组，发给剧组奖金 1 万元，编剧 2000 元。这些规定和做法有力地动了戏剧创作和演出。



荔枝湾的西关大戏台，一众票友自娱自乐，却十分专业

通过政府在经济上的支持，通过举办各种评比奖励活动，真正达到了“出戏、出人”的目的，对继承发展戏剧艺术，起到了一定的促进、推动作用。

广东戏曲在振兴发展的同时，也出现种种矛盾和问题。剧目创作和艺术革新的步伐未能适应时代和观众的要求、新演员素质欠佳导致演出质量下降，加上剧团和队伍的过度发展，又面临日益增多的娱乐品种的激烈竞争，使得戏曲演出的上座率下降。如广州市的戏剧（主要是粤剧）演出情况，1978 年演出一千七百多场，平均上座率 97%，1981 年演出 2200 多场，平均上座率 73%，到了 1982 年演出 1700 多场，上座率下降为 67%。许多年轻人不喜欢看戏曲，据当时一份调查材料，平均 1000 个戏曲观众中，年龄在 35 岁以下的仅占 10%。不少剧团在经济上收不抵支，戏曲界内外都有人发出“戏曲危机”的惊呼，各种议论纷起，一些报刊组织专题讨论，文化部门和创作研究机构也认真同戏曲界协调研究，寻求解决戏曲在新时期遇到的困难的办法，探讨在开放改革的形势下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和艺术革新，使人民的戏曲事业真正繁荣发展。



摹写时代风采　彰显广东精神

文　程　露

程露，湖北省通山县人。2012 年 7 月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广东现当代文学。现为中山大学新华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副主任、优秀共产党员。主要讲授“文学原理”“文学评论与写作”“美学”“基础写作”等课程。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40年来，广东实现了思想大解放、社会大变革、经济大飞跃，也带来了文艺大繁荣。然而，由于历史、现实、文化和地域等诸多原因，也由于缺乏梳理、总结以及宣传，广东文艺的成就被严重低估、忽视乃至遮蔽。近年来，广东省人民政府提出“岭南文化创新”的战略构想，倡导发展区域文化，以增强广东文化自信，提升广东文化的影响力。在此背景之下，适逢“改革开放40年”的契机，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组织编写了这本超过80万字的巨著《改革开放与广东文艺40年》（陈剑晖、徐南铁、郭小东主编，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广东文艺的成就与经验，展示广东文艺的实绩和力量。

该书按文学、影视、音乐、美术书法、戏剧等五大文艺类别分编，全书共五编60章，分别由陈剑晖、郭小东、陈小奇、许钦松、陈中秋主编。各编撰写者既有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广东技术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新华学院等各类广东高校教师，也有文史研究馆、美术馆、《南方日报》、羊城报业、广东高教出版社、各级作家协会、文艺研究所以及文艺公司等各路专家。他们是身处文艺现场的实践者、观察者、研究者，知识背景各异，评价视角多元，行文风格多样，因此，本书可以提供多种阅读的可能，满足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

《改革开放与广东文艺40年》以一种史学方式描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文艺的发展历程，点面结合，力求呈现各代际特征。该书既有对文艺类型、文艺特征、文艺活动、文艺报刊、文艺政策等方面的介绍，也有对文艺界诸领域代表人物（如作家、艺术家、导演、音乐人、非遗传承人等）的述评。其述评的文艺作品，多数都是获得全国性奖项或者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名篇名作，它们体现了改革开放在文艺领域的重要影响，也代表了广东文艺的前进方向。这一点，本书中关于各类叙事艺术如小说、报告文学、戏剧、影视的评述尤为明显，正如书中所言：“这些作品不仅描写了改革家和普通人的感情观念的变化，更主要的是通过这种变化的描写力求体现改革开放的一种历程与标志，因此更富有历史的深度及现实的力度。”阅读全书，让我们深深体会到：这40年的广东文艺早已刻下改革开放的烙印，成为我们回望历史的重要史料。

纵观40年的广东文艺，除了对改革开放历史语境的反映，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始终保持与国家意识形态的交响。开篇第一章所谈《南方日报》头版刊登的《砸烂“文艺黑线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创作》是全国最早以党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批判“文艺黑线论”的文章。20世纪七八十年代广东文艺理论批评界积极响应中央文件精神，为粉碎“四人帮”文艺思想，推动全国文艺界的思想解放运动，活跃和繁荣新时期文艺发挥了积极作用。第一编所论各文学体裁中有不少反映国家主旋律作品，尤其是

广州青年粤剧团，演出前准备工作



改革开放初期数量更多。其他各编如影视创作、中国画、油画、版画、话剧等领域的主旋律创作也取得诸多荣誉，充分展现了广东文艺的政治意识。

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广东的文艺创作曾有不少走在全国前列，有的甚至成为国内文艺的风向标，这也是广东文艺最值得称道的。第三编“改革开放与广东音乐”即向读者描述了众多词曲作者、后期制作等幕后音乐人的诸多创举，今天读来依然激动人心。中国流行音乐发轫于广东，除了传唱一时的音乐作品，很多音乐行为、音乐类型也是首创，比如举办本土原创歌曲大奖赛，开办“音乐茶座”，成立唱片公司，创作企业歌曲、旅游歌曲，等等。“广东的流行乐坛已成为中国流行音乐‘航母’的发动机，广东是中国原创流行音乐的摇篮和最紧实的创作根据地。”文艺创新不是孤立现象，除了音乐，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广东影视创作类型多样、题材全面，一片繁荣景象。广东电视台制作的第一部连续剧《虾球传》是除中央电视台之外地方电视台的首创。《公关小姐》《外来妹》开风气之先，以改革开放时代新人物为主角，取得不凡的收视率。《情满珠江》《英雄无悔》《和平年代》等荣获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一等奖。阅读第二编“改革开放与广东影视”，可以让我们清晰地看到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影视创作如何抓住机遇、创造辉煌，同时它也为今日广东影视创作的华丽转身指明了方向。文学方面的创举亦多有可称道之处，第一编“文学理论”版块谈及许多文学观念解放都是广东首发，比如关于“朦胧诗”的争论，金庸、梁羽生、琼瑶等港台通俗文学的出版，打工文学创作，“粤派批评”等，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各体裁亦有很多产生全国性影响的作品，此外，文学体制改革及文学活动亦多创举，例如广东诗歌节是广东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诗歌活动，广东是当之无愧的诗歌大省。广东文艺的创新力量一方面得益于广东经济的改革开放，另一方面取决于广东文艺工作者务实求新、开拓进取的精神，他们传承了近现代以来岭南先贤“独领风骚，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文化品格。广东精神与改革开放同步同趋。

歌德在其著名的《文学上的无短裤主义》一文中曾论及建立民族文学的路径，其中首要条件是“他在他的民族历史中碰上了伟大事件及其后果的幸运的有意义的统一”。即民族文学的建立要与这个民族所经历的伟大历史时代联系起来，要有顺应时代规律的历史运动，既而推进历史前进。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改革开放即是这样一个伟大事件，这样的时代也必然呼唤民族文学的产生。广东文艺工作者很早就已经感应到这种呼唤，从《改革开放与广东文艺 40 年》的各编述评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在发展文艺民族性及挖掘地方文化等方面的积极探索。从欧阳山、陈残云、陈国凯、章以武到张欣、张梅、廖琪，再到黄金明、陈崇正，一代代的广东作家都自觉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广东地域特色。音乐界对民族性的探索更加多元，陈小奇将唐诗宋词化入流行音乐，李海鹰打破流行与古典的界限，解承强把摇滚音乐与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完美融合，张全复用音乐表达中华民族传统情感，广东流行乐坛吹出西北风、戏曲风。此外，影视、绘画、戏剧等领域对民族性文艺的探索也是数不胜数，而且随着国力的强盛，越来越突显。书中所谈及的各类官方文件以及官方奖项，都有一个潜台词——“中华民族”。不同的文艺创作拓展了民族文学的疆域，深化了民族底蕴的内涵。民族化文艺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在多种文化互鉴中找准本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并发扬光大，正所谓：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改革开放与广东文艺 40 年》的出版，再一次表明广大文艺工作者应该始终坚持文艺民族化道路，为创作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艺作品而继续努力。

南风窗

争回来的宝地 ■ 杨尚昆为何借款一千万 ■ 6060案件 ■ 京西
了"长头发" ■ 投个眼风给巴黎 ■ 当心!"爱"的魔爪 ■ 人神之间



创刊号
1985
The Window Of The South Wind

一本时政新闻杂志是一个时代的体温

文 陈 中



陈中，资深媒体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杂志《南风窗》创办人之一，曾任《南风窗》的社长兼总编辑。2006 年，被国际传媒誉为“中国的良心”；2009 年，被中国期刊协会授予“新中国 60 年有影响力的期刊人”称号；2009 年，被评为“中国新闻改革探索的领军人物”；2010 年，被中国传媒大会评为“中国传媒年度人物”；2011 年，获第六届亚洲品牌盛典颁予“中国品牌创新杰出人物”奖；2011 年，被中国媒体高峰论坛评为“媒体业最具影响力品牌人物”。

人是环境的产物，杂志如人，一本杂志也是一个环境的产物、一个时代的产物，它随着一个时代应运而生，也将随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而逐渐消亡。

1984 年，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反“精神污染”不久，姓“社”姓“资”还时常争论不休。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地，也是“香三年，臭三年，香香臭臭又三年”。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全国劳动模范去深圳特区参观，他们看到了高楼大厦，灯红酒绿，商业繁华，港商外资，拿钱说话，征地建厂，民工潮涌……有个别劳模受到了深深的刺激，晚上回到宾馆关上门痛哭着说：“毛主席打下的红色江山，除了国旗还是红的，这里已经全部变色了，变成资本主义了！”

北京的一些老同志也对广东改革开放提出了不少质疑。为此，中央专门组织了一个新闻采访团，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记者组成，实地采访考察广东改革开放搞活后的真实变化。他们写了不少内参，拍了纪录片，带回北京去给老同志们看。

对于改革开放的这些质疑、争论甚至批评的信息回馈，广东省、广州市的领导们当然也知道。其时的广东省委书记是任仲夷，省长是梁灵光；广州市委书记是许士杰，市长是叶选平。叶选平的父亲叶剑英，1950 年主政广东，领导广东土地改革，他深刻分析了广东地处东南沿海、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工商业发达等实际情况，提出一系列保护华侨、保护工商业、保护民主人士的具

体政策和措施。不料，南下干部和本地干部的磨合不顺，一大批广东干部竟被扣上“地方主义”的帽子，被整得苦不堪言……30多年来，广东干部们一直小心翼翼，饱受冷遇，抬不起头。

虽说改革开放是中央的决策，也是时代的大势，但毕竟这是前无古人的新探索，改革者不仅要冒风险，更需要具有勇气和智慧。因此，任仲夷、林若、梁灵光、许士杰、叶选平、谢非这些领导们一边埋头苦干，一边也有种种困惑和担忧。这种困惑来自新旧体制、新旧观念交替时的碰撞，冲突不仅表现在广东内部，同时也表现在上下沟通中，在与国内其他地区的交流上。但很显然，如不能很好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必然会对改革开放的许多工作带来不利的影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南风窗》应时而生了。

有人说“广东人只会生仔，不会起名字”“广东人只会闷声发财”“广东是文化沙漠”“广东人是只会干不会说”……

若论“说”与“干”，人分好几种：光说不干的，先说再干的，先干再说的，边说边干的，能说会干的，会干不会说的，会说不会干的，说一套干另一套的，干一点说很多的，干完了也不说的……

广东人不能只会干不会说，广东不能没有舆论阵地——我们要务实地干，我们也要大声地说！

广州市委决定创办一份公开发行的月刊，有关提议来自吴迅——市委内部小报《机关建设》的女编辑。在征得市委领导的同意和支持后，吴迅和她的同事汤英，就成了这本杂志最早的筹创者。

吴迅是位个头矮小、其貌不扬的大姐。她本人不会办杂志，就找来了曹淳亮和我。

1984年11月16日，吴迅、曹淳亮、汤英和我四人向市委领导汇报筹办《南风窗》杂志的工

1985年《南风窗》创刊时期的办公室



作。金秋的阳光洒在窗外的小竹林，微风下，竹叶颤动，金光忽闪忽闪着，在这个收获的季节，我们正酝酿着思想解放的播种，会议民主而热烈，多项工作在讨论中形成共识，最后，市委书记许士杰说："这本杂志能不能办成功，关键是人才。"于是，曹淳亮和我第二个月即调入市委政策研究室，《南风窗》的筹办工作迅速动了起来。

新杂志的刊名由市委书记许士杰拍板确定。这个刊名是有争议的，对它的本意有各种不同的解读，拿现在的话说，是"羡慕嫉妒恨"全都有。"南风窗"本是一句广东俗语，指的是谁家有海外关系。文化大革命期间，谁有海外关系，常常被攻击为"内外勾结"的"敌特嫌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南风窗"的人家，会收到亲友寄来的提货单，你可以拿着它到友谊商店或"海员出国人员提货中心"提货，彩电、冰箱、洗衣机、自行车、各种紧缺副食品等。人们开始羡慕有"南风窗"的人家，姑娘找对象优先考虑这样的人家。

所以，拿"南风窗"做刊名，其实也挺犯忌讳的。

但是，许士杰一眼就相中了它，"好吧，出了事我负责任"。轻轻的一句话，立刻使我们放了心。许士杰书记说：

过去，有人总认为广州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广州人的社会关系复杂，有"海外关系"的成为审查对象，因而认为广州是敌人颠覆我国政权的跳板，是阶级斗争的前沿阵地；从准备战争出发，广州不适宜谈发展，也不适宜搞大项目的建设。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对广州的认识，而现在要进行改革开放了，就要用改革开放的观点来再认识广州，上述的种种问题不仅不是坏事，反而成为有利条件——毗连港澳是改革开放的地缘优势；华侨众多、海外关系成了改革开放的人缘优势，这对广州的建设是非常有利的。这种思想束缚一旦解放，人们的精神面貌就大不相同，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

其实，在我们草拟的若干个刊名里，我自己最喜欢的也是"南风窗"，因为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当时广东行政区域包括海南岛），我们就是想在祖国的南大门开一扇"窗口"，透口气，传递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一股清风。

可以说，《南风窗》是衔着光荣的使命出生的。这种使命，从许士杰亲笔写给我们的诗里可一窥端倪：

南风窗赞

一度严封闭，屋内未穷年。屋外春意闹，昏昏半入禅。

自从启窗扉，啁啾搅沉眠。南风驱郁闷，南风送春妍。

南风带疫菌，蚊蝇舞蹁跹。南风敏冷暖，未惬衣披肩。

开窗容窥探，室中应皎然。开窗为远望，纵眺万里云。

开窗光灿烂，宏观识大千。开窗乘长风，扶摇百尺巅。吴迅、汤英、曹淳亮和我，是《南风窗》最早的四个人。

吴迅是个中年大姐，温婉和善，思想开明，她勤于思考，却不善表达，无论是语言表达还是文字表达。她有宽大的胸襟，特别重才、惜才、爱才，为了吸引人才，放手让人才更好地发挥作用。她甘当人梯，更难得的是为了保护人才，她具有承担责任的勇气。

汤英是个川妹子，也是个典型的女汉子，风风火火，泼辣能干。汤英的特长是突破能力强。吴迅和曹淳亮是秀才性格，内秀而不张扬。汤英和我则是大将风格，敢冲敢闯，心里没个"怵"字，办刊初期，我开着摩托车带着她，几乎闯遍了省市领导的办公室和各机关部委，把要办的事


南风窗
For the public good
半月刊 2004年7月16日出版
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特别报道
百年小平
任仲夷：南粤开风气，多亏邓小平
解读邓小平的“政治遗产”
ISSN 1004-0641
南风窗
中国人本60年
南风窗
新年特刊
2005
中国
核心议题
南风窗
好好呼吸
南风窗
丑闻的季节
南风窗
“异端”的阅读
南风窗
09’“维稳”新思维
南风窗
走出“富饶的贫穷”
南风窗
震荡与重建：巨变时代的中国企业
南风窗
激流中的坚持
南风窗
生态政治浮现中国
南风窗
危机时代的治道变革
南风窗
爱国青年是如何炼成的
南风窗
FOR THE PUBLIC GOOD
20年，中国表情
南风窗
又见乡村
南风窗
古中医：危墙下的复兴
报国无门杨明明

《南风窗》杂志封面

一一拿下。

吴迅是伯乐，曹淳亮是千里马，可以说没有吴迅就没有曹淳亮，没有曹淳亮就没有《南风窗》——曹淳亮为《南风窗》定下了最初的内容基调和风格特色。

曹淳亮有着清瘦的外貌，架着一副最普通的工作眼镜，外表是谦谦君子，内心却常常激情澎湃，稀疏的头发和智慧成反比。老曹从小的理想就是当记者。小学五年级时，他一不小心把理想公布出来，结果同学们都嚷嚷："我也要当记者！""我也要当记者！"曹淳亮顾全大局，主动退让："都当记者怎么行？那我就当农民给你们种菜吃吧。"

后来他果真当了农民——高中毕业下乡插队，犁田、耙田、育苗、插秧、割稻全套农活都干过。7 年后他回城当了汽车修理工，终于能吃上每顿带点猪肉的饭菜了，非常知足。十年动乱结束，《黄金时代》杂志招考记者，曹淳亮幼时的理想再次萌动。他去考，考上了，那年他 32 岁。

当记者的第二天，曹淳亮就一个人外出采访了。若干年后，他也用这个方法考核了前来求职的大学毕业生秦朔。很快，曹淳亮升职为《黄金时代》编辑一室主任，在《黄金时代》的几年，他熟悉了杂志的采编流程，也萌发了担纲办一本杂志的雄心壮志。他太知道把握机会的重要性了——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曹淳亮就是这样的人。

在他的前半生，他扮演过多种角色，了解各种人物的不易，更深知通过沟通加强理解、消除误会、避免而不是激化矛盾的重要性。他的本性是善良的，他希望与所有的人和睦相处，希望所有的人都好，大家都往前看，都向前走。所以，他给《南风窗》确立的宗旨定位是做"桥梁"，他说：杂志应该起到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作用，成为沟通党心与民意的桥梁。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应该让群众多一些知道市委、市政府的决策过程，既是改革开放的窗口，又是沟通理解的桥梁。"总的说，《南风窗》的办刊宗旨就是"四新四桥"，"四新"是指杂志要"反映新事物、宣传新观念、揭示新趋势、促进新潮流"；"四桥"是指杂志要充当"政治与经济、领导与群众、理论与实践以及几代人之间的桥梁"。《南风窗》身处广州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地，我们有这个"土壤优势"。

《南风窗》是广州市委主办的杂志，我们在市委大院里创刊。虽然《南风窗》编辑部偏居于大院的一隅，但是我们离"常委楼"最近，我们跟书记、市长以及其他常委们经常碰面。那个年代，人和人的关系朴素单纯，同志的成分大于等级的界限，干群关系比较融洽，领导没什么架子，我们也率言直陈。对于我们有关创刊的所有想法，可以与领导平等地讨论。

我们提出的第一个想法：不以机关刊的方式办刊，以民间面目会更好地贴近老百姓。

当时国内媒体分为两个极端，一极是党报党刊，高高在上，那种"文件传达文件，会议传达会议"的党八股，"板着面孔说话"，一个劲儿地灌输教训读者；另一极是地摊文学，我们称之谓"拳头加枕头"，武侠混淆着黑道，爱情掺杂着色情，低俗文化大行其道。两种媒体泾渭分明，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们跟他们都不一样，我们既深知民众的喜怒哀乐，也看到了领导们殚精竭虑的决策过程。我们发现党心、民意之间其实有许多共通点，《南风窗》可以由此搭桥、沟通，而产生对社会问题的共识，形成社会进步的合力，由此也焕发传媒自身的生机与活力。

我们希望市委尽量让我们独立办刊，支持我们闯一闯新闻改革的探索之路。市委副书记张汉青明确表态："少干预，真支持。"事实上，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后五年，省、市的领导们真正做到了"少干预，真支持"。

那是一个真正的思想解放的改革年代。

我们提出的第二个想法：不要财政拨款，只

需暂借 5 万元开办费启动，待杂志运转上路后，再将这笔款还回去。

既然不作机关刊，既然要探索新闻改革之路，既然要独立办刊，就不要包养，从第一步就“下海”闯市场。现在回头看看，这种“零资本创刊”，全世界恐怕也仅此《南风窗》一家吧。

我们提出的第三个想法：不要局级的单位级别，编辑部现有的干部级别也不提。

为什么？当时，市委领导的意见是将《南风窗》定为局级单位，他们深谙体制内的运作，要想有资格靠近核心层，获得核心信息资源，必须有一定级别，否则，有些文件不能看，有些会议也不能参加。同时，市属各机关的相互关系，也须级别平衡，定为局级，这有利于《南风窗》的管理和工作开展（多年后的事实证明领导是英明的）。

那时，我们这些“秀才”压根没领会领导的苦心和深谋远虑。我们几个私下议论：除了挂名主编的市委研究室副主任王利文（他是正局级）之外，吴迅是我们当中级别最高的干部，她才是个副处级，显然她不可能连升三级。如果定了局级单位，上面很可能派一位局级行政官员来当领导，那《南风窗》岂不是又要办成机关刊了吗？岂不又要纳入党政管理系统了吗？我们不要办机关刊，我们要做专业的新闻杂志，我们要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无前例的新闻探索者！这是我们的追求使然，也可以说是我们的那点“小心眼”。市委领导们对我们的顾虑和愿望了然于胸，他们轻轻一笑，同意了我们的要求，他们也知道“体制病”束缚了多少创造性，他们也知道把一本新闻杂志交给能干的人是多么重要，因为他们自己也深受“官僚病”“请示病”之苦。许士杰书记和叶选平市长都在多个场合批评过这类官员。

许士杰书记跟我们说：“过去有‘恐右病’，现在有‘请示病’。有些同志过去被捆绑惯了，麻木了，现在放了权也不敢用权，不会用权，自己可以做主的问题不敢做主，到处请示。这种‘请示病’，既不利于工作开展，也干扰了上级的工作。”

叶选平市长跟我们说：“那些忧国忧民、关心‘四化’的牢骚正是我们希望的。那些逆来顺受、不声不哼的人不行，不能开拓新局面！”



两位领导人的谈话，我们都发表到了《南风窗》创刊号上。

我是《南风窗》创刊四人之一，我来是因为我喜欢文化工作。我出身于电影世家，1958 年全家随父母从北京中央新闻电影纪录片厂南下广州筹创珠江电影制片厂。受家庭和珠影大院的影响，我从小爱好文学和摄影，对探究影像世界的奥妙感到有无穷乐趣。

在来《南风窗》之前，我从 1972 年三年学徒一直干到了纺织厂的车间主任。1977 年参加高

⏩ 1985年，广州市市长叶选平与《南风窗》成员商讨开展“假如我是广州市长提建议活动”



考之后，我一直没接到录取通知，以为考砸了，半年后，党委书记找我谈话，拿出录取通知书告诉我：“你的录取通知来了后，党委会决定，因革命工作需要，正准备提拔你，所以没有同意你去学习，希望你能理解组织的决定。”

我理解，我无语。

但是，我想读书！

终于，1982 年，全国的党校系统加强了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力度，开始走向制度化、正规化。我考上了市委党校第一届马列理论大专班——脱产学习两年。我这一生与党校有缘，几次人生的重大转折都与党校有关。同学来自不同的单位，他们开拓了我的朋友圈。市委机关党委的孙宁和市委机关团委的逄忠群是我的党校同学，当吴迅问及他们党校的同学中可有什么人才时，他俩不约而同地推荐了我，吴迅正为办新杂志求才若渴，第一次见面就定下了要我。

创刊初期，人手少，所以每个人要身兼数职，我的主要任务是当摄影记者兼党小组组长（吴、汤、我三人为党小组）还兼人事、出纳、广告、杂志排版、发行、通联等，其实没有明确的分工，只要是工作需要的事，责无旁贷，干！

我 15 岁就开始喜爱摄影，那是 1969 年，父母和叔叔阿姨们都下放到“五七干校”去了，整个珠影大院里只剩下 200 多个 7 岁至 15 岁的孩子。我是“孩儿王”，带着小弟兄们“过日子”，两平方公里的大院子是我们的“家”，这个“家”里有山坡、树林、鱼塘，有各种漂亮的鸟儿和东奔西窜的野狗。特别是废弃了的电影置景和黑咕隆咚的大摄影棚，常常是我们玩耍的好地方。我们爬到道具服装仓库里，穿上古装、洋装和军装、“大盖帽”的戏服。弟兄们各自从家里拿来了父母珍藏的“莱卡”“基辅”“海鸥”相机，开演了一场又一场“大戏”，我充当“导演”、“摄影”兼“演员”，加上后期的暗房冲洗放大制作，从此，与摄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到《南风窗》工作，我终于从业余摄影爱好者转为专业摄影工作了，我全身心地投入，怀着创业的激情，面对新的挑战，潜能大爆发。

老吴、老曹给了我足够多的任务和困难，也给了我足够多的自由和信任。老曹对杂志的品相很有想法，希望《南风窗》能够图文并茂——图片至少要占版面的 30% 以上，而不是文字黑压压一片。我负责拍摄和编辑照片，他热切地寄希







望于我，但我的希望还不知在哪里。我既没有沉淀多少自己的摄影作品，也没有可资利用的图片资料，怎么办？

好在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许国强，在广东外贸轻工摄影中心工作。他那里有好多进口图书资料，我借了过来给曹淳亮看。其中一张国际设计年鉴的照片，曹淳亮一眼就相中了，伸手一指："就用这个！"老曹说："目前我们自己制作的封面肯定达不到这个水平。我们想要的感觉、效果，只要它能达到，就得采取'拿来主义'——任何工作都是从模仿开始的，找到感觉了，以后才可能创新。比如我们编发的稿子，你不可能都去现场拍摄照片，只要你编辑配发的资料照片，能够符合文章内容，让读者去产生联想就可以了。"

在我的印象里，老吴除了睡觉，90% 的时间都在工作，端着碗边吃边谈工作，连星期天也不放过。在她的带领下，我们几乎是刻意选择了一种艰苦的、类似于职业革命家的创业方式。我们身无分文，亦无立足之境，市委将大院封闭了的偏门旁一间废弃的传达室给我们当办公室，它内外两间一共才十几平方米，摆上七张办公桌，交错地坐人，最里面的人要出来，全体起立才能让出道来。我戏称："一人撒尿，全体起立，若不让道，就得憋爆。"房间里没有空调，以广州之热，我们何止是汗流浃背，所以我们常常在露天树荫下开会办公，简陋程度类似于陕北窑洞。事实上，也真有人称其为"窑洞"的。1995 年，《南风窗》庆祝创刊十周年，广州市委研究室原副主任、《南风窗》首任主编王利文写了一首小诗《〈南风窗〉十载偶感》：

"事业开头难，窑洞人心齐；甘苦自相勉，多得许书记！"

我们夜以继日，我们把身边的朋友甚至爱人和孩子都动员来帮忙，曹淳亮还找了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有的是调过来了，有的是借用他们做"指导"，对我们这些新手"传帮带"，我们只用三个月就完成了杂志创刊的全部准备工作。

1985 年 4 月 1 日，《南风窗》创刊号诞生了！封面照片是一美少女的半边脸，裹在严严实实坚硬厚重的赛车头盔里，仅露出一只清澈、深邃的眼睛，静静地看着这个世界。

《南风窗》杂志封面







1985年至2010年的25年间，是中国新闻改革和中国传媒业大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

在这25年里，《南风窗》破茧成蝶，达到了顶峰，成为中国具有影响力的新闻杂志。

《南风窗》诞生于中国经济建设的改革开放正在探索中启步前行之际，以改革开放前沿地的环境优势、观念更新优势、信息资源优势“开启思想之窗，搭沟通之桥，吹清新之风”，被读者称为“华不失实，活而不邪”，“带来一股新闻改革的清新之风”。

从现代传媒的语境去理解这个25年前《南风窗》所提出的“桥梁”作用，它更接近“建设性”一词，或者说试图建立一种沟通对话制度，让社会各个阶层能更广泛地参与到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去。良好的沟通是真正解决存在问题的良方。一些问题及冲突的恶化也许仅仅在于缺乏良好的沟通。发现了问题，不是恶意炒作和渲染，而应该尽量帮助有关各方信息互通，减少因信息不畅造成的误解，化解由此产生的困境。这也是我们媒体的责任与方向。25年来，这种“建设性”的沟通和桥梁作用一直体现在《南风窗》的具体办刊方针中。即使从今天办刊的角度来看，《南风窗》这种经验依然具有生命力。建设和谐社会更需要这种沟通和桥梁，25年来，《南风窗》稳健而不激进地深入参与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就是因为《南风窗》这种建设性的力量更契合中国社会前行的脉搏。

当时的中国经济建设开始遇到比改革开放初期更多的问题和矛盾。人们所关注的也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量问题，而是更关注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南风窗》以敏锐的目光和更具有责任感、更富于建设性的姿态介入政经生活，关注社会转型的进程。“一份有责任感的政经杂志”此时正式提出，这是国内首次鲜明提出“聚焦政经”的概念。改版后的《南风窗》发行量稳步上升，很快成为期刊界发行量和影响力最大的时政、经济杂志之一，被称为中国“聚焦政经”的新闻标杆。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令世人瞩目的业绩，解决了人民生活的温饱问题，而且在社会变革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现阶段，站在“准小康的门坎”上，中国社会已经悄悄步入了一个转型期。这个转型期的课题就是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构建，就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文明的构建，就是全民族公共利益的构建。

《南风窗》一直关注中国社会的转型问题，提出了“社改元年”“构建和谐社会”“底层关怀”“公共利益”“宪政文明”“告别GDP崇拜”以及“生态政治”等一系列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核心议题”。基于此，2003年，《南风窗》再次调整确定了最新的定位：做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杂志。这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做最出色的主流新闻，为了公共利益，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聚焦政经。

《南风窗》的这次定位调整，显得更准确、更成熟、更丰富，也更鲜明。由此，更凸显了《南风窗》杂志的宗旨定位与风格特色的相得益彰，更凸显《南风窗》主流性、可读性、原创性、思想性、前瞻性、客观性与建设性的特色。这不是几个简单的口号，而是有灵魂、有骨头，也有血有肉。正因为《南风窗》的责任感、使命感、成熟感，才形成了《南风窗》特有的理性和务实的品质和气质，才形成了《南风窗》对社会问题特有的视角，才形成了《南风窗》特有的文采风格，才吸引了中国社会主流人群的读者认可，这也许就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吧！可以

说，《南风窗》是一个理念的聚合体。

《南风窗》25 年来所坚持的是严肃的新闻理念、敏锐而深刻的新闻价值探索与判断，强调兼具建设性与分寸感的务实的新闻操作。能够 25 年始终秉持这种态度是难能可贵的，因为这 25 年的中国社会既有风波变化和转型，也有多元诱惑与陷阱。我常常感叹："一个社会，如果主流失语，一定是低俗商业文化与庸俗艳媚文化的泛滥。"

《南风窗》向着"做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杂志"的目标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南风窗》以其坚守责任、理性、良知的形象，成为备受读者和全球主要报刊、通讯社关注的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主流期刊之一——他们非常注重采用《南风窗》的报道或采访线索。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和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等图书馆或研究机构均长期订阅《南风窗》，将其作为了解中国经济和社会改革进程的重要窗口和参考资料。据统计，《南风窗》平均每期有 10 多篇文章被国内外约 80 余家媒体转载，被全国文摘研讨会评为国内文章转载率最高的杂志之一。

2010 年，《南风窗》各项指标均达历史新高。根据慧聪媒体研究中心、新生代市场调研机构等国内外 6 大调查公司所公布的 2010 年度最新的调查报告：《南风窗》在发行量、阅读率、转载率、传播率、引用率均以高比率数据成为全国同类杂志的排行第一，《南风窗》已经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杂志。

复旦、人大、清华、武大、暨大等知名大学的新闻学院，均将《南风窗》纳入解读和研究的媒体案例。这个时期的《南风窗》，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南风窗》的成长和成功，离不开省市领导给予的高度支持和开明的管理，任仲夷、许士杰、叶选平、谢非、朱森林、黄宗春、肖鸣、张汉青、杨资元、高祀仁、黎子流、陈开枝、黄菘华、石安海、于幼军、陈建华、朱小丹……还有好多好多，数不清了。

当年，他们戏称《南风窗》为"竹林七贤"，不为"五斗米折腰"，要把《南风窗》办出特色来、办出水平来、办出影响来。

任仲夷同志多次鼓励并要求把《南风窗》办成全国性的新闻大刊。

高祀仁同志从自己的岗位工作经费中拨 50 万给《南风窗》，要求《南风窗》向全国新闻大刊冲刺。

张汉青同志说："市委对《南风窗》的态度是：少干预，真支持，尊重首创精神。"

陈开枝同志为解决《南风窗》办公场地问题而奔走，亲自到《南风窗》杂志社召开市长现场办公会，也是希望解决《南风窗》的后顾之忧而更好地发展。

陈建华同志 25 年来一直为《南风窗》的健康发展而排忧解困，把关护航。

想起他们，心里温暖，眼睛湿润，真是思念这些共产党的好干部！

难怪外地的媒体同行羡慕：《南风窗》虽然没有中央级大机构做靠山，虽然广州没有新闻资源的优势，但有一个好的政治小环境，有一群好的"婆婆"，才有坚持严肃理念、充满责任感、富于才气和创造探索的《南风窗》人，才有中国的《南风窗》！

1985 年至 2010 年的 25 年间，《南风窗》不仅记录和见证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而且以绵薄之力参与了正面推进社会进步和新闻事业的改革与发展的进程，成为南方传媒业的一张文化名片，成为中国对外文化与新闻交流的一张名片。

一本时政新闻杂志是一个时代的体温。

一个社会，如果主流失语，一定是低俗商业文化与庸俗艳媚文化的泛滥。



孙中山文化

一个重要的国家命题

文 丘树宏

摘要

名人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无疑是20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受到海内外华人的尊敬和爱戴。孙中山研究领域在中国近代史和近代人物研究中可谓最具特色且成果丰硕，但孙中山研究成果如何与时代发展结合，用未来发展的眼光审视孙中山文化的当代价值及文化价值的提升、利用和推广，使之融入时代大潮、世界大潮等方面，仍有巨大的空间。

本人在2007年提出“孙中山文化”概念，并于2008年写入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文化名城建设的实施意见》中，列入“八大文化工程”之首。经过十年的努力和孜孜不倦的追求，孙中山文化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相关历史文化资源的利用视角不断创新，力度不断加强，尤其是在交流合作的现实实践层面取得了良好成效，影响日益扩大。2015年11月11日，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会联合《人民政协报》、中山市政协在北京举行了纪念孙中山诞辰149周年暨孙中山文化专题研讨会，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原主席周铁农出席，并在讲话中明确赞成“孙中山文化”的提法，认为孙中山文化概念的提出是有依据的，是有道理的。

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中山深度挖掘和弘扬孙中山文化资源”，孙中山文化上升为国家命题和国家战略。

孙中山既是中山市的，更是整个中国的，甚至是全人类的。中国影响世界并受到广泛认可的伟大人物中，孙中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从这个意义上讲，“孙中山文化”不仅是中山市的命题，也是国家命题，甚至应该是世界性命题。



丘树宏，中山市政协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2003年，凭抗击非典诗歌《以生命的名义》在央视播出造成广泛影响走进诗坛。出版诗集10部、人文社科著作8部，曾获《诗刊》诗歌金奖、《人民文学》创作赛金奖、郭沫若诗歌奖、广东省“五个一工程”奖和鲁迅文学艺术奖等。近年来转向长诗、史诗和大型舞台节目文学台本创作，大型交响组歌《孙中山》在海内外巡演和央视中播放；《南越王赵佗》《咸水歌》等大型舞台作品是对岭南人文的挖掘、传统文化的创新。

序言

广东是中国近代史的发源地，是中国近代文化的摇篮。广东文化的核心是近代文化，而世纪伟人孙中山先生则是近代文化之魂。在广东影响中国的众多人物中，孙中山先生是排在首位的人物；在中国影响世界并受到全世界接受和认可的伟大人物中，孙中山先生是其中最重要、争议最少的一个。孙中山先生伟大的历史功绩、博大深邃的思想、崇高的革命精神和高尚的人格魅力，受到海峡两岸人民和国共两党的推崇，受到全球华侨华人以及世界人民一致的尊敬和颂扬。

2016 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 150 周年，中央对此非同一般的重视，2015 年 11 月 8 日，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举办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 150 周年活动的决定》。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而在此之前，其实已经释放出大量的“蛛丝马迹”：

——2013 年 1 月 28 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首次引用孙中山先生“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一名言。

——2013 年 3 月 25 日，习近平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6 月 25 日的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又连续两次引用孙中山先生的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2013 年 10 月 23 日，在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习近平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从孙中山先生第一个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以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为实现这个目标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付出了巨大努力，作出了巨大牺牲。”

——2013 年 11 月 12 日，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道：“纵观世界，变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一天恰好是孙中山诞辰 147 周年的日子。

——2014 年 2 月 18 日，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及随访的台湾各界人士，发表了《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讲话，其中讲道：“第四，两岸同胞要携手同心，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孙中山先生的夙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夙愿，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夙愿。我们说的中国梦，就是这个民族夙愿的生动表述。”

——2014 年 3 月 6 日，习近平在全国“两会”广东团与全国人大代表、中山纪念中学校长贺优琳对话，说“中山校长希望我去美丽的中山，其实中山我去过，还去过好几次，我在当福建省省长的时候，还去过孙中山故居……今后还会再去”。

——2014 年 3 月 28 日，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中，又讲道：“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发展繁荣，必须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反之，必然会被历史抛弃，什么是当今世界的潮流，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2014 年 9 月 24 日，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说：“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

——2015 年 10 月 14 日，在两岸关系再次面临道路选择的重要节点，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和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在广州会面，就举行两岸领

导人会面达成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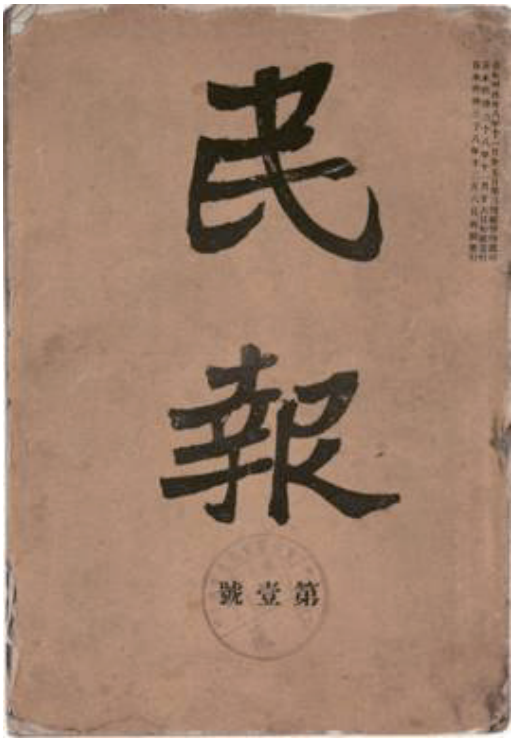
——2015 年 11 月 7 日，两岸领导人习近平、马英九在新加坡会面，就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交换意见。这是两岸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而到了 2016 年 11 月 11 日，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 150 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一生以革命为己任，立志救国救民，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2019 年 2 月 1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其中明确提出“支持中山深度挖掘和弘扬孙中山文化资源”，孙中山文化上升为国家命题和国家战略。

……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

同盟会机关报——《民报》



等对孙中山的丰功伟绩和历史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而据不完全统计，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少场合讲到了与孙中山相关的事情。据不完全统计，仅仅一年半时间，总书记在国内外重要场合引用孙中山先生“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一名言就达到了 7 次之多，多次直接讲到孙中山先生和孙中山家乡中山市。以上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一代伟人孙中山确实崇敬有加。近年来，中央和国家对于两岸关系、国家的和平统一，已经有了重大的战略部署和安排。习近平总书记这样做，绝对不是一种偶然和巧合，背后一定还有着他更为重要而丰富、目前还不为人知的深意在里面，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解密、昭示天下。

孙中山作为 20 世纪中国三大伟人之一，在全球华人中享有崇高地位，孙中山的名字已不仅仅代表他个人，而是作为中华民族一种文化符号一直受到全球华侨华人的推崇。如何利用孙中山和孙中山文化资源，来为发展海峡两岸新关系、促进国家和平统一大业、建设全球华侨华人共有精神家园、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是作为孙中山家乡的广东省和中山市必须严肃对待、认真思考、积极作为的光荣义务、庄严责任和伟大使命。中山市作为孙中山的故乡、全国唯一以伟人名字命名的城市，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环境下，近年来，大力弘扬中山先生的思想与精神，擦亮孙中山文化品牌，让孙中山文化基因得以进一步激活，渗透到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树立文化品牌，突显文化魅力，并转化为推动中山发展和人民进步的精神力量，以孙中山文化为引领，有力地推进全球华人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

第一部分　孙中山文化概念的提出

（一）孙中山文化概念

孙中山在中国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是不言

而喻的。我们一直非常崇敬孙中山先生，一直十分重视对孙中山的纪念及其学术研究，并把他与毛泽东、邓小平一起称为20世纪三大伟人。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对于孙中山，似乎一直始终处于一种说不尽道不完的“尴尬”状态。“孙中山文化”研究利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从国家层面来看，存在“强”与“弱”的问题：说的强，做的弱。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习近平都对孙中山先生给予了高度评价，如“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20世纪“三大伟人”论等。但对于孙中山的纪念，我们一直机械地奉行一种“例行规矩”，也就是只在他的诞辰日——每年的11月12日，举行一种简约而庄重的祭拜，或配合举行一些学术活动，或召开一个规格很高的纪念大会，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纪念日，即每逢五年或十年的“大庆”，以及在每年的“五一节”，在天安门的对面，高高矗立孙中山的巨幅画像，一周后又收藏起来。二是从广东层面来看，存在“浅”与“深”的问题：认识浅，做得不深。广东是孙中山的家乡，毛泽东同志提过，孙中山和六祖惠能是广东两个伟大人物。如今大家都觉得广东文化很迷茫，说不出自己究竟文化在哪，甚至觉得广东是文化沙漠。其实，广东最核心的文化是开放文化，或者叫蓝色文化、海洋文化，或者叫咸淡水文化、珠江水文化，传统的中华文化和海洋崭新的开放文化的融合，这就是广东人



的灵魂，核心人就是孙中山文化。广东目前真的对这一块认识不够，做得更不够。为什么近 20 年广东跟江浙等其他地方拉开了距离，人家追得越来越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发展中的文化动力不足，没有建立长久的、核心的竞争力。三是具体到中山市，存在“高”与“低”的问题：做事高明，做人低调。中山人确实很了不起、很高明，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山的经济社会和人文实践全面生动地诠释了孙中山思想。可以说，中山是最早提出“中国梦”的地方，100 多年前，孙中山就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这是中国梦的雏形；今天的中山是离“中国梦”最近的地区之一。但中山人过于低调，外人了解很少，甚至对于孙中山先生，也做得很不够，顾虑重重。四是在学术层面，存在“冷”与“热”的问题：国内冷，国外热。孙中山的学术研究在中国大陆比较冷，但是在中国台湾，美国、欧洲、东南亚等地方则比较热。国内在学术方面一直在深化和拓展方面没有多大的突破和创新，还出现过一些误区，走了一些弯路，甚至还在继续走弯路，对孙中山思想的现实意义更是研究不够。而在孙中山的资源开发利用，如孙中山文化产品生产、产业开发利用等方面，则与其他相类的政治性名人有着巨大的差距。

孙中山是中山人身边的伟人，是最鲜活的典型。其实，孙中山既是一个政治符号，也是一个



中山纪念堂

精神符号、文化符号，孙中山既为我们留下了重要的政治遗产，也为我们留下了重要的精神遗产和文化遗产。中山市在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发展变化可谓沧海桑田、翻天覆地。中山市以“五位一体”协调发展为特点，既成为了广东省以至全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典范，同时，其发展历程和实践成果也全面生动深刻地诠释了孙中山思想。在经历了工业立市、经济强市的发展阶段后，中山重新审视对孙中山的研究传承和资源开发利用这一重大课题，在制定文化名城战略时，2007年率先提出了“孙中山文化”这一概念。2008年，中山市委市政府出台加快推进文化名城建设的意见，提出建设孙中山文化工程、历史文化工程、产业文化工程、民俗文化工程、公共文化工程、博爱文化工程、“三名”文化工程和生态文化工程等八大文化工程，旨在通过纪念、研究、传承和资源开发利用来为现实服务，引导新老中山人增强道德判断力，增强城市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以文化引领主流价值观和经济社会发展。由此，孙中山文化正式成为中山市的命题。

“孙中山文化”概念的提出，其可贵之处是，走出了原有的纪念、研究的各种局限，回到了其应有的本原，更丰富了内涵、扩展了外延，是一种极具价值的深化和提升。它的提出，积极推动了各界走出对孙中山这个政治符号的僵化认识误区，进而从“大文化”的角度活化对孙中山资源的开发利用，即从政治纪念、学术研究、文艺创作、产业利用等方面全方位地开展工作。

2015年11月11日，在北京召开的纪念孙中山诞辰149周年暨“孙中山文化”专题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对“孙中山文化”概念的提出予以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原主席周铁农出席会议并在总结时说“我赞同孙中山文化这个提法”，他认为：“孙中山文化的提出是有道理的，也是有根据的。从字面上来讲，孙中山文化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孙中山思想、理念、精神、活动给予文化上的解读；另一方面是用文化的视角去观察、评价、研究孙中山其人、其事、其所处的时代和其所从事的革命活动。”时任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卞晋平认为，在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最大范围地凝聚两岸同胞和海外侨胞方面，在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厚植中华民族共同文化根基方面，孙中山文化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特殊而又无可替代的地位。

（二）孙中山文化概念的内涵

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既是一定社会、一定时代的产物，是一份社会遗产，又是一个连续不断的积累过程。那么，何为孙中山文化？孙中山文化应该包括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与理论体系、经济思想与社会主张，人格精神和道德品质等，以及以上几个方面所蕴含的文化元素，更包括孙中山的文化思想、文化成果和文化遗产等。

孙中山文化是一种现象，又是一种文化，其内涵应包括与孙中山有关的有形与无形的文化资源，大致可分为两类：1.精神层面的。即孙中山思想、孙中山精神以及孙中山的思想情操、品格修养、思维方式、宗教信仰、治国理念、价值取向、生活习惯、行为方式、审美情趣等。2.物质层面的。即与孙中山有关的物质方面的文化。如其故居，生活或工作过的遗址，使用过的遗物，所创作的作品，以及孙中山相关的研究成果、文艺作品、纪念设施、纪念物品，等等。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孙中山先生是喊出“振兴中华”口号的第一人，并且穷其毕生为之奋斗。这句口号至今激励着我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说：“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

创立了中华民国。”在筹建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时，毛泽东主席称孙中山先生为“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在孙中山先生诞辰 90 周年纪念大会上，毛泽东主席指出“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邓小平将孙中山的伟大的历史功绩概括为：一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二是开创国共合作，导致了北伐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1997 年 9 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胡锦涛在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不断实现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抱负。2014 年，习近平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汲取养分”。习近平同志在担任总书记之后不到两个月时间（2013 年 1 月 28 日下午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进行第三次集体学习和 3 月 23 日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两次引用了孙中山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可以说，孙中山文化是中国近代文化的灵魂。孙中山的思想、精神以及形成的人文资源，对于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和谐社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世纪伟人孙中山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他的革命足迹遍及欧美、东南亚主要国家，他的活动涉及各个社会领域，他审慎地吸取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精髓，融合中华传统文化，提出了“三民主义”政纲，在中国乃至亚洲创立了

油画《曙光——孙中山在广州》，2010年被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收藏



嘉应文学

国际统一刊号：ISSN 1007-7014；国内统一刊号：CN 44-1053/I

2020
全新改版

2020年《嘉应文学》全新改版，
由阅客文化团队领衔倾力打造，
致力于展现更多的声音和更丰富的表现形式，
通过文学化的记录和想象介入现实，
提供当下鲜活、有态度的，具备客家特色，
中国气派的纯文学价值读本。

《嘉应文学
2020年
华丽转身

/ 客家特色
/ 中国气派



订阅价格

半月刊，全年共24期，每期160页，定价**15元**，24期**360元**。

订阅方式

扫描右侧二维码，
进入**“嘉应文学”**微信公众号，
点击右下方**“订阅”**购买。

嘉应文学公众号

欢 / 迎 / 广 / 大 / 读 / 者 / 朋 / 友 / 订 / 阅

WENXUE JIAYING

广东省唯一（CN刊号）音乐专业性刊物

LINGNAN MUSIC MAGAZINE

嶺南音樂

《岭南音乐》杂志创刊于 1957 年，由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管、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主办，是广东省唯一（CN 刊号）的音乐专业性刊物。目前该刊双月出版，每期 84 页。主要栏目包括：本刊特稿、音乐现场、音乐人物、岭南乐话、音乐生活、词曲 / 美文、音乐教育等。该刊是广东省音乐家协会服务全省会员、对外展示广东音乐成果的一个重要窗口和园地，也是广东和全国音乐家、音乐爱好者作品交流的平台。

国际标准刊号：ISSN1671-413X

国内统一刊号：CN44-1081/J

定价：15元/港币20元



官方微博公众号　官方微信公众号

共和；他提出了《建国方略》等描绘中国发展的蓝图；“敢为天下先”是他的宝贵精神，“天下为公”、博爱是他的社会主张；虚怀若谷、愈挫愈奋是他的人格魅力。

孙中山文化博大精深，我们可以将孙中山文化内涵抽象为如下九个特征：一是敢为人先的无畏精神。正是孙中山的敢为天下先勇气，才领导了那场轰轰烈烈、举世闻名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创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二是顺势而为的进取典范。孙中山多次告诫国人和党内同志：“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势则昌，逆势则亡。”孙中山正是看到了当时世界发展的趋势和那个时代表现出来的国际法则和民主精神，领导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三是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怀。爱国主义是孙中山思想最鲜明的特点，振兴中华是孙中山毕生的追求。四是民生为本的济世风范。民生主义是孙中山全部思想理论体系最高的终极目标，他在《实业计划》中提出以建设港口、铁路为重点，农、轻、重各业并举的方针；主张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出“建设之首要在民生”。五是天下为公的博爱胸襟。孙中山走过了从做医生以行“救人之仁”、到上李鸿章书以求“救世之仁”，再到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组织北伐等，以行“救国之仁”的心路历程，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博爱始终光彩夺目。六是放眼世界的开放心态。孙中山外察世界滚滚潮流，内断近代中国已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提出挽救中国民族危机，唯有向西方学习，走近代化道路。在他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革命方略、建国方略、权能分立说、革命程序论等理论观点中，处处闪耀着开放进取的璀璨光辉。七是自由平等的恢宏气度。孙中山的自由平等思想除具有批判神权和君权、反对迷信和专制，提倡理性、科学和民主等西方先哲的一般原则外，尤以重视民生而非“意志自由”为特征，与西方人道主义者的自由具有本质区别。八是愈挫愈奋的顽强意志。从 1894 年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直到 1911 年辛亥革命胜利的 17 年间，孙中山领导了 11 次武装起义。武昌起义前的 10 次起义都失败了。他虽然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失败的痛苦，但始终没有退缩，没有气馁，一次又一次地从失败中站起，朝着既定的革命目标迈进。九是鞠躬尽瘁的利他品格。孙中山一生无私奉献、济世为怀、关爱苍生，为推翻满清政府专制统治、解放广大劳苦大众而呕心沥血、奔走号呼。为了革命不得不离妻别子，背井离乡，把一生献给了中国革命，无私无悔地谱写了伟大光辉的人生。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习近平同志也说：“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

毛泽东和习近平这两代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都用了同样的句式“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来论述孙中山。他们这是从文化的角度评价孙中山的，但它与政治上的评价同样重要。可以说，有政治上的评价，加上文化上的评价，才是对孙中山的全面评价，我们才能真正看到和了解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孙中山。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可以从以下方面来理解和诠释。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是指孔子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古代传统，孙中山则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现代传统的代表；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也应该包括总结和继承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古代传统和现代传统。另外，这里所说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的“孙中山”，还兼具两层含义：一个是指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这是政治文化的层面；另一个是指孙中山所

代表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新传统，这是历史文化的层面。

“孔夫子”与“孙中山”，实际上包含了中国文化与中国思想新旧两种传统。毛泽东和习近平在谈到继承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传统时，都强调要总结和传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的遗产”“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的“孙中山”，从第一层含义中又升华出第二层含义，即他既是中华传统文明的现代继承者，又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现代传统代表者。从这个角度上讲，孙中山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更为突出。

“孔夫子”与“孙中山”虽然内涵和外延都有不同，但其间存有着历史的必然联系，存在着一脉相承的经络。这种历史的联系，这种一脉相承的东西，就是中华传统文化古往今来的延续与发展。在这个延续与发展中，有变化，有改进，还有对传统的革新。“孔夫子”与“孙中山”，一个代表“古代的中国”，一个代表“现代的中国”。“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两段历史、两个伟人、两种文化，生动而全面地体现了这一历史的经脉联系。这种联系虽然由于时代的不同、阶段的区别，而涂上了不一样的色彩，却又是始终有机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血肉与灵魂完美融合的一个整体。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包括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古代传统和现代传统两个方面，因此，发掘、传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也应当包括总结和传承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古代传统和现代传统。只强调继承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古代传统，而不顾及继承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现代传统，不发掘两者之间的内在渊源，弘扬其作为以一个整体呈现的中国文明，那都是片面的、不科学的。

还必须指出的是，“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虽然表述的是两个时代、两段历史、两位伟人，然而两个人所代表的的文化非但绝不是各自独立的，反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血肉与灵魂完美融合的一个整体。它们一脉相承、前后连贯、互为彰显。因为孙中山也有着极为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色和蕴含，在这个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孙中山生发和创造了一种顺应历史潮流和世界潮流的现代文化，从而使两者神奇融合，构成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伟大的中华文明。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论述，首先从文化的维度补充和完善了孙中山的形象及其作用，或者说是从更高的层面提升了孙中山的重要地位，这样也就为如何进一步研究孙中山，更好地发掘、传承和弘扬孙中山的思想和精神，更好地利用孙中山及其思想、精神为现实和未来服务，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

这，就是“孙中山文化”。

孙中山文化的主要特征不仅与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倡导的核心价值完全契合，也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倡导的核心价值、推崇的主流文化完全一致。孙中山文化是中国近现代文化的灵魂，既领导和印证了近代中国甚至世界的文明进程，还将继续印证和影响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文明走向。前者是它的历史意义，后者是它的现实意义和未来意义，具有厚重的人类共同价值。

第二部分　孙中山文化研究及其实践

（一）孙中山文化研究及其现状

十多年来，孙中山文化的研究从无到有，从研究到实践，成效丰富。

2008 年，中山市在确定建设文化名城战略中首倡孙中山文化概念，并将孙中山文化工程放在八大文化工程之首，陆续推出孙中山文化周、文化节；设立孙中山史迹径；率先开展对孙中山后裔相关人物事迹的研究；设置孙中山文化艺术奖；

编排大型交响组歌《孙中山》等。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前夕，国内媒体聚焦孙中山文化，大幅度报道了中山市首次提出“孙中山文化工程是一个世界文化命题”“孙中山文化应成为国家命题”的主张和倡议。同年，“孙中山文化工程”进入广东省层面，并成为文化强省项目。

2015 年 11 月 11 日，在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会、人民政协报社与政协中山市委员会联合在京召开的纪念孙中山诞辰 149 周年“孙中山文化”专题研讨会上，孙中山文化更得到了方家的认同。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原主席周铁农认为：“孙中山先生所处的时代内忧外患、积贫积弱、民不聊生，从文化视角来看，也是一个文化冲突非常激烈的时代。这种文化冲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当时正好是新文化运动初期，新旧文化冲突非常激烈；一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即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之间的冲突。作为一位爱国者，作为一个革命家，如何来审视、理解、处理、解决这种文化冲突，一定是他经常思考的问题。对于这种文化冲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有不同的解决办法，也有不同的处理态度，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应纳入孙中山文化的研究范畴。因此，我觉得研究孙中山文化是非常有道理的，可以深化以往对孙中山的各种研究。同时，文化视角是一种独特的、有必要的也非常有意义的视角，希望能对“孙中山文化”这一提法、概念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他强调：“孙中山文化研究应为民族振兴服务”，“当前有两大任务摆在了中华儿女面前，一是振兴中华，一是祖国统一，这都是孙中山先生当年的理想。”“孙中山文化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目标，推动两岸和平发展，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一个非常有利的可依靠的载体。所以我认为，孙中山文化研究，要紧扣当前中华民族的这两大任务，要为此服务。”“希望孙中山文化的研究者，要持有一种科学、严谨的研究态度，真真实实地做一些工作，来推动这项研究沿着正确的方向向前发展。”

时任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卞晋平呼吁：“希望学界能够深入挖掘孙中山文化的内涵，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把研究孙中山文化、弘扬孙中山精神汇入到更加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崛起振兴的时代大潮之中！”中华文化促进会原副主席、主席团咨询委员金坚范则认为：“研究孙中山文化，研究不同文化的因缘互动，对今天如何培养创新习惯，使更多人变得更加富有创造性和创新性，是大有裨益的。”全国政协委员、时任民革中央宣传部部长、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会秘书长吴先宁提到：“孙中山文化的提出，对于推动孙中山研究，从一个特定角度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因此，有必要明确孙中山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以促进孙中山文化的研究、宣传和建设，使其有更为清晰的思路和实际针对性的举措，免于“文化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的流弊，慎守边界、以防滥用。”“我认为孙中山文化包含孙中山关于文化的理论；孙中山一生奋斗所体现的精神层面内容；孙中山一生的思想、事业和生活影响于社会历史，在社会历史上留下的所有痕迹的总和。在物质方面，包括孙中山的有关遗址、中山陵、中山纪念堂、中山公园、中山路等；在形式方面，包括对孙中山的各种纪念活动、纪念仪式，以孙中山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如传记、影视、音乐、雕塑、绘画等。”

2017 年 4 月 5 日，本人撰写的《粤港澳大湾区要注重人文价值链的发掘和利用》一文在《南方日报》刊发。我在文中提出，孙中山与大湾区 11 个城市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要将孙中山文化作为人文价值链的核心要素来做。2018 年 9 月 11 日，由中山市政协和广东省文史馆联合主办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流合作座谈会在中山市

举行，会议一致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每个城市都和孙中山有很深的渊源，孙中山文化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桥梁和纽带，建议建立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流合作机制，并在孙中山家乡中山市成立粤港澳大湾区孙中山文化交流中心，全方位开展大湾区文化交流合作。

（二）孙中山文化的传播现状——以中山市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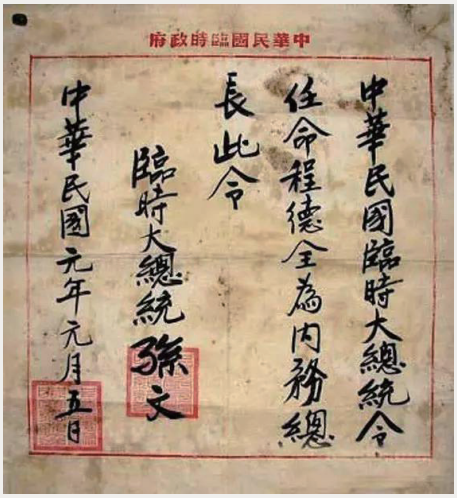
中山（香山）地处珠江口西岸，浩瀚的南海和悠远的珠江在这里碰撞交融出了一种奇特的“咸淡水”，让这个地区兼有海洋文化的开放和大陆文化的内敛。这种中西方文化交汇产生的“咸淡水”文化的持续影响，也为当地增添了开放、争先的元素，一大批的人文之星应运而生，先后走出了伟人孙中山以及一批中国近代化先驱，如容闳、唐廷枢、郑观应，等等。据统计，收进《辞海》的香山人物就有 29 人，在最早的 120 名留美幼童中，香山籍占了三分之一，香山成为中国近代史和近代文化的摇篮。它为中国的近代史和近代文化摇出了伟大的人物、伟大的思想和伟大的队伍。

文化是城市品牌的灵魂和核心。中山市作为伟人孙中山的故乡和著名侨乡，在 100 多年的发展中，时时处处践行着孙中山文化、发展着孙中山文化。民国时期中山县被国民政府设立为全国模范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广东省政府列为特等县；改革开放后，中山既得益于特殊的地缘优势和改革开放政策优势，也得益于以独特文化禀赋——孙中山文化的引领，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先行区、广东“四小虎”之一和幸福广东建设的排头兵。中山市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经济社会和人文实践全面生动地诠释了孙中山思想。首先，孙中山先生“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深深鼓舞了中山，中山人在改革开放后，创造了很多个第一。全国第一家中外合资宾馆中山温泉宾馆落户中

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任令



孙中山邮票



山、全国第一个引进外资的游乐项目长江游乐场在中山落成、创建为第一批全国文明城市、全国第一个获得联合国“人居奖”的城市和地级市中唯一一个全国生态市。其次，孙中山先生提出开放国门、走向世界的思想，而中山市在很早时候就主动去外面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还主动向华侨华人学习，请华侨华人回来参加、支持和指导家乡的建设。再次，中山市的宜居城市建设、走和谐发展之路，也得益于孙中山先生的“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的思想。其三，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博爱精神在中山市已经家喻户晓，并深刻影响到了市民的精神面貌，比如20多年坚持不懈的“慈善万人行”活动，已成为具有时代性、持久性、群众性特征的新民俗，极大地推动了和谐城市的建设。可以说，100多年发展历程中，每一个时期，每一个阶段，无不一以贯之地践行着孙中山文化。

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敢为天下先”文化。

《老子·第六十七章》中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孙中山先生反其道而行之，第一个提出要“敢为天下先”，开天下万物之先河，做他人未曾做过的事，从此，“敢为天下先”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宝贵精神。

特殊的区位优势，使中山成为最早接触西方文化之地，因而中山也就成为中西文化的结合点和交汇地，得风气之先，不甘人后、领潮争先的精神气质在孙中山故乡得以传承和弘扬。最为突出的是孙中山的“实业救国”思想和训政构想促使中山跨越式发展。

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即强调：“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当时民国初年，不少追随孙中山闹革命的香山华侨响应孙中山“实业救国”号召，纷纷携资返回祖国，参与家乡建设，掀起了香山县的第一次建设热潮。1929年2月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174次会议将中山县定为模范县（自治县），特设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为实施训政建设模范县之计划指导监督机关，直属南京国民政府管辖，委唐绍仪、孙科、吴铁城、钟荣光、李禄超、李蟠、马应彪、蔡昌、郑道实等中山县籍国民党要人为委员，前内阁总理唐绍仪为该委员会主席，在全国率先试行训政。从此，中山县开始以全国模范县为时人所称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觉传承和弘扬孙中山“敢为天下先”创新精神，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山人锐意进取，创造了诸多全国与全省第一：1979年广东省首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现场会在中山召开，诞生了国内最早一批种粮万元户，开办了全国第一家中外合作酒店，兴建了国内第一个大型游乐场，创建为第一批全国文明城市，成为全国第一个获领联合国“人居奖”的城市和地级市中唯一一个全国生态市……众多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回中山投资兴业，为家乡修桥筑路、兴教助学，有力促进了中山各项事业发展。如今，中山已从一个“模范县”发展成为举世瞩目、众口皆碑的现代化城市，产业高度集聚、城市规划宜居宜业、社会管理有序、生态环境优良、城乡发展均衡，走出了一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城乡全面协调发展之路。

2. 民生为生命的文化。

孙中山的革命动机，就是要挽救民族危机，振兴中华，解除人民的痛苦。孙中山提出：“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中山继承和弘扬孙中山民生思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步一个脚印地建设相关民生工程：如1951年建成的岐江桥成为连接城乡的交

通要道；1953 年起兴修的大型水利工程中顺大围确保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与粮食稳产高产；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率先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使中山单一的农业计划经济被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打破，市场经济兴起。中山市委、市政府始终将造福全市人民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0 世纪 80 年代，中山市坚持先让基层发展起来、先让老百姓富裕起来的民生思想，大力发展专业镇和集群产业，民营经济占了半壁江山，在 2015 年达到 3000 亿元 GDP 中，本土民营经济占百分之五十多，外资经济占百分之四十多，老百姓过上了小康日子。中山还在全省率先提出“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的绿色理念，坚持走科学发展道路，坚持生态惠民，“十二五”期间，中山市加快了干线路网建设、综合治理我们的母亲河——岐江河和植树造林的步伐，力争将中山建设成“城在林中”。“十三五”规划提出将绿色发展理念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到 2020 年，建成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让老百姓享有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3.“天下为公”与博爱文化。

孙中山的文化思想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崇尚和传承，其“天下为公”的理念出自孔子的大同思想。而中山市提出的建设既适宜居住又适宜创业适宜创新的城市，致力于包含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的和谐社会建设，开展为贫困者献爱心活动、开展服务社会的志愿者活动等，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孙中山建设大同社会、人民安安居乐业思维的传承，中山人提倡的和谐、包容文化，除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可追寻其根源外，地城文化的传承、孙中山思想的传承，也充实了其内涵。如今，中山先生博爱精神已经内化为中山的重要精神坐标，扶危济困等良好社会风尚深深植入到每个市民的心中。中山市已连续 28 年举办“慈善万人行”活动，志愿服务组织网络覆盖城乡。今天的中山已经成为一座经济发达、社会和谐、法治进步、文化繁荣、环境优美、人民安康、城乡一体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新型城市，初步探索走出了一条科学发展的新路。

4. 兼容、开放的文化心态。

孙中山精神的实质是顺应时代潮流，博采中外学说之长，为我所用，与时俱进。中山（香山）位于珠江出海口，受海纳百川，开放包容文化影响，中山（香山）的历史就是一部接纳移民的历史，也是一部包容的历史，从历史上看，香山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不断移民的社会，也是一个文化输入型的多元文化组成开放融通的社会。又因面向大海，具有较为强烈的蓝色海洋意识和开放意识，近代以来成为中国从大陆经济文化走向海洋经济海洋文化的缩影。改革开放后，中国从封闭经济文化走向开放经济文化的窗口，从而形成了兼容、平等心态和开放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山人弘扬孙中山先生的兼容精神，以开放、自信的心态迎接新移民，营造“同是中山建设者”的社会氛围，让外来务工者倍感温馨，对内外投资者一视同仁，内源经济与外源经济同步发展，体现了中山人的宽广胸怀。海外中山华侨和港澳乡亲对祖国和家乡感情深厚，从支持孙中山革命、支持祖国抗战到改革开放后支持家乡建设与发展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5. 开拓创新的文化。

孙中山“顺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不盲从、不自满、不保守、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不断进步，是孙中山最可贵的人生品格。他常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其近 40 年政治生涯中，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孙中山认为中国人在学习西方过程中完全可以走一条自己的道路。他提倡向西方学习要结合中国国情，主张要恢复我们民族地位，在提出对外开

放的构想时，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因地制宜地制订我国发展的建设规划，进行创造性地实行，不照搬，反对全盘西化，反对崇洋媚外。

在中山市，孙中山的开放创新文化得到了上上下下的广泛认同。20 世纪 30 年代初，中山县不仅率先提出建设新中山，还大胆尝试筹建中山港和中山港无税口岸。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中山市 30 多年来的发展变化可谓翻天覆地、沧海桑田。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物，其实践也全面生动地诠释了孙中山文化。而“博爱、创新、包容、和谐”的新时期中山人精神，凝练了香山历史文化和建设现代文明的双重意念，是中山人一种精神力量和共同的价值取向，体现了孙中山精神的现代传承与创新。面对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中山市继实施工业立市、经济强市发展战略之后，于 2007 年提出了“文化名城”发展战略，次年，市委、市政府以 1 号文件下发《关于加快推进文化名城建设的意见》，正式提出了孙中山文化这一概念，把孙中山文化作为文化名城建设“八大工程”之首。孙中山文化工程的实施成为中山城市战略，近年来，中山市认识到孙中山文化建设有较好基础，但距城市的品牌形象仍有较大差距，着力打造孙中山文化工程，把孙中山作为我们城市一张最闪亮的名片，把中山人高度认同的孙中山文化作为中山这座城市的代表性文化符号，包括“敢为天下先”文化，民生为本文化，“天下为公”与博爱文化，兼容、开放、开拓、创新的文化，并陆



《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民族交响音画音乐会公演现场

续了推出孙中山纪念周、文化周、文化节。2011年，中山市借辛亥百年纪念为历史际遇，通过举办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暨首届孙中山文化节活动；近年创作并推出长篇思辨体报告文学《中山路——追寻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脚印》、拍摄大型专题片《中山路》、编撰《孙中山传》《中山装》专著、创作大型交响组歌《孙中山》并在海内外公演；面向全国高等院校设立孙中山研究（研究生）奖学金，推动研究孙中山的青年队伍成长；以孙中山和近代史为切入口成功争取国务院把中山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翠亨村成功列入国家历史文化名村；孙中山纪念堂被确定为中山市的“城市原点”；孙中山史迹径建设成为文化旅游亮点；促进大专院校与台湾不少大学互派交换生等。2016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中山市策划组织了“六·十·六·十”活动，即：六大纪念活动、十大文化活动、六大建设项目、十大民生实事，以纪念的名义，传承和弘扬孙中山文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收到了极好的效果。与此同时，以孙中山文化塑造中山城市文化符号，搭建海峡两岸交流的桥梁，构建海内外华人共同精神家园，通过讲好中山故事、弘扬中山精神、展现中山风貌，让海内外华人、外国人士通过游中山，欣赏中国文学、艺术等作品来深化对孙中山文化的认识和了解，达到向世界宣传推介孙中山文化的目的。



2008年，广东省中山市在建设文化名城战略中首次提出了孙中山文化概念，并作为创建文化名城的一大品牌，而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效果。“辛亥百年”前夕，中山市提出“孙中山文化工程是一个世界文化命题”“孙中山文化应成为国家命题”的倡议，得到了社会赞同的响应。之后，“孙中山文化工程”进入广东省学术理论界研究探索的层面并列入文化强省的省级项目。近年来，中山市推出“孙中山文化周”“孙中山文化节”、设立“孙中山史迹径”，开展对孙中山后裔相关人物的研究、设置孙中山文化艺术奖、编排大型交响史诗《孙中山》海内外公演等，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为研究传播孙中山文化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引起了海内外业界的共鸣，得到了社会的充分肯定。

可见，基于孙中山文化是中山市的，也是广东省的、全中国的，以至全世界的，如何拓展孙中山文化的当代价值，挖掘、保护和开发、利用好孙中山文化这种世界遗产、中华遗产、民主遗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未来意义都很重大。

（三）孙中山文化交流合作的实践体会

毫无疑问，这座城市与伟人孙中山不但血脉相连、精神相依，而孙中山更是这座城市之魂。来到中山，你可以看到，兴中道、孙文路、中山

路等主干道，逸仙湖公园、孙文公园、兴中园等公园，孙中山故居、中山城等旅游景点，都是对孙中山先生最好的纪念。尤其是在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村的孙中山故居，每天都迎来大批国内外的游客，他们在这里追寻伟人足迹，瞻仰伟人风采。近年来，中山高度重视孙中山的研究以及相关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将孙中山文化品牌、孙中山文化工程放在“八大文化工程”第一位，通过纪念、研究、传承、交流和资源利用来为现实服务，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主要体现在：第一，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成为全球收集孙中山史料最多、最齐备的博物馆。孙中山故居兼具历史纪念性和民俗性、立体而多元化的陈列展览体系，充分地展现了孙中山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思想体系和革命实践。第二，对孙中山少年时代活动以及孙中山在中山的历史径迹研究，填补了关于孙中山历史研究的空白。第三，对孙中山先生后裔相关人物和事迹进行研究，在全省乃至全国具有领先地位。第四，中山是在全国最早提出并实践“孙中山文化”的城市，至今已初见成效。

中山人民的伟大实践，既是孙中山文化的现代诠释和作为一种活文化的具体印证，也是对孙中山文化的丰富和发展，深刻体现了孙中山文化的传承性。

1. 突显文化主题是塑造和传播城市形象的充要条件。一个富有鲜明文化主题的城市，才能对外具有影响力，对内产生凝聚力和创造力。就中山市而言，孙中山无疑是“独一无二”的文化资源，中山既重视全面部署落实文化建设工作，更重视找准城市文化灵魂与核心并以此实现纲举目张——“文化标志”。经过多年的探索，目前中山市已找准了以“孙中山文化”为代表的城市核心文化，主打“孙中山文化牌”，以此作为标杆，实现纲举目张，作为建设文化名城的重要抓手。

2. 整合文化旅游资源是扩大城市文化主题传播效应的有效举措。一座城市要突显文化主题，不能仅仅盯着某一个支点，而要瞄向整个城市区域内的丰富资源，有效规划整合文化旅游线路，才能增强城市主题文化的吸引力。中山市要扩大孙中山文化的影响力，要整合历史文化、民俗文化、产业文化、生态文化等旅游资源，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才能提升中山文化旅游的魅力指数。2011 年，中山市在城区重要路段和公共场所建设一批名人雕塑群，翠亨村百年辛亥纪念广场、兴中园百年纪念雕塑和孙文纪念公园雕塑群在辛亥革命 100 周年纪念日前竣工。配合市旅游部门，将孙中山故居旅游区创建成 AAAAA 级旅游景区和国际旅游小镇，整合翠亨村一带旅游、文化资源，形成品牌效应，打造龙头旅游产品。

3. 既重视常态性日常性的文化工作，更重视借势做事利用各种机遇实现事半功倍、点石成金。经过多年的实践，中山市已经探索出一条具有中

三民主义　孙中山／书



山特色、具备明显实效的文化工作方式——利用文化杠杆，“借势做事”，达到了四两拨千斤、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借上海世博会寻找中山元素，策划了“中山人在上海”大型人文项目，影响巨大；借广州亚运会纳入孙中山文化元素，效果特好；借辛亥百年纪念，举办中山市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暨首届孙中山文化节活动，以“惠民是最好的纪念，发展是最好的继承”为原则，以“孙中山”为核心、以“孙中山文化节”为重点、以“辛亥百年”为背景来开展，成功举办了“翠亨论坛”、首届孙中山文化节、中央电视台“心连心”大型慰问演出、第二届“中山杯”华侨华人文学奖等事关纪念活动、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的四大系列近百项活动，打造出中山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历时最长的文化盛事，中山文化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影响力和凝聚力显著提升。纪念活动贯穿整整一年时间，形式多、内容广、规格高、规模大，突出文化性、彰显综合力，在海内外产生巨大影响，受到本市老百姓和社会各界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广泛关注和普遍赞赏。2011年年底，中山市正式宣布全市从文化名城建设走向文化强市建设，这标志着中山市的文化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而2016年，借助孙中山诞辰150周年系列活动的成功举行，更让中山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提升了一个更新的台阶。

4. 扎实做好普及推广工作是基础环节。城市文化的传播不仅要依靠政府和媒体主导，同时也离不开生活于其中的广大人民群众，并以提高群众文化素养为根本落脚点。中山市推进孙中山文化工程建设，除了积极创造学术和文艺精品外，还广泛开展孙中山文化普及工作，形成浓郁的文化氛围。

5. 建立适合本土实情的管理体制机制是关键要素。要充分释放城市各种优良资源的能量，离不开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体制。中山市孙中山故居及周边的历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有关部门不断研究探索建立一套具有较强统筹能力的机制，提高资源的整体开发利用水平，重点要理顺孙中山故居周边环境的隶属关系，力求更充分地发挥其文化核心的地位和功能。

6. 以产业化为导向加强对名人资源的规模化开发利用是必经途径。我市的旅游文化部门在留住旅客方面正加大力度改进，重点要开发以孙中山先生为主题的文化纪念品和文艺节目，完善吃住行购娱配套服务，让游客在丰富和愉悦的文化消费中全面感受伟人及其故里的风采，促进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7. 大手笔策划品牌文化活动是扩大城市影响力的重要载体。城市文化宣传和形象塑造的有效途径是组织策划好一场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品牌文化活动。中山的慈善万人行、孙中山文化节、“中山杯”华侨华人文学奖颁奖典礼等已逐渐成为文

天下为公　孙中山 / 书



化金名片。2011 年广东省和中山市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的重点文化项目大型交响组歌《孙中山》在 2011 年 11 月、2012 年 8 月在广州、中山、北京、马来西亚吉隆坡的盛大公演，对《孙中山》进行了完美的演绎。2013 年 7 月 24 日晚，广东省副省长招玉芳，中山市领导以及台湾方面的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新党主席郁慕明，亲民党秘书长秦金生等两岸政界、经贸界、学术界人士，以及港澳和海外有关知名人士、侨领、中山市民共1300多人同场观看了演出。海峡两岸同胞，以及海内外华人一起在孙中山先生的家乡同场观看孙中山专题文艺演出，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意义重大，必将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此外，该作品还作为香港地区今年纪念孙中山诞辰 150 周年的首场大型文化活动，于 9 月 16、17 日在香港连演两场；11 月，《孙中山》再次走进马来西亚吉隆坡。中山大学和有关机构也争相邀请公演。可以说，2016 年，是大型交响组歌《孙中山》年，这部广东原创音诗画协奏曲，让海内外观众再次感受孙中山音乐形象的魅力，感受伟人孙中山的精神风采。2016 年 12 月，国务院台办将《孙中山》列为当年对台交流的重点项目并组织到台北演出，2019 年 12 月，国家文化旅游部将《孙中山》列为澳门回归祖国 20 周年的重点项目安排到澳门演出，均造成了广泛影响。

8. 以翠亨新区为载体，以孙中山文化的名义，不断加快实体建设，全方位开展与港澳台地区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文化交流合作。2011 年，中山把握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的历史机遇，规划了起步核心区 50 平方公里、整体为 230 多平方公里的“翠亨新区”。翠亨新区以翠亨村为原点，以孙中山和孙中山文化为灵魂，以文化为引领，以加强海峡两岸交流合作为重点，以建设全球华侨华人共有精神家园为目标。目前，翠亨新区建设进展良好，势头喜人：2013 年成为广东省级新区平台，成功举办第二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并成功争取该论坛永远落户中山市，2016 年成为广东省粤澳合作示范区，更成功获国务院台办批准成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中山市还启动了翠亨村 AAAAA 旅游景区改造升级工作，2016 年 10 月，翠亨村以国家 AAAAA 景区的崭新面貌展示在世人面前。

9. 善用孙中山文化深化联谊，港澳台侨和公共外交工作取得新成效。中山是伟人故里，孙中山先生倡导的博爱、天下为公思想，已成为现代华人社会共同接受、共同遵守的观念。中山市打好“孙中山文化牌”，在增强民族和海外华侨华人的凝聚力上多做工作。2012 年，以大型交响音诗《孙中山》海外演出为媒介，组团成功出访马来西亚，代表中山市政府与马来西亚槟城州首府乔治市签署了两市友好合作备忘录，与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签署孙中山文化交流合作意向书。2013 年，组团赴美出席孙眉铜像在夏威夷的落成典礼和孙家后裔大聚会，联络、促进了孙中山先生亲属、后裔与中山的乡情维系，增进了与海外侨胞的联谊。

2019 年 5 月 16 日，由中山市政协和香港大公报联合主办的“孙中山文化粤港澳行”大型人文采访活动在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举行启动仪式，广东省副省长许瑞生出席活动并为参访团颁旗。采访团历经两个多月，走遍了香港、澳门和珠三角 9 个城市的孙中山遗迹，除了广泛报道之外，还编辑出版了《中山路》一书在香港书展上推出。近几年来在香港、澳门举行的中山文化节，也影响很大。

第三部分　孙中山文化上升为国家命题的现实意义

2012 年 11 月 29 日，习近平主席把“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习近平主席进一步指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两岸同胞共同来圆‘中国梦’。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该成为两岸关系的主旋律，成为两岸中华儿女的共同使命。”孙中山是喊出“振兴中华”第一人，可见习主席提出的“中国梦”与孙中山先生的“振兴中华”是一脉相承的。孙中山在中国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是不言而喻的。2016 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 150 周年，这是个历史性的机遇，我们责无旁贷地珍惜和保护孙中山文化资源，要直气壮地挖掘和利用孙中山文化资源，通过淋漓尽致地发挥孙中山这个不可复制、无可替代的政治资源、统战资源、历史资源和文化资源，甚至是经济资源，结合改革开放实践与成就，为宣传展示开放中国和文化中国形象，为海峡两岸交流合作，为全球华侨华人共同精神家园建设，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一）以孙中山文化促进两岸和平发展。

孙中山是两岸共同尊崇的人物，孙中山文化对促进两岸和平统一桥梁有重要价值。他主张世界大同理想，希望透过政治、经济现代化，进而达到中华民族的复兴，表明了其对中国和平崛起融入世界的向往。孙中山先生从组建兴中会、推翻封建帝制、创立共和到提出《建国方略》、确立三民主义信仰，“自由、平等、博爱”之价值贯穿始终，并成为激励仁人志士为中华富强而奋斗的精神动力。孙中山奔走革命期间，曾得到台湾人民的支持，他本人就三度到台湾。而两岸文化交流的破冰之旅，就与孙中山文化、与广东省、与中山市直接相关。1992 年，在孙中山诞辰 126 周年纪念日，由广东省社科院孙中山研究所和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等促成的在翠亨孙中山故居举办的“孙中山与亚洲”理论研讨会，是两岸学者的第一次聚首。海峡两岸中山论坛的搭建更拓展了“促进对话、深化互信”的交流平台。孙中山至今仍为两岸的执政者高度认可。2016 年 11 月 7 日在新加坡举行的“习马会”，是 66 年来两岸领导人的第一次握手，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孙中山文化对促进海峡两岸和平统一有重要价值，善用孙中山文化，促建两岸交流，大有可为。孙中山有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就是中国要统一，不能分裂。他指出：“支那国土统一已数千年矣，中间虽有离折（析）分崩之变，然为时不久复合为一。”中国“幅员之广，人口之多……虽各地乡音稍异”，但是“文字俗尚则举国同风”。他认为中华民族文化同根、同宗、同源，要是列强硬“要分割此风俗齐一、性质相同之种族，是无异毁破人之家室，离散人之母子，不独有伤天和，实大拂乎”人性，全中国人民“必以死抗之矣！”孙中山视实现国家统一为立国方针，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民族、领土、军政、内治、财政”五个统一。中山先生指出：“惟今日虽已共和，尚未大定，欲其大定，必须统一。”为使中国强盛起来，他亲手绘制了《建国大纲》这一宏伟蓝图，使国人大开眼界。临终前他留下两句传世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百年过去，海峡两岸在经济建设方面都各自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但中山先生的两项使命尚未完全达成。争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延滞了几代人的中华民族“大团圆”“大统一”之梦，依然是两岸同胞及海外侨胞在 21 世纪的两大重任。

要使两岸关系继续平稳地发展下去，进而促成中华民族的全民复兴，必须找出一个两岸都能接受，又有其实质内涵的政治经济思想，为其战略上之纽带，如此才能带领两岸同步迈入发展新时代。假如两岸皆能坦然接受孙中山思想，则化异存同，效应倍增。孙中山是振兴中华无可替代的旗帜，在台湾也有重要影响，对统一两岸意义重大，应该充分挖掘。“孙中山文化”概念的提

出，一定程度上跳出了纯政治的框框，有助于走出一直以来将孙中山纯政治符号化的僵化认识和误区，回到了其应有的人文本原，进而从人文和“大文化”的角度活化对孙中山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一种极具价值的深化和提升。

目前两岸关系正面临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中山是孙中山先生故乡，广东是国民革命的发源地，而孙中山先生是两岸共同认可、享有崇高威望的世纪伟人，其思想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遗产。孙中山文化则是中山乃至广东的一个可利用的重要、特殊又无可替代的文化品牌和资源。弘扬孙中山精神，增强其作为两岸同胞重要精神纽带作用，深化两岸文化交流，对于进一步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孙中山文化是凝聚全球华侨华人的精神大旗。

孙中山文化对构建海外华人精神家园具有很高的价值。民主革命时期，孙中山是华侨华人的精神领袖。1894 年 11 月，在檀香山组织成立兴中会时，就开宗明义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并且穷毕生追求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民主统一，祖国富强和人民安居乐业。2012 年 11 月 29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把“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并且表示这个梦“一定能实现”。可见习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与孙中山先生的“振兴中华”是一脉相承的。

孙中山近 40 年的政治生涯可谓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影，他以侨居地为革命基地，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九次在海外策动革命。孙中山文化在海外华人中的认同度极高。华侨华人素有爱国爱乡光荣传统，当孙中山高擎民主革命大旗时，遍布世界各地的不少华人出钱出力，参与和支持孙中山所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在中国革命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孙中山先生对此评价极高。而今，他们更是积极参与、支持祖国经济社会建设。而今，广大华侨华人不少成为积极参与、支持祖国经社会济建设者，更是

《孙文学说》



孙中山文化乃至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者。孙中山文化已成为华侨文化、华侨爱国精神的化身和华人世界的文化精神纽带。

深受孙中山文化影响的中山华人热切盼望祖国强盛，不仅义无反顾地率先追随孙中山革命，更倾囊支持祖国抗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少中山华侨一如既往地支持新中国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投资建设、关怀桑梓，热心公益，对祖国、对家乡建设贡献良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山市要进一步光大孙中山等革命先辈的爱国主义精神，勇立潮头，充分发挥本地区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多，对外联系广泛的优势，以孙中山文化凝聚凝聚近百万海外中山人以及全球华人的精神和力量，大力弘扬孙中山文化中蕴含的广泛联谊和充分依靠海外侨胞支持中国革命与建设以及保护海外侨胞合法利益的光荣传统，使之能够充分体现党和政府对海外华人华侨的关心、爱护和高度重视，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海外侨胞积极回国投资兴办实业，实现我国侨务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略。同时，在华人世界大力推出以孙中山命名的各类华侨文化工程，广为传播孙中山文化，这对于弘扬华人华侨身在海外心系故土的爱国情怀，培育新生代华裔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增强广大海华侨外华人及海外华人社团的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以孙中山文化连接一带一路倡议。

2013 年下半年，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建设“一带一路”战略即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反响积极。在新的历史时期下，如何将孙中山文化和丝路精神进行创新融合是值得我们探索的命题。

孙中山文化是中国近代文化的灵魂。孙中山文化主要特征是以开放的心态学习西方，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有分析、有选择地鉴别和吸收中外一切有益的文化成果，与时俱进。

而丝路精神则是经过几千年的丝路文化传承而形成的，丝路精神要求文明互鉴，要求尊重道路选择，要求合作共赢，要求和平对话。中国追求的是共同发展，中国与丝路国家都应坚持以开放包容心态看待对方，用对话交流代替冲突对抗，使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和谐相处。可见，丝路精神与孙中山文化在内涵上有不少相似之处。

孙中山文化和丝路精神都要求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发展必须顺应潮流，符合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规律。作为中国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和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大战略，“一带一路”所展现出的友好互信、平等互惠、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现代丝路精神，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让中国与世界更加文明进步。孙中山文化与丝路精神还具有共同的目标。孙中山毕生为振兴中华而奋斗，接受过西方教育的孙中山借鉴西方文明，并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相融合，赋予了大同思想以新的时代观点，希冀达到世界统一的大同社会理想。

面临建设“一带一路”的国家机遇，需要弘扬孙中山文化所蕴含的与时俱进精神，融合丝路精神，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当今世界国家的竞争，已经不仅仅是经济的竞争，更是文化的竞争。由文化所彰显出来的软实力，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精髓也是一脉相承的。中山是以伟人孙中山名字命名的城市，孙中山是中山城市最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孙中山文化是中山最宝贵的文化资源、城市品牌和精神财富。利用孙中山文化和丝路精神打造华人文化品牌是中山的优势。

孙中山文化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其伟大的历史贡献，而且体现在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对中山市尤为如此。将孙中山文化和丝路精神的文化符号用在引领中山未来发展上，具有继承性、代表性和开放性。中山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战略支点，

原属香山管辖的澳门就曾是海上丝路的重要港口；近代香山华侨为谋生而漂洋过海，反映了中山人的丝路精神。中山应借助华人文化品牌融入经济国际化，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

（四）以孙中山文化融通伟大的“中国梦”。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2014年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及随访的台湾各界人士，首次面向台湾同胞发表重要谈话。谈话中进一步强调“中国梦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梦”，“两岸同胞要携手同心，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孙中山先生的夙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夙愿，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夙愿。我们说的中国梦，就是这个民族夙愿的生动表述。”希望两岸同胞携手同心，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中华民族20世纪第一个伟人孙中山最早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与“中国梦”是一致的。千年中国的盛世与百年衰败的变奏曲，是民族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历史背景。120年前的甲午（即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在其亲自起草的《檀香山兴中会章程》中呼号：“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用特集会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他首次破天荒地喊出了“振兴中华”这个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伟大口号。他高擎民主革命大旗，发动并领导了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创立了共和。

孙中山为中华儿女勾勒出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美好民族夙愿，激励一代代中国人奋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民已经实现了民族独立、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正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也表示：“中国梦与台湾的前途是息息相关的。”可见，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尤其海峡两岸，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文化，各方面都相互依存，中国梦符合两岸未来基本价值的共同架构，是两岸中华儿女共同追逐的梦，需要大家一起来圆梦。

梦想，是跨越海峡的桥梁，是指引未来的灯塔。中国梦是两岸共同的梦。“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习总书记以古训勉励“两岸同胞要相互扶持，不分党派，不分阶层，不分宗教，不分地域，都参与到民族复兴的进程中来，让我们共同的中国梦早日成真”。

（五）孙中山文化是讲好“中国故事”重要的素材。

孙中山文化具有国际性和开放性，与今天改革开放一脉相承，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起源与海洋文化密切相关，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海外西方相结合的产物。孙中山先生的影响不仅在中国，在国外，特别在东南亚“海上丝绸之路”中沿线形国家中，他的共和、民族、民主主义思想同样影响深远。我们借助孙中山先生在海外的影响力，有利于树立中国文化海纳百川、善于吸纳海外优秀文化的一面，有利于在海外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为国家树立新的国际形象，建立的新国际关系承担桥梁、媒介的作用。

与此同时，还可以在海外中国文化传播基地中建立孙中山文化传播点，创作出版和制作孙中山文化学术研究、文学艺术、旅游纪念等产品，并实现产业化、社会化运作。

第四部分　关于做大做强孙中山文化的建议

对于一代伟人孙中山，政治纪念是核心，学术研究是支撑，文化活动和项目是动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目的，要做到“四位一体”统筹部署。同时，因为孙中山和孙中山文化厚重的世界性和人类性，我们还可以融合到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来做。

2016 年 11 月 12 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 150 周年纪念日。在此期间，海峡两岸以及全球华人的聚居区都掀起了缅怀纪念活动的热潮。其中，中山市委、市政府以“缅怀孙中山，共筑中国梦”为主题，以“发展是最好的纪念、创新是最好的继承”为指导思想，举办了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 150 周年系列活动，并按照全国政协、省政协的工作部署，承办了国家和广东省在中山举行的各项纪念活动。通过实施“六·十·六·十”系列工程，即：六大纪念活动（含国家部门、广东省在中山举办的活动）、十大文化活动、六大建设项目、十大民生实事，以此振奋中山人的精神，增强中山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扩大中山市海内外影响，进一步凝聚了海内外华侨华人和中山乡亲的力量，大大提升了伟人故里形象和软实力。

作为一代伟人，孙中山著写的《革命方略》、《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和《三民主义》，为中国革命留下了丰富的政治和文化遗产。孙中山第一个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这是中国梦的雏形；他倡导的“振兴中华”“天下为公”“博爱”“敢为天下先”“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等词语的持续使用，说明其影响深远。广东要完成好习近平总书记“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的要求，要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赢得主动、先机，必须打好先手牌，再次擎起改革开放、敢为人先的大旗，从文化这个核心竞争力上破题。我们要汲取孙中山文化的优秀文化养分，探索试办“文化特区”，为写好“中国方案”提供“广东思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一）建议做大做特“孙中山文化”符号，再造广东人文精神。

长期以来，人们都在说广东人“没文化”，广东人不服、不爽，但又无可奈何。可以说一直到现在，广东都处于这种“文化迷茫”之中。究其原因，一是人们包括广东人自己，自觉或不自觉地都会掉进一个误区，觉得所谓中国文化，就是指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广东便是“没文化”；二是在这个思想的主导下，广东人包括广东人之外的人没有看到或者说没有深刻地认识到广东自身的文化。其实广东是有着非常独特而灿烂的文化的。一是与中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血脉相连的文化。比如自秦朝统一南越之后，从中原带来的文化，集中体现在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以及这三种族群文化的融合文化上。更为可贵的是，这是中原文化的“活化石”，是所有华侨华人中保存得最好、最典型的中原文化。二是“六祖文化”。六祖惠能将佛教“中国化”、通俗化，为广东以至中国留下了十分可贵的文化资源。三是“开放文化”，或者叫“海洋文化”“蓝色文化”“咸淡水文化”。因为面临大海，自有文明以来，广东就是一个开放的地区。广东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肇始地和必经地，尤其是近 300 多年来，广东更成为中国开放的最重要的窗口，成为中国近代历史、近代文化的摇篮和源头。广东为中国近代发展准备了以孙中山为标志的伟大人物，包括伟大的队伍和伟大的思想。四是改革开放之后，广东承接着自古以来的人文传统，使得“开放文化”再放异彩，引领时代。

经济社会转型，要以现代文化引领。经过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发展，小富即安情绪已比较普遍。毋庸置疑，务实是广东人的传统优秀品格，但如

果做得“过”了，特别是到了今天的市场经济社会、开放社会、信息社会，就可能变成保守。过分的务实，可能出现重经济、轻文化，重物质、轻精神，重眼前、轻长远，重战术、轻战略，重实际、轻理论，重自己、轻他人等种种现象，其中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小康自满、安于现状。这种人文弱势制约了文化产业乃至整个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如果说，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广东是以“经济引领”创造了“广东奇迹”的话，广东下一步的出路，就是要以新一轮的思想大解放，改变“文化弱势”，发展“文化强势”；走出“文化迷茫”，树立“文化自信；突破“文化无为”，形成“文化自觉”，促进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以“文化引领”促进“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的实现，塑造和培育全新的广东人文精神，实现由“制造广东”向“创新广东”“文化广东”转型，再创“广东奇迹”。广东要充分发挥、利用改革先行地、开放桥头堡的前沿作用，探索建立“文化特区”，主动承担起为两个百年“中国梦”文化立言、文化输出的重大使命。建议深刻认识并牢固树立“开放文化”是广东文化核心的观念，树立文化自信，重点挖掘和利用好以孙中山文化为代表的近现代文化资源，将包括改革开放文化、岭南文化、孙中山文化、博爱文化等精神元素在内的广东文化作为重要命题，规划建设中国改革开放博物馆。同时，要将孙中山文化塑造成广东文化符号，要着力保护及开发孙中山相关文化场所和设施，延续历史文化脉络，确立视觉识别体系，集中直观地展现文化特性。加强艺术创作，充分展示孙中山文化的风采，向市民和游客弘扬孙中山精神和文化。

（二）建议将“孙中山文化”上升为广东的文化战略行为，甚至是国家战略行动。

孙中山与毛泽东、邓小平并称20世纪三大伟人。尽管孙中山研究和相关历史文化资源的发掘利用近年来有所突破，但与孙中山卓越的历史地位以及同其相联系的丰富历史文化资源相比，仍然存在相当的不足和严重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一是孙中山研究目前多还停留在政治和学术层面，从文化资源和文化遗产的角度重视不足，甚至走了一些弯路；二是政策的局限性，导致与海外交流特别是“大中华”之外地区交流的渠道拓展不足；三是孙中山研究人才队伍出现青黄不接，极大地制约了孙中山文化研究的深度、广度和相关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力度，这对于增强两岸同胞的精神交流无疑是一种无形的损失；四是资金投入严重不足，更没有在产业化上下功夫。

孙中山文化是中山市的，更是广东省、中国乃至全人类的。可以说，孙中山文化既是中山市的文化命题，也是广东命题、国家命题，甚至是世界性命题。迫切希望得到中央和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推动“孙中山文化工程”上升为国家的重要文化项目和行动。希望能有适当国家资金投入孙中山故居建设，大力推进“孙中山故居AAAAA景区”建设，使故居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带动广东旅游文化升级。建议国家和省一级以适当方式介入“孙中山文化节”，在政治上办好纪念活动的同时，力争在文化层面有新的突破。建议从中央和省的层面立项，从教育（孙中山文化进入学生教材）、产业（推动中山装成为国服）、交流（发挥如《孙中山》大型交响组歌等拳头文化产品在对外交流中的作用）等方面入手，再次赋予广东、中山在文化输出上先行先试的开放重任。策划部署孙中山主题文艺创作和文化产品生产，支持中山市“海峡两岸文化产业园”立项建设；收集整合全球包括大陆、台湾地区的各类有关孙中山的文艺、文化和理论产品，以“孙中山文化”为主题策划“走出去”、请进来。同时以翠亨村为原点建设全球最大的孙中山文化基地。策划生产系列孙中山主题文化旅游产品。

（三）以“孙中山文化”为载体，打造发展新平台，加速推进伟人故里建设。

加速推进伟人故里建设，迫切需要新的发展平台。翠亨新区正是这样一个平台。中山“翠亨新区”位于中山市南朗镇和围垦新区，区位优势明显。启动区 5 平方公里，核心开发区 20 平方公里，重点开发区 50 平方公里，统筹规划建设周边共 250 平方公里。翠亨新区的战略定位包括四个方面：新一代珠西岸理想城市先行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引领区、山水和谐智慧用海试验区、海内外华人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探索区。从规划中，人们不难发现，翠亨新区除了工业带动其发展外，与广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横琴都不一样的是，它还依靠人文带动。建设中的中山“翠亨新区”包括中山广场、海峡两岸中山论坛（翠亨村全球华人论坛）、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园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以孙中山思想和精神为灵魂，使之成为两岸同胞及全球华人华侨加强经济文化交流新窗口，是谋求两岸共同发展、追求文化共识的精神符号，是构建海峡两岸、海内外华人子孙的共同家园，是进一步提升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推动全世界华人华侨在促进祖国统一和全面振兴中华目标下的大团结的理想选择，也是推进广东省“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理想平台。积极推进“孙中山故居 AAAAA 景区”建设，是“翠亨新区”建设的突破口，故居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作用将充分发挥出来，并将带动广东旅游文化升级，实现中山在推进现代服务业发展中的重大突破。

建议也考虑以翠亨新区为试点，试办文化特区。

（四）弘扬“孙中山文化”，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孙中山文化”对构建海外华人精神家园有巨大价值。“华侨是中国革命之母”，“我海外同志，昔与文艰苦相共，或输财以充军实，或奋袂而杀国贼，其对革命之奋斗，历数十年如一日，故革命史上，无不有华侨二字”。孙中山以侨居地为革命基地，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9 次在海外策动革命——可以说，孙中山就是华侨文化、华侨爱国精神的化身，是华人世界当之无愧的文化、精神纽带。广大海外华人华侨也是“孙中山文化”在海外最积极的传播者，素有积极参与、支持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慈善事业的优良传统。在华人世界大力推出以孙中山命名的各类华侨文化工程，广为传播“孙中山文化”，对于弘扬华人华侨身在海外心系故土的爱国情怀，培育新生代华裔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增强广大海外华侨华人及海外华人社团的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意义重大。

（五）以“孙中山文化”为切入点，让广东走向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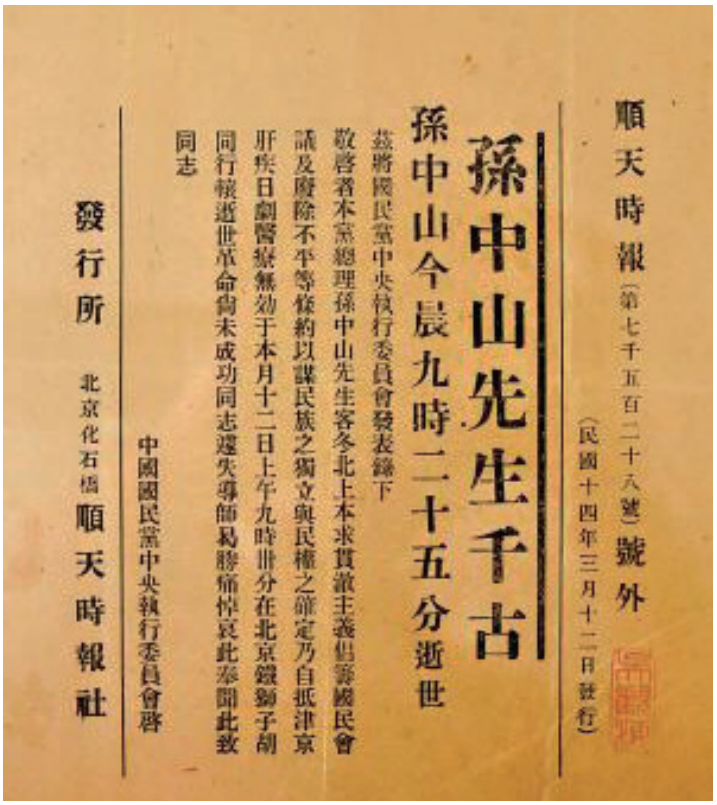
孙中山思想品格中有着深刻的人民性、民族性和人类性。孙中山 59 年的生涯中，有 31 年在海外度过，除了非洲、澳洲等地，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全世界，并与世界各国的政治精英、文化领袖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据不完全统计，如今全球共有 43 座孙中山主题公园、187 条中山路，另外，全球许多城市和地区还设有许多中山纪念堂、纪念雕像等。全球各国各地区发行的孙中山主题邮票最多、最丰富。鉴于孙中山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影响和普遍认可，党和政府如能充分运用世界各国包括美国政府和民众对于孙中山先生的历史记忆和历史遗迹的既有事实，分析和寻找中外、中美政治文化的契合点，对外传播孙中山“天下为公”“平等博爱”“民主法治”等人类共同的价值文化，那么，“孙中山文化”就能成为我们对外宣传的一张重要的政治名片，并在中外文化合作交流上起到重要的桥梁平台作用。

（六）以孙中山文化为纽带，促进海峡两岸和平统一。

孙中山有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就是中国要统一，不能分裂。100年过去了，海峡两岸在经济建设方面都各自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但中山先生的两项历史使命尚未完全达成。争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依然是两岸同胞及海外侨胞在21世纪的两大重任。当代中国“国家统一”大业的“重中之重”就是实现大陆、台湾海峡两岸的“和合”，实现中华民族“大团圆”“大统一”之梦。而从孙中山对国家民族的思考中，都能找到很多借鉴的地方。因此，进行当代中国“国家统一”模式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进行解决台湾问题的“一国两制”方案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必须全面、系统和深入地清理和总结孙中山“国家统一”的思想，从中汲取营养。我们以孙中山和孙中山文化为载体，以中山市为重要基地，建立全方位、更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共同为海峡两岸的经济社会文化交流合作，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为建设全球华侨华人共有的精神家园，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伟大的中国梦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文化，是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引擎。孙中山先生至今仍为两岸人民高度认可，孙中山依然是世界公认的十大伟人之一。当前，在国家层面，我们正在加快民主法制建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迈进；中国正处于近300年来实施“文化复兴”的最好时期，提高文化软实力十分急迫；两岸关系也正面临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从“经济崛起”走向“文化复兴”的中国，需要用文化与世界架起沟通的桥梁，树立崭新的形象。所有这些，“孙中山文化”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可能和途径。以孙中山文化不仅仅是中山市的命题，也是广东省的命题，是国家命题，甚至是世界命题、人类命题。从国家层面塑造、推广、利用孙中山文化刻不容缓、意义重大而深远。只有善用孙中山文化，才能最大范围地凝聚海内外华侨华人，在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中国更加积极、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孙中山千古消息


順天時報（第七千五百二十八號）號外
（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發行）
孫中山先生千古
孫中山今晨九時二十五分逝世
茲將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錄下
敬啓者本黨總理孫中山先生客冬北上本求貫徹主義倡導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以謀民族之獨立與民權之確定乃自抵津京肝疾日劇醫療無効于本月十二日上午九時卅分在北京鐵獅子胡同行轅逝世革命尚未成功同志遽失導師曷勝痛悼哀此奉聞此致
同志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啓
發行所 北京化石橋 順天時報社



输入与输出：广东侨乡文化特征散论

文　张应龙

张应龙，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广东华侨史》编修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广东华侨史》主编，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广东华侨历史学会会长，《华侨华人文献学刊》名誉主编。长期从事华侨华人史研究、侨务政策与侨务工作研究、侨乡研究。近几年主编的著作有《华侨华人与新中国》《海外华侨与辛亥革命》《海外潮团发展报告（2015）》《海外粤籍华人社团发展报告（2018）》《中外侨务研究》等。

侨乡文化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侨乡文化体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无论在哪个侨乡，外来文化只是一种“补充”，侨乡的主流文化还是本土文化。举凡建筑、语言、饮食、服装和习俗等，外来文化都属于“寄生物”。不同侨乡文化的差别主要体现在本土文化特色以及外来文化影响程度高低的不同。当然，进行这种差别的对比研究，对进行侨乡比较研究是必要和必需的。本文以侨乡文化中比较容易辨认的建筑文化为中心进行侨乡文化特征的比较研究。

从历史角度来说，侨乡文化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不同历史时期的侨乡文化有不同特点，大致上说，侨乡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一）1949 年以前为侨乡文化成型时期；（二）1949 年至 1978 年是侨乡文化衰退时期；（三）1978 年以后是侨乡文化转型时期。本文所讨论的侨乡文化时间范围是指 1949 年以前这个历史时期。本文所选择的比较对象是五邑侨乡和潮汕侨乡。

洋气张扬的五邑与平淡内敛的潮汕

观察侨乡的建筑文化，我们不难发现广东不同侨乡的建筑文化有很大的区别。在广东侨乡中，江门五邑侨乡文化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非常突出，外国文化色彩的建筑较多，拥有众多的西洋风格楼房以及中西合璧的碉楼等，到处可见张扬的洋气，广东其他侨乡受西洋文化的影响就不那么显著了。

对于这种现象，学者们一直在关注和思索。但仅仅从五邑华侨如何善于接受新生事物、如何敢为人先等角度去探索，恐怕还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因为从对外交流史来说，潮汕人民出国交流的历史不会比五邑人民晚，在清代中国海外贸易中，潮汕地区要比五邑地区更加发达，而汕头在鸦片战争后还是中国对外通商口岸之一。从对外移民史来说，潮汕也是很早就有向外移民的活动，在清代随着红头船贸易的兴起，对外移民的数量更多，单单泰国就聚集了大量的潮汕华侨。从侨乡人民的文化程度来说，潮汕历来有“海滨邹鲁”之称，文化水平不低。总的来说，五邑侨乡在对外交流、向外移民、文化教育水平和开放意识等方面并不见得比潮汕侨乡强多少。

五邑侨乡之所以建有大量的洋楼和中西合璧的碉楼，首先是五邑侨乡具有比其他侨乡更雄厚的经济实力，这种实力就是五邑侨乡民众平均拥有财富的数量要高于中国其他侨乡的民众。从表面上看，潮汕侨乡比五邑侨乡拥有更多的海外华侨大财主，海外潮汕族群的财富总额应该不会比海外五邑族群少，问题在于那些海外华侨大财主的经济根基在海外，而大富大贵的只有一小部分人。从普遍意义上说，侨汇才是对近代侨乡经济影响最大的因素，也是衡量侨乡民众平均财富的主要尺度。以台山而言，1929 年以前每年的侨汇超过 1000 万美元，1932 年增加到 3000 万美元，1937 年达 1.8 亿美元。在 1946 年，台山每月平均侨汇为 425 万美元，而潮汕、客属侨乡每月侨汇才 80 万美元，差距非常悬殊[①]。下面以有准确人口统计的两个年份作为比较。1953 年台山第一次人口普查的人口总数是 655567 人，1964 年第二次人口普查的人口总数是 731923 人，同时期台山收到的侨汇，1953 年是 8167230 美元，1964 年是 8313159 美元[②]，每人年均侨汇分别是 12.5 美元和 11.4 美元。大量侨汇的流入，对于没有工业基础、以农为本的侨乡来说，作用是非常大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这里借用清光绪末年新宁知

① 林家劲、罗汝材、陈树森、潘一宁、何安举著：《近代广东侨汇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2页。

② 台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台山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5、408、417-418页。

县李平说的一段话：“出洋之人多获资回华。营造屋宇，焕然一新。服饰饮食，专尚华美。婚嫁之事，犹斗夸奢，风气大变。”[3] 这段话说出了侨汇对侨乡社会经济的重大影响。早期华侨的理想之一就是买田建屋，由于有了庞大的侨汇来源，五邑侨乡才能建起那么多的洋楼，才能支撑起侨乡商业经济的繁荣。仅台山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兴起 106 个圩市，而开平、新会、恩平、鹤山等县也涌现了一批商业活跃的圩市[4]。其次，五邑华侨大多数居住在北美地区，这是五邑侨乡区别于中国其他侨乡的主要特征。五邑华侨在北美见识到发达的资本主义文明，尽管他们大多数人被局限在唐人街之内，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时刻影响着他们的思想与行为习惯。当他们返回家乡后，除了带来外国的物品之外，也将西方的文明习惯引进到侨乡。他们凭着自己的记忆，仿造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家园，在自己家乡建起与传统建筑文化截然不同的建筑。从文化角度说，这也是一种家园再建的表现。

在潮汕侨乡，由于经济不如五邑侨乡发达，与同时期五邑侨乡相比，侨乡市镇化程度远远低于五邑侨乡，除了县城还有一条商业街外，乡村地区基本还是传统村落的样子。在潮汕侨乡，见不到遍布五邑侨乡的颇具规模的近代化圩市，更没有出现像开平赤坎那样的新市镇。华侨在家乡兴建的房子基本还是传统格式的平房，即当地的大宅格式“下山虎”、“四点金”或者“驷马拖车”，连著名华侨大宅澄海陈慈黉故居[5]等都是如此，一切显得平淡内敛。这是否意味着潮汕华侨比较保守？众所周知，潮汕华侨基本集中在东南亚。东南亚的建筑文化基本包括四种类型，即西洋风格、中国风格、印度风格、本土风格。这四种风

③ 参见沈冰虹主编：《岭南第一侨宅：陈慈黉故居及其家族》，汕头大学出版社，200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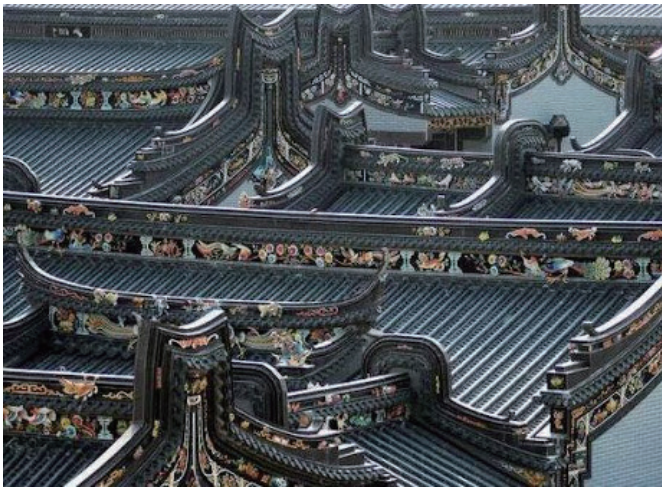
④ 台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台山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5、408、417-418页。

⑤ 参见沈冰虹主编：《岭南第一侨宅：陈慈黉故居及其家族》，汕头大学出版社，2001年。



⏩ 汕头陈慈黉故居

格的建筑物交叉在一起，和谐相处，共同构成东南亚的多元建筑文化风格。东南亚的土著居屋一般都是用茅草或者木板搭成的简易房子，例如马来西亚的“亚答屋”、婆罗洲的长屋，等等，东南亚的砖石结构楼房主要是西方人到达东南亚以后才引进的。由于东南亚经济水平的限制，除了像新加坡、槟榔屿等城市拥有较多较精美的西洋建筑之外，大多数市镇的建筑物都以二层高的房子为主，装饰也比较简单。生活在东南亚的潮汕华侨大多数人的居住环境非常一般，那些生活在农村的华侨，有的生活条件甚至不如在自己的家乡，因此，资本主义文明对他们的冲击和影响也远不如五邑华侨。虽然潮汕华侨也在家乡兴建一些中西合璧的建筑，但数量很少。不过，为数不多的西洋建筑有的规模比较大，也非常精美。例如，在潮阳谷饶镇，有一座柬埔寨华侨建造的大宅，前面是传统的“驷马拖车”，后面是完全西洋风格的三层洋楼，三楼阳台修有假山，屋顶还立有旗杆。洋楼后面是假山花园，非常精致。但是，潮汕乡村的建筑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束缚，风水与阴阳五行学说影响非常深刻，潮汕侨乡的乡村建筑一般是以精雕细刻来展示其财富[6]，而不会随便突破传统建造格式。据笔者了解，村民不能允许邻近的房子高过自己，认为那样的话，自家的“风水”会受到侵犯。民间还有一些神秘色彩的传说，指那些洋楼的主人在建成房子之后不久就家道中落了，原因是他们盖的高楼大厦受不了那种“福气”。以致一般人不敢轻易在村中建造洋楼，哪怕是一般的楼房。潮汕侨乡洋楼不多的现象，其主要原因还是民间经济实力不强，潮汕的侨汇远就不如五邑侨乡多，而建造一座洋楼的费用显然高于建造一座平房，对于不是大贵大富的华侨来说，建造



潮汕民居

传统宅院更加容易些[7]。同时，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文明程度与北美相比有较大的差距，西方文明对东南亚华侨的影响不如五邑华侨在北美受到的影响那么大，因此，即使有大量的华侨频繁进出侨乡，他们所携带的西洋文明对潮汕侨乡的冲击力也远不如五邑侨乡那么广泛和深刻，不足以对传统建筑文化产生重大影响。

“洋化运动”与现代化

如何看待近代侨乡建筑的中西文化交融及华侨引进外国建筑文化的历史背景？许多研究都强调这是中西文化碰撞的结果，是中西文化融合的结晶，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这种看法只是对“现象”的描绘，而不是对“原因”和“背景”的解构。笔者认为，应该从近代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视角来探讨这个问题。

近代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在西方资本主义的

⑥ 唐孝祥：《近代岭南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特征》，《新建筑》2002年第5期，第66-69页。

⑦ 例如，开平碉楼的建筑费用，瑞石楼是3万多港币，铭石楼是6万双毫，光益楼是1.1万两白银。见梅伟强：《开平华侨与碉楼建筑》，《五邑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冲击下逐步瓦解。“师夷之长技”成为中国社会一股强劲的思潮。辛亥革命后，尽管连年军阀混战，战争不止，但中国社会依然在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国要进行现代化建设，所能参考的坐标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等于“西化”，“洋化”意味着“先进”，这几乎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标准格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侨乡的现代化建设自然要体现西洋的东西，否则就不是现代化。

现代化建设基本上需要两个支撑：一是观念，二是金钱。居住在海外的华侨，对资本主义文明的了解和应用要比生活在国内的民众强得多，也生动得多。因此，华侨自然成为侨乡文化新观念的引领者和先行者。尽管华侨在海外也是生活不易，但相对国内一般民众，他们毕竟能够通过努力积累到一定的财富。自 20 世纪以后，越来越多的华侨陆续回到家乡投资兴办实业或者兴建房屋。侨乡正是有了这些华侨，在现代化观念以及现代化建设资金上都具有比非侨乡优越得多的条件。

广东城乡的现代化建设开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五邑侨乡与潮汕侨乡涌现的中西结合建筑物便是侨乡现代化进程的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广东侨乡建设发展的黄金时代，在这段时期里，广东城乡到处大兴土木，一个个圩市涌现出来，城镇建设也日新月异。据《台山县志》所述，1922 年—1927 年是台山大规模建设的时期，台山县城的新面貌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新县城相当繁华，有“小广州”之称[⑧]。以当时台山的现代化建设水平而言，它在县级行政区域当中是非常突出的，这自然得益于侨汇的作用。在开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开平的楼房有 80% 以上是侨资所建[⑨]。开平赤坎在 1926 年开始全面改造，建成中华街和东西长堤等主要街道，街道两旁均是西洋格式的骑楼，被称为“欧陆街”。与非侨乡的农村相比，五邑侨乡的圩市建筑多采用西洋风格的骑楼，其景观要比非侨乡圩市洋气许多，例如台山端芬镇的汀江圩。同时，由于有大量侨汇的输入，侨乡消费能力空前提高，百业兴旺，货如轮转，乡民从饮食、服饰到器物，处处可见外国文化的影子，可谓抬头即见“西洋景”。

在潮汕侨乡，以汕头、潮州市为代表的现代化建设也十分突出。尤其是汕头，自开辟为对外通商口岸之后，城市建设突飞猛进。华侨在潮汕兴建的现代化建筑大部分集中在汕头市，1929 年至 1932 年是汕头城市建设最快的时期，这个时期建成的楼房属于华侨投资的约占三分之二，建成的华侨房屋约 2000 多座[⑩]。潮汕华侨虽然大多数集中在东南亚，但他们在汕头所建造的建筑物却是十分洋气，与五邑相比毫不逊色。事实上，汕头在改革开放前一直是广东第二大城市，其现代化程度仅次于省城广州，远远超越珠江三角洲任何一个城市。

回顾侨乡历史发展的道路，民国时期侨乡建设的主要趋势就是现代化，一个个现代化社区的形成是侨乡现代化的表现。侨乡城镇与圩市中大量骑楼洋房的出现恰好与这个现代化潮流相契合。五邑侨乡、潮汕侨乡以及其他侨乡的中西合璧建筑物在更大程度上是侨乡民众对现代化追求的结果，这些西化建筑是他们心目中现代化水平的象征。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大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广东、福建、上海的城市建设，就不难发现，几乎当时所有的新建筑都是洋气十足的“洋楼”。应该说，洋楼、中

⑧ 台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台山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5、408、417-418页。

⑨ 《开平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1年，第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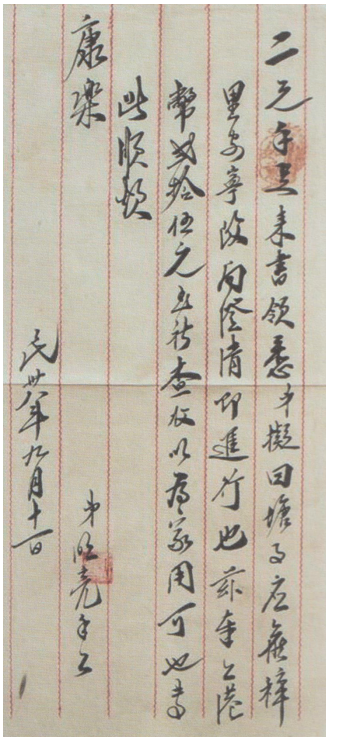
⑩ 王绵长：《近代华侨对汕头经济和海运贸易的贡献》，《汕头侨史论丛》（第一辑），汕头华侨历史学会，1986年刊本，第134-157页。

西合璧建筑并不是侨乡的专利，而是那个时代的流行色。

观察侨乡的现代化建筑，不难发现它们大多数坐落在市镇或者圩市之中，传统村落中西洋建筑相当少，即使有的话，通常也是在村落外围。与城镇和圩市中以骑楼为代表的大片西洋格式楼房拔地而起相比，传统村落的建筑物还是传统建筑格式占大多数。在传统农村村落里，中西合璧的建筑不多见。

大致而言，近代侨乡的现代化建设，以传统乡村为中心呈现向外扩张的态势，愈向外洋化就愈明显，其洋化路线图表现为传统村落——村落外围——圩市——市镇——城市。具体地说，传统村落受到洋化的影响最小，但有一些地方采取西洋的规划概念，而零散的西洋格式别墅（庐）通常建于村落的外围，成规模骑楼群浮现在圩市之中，市镇与城市新修商业街与住宅群则以骑楼和洋楼别墅为主。当然，如果能在普查的基础上，描绘出洋化建筑的分布图，情况就会更加直观和有说服力。总的来说，五邑侨乡的“洋化运动”是在侨乡现代化背景下进行的，五邑民众之所以大量建造西洋风格建筑物或者中西合璧建筑物，源于对现代化建设的认识和实践，源于海外华侨强劲的财力支撑。

反映侨乡建筑“洋化运动”的代表是骑楼、碉楼等。骑楼，在粤闽侨乡是一种常见的建筑格式。骑楼这种建筑格式无疑是引进外国建筑的产物，它集中反映了侨乡中西合璧文化的特征。骑楼主要出现在城市和埠镇圩集之中，像广州、汕头、潮州、江门、厦门和泉州这样的大中城市以及像台山的台城、广海、汀江圩、开平的赤坎这样的市镇圩集，都有成片成排的骑楼。毫无疑问，骑楼是近代侨乡建筑的一大特色，但它不是某个侨乡所专有。就骑楼这个建筑现象而言，粤闽侨乡都是一样的，其区别在于数量的多少以及某个局部的装饰式样不同而已。相对而言，五邑的骑楼比较原汁原味，装饰更加精美，多采用巴洛克式和文艺复兴式，而五邑以外的地方除了巴洛克式占第一位之外，中国传统式占了第二位。[11]骑楼的基本特点是商住混用，楼下用于开设店铺，楼上用于住人。凡是骑楼成片成排的地方通常也是当地的商业中心，不作商业用途、纯粹用作民居的骑楼比较少。骑楼的基本功





⑫ 1949年马来亚麻坡寄往广东汕头的侨批

⑪ 许桂玲、司徒尚纪：《中西规划与建筑文化在广东五邑侨乡的交融》，《热带地理》第25卷第1期，2005年3月。

能是商业性，骑楼数量的多少决定于当地的商品经济之发达水平。骑楼的文化意义就像今天摩天大楼的文化意义一样，它是现代化的产物和标志之一。

五邑侨乡中的碉楼通常被当作中西文化结合的代表。问题在于，村落中的碉楼，其基本功能是防卫，用于日常生活和居住的碉楼不是很多，因此它可以以十分张扬的形式出现。所以，在涌现众多精美碉楼的村落，一边是碉楼矗立其中，一边是传统民居岿然不动，两者似乎互不干涉，相安无事，张扬的碉楼式中西结合建筑文化并没有导致民居建筑格式发生重大的变化。当然，在五邑侨乡，一些村落已经引进西方的“规划”概念进行村庄建设，也建了一些突破传统建筑格式的楼房，或者在装饰上使用了西洋风格的东西⑫，但总的来说，外来文化（式样与装饰）对传统村落建筑文化的影响不是很大。

潮汕地区的乡村也修建有防卫功能的炮楼，其门窗多采用西洋风格的装饰。炮楼通常单独而立，但也有一些炮楼夹杂在两座“四点金”之间的火巷，它一般只有两层楼高，其门窗同样多采用西洋风格的装饰。也就是说，普通民宅依然采取传统的格式，而楼就可以“洋”一些。潮汕侨乡的民众包括华侨，对于“宅”一般遵从传统的格式，对于“楼”则乐意引进西洋风格的式样或者装饰。在五邑侨乡，这种差别同样存在，楼可以极尽洋化，而宅还是老样子。这些现象揭示了包括华侨在内的五邑侨乡与潮汕侨乡民众在对待宅与楼（庐）之间同样有着明确的观念分野，这种分野既表现在式样方面也表现在地理位置方面。所以，以开平碉楼为代表的眼花缭乱的西式装饰便可以理解了。

如果说对过去侨乡建筑文化探讨起来还比较费劲的话，那么将时段切换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时期，情况就会容易明白得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掀起了现代化建设的高潮。不管是在沿海地区还是在内陆城乡，一栋栋新建筑宛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一般来说，城市的建筑比较追求完整的西化，农村的建筑则习惯于中西结合。有的地方建造的中西合璧建筑看上去甚至是不伦不类的，但建造者却将此当作了现代化。农村新修的楼房或者平房一般离开原来的老寨，向外围发展，沿着大路两侧修起的楼房，亦商亦住，成为新的“商业街”，这与旧日侨乡的中西文化建筑物分布图有相似之处。中国城乡的现代化建筑还是像过去那样以“西化”作为“现代化”的标准。新一轮“洋化运动”的结果便出现像媒体批评的“城市像欧洲”现象。在各大城市新建的大楼盘中，西式建筑以及洋化楼盘名称似乎成为潮流，诸如雅居乐、蓝色康园、托斯卡纳、优山美地等，尤其在别墅区更是如此。

很显然，过去五邑侨乡的西式建筑要比现在侨乡的西式建筑精美得多，正宗得多。为什么在同一侨乡，所造的房子有这么大差异？原因值得探讨，但有一条，这就是时代潮流使然，不能由此断定现在五邑华侨华人的眼界比过去低。在现在的欧美国家，新建筑风格也已不同于过去的古典建筑风格了，大型公共建筑喜欢大量采用玻璃和钢架了。这似乎成为一种世界性潮流，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后中国城乡建筑潮流其实与过去侨乡建筑潮流是相一致的，其心态也是相似的，这就是：现代化等于“洋化运动”。

输入与输出：五邑与潮汕侨乡的不同文化形态

以广东侨乡而言，五邑华侨大多数集中在北美，潮汕和客家华侨基本集中在东南亚。因此，广东华侨所接触的外来文化基本上可以分为西

⑫ 张国雄：《岭南五邑》，三联书店，2005年，第61–65页。

洋文化圈与东南亚文化圈两大类，其中有互相交叠，但基本上凸现一种文化圈的影响力。在文化输入方面，五邑侨乡的西洋文化色彩较浓，潮汕侨乡西洋文化影响较弱。在文化输出方面，潮汕华侨的表现要比五邑华侨强得多，潮汕华侨不但把中式建筑文化输出到东南亚，而且将语言、习俗也输出到东南亚。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我们很难用觉悟、开放、善于吸收之类的词汇来加以概括。华侨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和媒介，在引进外国文化的同时也将中华文化介绍到国外去。一般来说，如果外来文化是“先进”的、“时髦”的、“好用”的，便容易被侨乡民众所接受。五邑侨乡之所以大量引进西方建筑文化，是因为它们代表着“现代”，使用西洋器物代表着“身份”，话语间夹杂一些英语词汇代表着“品位”。东南亚的文明程度应该说比中华文明稍微低一些，其茅草居屋、用手抓饭等文化很难被引进来[13]。相反，中国的食物、日常用品却大量输出到东南亚，并深受东南亚土著居民的欢迎，有些在中国属于日常用具的东西如陶瓮等还被一些民族赋予神秘的色彩[14]。中华文明被华侨输出到国外后是否能在当地生根，还要看华侨社会在所在国家的社会与经济地位。



⏩ 1936年马来亚芙蓉梅江五属会馆会员证书

二战前的东南亚华侨社会，在当地的经济活动中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雇用了不少当地的劳动力，一些中华文化便在这种密切的交流中进入了当地社会。不少潮汕方言、闽南方言成为当地民族日常用语的一部分[15]。居住在北美的五邑华侨，其社会经济地位显然不如东南亚华侨那么高，也不如东南亚华侨社会与当地其他族群的交流那么密切。所以，尽管在唐人街内到处乡音飘飘，五邑方言词汇能进入英语的也极少，五邑华侨在向北美输出中华文化时遭遇到较大的障碍。就建筑文化的交流而言，当我们将视野移至五邑华侨

⑬ 但是，有的外国文化却在潮汕侨乡产生深远的影响。例如，过去潮汕乡村最为流行的浴布（水布）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潮汕农村，几乎每个成年男子都有一条浴布。浴布显然来自东南亚，它是一种长条方格条纹的彩印薄纱布，一般长1.2—1.5米，宽0.4—0.5米，印上小方格，或红或蓝或青或黑，用途多种多样，如洗澡时可以作为浴巾，包东西时变成包裹，铺在地上可以作为床单，盖在身上可以作为被单，扎在头上可以遮阳，武斗时可以作为工具，等等，在过去是广大乡村民众的“标准配置”。在潮汕侨乡，大概找不出有另外一种外来文化像浴布那样对民众的影响是如此广泛和深入了。

⑭ 刘子政：《砂拉越史事论丛》（第一辑），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1999年，第49-62页。

⑮ 孔远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化探析》，南岛出版社，2000年，第240-267、355-366页。

居住的北美地区时，我们马上会发现一个相反的景象。以五邑华侨占多数的美国旧金山唐人街而言，五邑方言在旧金山唐人街是一种通用语言，流行市井坊间。但旧金山唐人街中的中国建筑色彩并不浓厚，除了花园角有一中国式凉亭之外，很少见到完整的中式建筑物。像妈祖庙、会馆这类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建筑物，也是以西式建筑为主体，中式建筑元素只是其中一点装饰而已。笔者曾经请教旧金山州立大学亚裔学系的谭雅伦教授，他也说在美国完整的中式建筑很少，完整的中式庙宇只是早期才有。本来，唐人街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华侨居住区，为什么五邑华侨不把中式建筑搬到美国呢？笔者猜想，这可能与美国的城建规划和实施条例有关。据美国华人介绍，在美国盖房子，一是要经过政府的批准，二是要经过邻居的同意，否则即使得到政府的批准，如果邻居觉得你的房子对他造成影响，他同样可以告到法庭要求停工。因此，我们就见到一个很奇异的现象：五邑华侨一方面在家乡大量引进和建造西式建筑物，一方面却没能将中式建筑文化有效地输出到海外。

尽管潮汕侨乡中西结合或者西洋格式的建筑不多，但在潮汕华侨集中居住的东南亚华侨社区里，却到处是中国格式的建筑物，举凡会馆、神庙等莫不如此。在 19 世纪新加坡这个国际化大都市，潮汕华侨陈成宝、佘有进、黄亚佛和陈旭年竟建造了四座著名中式大宅院——“四大厝”，并以资政第、大夫第之类的名字命名。在潮汕华侨集聚的曼谷，潮汕华侨建设的商业社区模式与潮汕本土商业社区模式大致相同。中式建筑物在东南亚落地之后，许多建筑物几乎原汁原味被移植到海外，甚至连建筑材料、构件也不少是在国内定做然后运出国外的。在东南亚，凡是华侨集中居住的地方都有许多中式建筑物，并且是以建造者家乡的建筑格式建设的，潮汕华侨建筑的房子带有潮汕文化的印记，福建华侨建筑的房子带有福建文化的印记，广府华侨建筑的房子带有广府文化的印记。走进东南亚华侨居住区，人们都有仿佛进入中国南部乡村的感觉。因此，尽管潮汕华侨（包括客家华侨、福建华侨等）在引进外来文化方面较弱，但在输出文化方面则比五邑华侨强得多。

回顾侨乡建筑文化发展史，不难发现，过去侨乡建筑由华侨建造的房子比非华侨建造的房子高了一个档次，而现在侨乡由华侨华人建造的房子与非华侨华人甚至非侨乡建造的房子相比不一定存在很大的差别，相反，不少中国本土富翁建造的房子要比华侨华人建造的房子精美、宽敞、豪华得多。中国本土富豪所建造的建筑之所以更加洋气，除了经济实力之外，主要得益于全球化时代便利的信息传播。

总的来说，在侨乡，根意识是基础，财力是支撑，眼界是条件，现代化是潮流。没有根的文化意识，华侨华人便不会回家乡建房；没有一定的财力就无法大兴土木；没有全新的眼界就造不出精美的西洋建筑物；没有现代化潮流的影响，西式建筑就难以在侨乡大行其道。正因如此，今日五邑侨乡难以见到过去那样的大量精美西洋建筑，而在福建新侨乡如长乐等，则新修了大量反映当代潮流的洋楼。

综上所述，五邑侨乡建筑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最大，但五邑本土建筑文化在海外影响最小。广东其他侨乡和福建侨乡的建筑文化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受到外国文化的影响，但本土建筑文化在海外影响却非常大。从建筑文化角度说，五邑侨乡文化特征是输入型文化，而广东、福建其他侨乡的文化特征则是输出型文化。侨乡文化比较研究是一个宏大的课题。以上只是一些关于侨乡建筑文化的散论而已，不是对整个侨乡文化的思考，谬误处，敬请方家指正。

电话：+86-20-38878230
传真：+86-20-38879452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广州体育中心支行
银行账号：44001382203059000021
受赠单位：广东省侨界仁爱基金会
地址：广州市体育东路140-148号南方证券大厦六楼606室

广东省
侨界仁爱基金会

广东省侨界仁爱基金会成立于2006年5月，坚持“以侨为本、为侨服务”，成为全国侨联系统第一个被评为5A级的公募基金会，曾获得“全国侨联系统先进组织”“广东省十佳社会组织”等荣誉。



庆祝广东省侨联法律顾问委员会成立十五周年

15TH

维护侨益十五春秋

广东省侨联法律顾问委员会成立于2005年6月，15年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积极维护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及港澳台同胞在国内的合法权益，在提供法律咨询、开展调查研究、提供科学决策、协办案件、参与化解矛盾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2007年广东省侨联法律顾问委员会被中国侨联授予“维护侨益先进集体”。



从东江到香江

文 陈启文





陈启文，湖南临湘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国家一级作家。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河床》《梦城》《江州义门》，散文随笔集《漂泊与岸》《孤独的行者》，长篇报告文学《共和国粮食报告》《命脉》《大河上下》《袁隆平的世界》等 20 余部，多篇作品被翻译为英、法、德、俄、韩等文字在海外出版。曾获国家图书奖、老舍散文奖、郭沫若散文奖、徐迟报告文学奖、《中国作家》报告文学奖、毛泽东文学奖、林语堂文学奖、《小说选刊》双年奖、《北京文学》双年奖、全国电视纪录片一等奖、中国新闻奖、广东省鲁迅文艺奖等，2015 年被国家水利部授予“水利文学创作特别贡献者”荣誉称号，2017 年获“第三届广东省中青年德艺双馨作家”称号。

一

这是一条离大海最近的河流，一条被人类反复命名的河流，循江，浈江，东江。事实上，她每流经一个地方就获得一次命名，在寻乌，她叫寻乌水；在安远，她叫安远水；在惠州，她叫惠州河；在石龙，她叫石龙河。这是一种深情的眷恋和挽留的方式，无论她将流向何方，她的名字，她的魂，就在这样深情的呼唤下，在她流经的某一个地方留下了，从此，永远，只属于那里，她与那片土地成了同义词。在我注视她的那一刻，感觉有许多事物在一条河流同时发生。这不是我的幻觉，这是河流的意义。

这世间，没有谁能够超越河流，也没有谁能超越时间和死亡。

只有河流，只有她能够超越人类渴望超越的一切。

每走近一条河流，我都满怀着虔诚、敬畏和祈求。这河里是有神的，我绝对相信。

中国的每一条河流都有自己的神。东江的河神传说为东河潘大仙。这到底是何方神圣？我向民俗学者打听过，但一直没有得到令我深信不疑的解答。这应该是东江流域的一种久远信仰。一些从东江打捞出水的文物验证了这一点，其中有不少古代女子作为饰物的小挂件，就刻有“东河潘大仙”的字样。这里不必做太多的推测，那些女子刻上一个河神的名字，就是祈求东江河神保佑她们和家人平安吉祥。当人类向一条河流祈求平安时，说明这条河已经不那么平安了，而东江又是从何时变得让人们惶惶不安的？

翻开一册线装的、被白蚁蛀蚀过的发黄史册，历史宿命般的千疮百孔。

东官古郡，自东晋咸和六年（331）分南海郡置东官郡，至今已历一千六百余年。但到了六百多年后的五代南汉大宝年间，在东莞的地方志上还有“象群践害庄稼，后主命官捕杀”的确

凿记载。看来这事闹得还不小，连皇帝都惊动了，亲自下令，“命官捕杀”。可以想象，中世纪的东江流域还有大片原始森林的存在，大象一类的大型野生动物还显得那么强劲活跃。但人类的拓荒和开垦无疑已经逼近森林的边缘，人类同大自然争夺生存空间的竞争也变得空前激烈，人类一开始似乎成了受害者，面对大象这样庞大的对手，人类虽然心生怨毒却束手无策。然而来自人间之王的一道捕杀令却一下激发了人类施暴的欲望，人与大象的生存竞争终于演变成了一场残忍的丛林血战。没有一个人能战胜大象，也没有一头大象能够战胜人类的阴谋。在丛林法则里，还没有哪种动物可以抵挡人类深藏不露的刀锋与暗箭。一头受伤的大象在夜里低号着，它贵比千金的象牙已被人类活生生地扳掉。一头大象倒下时会发出山河倾覆般的轰响，奔突的血水叫河流躲闪不及。整整一个朝代，河流里浸满了鲜血。秘密就在河流里，但人类毫无知觉。在那个短命的王朝，人类的暴力最终被推向了极致，东莞后来建了一座镇象塔，对此，地方志上也有十分确凿的记载，“莞人邵廷聚骨建石塔以镇之”。被镇压在这座石塔底下的，都是从各地收集来的被人类捕杀的大象的骨骸。这一座镇象塔，表明了人类在弱肉强食的生物链中对大自然的又一次伟大胜利。大地上的脚印在不断地缩小，再没有人看到大象巨大的足迹，这一地从此再也没有关于大象的消息。

东江流域的历史在异常平静中出现了大片空白，只有人类缓慢地从刚拓荒的土地上走过，他

东江与西枝江交汇



们终于有勇气走进那片原始森林，开始砍伐森林，种上养命的稻子，过上了男耕女织的恬静生活，天下太平。女人们在逝去的光阴中绣出的已是鸳鸯荷花，农夫的赤脚深陷于泥土，不能自拔。

但河流不会一直保持沉默。到了宋元祐二年（1087），“东莞知县李岩倡筑东江堤，以防东江洪水；两年后，又筑咸潮堤，防海潮侵害”。这是我在地方志里找到的关于东江洪水和防洪的最早记载。人类在与大自然第一轮的竞争中获胜之后，大自然隐秘的、锁链般的戒律终于崩溃了，巨大的洪灾在大象灭绝后的百余年后终于降临，这意味着在大象灭绝后还有一场森林的大毁灭。在东莞成为岭南数一数二的粮仓时，东江之水，也成了东江人世代的隐患，东江人在往后的历朝历代一次次地遭受灭顶之灾。明正德八年（1513）四月，“东莞淫雨，山洪暴涨，南城门外平地水深五六尺，城门及民房尽被毁坏”。除了水灾，在明嘉靖末年，这里还出现了岭南极为罕见的反常天气，有一年腊月，这里竟然下起了鹅毛大雪，“连续天阴，寒甚，白天雪下如珠，后又下如鹅毛，持续六至八日乃止”。到了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闰五月，东江又一次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大洪水，“东江水大涨，莞城东湖、城北白浪如山，民房毁坏甚多，避水者多集于城南高地”。这些孤单决绝的避水者，又该用怎样一种眼光看着，他们的亲人，他们的家园，他们的庄稼和牲畜，在洪水中被一一卷走。一切没有结束，而是



刚刚开始，在他们空虚而悲哀的眼神里潜伏的是饥荒，是瘟疫，是暴乱。几乎在每一场洪水过后，都会引发饥民的反叛，官府的镇压，东江一次次被血水染赤。这是历史的逻辑链条，也是河流的逻辑链条，但一点也不再隐秘。

很多的细节都丧失了，人类从来没有真正看清楚过一条河流，不仅仅是东江。一个民族数千年来的动荡不安无一不与河流有关。她经历生，也穿越死。从水利看中国，中国到处是水又到处缺水，中国人对水的依赖和对水的恐惧，从大禹治水之前的时代开始，数千年来一直异常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水，萌生和繁衍了中华农耕文明，而大规模的垦荒，又让中国成了世界上原始森林和湖泊湿地消失得最快的国度，连河谷、河床和那些蓄水的湖泊也都被围垦成了粮田。这无边无际的粮田，就像人类永远也填不满的巨大胃口。一旦洪水淹没了粮田，就成了人间万劫不复的灾难，但却很少有人想过，这些粮田原本就是河流的路。中国的许多河流，每一次疯狂的泛滥，几乎都是被人类逼疯的。你已经把它们的路逼得越来越窄了，逼得无路可走了，而面对洪水的泛滥，你除了把堤坝拼命筑高，越筑越高，再就是俯身向河神祈求。人类开始拱手作揖，祈愿各路神仙慈悲为怀。连人间最尊贵的王者，也在河流跟前跪倒了，他们祈求有一种比河流更强大的力量，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来镇压它们。

东莞有一座镇象石塔，还有一座镇水宝塔——金鳌洲塔。它就耸立在我黄昏时散步的河谷里，万江桥边。这样的镇水塔我不知见过多少，对于每一片经历过原始洪荒的大地，对于中国的每一条河流，它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存在。此时，残阳已在河流中化尽，却还照着对岸的塔尖。时光的错位，只因生命过于短暂。我和它隔着一条河，但我的眼光是远远不够的，那是大明万历年间的建筑，屈指一算，四百多年了，这并非多么悠远的历史，却让一个人难以抵达。我的抵达如同虚构。

大约就在一场大洪水过后，东江人为了镇住洪水，用了二十七年时间才建成这样一座九层宝塔。如果不同灾难联系起来，你会觉得这是一座纯粹建筑艺术的精品。八角形的塔身，以砖牙叠砌的美妙方式，层层递升。进入塔内，有通天石级直通塔顶，塔顶还建有塔刹。穿过它的内部，一种非常奇怪的声音，一种可能早已不存在的声音，在沉沉岁月中浩荡而来。你感觉，这塔下，或许真的有一条桀骜不驯的河流被镇在下面，那样的震动，让你觉得，它在时刻准备着迎接下一次未知的风暴。晕眩。缘着回旋的石阶，爬着爬着就晕眩了。我的根器还是不足。你得把心和意都把握住，能凝住神，能空下来，方能上升到一个高度。这个高度超过了我的想象，如同悬在半空，我再次感到了自己在莫名地颤抖。

或许，只有用一个念头压倒了千万个念头，你才能看清楚一条河。

当你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只有一条河，你终于看清了一条河流的真相。这分明是一条天性善良的河流，简单而纯粹，她的流淌是那么温驯贤



东莞金鳌洲塔

淑，温情脉脉，连每一朵浪花都那样妩媚动人。上善若水，而这分明就是上善之水啊。看着一座镇水塔，突然感到河流的无辜，你很难把她和一场又一场的灾难联系起来，然而她没有唤起人心底柔软的温情，却换来了人间最深的怨毒，很难想象这样的一条河人类居然要借神力施以镇压。洪水猛兽是真实的，剿灭了猛兽，洪水却来了，有了一座镇象塔，必然就有一座镇水塔，这又是从历史的逻辑中发展出来的一种结果。你或许还可以看得更远一点，她不会局限你的眼光，宽容也是河流的本性。你的视线可以随着她的水系蔓延开去。从这样的高度，俯瞰一座庞大无比的城市，你会看见一条条熠熠发亮的蓝色水流，她以一种神奇的穿透力贯穿了城市的骨骼，进入一座城市的心脏，如同经脉一样地环绕着城市的内心向各个方向延伸，萦绕。城市，从来就不又是一堆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物。在这座据说三天就可以盖起一座大楼的城市里，河水流到哪里，哪里便开始生长出大片鲜亮而葱茏的绿色。一座城市的气息，就是一条河流的气息，水汽充盈，淋漓尽致，你感觉这座城市还是活的，它的整个生命都被一条河流激活了。



身为人类，我总有那么多的忧虑，但许多事却并非杞人忧天。譬如说这条河，越来越浅了，浅得已经难以激起浪花，只有在流过桥墩时，才会激起阵阵水声，才有一朵两朵浪花，稍纵即逝。桥墩上，有水位曾经抵达的高度，也有退下去后的痕迹。看得清楚，东江水已经一次次降到历史水位以下。每当汛期来临，人们早已没有了那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她已经积蓄不起暴发一次洪水的力量。但是否有人担心，这条河会不会就这样枯萎下去，一直枯萎下去，直到在某天早晨你突然看不见她了？世界上有多少河流就这样从地球上消失了。河水急剧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全球气候变暖。导致东江流域自然降水锐减还有一个最直接的原因，近三十年来，有无数像我一样的外来人口成群结队地涌入东江流域，每个人来了，喝的都是东江水。东江连接江西、广东和香港三地，是香港、河源、惠州、东莞、深圳、广州这个密集城市圈里数千万居民的主要饮水资源。别的地方不说，只说东莞，这个原本只有七八十多万人口的农业县，在三十年内神奇地完成了向世界工厂的转型后，人口一度猛增到一千四百多万，一下翻了二十多倍。这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让河流一天比一天瘦弱了，瘦削得你已经能看见她的骨头，那些一直淹没在水底下的礁石，正在以残忍而尖锐的方式露出水面，犬牙交错，锋芒毕露。这是我一直不敢走得离她太近的一个原因，我总是站在一个不远不近的地方打量她，一半是真实，一半是幻象……

就在我和一条河静默着对视时，从东江的源头传来了一个消息，我曾经去过的那座原始森林，现在不再是无人区，那里已开发成了一个人间绝美的风景区，绝美！人类已在陡峭的山崖上凿出了一条条通道，沿着逶迤的山势铺垫了蜿蜒而上的台阶。在这样一个时代，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人类的脚步，直到再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去。现

在，你可以走进去了，你可以一直走到一条河流的源头，那是世界上最净的水——知音泉。她的清澈，千里之外的我也能谛听到，轻盈于天上，雪线之上。我在心里祈求，我的同类，如果你真的觉得这河流里有一个神，这水就不只清澈，不只干净，而是圣洁，每一滴水都是圣洁的。

当你爱着这个世界的一滴水时，你才会爱着整个世界。

二

一路循着东江，朝着阳光照射的一个角度，穿过岭南水汽缭绕的丘陵与平原，恍若行走在一张漂移的地图上。有一些事物正在相互撞击，相互融合，风水和阳光精巧地搭配着，满眼的潮湿发亮的翠绿，一轮轮地扑到这河流两岸，流水滔滔而花影摇曳。在流水与花影中，有一座城池像寓言一样逐渐浮现，浮上来的便是桥头。

第一次走到这里，但我感觉已来过多次。这种感觉无疑与水有关。水，在宁静地制造着某种幻觉，让我在不知不觉中进入记忆。

如果桥头是一个寓言，从一开始她就是一个水的寓言。

走进桥头，水，无处不在。这里是东江从上游的惠州博罗流入东莞境内的桥头堡。但我怎么看也觉得不是一条河，分明是一个大湖。天地间，如卧着一面无与伦比的镜子。这绝对不是我的幻觉。这里是东深（东江—深圳）供水工程的源头，一个供深圳和香港千万人畅饮的生命之源。

桥头，即桥的一端。它必将通向彼岸。这是它结构简单却极富表现力的寓意。

从这里到桥的另一端——香港，从东江到香江，八十多公里，是水连起来的。

流水一直指引着我的方向，但没有谁能踏上昨日的道路。

我站住了。当我愣愣地看着这满世界的水，

东深供水工程示意图



喉咙里竟有一种异常干渴的感觉。我知道，这可能与一个强烈的念头有关——香港频发的水危机。这其实与我无关——却总是在一次次地牵动着我的神经。

谁都知道，香港有一条著名的河流——香江。这是每个到了香港的人都想看看的河流。我也是。那天，顺着空气中飘来的一阵香味，我很快就走了过去。去那里一看，我就知道我错了。那不是一条江或一条河，而是一条很小的溪流。又或许是香港太缺水了，才把这样一条小溪叫作香江，让我们有了太多的想象。

事实上，很多人在未到香港之前，都以为香江就是香港的一条河流。这是我们对香港的误解之一。她缺的不是水，一个拥有大海的地方，怎么会缺水呢？她缺的是一条可供数百万人畅饮的河流。后来，我几乎把香港、九龙和新界跑遍了，还真没有看见比香江更大一点的河流。很难想象，现在这个世界三大天然深水港之一，竟然是由这样一条柔软的、丝绸般的小溪在入海时冲积而成。还在英国人占据香港之前，这里就是一个天然港湾，在开埠之前，她无疑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出发点。放浪于海上的水手和渔人，路过这里时，也会上岸来狂饮一顿，他们往往被水撑胀了肚子，连胡茬上也挂满了水珠子，都一个劲地叫唤着，痛快，痛快啊。这溪水甘香四溢，明蓝而干净，她的美名在大海上越传越远，一条小溪在传说中变成了一条江，又因她散发的甘香，便成了谁都知道的香江，而一个原本无名的小港湾，也就开始被称为香港。关于香港之名由来的说法有很多，这只是其中之一，也是所有的传说中我最喜欢的一个。没有这条小溪，就没有香港，直到今天，香江仍然是香港的别称，然而，她带给人的却是一种美妙的幻觉。



自开埠之后，香港从一个人口不过五千人的小渔村，迅速演变成一座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国际大都会。香江，那样一条小溪流，无论怎样甘香清甜，又怎能满足数百万人口的吮吸？干旱，缺水，一直长时间困扰着香港。港人吃水、用水，就只能靠井水、雨水、山涧、水塘和一些小水库勉强维持着，开始还能凑合着对付，随着人口与日俱增带来的巨大的压力，又有百年来频繁发生的旱灾，那点儿井水对这个远东的国际大都市、世界三大天然海港之一已是杯水车薪。从 20 世纪 20 年代起，一直守望着辽阔南海的香港，一直和内地保持着井水不犯河水的香港，不得不转过身来，重新面对她的祖国。他们的目光看得并不远，径自投向了离香港不过百里之遥的东江。只有从东江引流入港，香港才有源源不断的水源。但不知为什么，原因也许很复杂，内地数十年来持续不断的战争，香港在日本武士刀下的沦陷，无疑还有港英当局对中国的猜疑和警觉，总之，干涸的港人在差不多又煎熬了二三十年之后，一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他们才向时任中南局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求助。陶铸马上就同国务

院港澳办联系，时任港澳办主任的廖承志又马上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其速度之快如同取水救火，很快，一个从东江引流入港的工程计划，就开始进入了国家层面的运作。

中国内地显然没有港英当局想得那样复杂，上善若水，水超越了意识形态的边界，也超越了人类划定的一切边界。很快，按照陶铸的建议，广东省政府决定在当时深圳河的上游兴建一个输水香港的大型水库。1959 年冬天，深圳水库正式动工，像那个时代的所有浩大的水利工程一样，除了几台笨重的压土机，没有任何大型施工设备，但中国人有中国特色——人海战术，千军万马奋战在工地上，挖土、运土、堆土，几乎全部靠民工从家里带来的锄头、铁锹、筐箕和手推架子车。原计划，高峰时保证一万多民工参战，但眼看着雨季即将来临，为了赶在雨季前完成主副坝土方工程，时任佛山地委书记兼宝安县委第一书记的李富林一声令下，就从当地各人民公社抽调两万多名民工，以军事化的速度，三天全部进场，到达施工岗位，整个工地的总人数一下差不多达到了四万。

那该是怎样一种壮观的场面？无法想象。

很想找到一个当年的民工。我早已习惯于这样的寻找，寻找一个当年的在场者来代替我，让发生在半个世纪之前的事实重新得到确认。

一个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老人，出现在我面前，满头的白发，在阳光的照耀下，根根闪亮。这是一个硬朗、健康的老人。老汉姓林，他说，我又不是什么英雄，你就别往书里写了。那就让他处在匿名状态吧，那十万民工，哪一个又不是处在匿名状态呢？有名有姓的，陶铸我知道，但陶铸早已在“文化大革命”中冤死了；工程总指挥曹若茗我也知道，他在深圳水库建成后调往中央，但没过多久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自杀了。但无数处于匿名状态的民工却很容易找到，当年在深圳水库和整个东深供水工程奋战过的民工，据说超过了十万，大都是东莞和宝安人。十万人，哪怕现在还有一半人活着，在东江到深圳、香港的这片方圆不过百里的土地上，你在东江随便遇上的一个七十岁以上的老人，都可能在当年的工地上当过土夫子。土夫子，他们都把自己叫土夫子。

林老汉说他是第二批抽上工地的。出门时他结婚才三天，洞房的门上还贴着大红的对联。多年以后，他一直在回想，在那个电闪雷鸣的夜晚，他怎么舍得把新婚妻子抛下就头也不回地走掉了。那段岁月不同寻常，从来没有人问为什么。只要听毛主席的话，不会错。在风雨泥泞中走了一夜山路，到了工地，才发现连个遮风避雨的地方也没有，连摊开一床被窝的地铺也没有。原本只能挤下一万多人的工棚，一下却来了近四万人，而工地上从准备到四万民工按指令全部到位，准备的时间只有两三天，哪有时间搭起这么多工棚？这四万民工很快就自己动手，在工地周边的烂泥里用树枝竹竿搭起一个个简陋的小工棚，又在地上胡乱地铺上一层稻草，就算安营扎寨了。四万人，在一个早晨几乎就把四周的山林砍光了。

——老汉说着看了我一眼，那是我见过的最荒凉的眼神。

很多事，都是他后来每天都在想的事，人这一辈子，有些事不是你想记住就能记住，想忘记就能忘记的，记忆会做出自己的选择。能够记住的事情其实不多，而经常梦见的事就更少。而这个老人的一生，仿佛就深深地陷在那半年像烂泥一样的光景里了。也许，在我找到这个老人之前，他从未想过要向谁讲些什么。突然被我这个陌生人问起，老人露出不知所措的表情。我忽然感到我有些残忍，对于他们，那无疑是最苦、最累、最沉重的回忆或梦。像大多数岭南人一样，林老汉个子瘦小，但短小精悍。这样的人看起来不起眼，但他们一旦干起什么事来，一下子，突然就变得你不认得了。人都是有毅力的，而岭南人又

特别有毅力。每天，上工的号子一响，他们就一天干到晚，不歇气。到了夜里，下工的号子一停，他们拄着铁锹也撑不住自己的身体，一个一个咕咚咕咚往烂泥里栽。有的就倒在烂泥坑里呼呼睡着了。就这样，四万民工在半年时间里筑起了三十米高、一公里长的水库主副坝土方工程，这是靠人海堆起来的。

1960 年 3 月，那是老汉一生最难忘的春天，他还记得红线女在庆功大会上的歌唱，那个美啊！老汉此时张开了他只剩下了几颗牙齿的嘴，无声地瞅着一个邈远的方向，黝黑的脸上，只剩下了美滋滋的表情。此刻，看着老汉的白发白须在风中飘扬，我却想到了一个当年的年轻小伙子，他肯定在想媳妇儿了。

然而，此时离他回家的时间至少还有五年之久。一座水库再大，还得有源源不断的水源，这数万民工，还有更多的民工，将要用他们一生中的五年时间来修建东深供水工程，从东莞桥头引东江水南流入港。如果你顺着这条水路走一次，你会发现，这项工程比修建深圳水库还要艰巨数倍。先要将一条原本由南向北流入东江的支流——石马河变成一条人工运河，再把河水从下游抽回上游，逆流而上，流经司马、旗岭、马滩、塘厦、竹塘、沙岭、上埔、雁田，直至深圳水库，沿途要修建六座拦河闸坝和八个抽水站，经八级提水，将水位提高到四十六米后，注入雁田水库，再在库尾开挖三公里人工渠道，才能把东江水注入深圳水库。如果像现在一样有大型施工设备就好了。这是多余的话。在那时，十万民工只能以血肉生命来验证人多力量大是一个多么伟大的真理。那千军万马奋战的壮观场面你可以想象，哪怕是想象也会让你的心扑扑地跳动。但有些事你却无法想象，一个个民工把自己泡在齐腰深的泥水里施工，一天泡到晚，一年泡上头，不说泡上五年，不到半年，下半身就开始溃烂，疮口上的脓血里，就有无数蛆虫蠕动。有的民工一边用筷子的一端吃饭，一边就用筷子的另一端把那些白花花的蛆虫夹出来，恶狠狠地捻死。痛苦的感觉是一点也没有的，就是奇痒难忍，这种奇痒的感觉，会伴随许多人的一生……

我沉默不语。当老汉下意识地又开始在身上抓挠时，我

广东10年投80亿整治石马河



沉默不语。

半个多世纪在睁眼闭眼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其实不比那五年更漫长。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半个世纪之前的一个大型水利综合工程，我内心里充满了敬畏，又不得不敬佩。同那个时代许多在狂热的激情中匆促上马的工程相比，这是一个经得住历史考验的工程，也是在那个激情燃烧的时代考虑得特别周全的一个工程。除供水香港外，它沿途还灌溉着十六万多亩农田，排涝六千亩，每年还向沿线城乡提供三千多万立方米的生活用水。对十万民工的痛苦谁也不能残忍地漠视，但我又不能不说，十万民工的血汗没有白流，这源源不绝、阳光融融的流水，滋养着上千万人的生命。

很奇怪，在工程建设中，当年港英当局反而变得多疑起来，东深供水工程正式向香港供水的时间一再被延误。这里面可能有很多原因，发生在1963年的东江流域的大旱，无疑是一个原因，但还有很多复杂又不复杂的原因。总之，直到1964年4月，粤港双方才正式签订协议：从1965年3月开始，广东省每年向香港提供不少于150亿加仑（6820多万立方米）的饮用水，香港叫“食水”，每立方米售价为当时人民币的一角钱。这个正式供水的时间，一般也被认为是深圳水库和东深供水工程正式竣工的时间。每次去深圳，我都会去深圳水库看看，六十多平方公里的水面，看上去像一个无边无际的大湖。深圳水库库容为4577万立方米，有两条从深圳河上横跨而过的输水管，先把东江水输入深港边境木湖的接收水池，然后从香港木湖抽水站输往新界沙田滤水厂，再通过一条条像毛细血管一样的水管，流进每一个香港人的家里、肺腑里。干涸的香港人，终于可以开怀畅饮了。

然而，港英当局对那些苦难的民工几乎没有说一句感谢的话。在以资本为核心的价值观面前，这就是一桩买卖，一个双方必须严格恪守的协议。



但不管怎样吧，干涸的香港人从此再也不愁没水喝。后来，东深供水工程又扩建了三次，现在已将供水量增至 17.43 亿立方米，最大提水能力每秒约 69 立方米，其中 11 亿立方米原水供港，另向深圳供水达 4.93 亿立方米，沿线灌溉用水 1.5 亿立方米。而随着香港人口的增长比预期少，又加之香港工业区北移，香港一度从水危机变为了水过剩。由于供大于求，香港在 1998 年至 2003 年期间，把价值超过三十多亿港元的东江水白白地排入大海，这不仅是水资源的浪费，这都是白花花的银子，是香港纳税人的钱。此事引发了香港公众的强烈谴责，港府只得再次向广东省求告，双方重新订定了弹性供水协议。这也又一次表达了只有内地才有的豁达和理解。只是不知道，如今的香港是否还把这看作一桩单纯的买卖?

但有些事实我觉得没必要隐瞒。对于东深供水工程，港英当局可能想得太多了，难免心情复杂。那时候，香港不仅是英国在远东的最后殖民地，也是横亘在西方和东方的一道壁垒。但他们别无选择，中国太近了，而英国太远了，远水救不了近火。在东江水源源不断地供应香港时，港英当局因为他们复杂的心理，一直不敢过于依赖东江水，他们一度想通过海水淡化工程来解决香港六七百万人的饮用水，并在 1975 年建起了海水淡化厂，终因成本过高，香港老百姓用不起，才于 1982 年关闭停用。半个多世纪以来，东江水一直是香港第一大水源。

而今，昨日的土夫子们已经苍老，又在苍老的岁月中早已被人遗忘。遗忘，其实是人类存在的最好状态。沉默寡言的岁月，一个沉默寡言的老人早已儿孙成群，却有一种深沉的孤寂。现在，他坐在一条河流边，就像一个多余的人。他再也不用肩挑手提地上河工了，他的子孙，那些土夫子的

深圳河



后代们，也不用再像自己的父辈那样上河工出死力了。现在的水利工地上，几乎看不见人，一些在过去岁月颠扑不破的真理，正在被现代化的大型施工设备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推倒重来。但岁月中，毕竟还有一个老人这样长久地看着，看着这条河，白色的水鸟，娓娓而来的鱼群，还有像我一样漫游在江河大道上的游人。这里已经是风景了。这其实是很多河边老人的习惯，就像我的老父亲一样。只是，那双浑浊不清的老眼，必须戴上老花镜才能看清楚，这里，还是不是他洒下了五年汗水的那条河？

在水一方，忽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一阵阵清香被潮湿的风吹来，又吹去。

我立刻嗅到了，那是荷花。而荷花，是必不可少的，清水出芙蓉，濯清涟而不妖。荷花是桥头的象征，也是桥头的一个节日。二十顷莲湖，让桥头芳香四溢，这是我也是很多游人来寻芳的缘由。二十顷莲湖有多大？不由抬头一望，万千荷花顷刻间笼罩了我的视野。这无数荷花尽管有着千姿百态，但每一朵荷花都是清晰的，就像一滴水那样清晰，只要你仔细看，低下头，你就能看到心里去。在荷花面前，我早已丧失了比喻的能力。没有任何一个比喻可以比喻荷花。她的美，超过了所有的比喻。最好的方式，就是用心去看。很多香港人来桥头，不为别的，只是来看桥头的荷花。这样才好，心里没有什么别的念头，于是单纯，于是纯真。这样你才会发现，一朵莲花的身影也充满着人的神态。眼下，还没到荷花绽放的季节，小荷才露尖尖角，全都是一副微闭着眼祷告的样子。

暗自想，一朵荷花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人类也许不知道。但人类应该能够虔诚地感觉到，那种无比清纯的力量。只有荷花，才能让世界变得这样干净。

三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香港人能喝上东江水，是东江流域的无数民工用命拼来的。

又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几乎所有喝东江水的人都把自己下意识地当作了东江儿女，把东江当作了和自己血脉相连的一条母亲河。但你要说东江是香港人的母亲河，他们绝不领情，他们没有这样多情，更没有这样矫情。他们和东江的关系，绝非儿女与母亲的关系而是资本与“食水”的关系，这和我们掏钱买瓶装水喝是一个道理，绝没有人会把瓶装水和母亲联系在一起。你不能不说那些个香港人比我们更理性，更懂得资本与“食水”的普世价值，在香港人面前千万不要滥用一些有太多感情色彩的词语，否则，你立刻就会看到他们满不在乎的神态，甚至会露出讥讽的笑容。

还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在东江水日夜不息地流向香港时，这与人类相依为命的水，也给港人带来了另一种危机。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东江水污染就开始困扰着香港人。为了避免东江水在流经的沿途受到污染，1998 年，广东省政府向港方建议，修建一条全长八十三公里的封闭管道，从东莞桥头东江水源地直达深圳水库，这样可以避开石马河流域对输水系统水质的影响。这一耗资 49 亿元的东深供水改造工程，其中约一半资金由港府免息贷款，分二十年摊还。该工程于 2000 年 8 月动工，第一期管道，长五十公里，由东莞太源至深圳雁田水库，已于 2003 年 6 月正式启用。

然而，在东深供水工程密封管道落成一年后，一个叫“绿色和平”的香港环保组织在 2004 年 3 月 18 日至 19 日的两天之内，分别在密封水管的入口地带抽取了三十二个源头水样本，该组织随即发布消息称，其中大肠杆菌超标三千多倍，还有部分样本发现水银等致命

的重金属，他们做出了一个令人作呕的结论，东江水“污染程度犹如粪水”。这个结论一度引起港人的极度恐慌，也煽动了港人普遍存在的某种情绪。不过，香港水务署很快就对这份报告予以强烈反驳，他们说：“我们根本不用反驳，我们有数字！”根据水务署的化验报告，自密封水管2003年春天启用后，他们在当年7月起至2004年3月，多次在位于香港边境的木湖抽水站抽样，发现密封水管投入使用后比使用之前的大肠杆菌大量减少，每升水含量大跌31.7%，氨氮含量更急跌84.6%，这些数据反映东江输入香港的水质不但没有降低，而且有非常显著的改善。他们据此重申，东江水可安全饮用，让香港七百万市民放心。

这两种分别由官方和民间做出的截然不同的结论，让港人也是满脑子疑团，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严重分歧？又到底应该信谁的呢？还是一些香港学者显得比较理性，在分析之后，他们如是猜测：这很有可能与近期枯水期有关。香港大学地理系副教授吴祖南分析说，冬天水落石出，东江水大为干枯，污染物就比全年平均数高许多。这就是说，由于季节和气候的影响，在个别月份东江水水质可能会特别差，这也会对市民生活构成影响，他建议港府应该每月公布水质报告。“绿色和平”总干事廖洪涛也承认水质可能只属季节性恶化，但是水务署为清理净化饮用水，必须采用更多化学物料进行消毒，市民最终会把这些化学物质喝进肚里。他还批评，自密封管道启用后，邻近东江、受严重污染的石马河，水量急降，每遇潮水涨退，就会倒流至东江中游，严重污染东江源头。

尽管“绿色和平”的数字里明显有些偏激和夸张的成分，但广东省水利厅也坦率地承认了东江支流石马河的污染，不是严重，而是极严重，他们正在抓紧制订整治污染的计划。

坦率的承认比遮遮掩掩好。石马河的污染程度是有目共睹的。一条石马河从深圳宝安龙华镇大脑壳山流过来，在河谷里浑浊地流淌着的污黑的液体散发出刺鼻的臭味，几乎看不出水的丝毫光亮，唯一发亮的东西就是漂浮在河流上的塑料垃圾袋。很多人不叫它石马河，叫它“黑龙江”，乌黑的河流就像一条黑龙。三十多年前的石马河不是这样子，那时的石马河流域，在明媚的阳光下呈现出来的是碧绿的原野、满山遍野的果园和偏居一隅的岭南民居。可惜，那缓慢而宁静的乡村田园风景，在三十多年的岁月里早已被无数工厂和坚硬的钢筋水泥建筑掩没。现代化的坚硬的阳光，到处发出金属的响声。这石马河畔的每一个乡村，曾经的乡村，现在的身份无疑都是复杂的，比所有的时代都复杂。在行政区划上它们仍然是乡村，但当你走进这些到处都是高楼和高架桥的乡村，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乡村，还是城市？是小镇，还是都市？你已经无法为这样一片土地定义。这里的土地正在被水泥一块块地吃掉，这里的河流里也能看见繁华的大街与楼群。一个桥头，现在每年就能创造出四十多亿元的财富和六亿多美元的外贸出口额。在这样一个地方我走得很慢，我只能以萨特式的眼光，迷惘而怀疑地打量着这里正在发生的一切。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十年，一股股乌黑发臭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直接就排进了石马河里。转而一想，若没有这最初十年的以污染为代价的原始资本积累，也许就没有三十多年来中国最发达的南部沿海经济带和惠、莞、深、港经济走廊，更没有今天的桥头。

污染的不只东莞，还有更严重的深圳河、布吉河。深圳的经济实力，差不多是东莞的两倍，然而在对深圳河、布吉河的治理上，深圳也是历经多年治理没有明显的成效。而深圳还时常有意无意地向东莞转嫁危机，尤其是东莞与深圳两市的界河，更多是来自深圳的污染。这让东莞人很气愤，他们说，深圳把满街的乞丐用卡车拖到了东莞，扔下不管了，深圳把污水排

到了东莞，也不管了。深圳算什么？早多年前不就是东莞的一个小渔村吗？这话，说得有些偏激有些情绪化了，这又确是东莞老百姓的说法。但深圳官方是不会这样情绪化的，而是表现出了一种理智上的清醒。2011 年 9 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小川率省人大代表来到东莞和深圳之间的界河观澜河、石马河交接断面处查看，发现深圳段的河水又黑又臭，而东莞段则是清水流淌，两座城市，同一条河流，泾渭分明。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深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吕锐锋向广东省人大代表视察组诚恳道歉并表达了深圳对东莞的道歉：“我们对不起东莞，把污染物都排到了东莞。”

我们对不起东莞！在东莞人的印象中，这也是深圳有史以来第一次对东莞说了一声对不起。不过，东莞人并不会因此而瞎激动，他们是务实的，听其言，还得观其行。吕锐锋也做出了郑重的承诺：深圳市将立即采取五大措施，把观澜河治污的主要责任承担起来，争取明年年底实现观澜河交接断面水质明显改善。这五大措施是：一是一个月内完成观澜河应急污水处理设施的改造升级；二是一年内建成观澜河污水处理二期、龙华污水处理二期，新增四十万吨污水处理能力；三是根据汛期情况，设两到三个污水调蓄池；四是准备将清湖人工湿地旁边的一块面积较大的菜地改成人工湿地；五是富士康已建成五千吨匈牙利水质净化技术的设施，在此基础上，沿线再建一到两个万吨的深度净水设施。

有人说，这是还债，深圳人必须还他们这么多年欠下的债，他们也还得起。事实也是这样，在积累了雄厚的资本之后，人类又开始每年以数十亿计的资金给东江还债。为确保供应港澳充足的水量和良好的水质，早在 1995 年，广东省政府就成立了东深水质保护领导小组，负责对供水工程水质保护的协调工作，还专门成立东深水质保护监理站，负责东深水质保护的监督、检查和协调工作。近年来，广东省先后在东江流域建设新丰江、枫树坝和白盆珠等一系列水量调节枢纽工程，并对其实施以防洪与供水为主的调度运行方式，实现了东江水量的多年调节，保证供香港的水量需求。为了严格控制水污染，广东省一直在加强对东江流域建设项目的严格管理，但石马河依然是东江流域一条久治不愈的污水河。

> 东江人，桥头人，其实没有太多的想法，他们始终保持一个纯真的念头，让每一个香港同胞都能喝上一口好水。

除了石马河的污染，还有东江中上游的河源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东江从河源市穿境而过，长达两百五十余公里，一条东江，河源差不多占了总长度的一半。东江水质如何，东莞、惠州、广州、深圳和香港两千多万名居民饮用水的水质如何，一大半要看河源的水质如何。河源必须做出牺牲，他们在工业、旅游业上均受到严格的限制，这也让河源市成了东江流域和珠三角地区一个经济滞后的县级市。尤其是新丰江水库四周的河源居民，为了保护东江水资源，他们只能做出牺牲，只能眼看着别人开工厂、搞旅游，他们却什么也不能干。至今，这里还有二十多万人生活于贫困线以下。这在沿海地区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发展是硬道理。发展对于这些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老百姓也同样是硬道理。他们的活路到底在哪里？自 2006 年以来，他们终于找到了一种摇钱树，突然开始大量种植作为经济用材的尾叶桉。大片野生的、原生态的森林被人

类的植树造林所取代，这些善良、憨厚的老乡们并不觉得他们在毁灭什么。事实上，很多中国的老百姓到现在还不十分清楚，这样大面积种植某种单一的树种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他们觉得，他们还在植树造林，就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了。他们并不觉得他们在毁灭什么。短短几年，东江中上游河源一带的原生态森林就这样被毁掉了，很多不能作为经济用材的野生杂树大都被连根铲除，只有满山遍野的桉树在疯狂地生长、蔓延，大量物种正在灭绝，或已经灭绝。这是比工业、旅游业更具杀伤力的生态大破坏。有人预测，如果没有一种力量来阻挡这种单一物种的疯长，过不了多久，东江水源很可能遭遇断流的灭顶之灾。

大自然的生物链一旦被破坏，人类社会的生物链也必遭受破坏。

现在，香港特区政府已与广东省人民政府设立了紧急通报机制，对任何可能影响东江水质的事故都能在第一时间通报对方，以便实时采取适当的防控措施和相应行动，确保东江对香港的供水安全。

船到桥头自会直。这又是关于桥头的一个寓言。没有谁比桥头人更相信这一句老话。

而桥头，兴许是值得很多人来看看的一个地方，不只看风景。为了让一条河流从悲伤和绝望中走出来，桥头近年来投资数亿元，对境内河流水系采取了一系列生态修复和生态重建。二十顷莲湖和东江堤岸景观的营造，对河涌清淤和调水冲污等综合整治，极大地提升了河流水系的生态净化系统。而桥头人在治水治污的过程中，也把这一小片灿烂的土地打造成了集观光旅游、文化休闲、商住开发于一体的生态休闲特色区，人与自然在这里得到了真正的山水兼容、和谐共处。大自然不应该作为人类的背景而虚设，而对大自然的保护，也不能逼仄人类的生存空间。

风流水转，水泊桥头。而今，一条翠绿的河流，正从这里荡气回肠地流过，就像我此刻正在行走的江河大道。这里的水，清清亮亮，如清晨凉爽的井水，真干净啊。这是我在岭南三大水系中见过的最干净的水，干净得可以洗濯自己的肺腑。你可以试一试，亲口品尝一下。掬水而饮，一饮而尽，就能听见自己鲜活的心跳。只是，别太激动了，别惊飞了荷叶下那只白色的水鸟。想到那些香港人每天喝着这样的水，身心该有多么舒畅。东江人，桥头人，其实没有太多的想法，他们始终保持一个纯真的念头，让每一个香港同胞都能喝上一口好水。

每年春汛，那个姓林的老汉都要在这条河里捞起一些从上游漂来的浮渣，又放下一些鱼苗。这不是一个老人晚年的闲情，而是如今桥头人的一种习惯。鱼群如水，比水更明亮。桥头人的眼光，好像就是在追逐这些鱼群的身影时，逐渐变远的，越来越明亮的。

桥头，很小，只有五十多平方公里，像寓言一样短小。如果桥头真是一个寓言，我希望她不是假托的故事，也不只有劝诫，唯愿动物、植物或自然界的其他事物都是这个地球村里人格化的主角，但愿这样一个借小喻大的寓言，被广泛讲述。

对这个小镇我心存感激，我喝的也是东江水。我能感觉到自己心中的许多东西，正在一点一点地变得纯净，变得豁达。走进桥头，走进这里的风土和流水，感觉如同经历了一次内心故乡的漫游。只要还能够和一条干干净净的河流走在一起，我就觉得是最大的幸福，自然，也有许多难以言说的滋味。

此时，漫天的阳光化入水中，化入我心中难以名状的悸动。

深沉的脉动

广东当下诗歌创作状况

文 世宾



世宾，广东作家协会文学院专业作家、广东省诗歌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东荡子诗歌促进会会长，“完整性写作”主要倡导者和理论阐述人。部分诗歌被翻译为英语、日语、俄语、葡萄牙语等发表。著有《批评的尺度》《梦想及其通知的世界》《大海的沉默》《迟疑》《伐木者》等多部文论集、诗集。主编有《完整性写作》。

1990 年前后，这是广东诗歌现代性转换形成规模的转折时期。这一时期的重要标志是民刊《面影》发表大量全国的先锋诗人和广东前卫诗人的作品，并在广东开放地区的诗人间广泛传播。在此之前，像中国诗歌发展历史一样，广东现代诗歌的现代性有过发轫和回潮的过程。李金发、梁宗岱作为中国新诗初期的风云人物为广东新诗奠定了现代性的基础，他们把象征主义法国一脉的兰波、波特莱尔、瓦雷里，以及德语的里尔克以翻译和中国化的形式带入这片沉睡的大陆，同时也在广东影响了一批后来者。1949 年之后，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成为写作的主流，并在某种程度上强制着诗歌语言的探索和对社会、历史生活的更深邃的介入，赞颂之声成了必然的写作道路。这一情形直到新时期文学的开始才有了改观。广东新时期文学领风气之先的是小说和批评，以 1982 年戴厚英的《人啊，人！》在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出版和 1983 年《当代文坛报》的创刊为代表，在全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引领了一个时代的风尚。而诗歌相对于北京、贵州、四川，新时期广东诗歌的影响力要相对滞后，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运动，广东诗人的缺席便是一个证明。对于这个问题，也有另一个看法，第三代诗歌大展是徐敬亚 1986 年在深圳的《深圳青年报》与安徽的《诗歌报》联合发起的，这也是广东作为第三代诗歌运动前沿的标志。但这个运动没有在广东诗人群里形成广大的影响却是一个事实。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随着高考的恢复，现代主义意识重新在高校圈里萌芽，黄灿然、陈少华、温远辉、刘子乐、马莉、朱子庆、尚均鹏、汪国真等人在暨南大学、华南师大、中山大学等广东高校创办高校学生诗歌刊物、进行“实验性”诗歌写作；官方作协和文化机构也同时有一批诗人努力从固有的意识形态写作中挣脱出来，赋予诗歌以现代主义精神，如野曼、林贤治、郑玲、郭玉山等人，他们的诗歌努力想反映当代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但由于精神资源的匮乏或写作惯性的作用，在写作技巧和世界建构的现代性转换上并不彻底；同时，在民间还有一批人依借办民刊、结诗社的形式，形成诗歌团体，如广州的沈绍裘、江城，汕头的冰俊、凡斯、林济昌，江门的吴迪安，茂名的赵红尘、浪子，当然也包括深圳的徐敬亚、王小妮、丁当等人，在铁板一块的传统现实主义写作氛围下打开一个现代主义写作的缺口。他们愤世嫉俗又不乏尖锐的发现，他们努力又颇为冒险地在进行着语言和精神的实验。他们的出现有如一群揭竿而起的草寇，虽然无法改变现有的格局，但也有如星星之火，在广东各地点燃了“先锋诗歌”的烽火。他们是小众的，但也扮演着青年先锋的角色，在青年诗歌的小群体里，他们有如池塘里的鲶鱼，时时搅动起一阵小小的喧哗。

回头眺望，广东的诗歌写作在静寂的表面下，依然应和着中国诗歌的脉搏。虽然朦胧诗运动和第三代诗歌运动在全国的范围看，除了中山大学的尚均鹏临时组建了个两三人的“小城诗派”，并没有广东诗人立于潮流浪头的影子。尚均鹏等人的写作也在离校之后由于工作原因或个人选择趋于停止的状态。这个现象可能与广东的民风性格有关，他们温和，并不习惯于激烈和呼啸的身姿；另一个原因就是在此之前有强大的官方传统方面的作家，他们在作协、出版社和媒体有着重要的位置，他们的观念无疑对新生的诗歌构成了制约。缺乏发表平台，缺乏呼应的激情，这可能是广东诗歌现代性转换滞后的时代原因。虽然第三代诗歌运动是由刚从吉林大学来到深圳的徐敬亚所发起，那时他和王小妮、丁当、吕品贵、海上等人已经来到了

深圳，但一时间还没在广东本土的诗坛激起波浪。我没有把徐敬亚在 1986 / 1987 年的第三代诗歌运动在深圳的举旗作为广东诗歌现代性的转变的标志，是因为在广东由革命现实主义主导的写作局面并没有因它而改变，而是由来自广东本土的民间刊物《面影》，而让具有现代性的精神渗透到广东诗歌的内在结构——这一原因所判断的。但我们不能否认，他们的存在日后依然成为广东诗歌最具有潜移默化影响力的重要力量。

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后，广东由于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吸引了全国各地的青年才俊汇集过来，同时也激活了全省各地的诗人群体。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到 21 世纪初，广东各地民刊和网站、论坛有如雨后春笋、百花齐放、此起彼伏，广州的《面影》《返回》《错位》《南方以南》《诗歌年鉴》《诗歌与人》《中西诗歌》《完整性写作》《一刀文学网》，深圳的《诗生活》网站、《飞地》、《大象》，东莞的《打工诗歌》，潮汕的《九月》，梅州的《射门》《故乡》，韶关的《五月》，湛江的《红土》，茂名的《女子诗报》，阳江的《南鲨》，等等，这些民刊和网站聚集了大量诗人，并促使了广东大地的当代诗歌写作保持持续的写作热情和创新热度。诗歌呈现出一个多元、多维，在技艺和思想、语言维度上不断探索的局面。在这个过程中，民刊起着重要的作用，形成了一个个诗群和流派；催生出一大批在全国颇有影响、各具风格的年轻诗人，如江城、杨克、东荡子、世宾、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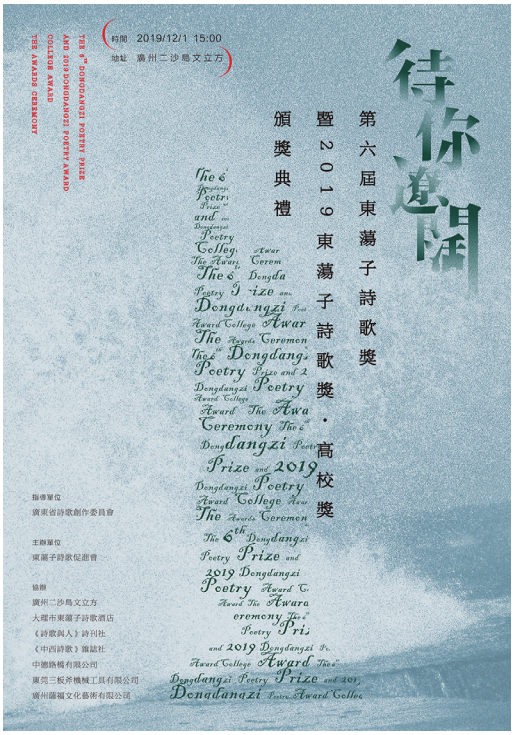
陈肖、黄礼孩、梦亦菲、东荡子、阿西、世宾、巫国明，2007年12月12日于增城



浪子、黄礼孩、老刀、晓音、黄金明、凌越、杨子、安石榴、梦亦非、林馥娜、莱耳、张尔、谢湘南、陈计会、陈轲、陈仁凯、黄昏、丫丫、阮雪芳、雪克、卢卫平、华海、方舟、汪治华、郑小琼、余丛、傈僳、游子衿、刘汉通、吴乙一、阿翔、陈会玲、唐不遇、唐德亮、谭畅、杜绿绿、冯娜、吕布布、布非布、舒丹丹、向卫国、张德民、谢有顺、杨汤琛、李俏梅、陈芝国等人。

这些诗人和评论家大多数都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崛起的一代，基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视野开阔，有比较丰富的知识背景，对社会生活有比较深入的洞察。他们在方法、语言、诗歌世界都有各自的探索；及基于不同的知识结构和社会认同，他们会选择不同的诗歌路径，这也为丰富诗歌的不同面目，建设多元、多维的诗歌生态打下了精神性的基础。在广东，所有的诗人都可以坐到一张桌子上的，他们可以为不同的社会立场、不同的诗歌观点、不同的语言方式、不同的诗歌路径、不同的批判方法争吵不休，但他们不会因此而反目成仇。友谊和诗歌是他们交往的基础。友谊是因为交往的人有趣、性情相投，诗歌是对友谊的深化，让交往的朋友能够不断去思考和探索更深邃的东西。

《待你辽阔》颁奖典礼海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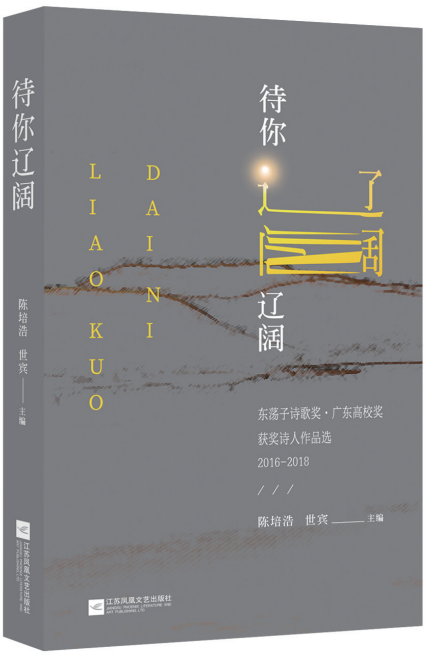


广东是个开放的地方，也是经济最早发展起来的地方。全国和世界许多优秀的诗人都来过广东工作、学习、交流，广东就这样迎来送往了一批批诗人，广东诗人也就这样与中国其他地方的诗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前些年，广东各地的诗会加起来每年召开不下百次，广东有几个重要的文学奖项，如“东荡子诗歌奖”、“诗歌与人奖”、《南方都市报》的“华语传媒文学奖”和《羊城晚报》的“花地文学奖”，清远的“刘禹锡诗歌奖”都以各自的独特品位赢得良好的口碑。这也有机地成为广东诗歌生态的重要部分。

评论家朱子庆曾经描述过广东诗歌的构成，他说广东的诗坛十分开放、包容，具有全国所有流派的写作，高的、具有精神性的写作有“完整性写作”，低的、肉体的写作有“垃圾派”。他的粗略描述总体来看是准确的。在全国学术界和民间具有比较大的影响的并具有特色的，归纳起来大概有三类：一是以“完整性写作”为代表的强调精神性的写作，如“完整性写作”强调写作的“首要任务就是对创伤性生活的修复，使具有普遍性的良知、尊严、爱和存在感长驻于个体心灵之中，并以此抵抗物化、符号化和无节制的欲望化对人的侵蚀，无畏地面对当前我们生存其中的世界，通过对现实的评判而抵达人的完整，以人的完整照亮现实的生存，直至重建一个人性世界”。这种倾向的写作在广东有较成熟的理论、创作实践，不少民间刊物的办刊方向都是在这个维度上；甚至包括几个有影响的大奖都是这个倾向，它的理念在广东许多地区有广泛的诗人基础。二是“打工诗歌”，

这是在20世纪80年代因为广东的特殊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在特定的人群中产生的写作现象，它在文学和社会学的范畴对应了时代的生活。打工诗歌的出现被作为某种社会样本被不同领域的目光所关注。作为左派文学，打工诗歌还有巨大的空间可以挖掘。三是“低诗歌”现象，这是一种以自贱、自残、自我贬低的方式去解构他们置身其中的世界，以获得自我的解放和批判性效果的诗写，他们大多数以口语化语言进行写作，在广东以垃圾派和脑残体写作最为活跃。

在广东的当代诗歌写作史上，英年早逝的东荡子是无法忽视的一位开拓性的诗人。东荡子早年参与发起“完整性写作”诗歌运动，他在2008年诗歌方向开始调整，开始进入《阿斯加》系列的写作。他的这一系列作品，为中国诗歌在诗意空间的开拓树立了典范，他是中国诗歌境界美学的开拓者。百年中国新诗一直都在现实和历史的空间里抒写，那是诗性的维度，而诗意的维度是海德格尔定义的“诗人不关心现实，只耽于想象，并把想象制造出来”的那个面对时代“深渊”而具有神圣性的世界。东荡子在他人生后面几年，已清醒地意识到那个世界的存在，并努力创造出来。虽然只有少量的几十首，但已经明晰地启示了在汉语诗歌中那个诗意的世界存在的可能。他的写作也激发了广东一批诗人在这个方向上



《待你辽阔》 陈培浩 世宾 主编

的努力。广东诗人由此成立了东荡子诗歌促进会，举办了“东荡子诗歌奖”，出版了《完整性写作》（注：《完整性写作》2003年创办时以专辑的形式在《诗歌与人》上发表，2019年才独立创刊），并且在理论研究和诗歌创作实践也不断获得成果。这无疑为中国诗歌理论和诗歌写作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也必然成为广东诗歌写作新的发力点，结束广东诗歌在全国诗歌潮流中也步也趋的局面。

近些年来，90后一代和一些后起之秀也逐渐进入诗坛的视野。他们大多数在高校接受高等教育，在书籍和互联网的滋养下，视野开阔，写作起点较高；加之社会对他们较为关注，很多年轻诗人已经浮出水面。如《作品》开设的有关90后栏目，“东荡子诗歌奖”的广东高校奖，都在努力推举新人，如刘振周、蒙晦、黎衡、沈渔、林程娜等人的崛起。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必将成为广东诗歌的中流砥柱。

对于广东诗歌的演变、生态和诗学倾向的描述，目的在于让读者感受到广东诗歌的内在活力。广东诗人每个个体的写作量总体看来并非十分巨大，但写作的持续性和探索的热情几十年间却从未减退，多元并进、生机勃勃的诗歌写作土壤无疑滋养和孕育着广大的诗人，他们的成长并在里面催生出一两个大诗人也并非不可能；这无疑也考验着他们的精神世界的建构力和写作的持续力及专注度。



鸿雁于飞

——追寻唐前岭南的文明进程

文　陈桥生

陈桥生，1971 年生，江西遂川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粤派批评·陈桥生工作室”负责人。主要研究领域为岭南文化与六朝隋唐文学，已出版著作《唐前岭南文明的进程》《刘宋诗歌研究》《小窗幽记评注》《南方，南方》《陶渊明》《韦应物》等。现供职羊城晚报社，获广东新闻最高奖“金梭奖”等。

“岭南”这个概念，长期以来就是身处中原者对南土的指称，是他者建构和使用的概念，因而天然就带有着某种不解、猎奇，以至排斥的色彩，是中原文化优越心理的直观反映。“古人云：五岭者，天地以隔内外。”五岭阻隔的不仅是自然地理意义上的内外，也是化内与化外之别。

因五岭而起的化内与化外之别，在历史的进程中，是如何一点点被突破，又一步步走向交融，最终使岭南文明与中土文明汇聚成华夏文明的浩荡潮流，正是岭南文明史研究的哲学根本问题：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本文拟对唐前岭南文明发展的进程进行简要梳理，探讨中原文明是如何经由不同文人群体的引入而泽被岭南，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文明的推衍，以及岭南文明又是如何反过来渗透影响于中原文明。

一、第一次正面交锋

在历史上，第一个从中原踏足岭南这片土地的著名文人，非陆贾莫属。

陆贾（约前240年—前170年），汉初楚国人。在高祖刘邦和文帝刘恒时，他两度出使南越，说服赵佗臣服汉朝，对安定汉初局势做出极大的贡献。他也是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他的到来，对于岭南这片土地，仿佛自天而降的一段因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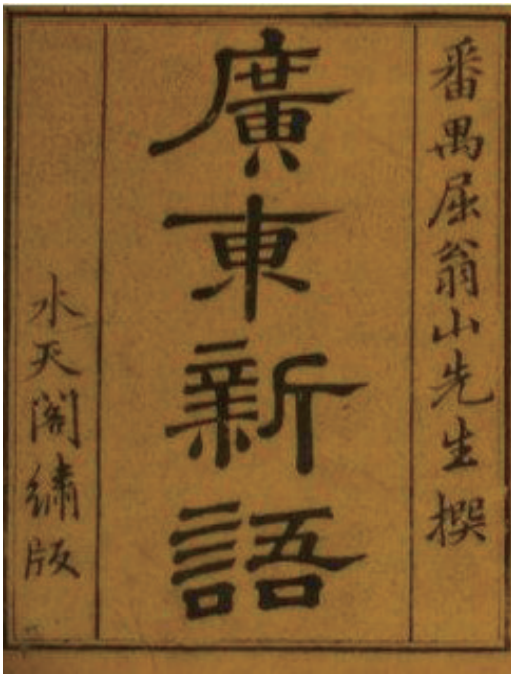
陆贾之前，朝廷对岭南实施的政策是开边用兵，武力征服。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年），率秦兵逾岭的将领是屠睢。屠睢的做法是残酷、暴戾的镇压，直至丧师陨身。继任者任嚣与赵佗，便汲取了教训，调整了政策，和辑越人。公元前206年后，赵佗平息南越地方部族，底定岭南。又趁刘项争霸中原无暇顾及之机，在南海诸郡北部边界及沿南岭山脉诸孔道完成布防，自立为王，定都番禺，建立南越国。赵佗称帝是在公元前204年，至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南越国灭，共传五世93年。南越政权是古代岭南第一个割据政权，就其统治时间之长，及其对后世影响之深而言，都远非后来的南汉和南明两个割据政权所能比拟。

对南越立国，汉朝起初采取的对策只是把岭南之地“遥封”给越族功臣，为南越树敌，以此加以牵制。是以，刘邦封番君吴芮为长沙王，封地为长沙、豫章、象、桂林、南海五郡，其实后三郡都在赵佗的实际掌握之中，吴芮只是得个“虚封”而已。封是封了，能不能真正据有之，就看你自己的本领了。事实上，由于赵佗修武备，据岭固守，受封者始终无隙可乘。

到了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为一统江山，刘邦着手打破这一僵局。

首先是公开颁诏肯定赵佗在岭南的作为及功绩，释放善意。然后派陆贾出使南越，赐赵佗玺绶，立为南越王。于此，《汉书》记载中一笔带

《广东新语》 屈翁山（屈大均） 撰



过：“使陆贾即授玺绶。佗稽首称臣。”仿佛这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之事，这边一授玺绶，那头便稽首称臣。然而，这一笔略过的历史，其实潜藏的是说不尽的刀光剑影、波诡云谲。

陆贾奉命带队乘坐官船前往南越，来到番禺城外登陆，但赵佗初时对刘邦的和平政策并不领情，迟迟不与接洽。据清代学者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陆贾初至南越，筑城于番禺西浒以待佗，名曰陆贾城。其遗基在郊西十里，地名西场……盖贾之所尝经营者也。”[①] 筑城以待，可见是经过了不短时间的等候，才最终使赵佗感化，从而接见了陆贾。

《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中生动详细地记载了陆贾第一次出使岭南，及其与岭南君主赵佗的斗智斗勇。陆贾是楚人，深知南越的内情，又是有名的辩手。赵佗，秦东垣县即汉真定县（今河北正定县）人，原为秦朝将领，与任嚣南下攻打百越，为首任龙川县令。面对赵佗的傲慢，陆贾一见面就一针见血指出其“足下中国人”的身份，却“反天性”，弃仁义礼智信于不顾，给了赵佗一个结结实实的下马威。

双方唇枪舌剑，机锋四起。从“魋结箕倨见陆生”到“蹶然起坐谢陆生”，再到“大笑”、“大悦陆生，留与饮数月”，最后“赐陆生千金”，一系列的行为动作，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在陆贾的凌厉攻势下赵佗前倨后恭的心理变化全过程，让我们仿佛又领略到春秋战国时期著名辩士的机智风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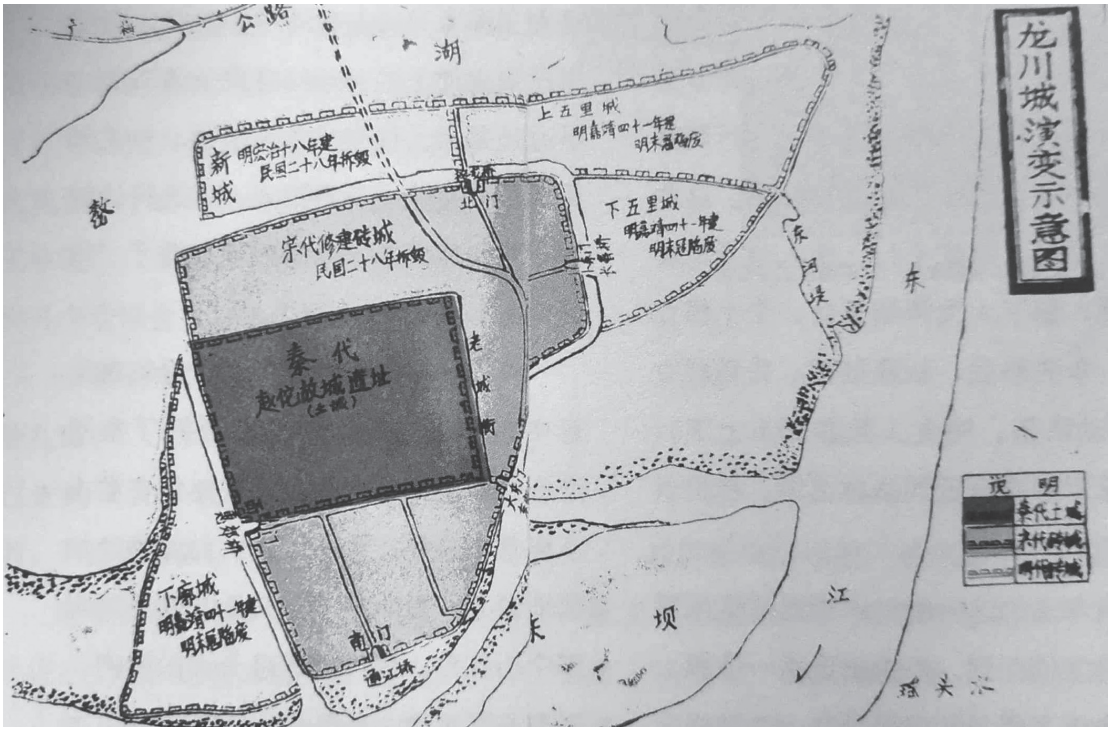
这是“礼义”对“蛮夷”的一次说服，是中原文明与岭南文明最早的一次直接对话与正面交锋。交锋的结果，使割据而治的南越，重新纳入到大汉帝国统一的版图之中。中华民族的统一强盛是数千年来无计其数的有识之士勠力奋斗的结果，而汉、唐两个盛世为祖国的统一与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陆贾以其出色的外交才华，为汉王朝的统一，为南越文明的发展，贡献了杰出的智慧力量。

据说，赵佗当年常常登上越王台遗址，恭敬地遥望文明的北方，潸然泪下。《番禺县志》载，赵佗并在其旁筑有“朝汉台”，每岁朔旦辄望汉而朝。那里有他的家乡、亲人，有他的先人冢、宗族祠，是他的根脉之所在。虽割据南越，然血浓于水，遥望北方，百感交集，能不泪下？这是文化的力量。“足下中国人”，陆贾对赵佗这一身份的确认，必然深深地触动着这位北方将领的深沉的故国之思。想来，这也正是赵佗能最终答应归汉的最深层的文化根源。虽然割据南越，虽然赵佗还娶了一位越女为妻，但他的内心依然是“中国人”，也因此人们通常认为是赵佗将汉语和汉语文学引入南越，因此视他为华人文化与蛮族文化的伟大融合者。[②]

陆贾在南越滞留了数月之久。史书曰：“乃大说陆生，留与饮数月。曰：‘越中无足与语，至生来，令我日闻所不闻’”。赵佗表达的是一番相见恨晚之慨。这其中或有客套的成分，但史书的记载，绝不会只是因应客套。“越中无足以

① 屈大均撰：《广东新语·地语·西场》，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43-44页。今天在位于广州市东风西路的广州发电厂内，还保留有一块关于陆贾的碑石。这块碑石是陆贾的后人于1932 年1月建成。据悉，这里原本有一座陆贾纪念亭，里面有三块碑石，中间一块碑石刻着“开越陆大夫驻节故址”，左碑刻为《广州澳溪开越陆大夫驻节故址碑亭记》，右碑刻着捐资者姓名。“文革”中，三块碑石的左右碑被毁，独“开越陆大夫驻节故址”碑，以及纪念亭的底座和一根柱子得以保存。现在这块碑石和广州发电厂传达室的背墙联结在一起。有考证以为，当年陆贾登岸的古码头，位置应该就在发电厂立碑处附近。所谓“开越”，有开辟、启蒙、沟通的意思，是后人对陆贾的尊称。

② 转引自薛爱华著，程章灿、叶蕾蕾译：《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年版，第34页。



龙川城演变示意图

语”，当是实情，也是促使赵佗归汉的重要的潜在因素。“至生来，令我日闻所不闻”，这才是真正的点题，透露出数月间陆贾在实际从事的工作，那就是与赵佗反复地进行交流和说服。上面详细记载的交锋场面，更适合视作一次典型描写，这样的交锋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陆贾需要滞留数月，需要无数场的交锋激辩，才得以最终完成使命。

那又是什么“语”令倨傲的赵佗“日闻所不闻”？史书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细心的读者，却并非没有线索可寻。紧接着上面引述的《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的下一个段落，记载的是陆贾对高祖倾心阐释的《诗》《书》，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的理论，统而言之，就是陆贾《新语》十二篇的要旨。这两段文字完全是互文见义的。陆贾对高祖所言，肯定也就是他对赵佗所说的主要内容。陆贾所言，令高祖连连称善，左右连呼万岁，也就难怪更要让赵佗惊为“闻所不闻”。

身为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的陆贾，之所以会被选出使南越，就是因为他的这套理论深获高祖赏识，那么当他面见赵佗，要极力以他全部的学识才华说服赵佗归汉时，运用的必然是也只会是这套理论。若论马上得天下，或许汉越间还存在一比高下的可能；若论马下治天下的理论，则南越唯有俯首称臣的份。

武力的征服，激起的往往是更强烈的反抗，更尖锐的对立。思想文化上的交流，在当时至少是暂时赢得了赵佗的信任，缓和了汉越间的对立、对抗，建立了松散的隶属关系。汉廷以通使物、开关市换取南越贡物“驯象”、“能言鸟”（鹦鹉）等，维持着官方的往来、表面的一统。其次，便是从文化上将南越纳入到了中原文化的体系中来，以礼义文明感化粤人“相攻击之俗”，“使和辑百粤”，创造相对融洽的民族氛围等。

二、《南越行纪》透露的信息

陆贾使南越，将中原的儒家文化、技术文明带入岭南，同时，也必然会把岭南的风物人情介绍回汉地，从而加深彼此的沟通了解。

陆贾两次出使南越，且滞留时间都不短，游历颇广，无论是政治所需，或是文学之寄怀，都要求他不能不有所撰述。他回朝复命后撰有《南越行纪》，惜乎早已不存。仅存的几则，是晋嵇含《南方草木状》中所引用的文字，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南越行纪》应即是陆贾出使南越时的笔记，记述这一带的地理位置、风土人情。

《南方草木状》所引用，其一是记载罗浮山上的胡杨梅和山桃。其卷下“杨梅”条曰：

杨梅，其子如弹丸，正赤。五月中熟，熟时似梅。其味甜酸。陆贾《南越行纪》曰：“罗浮山顶有胡杨梅，山桃绕其际。海人时登采拾，止得于上饱啖，不得持下。”东方朔《林邑记》曰：“林邑山杨梅，其大如杯碗，青时极酸，既红味如崖蜜。以酝酒，号梅香酎，非贵人重客不得饮之。”

嵇含引述了两则前人对杨梅的记载。陆贾所记罗浮山，仙道之气十足，记罗浮山环境既清幽，而海上来客又时登采拾；东方朔所记其形其味，以及其酝酒之功用，充满人间的生活气息。林邑在今越南中部，秦汉时为象郡象林县地。可见这里提及的两处杨梅的产地都在南越。从古至今杨梅就以其独特的色、香、味而广受世人青睐。

罗浮山距离广州有一百公里左右的路程，在当时恐怕也不是一个轻易能到达的距离。陆贾使游至此，窃以为或有祭拜名山大川之缘故。恰如泰山封禅一般，作为使者的陆贾，一定也是承担着祭祀岭南名山大川的使命。这是一种礼仪，也是一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宣示。身为使臣的陆贾，其使命就是要劝服南越归心，所以踏访南越高山大川，就成为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罗浮山顶有胡杨梅”透露给我们的信息，陆贾不仅到访了罗浮山，而且登上了罗浮山顶。他的登顶，是为欣赏山色景致吗？更可能恐怕是要在山顶举行祭拜仪式。陆贾在《南越行纪》中专门记述之，也是向皇帝的一种述职。此外，如广州番禺的大夫山，据说因山顶经常云遮雾掩，山色朦胧而被称为“大乌岗”，后为纪念陆贾大夫而改名大夫山。如今大夫山上，还建有大夫阁、大夫书院等。很可能，周围重要的名山大川，陆贾都曾作过踏访祭祀，他是代天子在对南越山川宣示管辖权。

如今的罗浮山顶，杨梅山桃已杳无可寻，也许是历史的误会，也许是沧海桑田所致，但无论如何，陆贾的描述使我们对两千多年前的罗浮山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而山顶遍绕杨梅、山桃的动人景致，是不是也足以对此后一代代文人隐士们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呢。经过晋代嵇含等人的不断引述，尤其是葛洪于此隐居修炼，罗浮山作为道教名山的名声越来越大。

除了到罗浮山的游历，《南越行纪》也记录了岭南的花草、风俗人情等。同样是嵇含《南方草木状》，其卷上“耶悉茗”条曰：

耶悉茗花、末利花，皆胡人自西国移植于南海。南人怜其芳香，竞植之。陆贾《南越行纪》曰：“南越之境，五谷无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者，缘自胡国移至，不随水土而变，与夫橘北为枳异矣。彼之女子以彩丝穿花心，以为首饰。”

这段话透露给我们的至少有两层信息，一是南越接受外来影响之早，二是南越之人于花之欣赏喜爱程度。

花卉，既非奇珍异宝，亦非生活必需品，仅是点缀观赏之物，却早在两千多年前，已自西国

引入，则其他物种，更可想而知。上文中所曰“罗浮山顶有胡杨梅”，可知此杨梅也自西国引入，且于罗浮山顶已有大片种植。如此多的物种品类来自于西国，南越当时的外来交往与贸易繁盛程度，绝对可以以“震撼”二字来形容。其时间之早与程度之深，并不逊于与岭北中原的交往。亦足以证明人类文明的往来交流，并没有想象中的滞后和困难，互通有无是古而有之，即便是大洋、国别也阻隔不断。而对于外来事物的接纳，其开放的心态等，于南越这片土地，也可谓融化于其血液之中，是与生俱来的。陆贾虽只是出使至此，但他却是敏感的，片言只语便敏锐地抓住了此地独特的种种现象。

所谓耶悉茗花，专家考证就是素馨花。末利，即茉莉花。由于对这两种花的芳香尤其喜爱，南越之人很早就竞相种植之，而且佩戴者繁，逐渐发展成一种行业。屈大均《广东新语》载：“南人喜以花为饰，无分男女，有云髻之美者，必有素馨之围。在汉时已有此俗，故陆贾有彩缕穿花之语。”“东粤有四市……一曰花市，在广州七门，所卖只素馨，无别花，亦犹洛阳但称牡丹曰花也。”③

两千多年来，岭南对鲜花的钟爱，从未衰减过，“彼之女子以彩丝穿花心，以为首饰”，后世多以为便是岭南人之爱花，并最终形成花市之渊源。

陆贾描述当时的南越，是“五谷无味，百花不香”，也许是其优越心理下的一种真实心理感受，也许是他想强调外来花种的独特性及其对南越的重要性。从“五谷无味，百花不香”，所以发展到后来的穗城和花城，如耶悉茗花、茉莉花等外来物种的引入，显然功不可没。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具体而微到一草一木，也是有迹可寻的。这还是两千多年前的情形，而两千多年来的交往交流，无疑更加全面、更加深入，既有地理环境的客观因素，也有接受心理的内在驱动，这正是岭南常常领风气之先的根本原因所在。

三、西汉徙合浦

史载最早被贬徙岭南者，为西汉成帝（前33年—前7年）时京兆尹王章的亲属。据《汉书·王章传》记载，王章以敢直言名，成帝时被选为京兆尹，因得罪当时辅政的帝舅大将军王凤，“遂为凤所陷，罪至大逆……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

自王章家属之后，西汉末年至东汉前期，史载贬徙岭南者，集中成批出现，且几乎清一色都是“徙合浦”。除王章案例外，几乎都是因于宫廷的政治争斗中落败而为王莽所贬。王莽称得上是第一个将贬徙手段运用得登峰造极的弄权者。

王莽是汉成帝母亲王政君的侄子，他在西汉末年社会危机四伏的背景下，以大司马大将军的身份掌握了朝廷大权，一方面笼络人心培植党羽，一方面对政敌严刑以待，手段相当残忍粗暴，动辄“家徙”“皆徙”，将其部属同僚、举家男女老幼徙往最遥远的合浦，使之远离中土，为自己的改制扫清障碍。

从史载徙合浦者的身份看，都是出身于权贵阶层，光是“侯”爵就有六七位，还有王后、大夫、太守、京兆尹等，都是当时在朝廷中掌握实权的人物，炙手可热，却由于政治的争斗，一夜间从权力最核心的地方，贬徙到了最偏远的海角之地，从权力的最上层沦落到了罪囚的境地，其心理的落差与打击之大绝非常人所能理解。

当然，史家之笔无暇顾及于此，不会给失落者的心理情感留下哪怕一字一句的表达空间，但其字里行间依然为后人透露出，他们的到来，对于当地的开发，起着不容小觑的作用。

《汉书·王章传》：“大将军凤薨后，弟成

③ 屈大均撰：《广东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97、48页。



广东罗浮山花手寺

都侯商复为大将军辅政，白上还章妻子故郡。其家属皆完具，采珠致产数百万。时，萧育为泰山太守，皆令赎还故田宅。”王章妻徙合浦，在阳朔元年（前 24 年）冬，而王凤病死于阳朔三年（前 22 年）秋八月。可知她们留在合浦的时间，大致两年左右。在此不足两年的时间里，王章妻一个弱女子，一个流迁之人，却不仅让家中老小得以“完具”而还，而且“采珠致产数百万”，骤然间发家致富，成为岭南史上第一个女百万富翁，着实令人惊异。

这与王章妻的聪慧能干密不可分。《汉书·王章传》只有简短的 517 字，记述其妻子的篇幅字数，甚至超过了王章本人。其中记载的三件事例，为我们描绘出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形象。

其一，在王章困厄未显之时，牛衣对泣，其妻呵怒之曰：“京师尊贵在朝廷人谁逾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

其二，及王章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当知足，独不念牛衣中涕泣时邪。”

困厄之时激其奋起，得意之日诫其知足，是为贤妻。

从王章最终的结局下场回看，就更能见出其妻于人情世故方面的练达。王章为王凤所举荐，事后却非议弹劾王凤，借日蚀之象，上奏封事，言凤不可任用，宜更选忠贤，为凤怨恨之深切可想而知。倘若当初他能听从妻子的忠言，止奏封事，作为个人，他至少是可以逃过此劫的。

其三，“小女年可十二，夜起号哭曰‘平生狱上呼囚，数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刚，先死者必君。’明日问之，章果死。”小女聪慧如此，可见教导有方，良母之功也。

贤妻良母若此，终无力阻止憨直的王章一意孤行，并最终走向毁灭。只是在王章死后，在万里之遥的合浦之地，她才像合浦珠一般，发出了熠熠夺目的光辉。我们甚至不知道她姓甚名谁，但笼罩在她身上的神秘之光，却让千古而下的人们思索感叹不已。

在《汉书》的记载中，一句“徙合浦”后，大多没了下文，他们流徙到岭南后生活状况如何，也都不得而知。但从发生在王章妻身上的事实来

看，流徙者在当地还是有相当的生存空间。

西汉时的南越，更多还是一块未被开发的处女地，一旦它与较高的生产力相遇，必然爆发出更大的能量。这些徙合浦者，都有着较好的出身，文化修养较高，有丰富的人生阅历。而且他们流徙的时间也比较集中，多在王莽当政期间，他们在流徙前有的就属于同一个阵营，因共同的遭际一同流徙到万里之外，自然会抱团取暖，更添一份惺惺相惜，这对于他们的立脚、生存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因为他们的到来，他们的才智、物力，对于当地文明的开发必然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王章妻能很快发家致富，更是得益于合浦采珠业的兴盛，是这个繁荣的产业有以致之，她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商机。

合浦素以盛产珍珠闻名。在秦统一以前，即已经开始采集。据称，由于汉朝派驻合浦的太守一度贪得无厌，搜采无度，使珍珠濒临灭绝，以致连珍珠都对贪官不满，纷纷迁往其他海域了。《后汉书·孟尝传》记载孟尝任合浦太守时，革除前弊，与民休息，实施有限度开采，使珠母有繁殖的余地，外逃的珠母遂又纷纷回迁合浦，这就是合浦“去珠复还”的故事。可见，当时的人们已懂得开采需要适度，对大自然要心存敬畏，否则便要遭受自然的惩罚。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 111 年）平定南越国后，将岭南原来的南海、桂林、象三郡重新调整扩充为九郡：南海、苍梧、合浦、郁林、珠崖、儋耳、交趾、九真、日南。《汉书·地理志》在叙述至此时接着写道：“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由此可见，随着岭南新郡的设立，当时从中原来到这里的，已经有大量的“往商贾者”了。而且这些“往商贾者”，大多可谋取到富利，可以想见当时物产交易的情形之活跃。天下熙熙，皆为利来，有人在这里发财致富了，必然刺激越来越多的商人前来淘金。从这一点来看，王章妻子的“采珠致产数百万”，或许就不显得那么突兀惊异了。

合浦商业贸易的发达，又是直接与汉武帝设置合浦郡后即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息息相关，是因于它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始发港，是这条海上交通线的桥头堡。

由合浦沿北部湾西海岸南下抵达东南亚和南亚，与通往西亚、非洲和欧洲的航线相接，由此构成连接欧亚大陆的交通大动脉。与此前汉武帝委派张骞于建元三年（前 138 年）出使西域开辟的陆上“丝绸之路”遥相呼应。海上丝绸之路的港口、沿岸，便成为人们淘金的热土。

合浦郡辖五县：徐闻、高凉、合浦、临允、朱卢。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秦汉岭南部分标示，合浦郡北与郁林、南海二郡为邻，南接交趾郡，东南面临南海。徐闻相当于今广东海康县，高凉相当于今广东茂名、电白一带，合浦相当于今广西钦州、北海及玉林市南部，临允相当于今广东新兴，朱卢相当于今海南琼山县。西汉末，儋耳、珠崖两郡相继撤销，设珠崖县，“遥领”原儋耳、珠崖两郡事，也隶属合浦郡。因此，汉代合浦郡相当于今之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及海南。

汉代的厚葬之风，给合浦留下了一个规模宏大的汉墓群，是当年合浦的繁荣在考古学上留下的有力证明。其中，风门岭是合浦汉墓群八个墓葬分布密集区之一。据考古发掘研究，风门岭汉墓乃至整个合浦汉墓存在明显的缺环，合浦汉墓还没有西汉前期的墓葬，递至中期，也仅初步确认一座，大量的墓葬出现在西汉后期及其后。其可能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西汉前期合浦地处南越国的边远地区，人烟稀少；二是汉墓群附近亦即现县城位置并不是始设郡县时的中心。而大量的墓葬出现在西汉后期及其后，其随葬品的丰富程度甚至超过广州汉墓，

可以见出合浦自西汉后期起即开启其高度繁荣的历史。④

徙合浦者到达徙所后，也只能在当地定居。除个别侥幸得还者外，如王凤死后，王章妻子得还，其他大多都只能是客死异乡。合浦成为大多数流徙者的人生归宿地。汉哀帝时宠臣董贤的父亲董恭，老年被流徙，最后死在合浦，葬于黄姜岭下。据考，合浦黄姜岭下有董公墓，就是董恭的墓地。

依常理推断，留存合浦汉墓中的，应不乏流徙者。合浦汉墓群集中在西汉末年以后，与流徙合浦者集中出现于西汉末年，不会是简单的巧合。汉代边郡长官除极个别从当地选用外，多数是由中央从内地派往的。这些官吏，但凡有条件的，一般都在生前告老还乡；即使死在任所，也要不惜千里跋涉，移柩原籍，归葬旧茔。甚至在战争中战死的将士，也都“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归”（《汉书·严安传》）。有的罪人即使已埋在流徙地，一旦平反，恢复名誉，仍要迁灵柩或捡遗骨回原籍。只有那些落籍异乡，不允许迁回故郡的罪人，死后才埋葬于当地。⑤

于是我们看到，在秦汉之时，从“谪徙民”到“往商贾者”，再到这些“徙合浦”的王公贵族，一批接一批的中原人，从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来到了岭南，推动着岭南政治、经济、文化向前发展。合浦的繁荣就是最生动有力的例证。贸易是文明的标志，对于物质文明如此，对精神文明亦如此。贸易直接促进了合浦的经济繁荣发展，也使得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思想观念等各种信息能够广泛传播、交流碰撞。随着贸易的不断深入，尤其是此后更多饱学之士的到来，文化意义上的交流互动也便越来越丰富生动。

四、东汉徙交州

相对于西汉，东汉的流徙情形，已有了很大的变化，具体可概括为四个方面：

其一，流徙地由合浦扩散开来至整个交趾，更远及于最南边的九真、日南（均地处今天的越南境内）。政治的争斗，冤冤相报无时了，但抹去了历史、个人的恩怨情仇，流徙所及，便是文化的流播所及。流徙者以其满腹的才华，就像一座流动的图书馆，被迫迁徙到了帝国最僻远的文化角落，愈行愈远，无远弗届，譬若阳光，不遗忘任何一个角落，譬若文明的种子，播撒一路，从而在荒远的土地上也开出鲜丽的花来。

其二，更多的人是早年流徙此地，其后不少都得以返回到内地，从单向的流贬逐渐过渡到有了双向的交流。他们辗转多地，从江东到南海到苍梧，正如文化的摆渡人，把饱受战乱蹂躏的北方文明渡到相对安宁的岭南，又将岭南从相对落后渡向更高的文明；他们又像是燃灯者，把文化的点点星火散播于岭南大地，播种在一个个“生徒”心中。代代相授，开枝散叶，将岭南的文化教育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打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对于岭南的文明开发所起到的示范效应可想而知。

其三，东汉末期起，不少人为避乱而来到岭南，尤其是建安元年（196 年）孙策破会稽之后，“皆走交州以避其难”，成为不少江东士子的无奈选择，迎来了一个士子南下的高峰。又由于是吴郡会稽等地，东面既已被孙策大军封锁，海路遂成为这批士人们进入岭南的主要途径。一大批东吴文人南来，而且他们来到交州后，陆续都聚集在了交趾太守士燮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的岭南学术集团。

---

④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编著：《合浦风门岭汉墓：2003—2005 年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2页。

⑤ 蒋廷瑜《再论汉代罪犯流徙合浦的问题》，见蒋廷瑜著：《桂岭考古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213 页。

其四，更多的到来者都是饱学之士，不唯彼此间的相互切磋，他们开始在这里大量招徒授业、著书立说，文化的交流从自发走向自觉状态。刘熙之所以在苍梧南海之间往返讲学，就是因为士燮的大本营在苍梧，以苍梧、南海为中心，辐射至交州大部。“客授生徒数百人”，既可见出其时岭南之地的从学氛围已颇具规模，而刘熙等人的辗转讲学，更为之推波助澜。

也因此，汉晋前后岭南的学术文化得到极大的提升。尤其是在当时的交趾治所地苍梧，形成了以太守士燮为中心、刘熙为学术核心的最早的岭南经学中心；出现了牟子《理惑论》这样的佛学开山著作；随着虞翻之南迁，《易》学也在岭南获得新的发展。儒、道、佛思想文化都在这里播撒下种子并开花结果。

我们且以牟子所著佛教著作《理惑论》为例。

汉末中原多故，南荒遂为避乱之地，牟子也是将母避世交趾，与之前后，来自北方的异人、学者不在少数，他们肯定带来了不少内地的典籍，因此此时的交州，经传诸子之书籍靡不齐备，中华学术乃渐兴。当时社会动乱不止，州郡相疑，隔塞不通，而太守以其博学多识，使致敬荆州，学术文化的交流，却可以打通州郡之间的相互隔塞。尤其是，交州为东西海程之中心，因能吸收异教殊俗，且被中华教化未久，思想比较自由开发，汤用彤先生评曰：“牟子生平学问信仰，兼收并蓄，常有转变，实充分表现五方杂处、交通频仍地方之精神。”

《理惑论》共 39 章，首章一般称为序传，最后一章称为跋，正文共 37 章。全书均采用自设客主进行问答的形式展开，所假设的问者是个来自北方的儒者，他昔在京师，入东观，游太学，视俊士之所规，听儒林之所论，未闻修佛道以为贵，自损容以为上，佛教提出种种疑问和责难；而设置的答者是牟子，牟子引经据典，逐一加以解释或辩驳。在一问一答之间阐述了佛教的义理，以图论证佛、道、儒观点一致。

“问答体”是汉代散体大赋的重要特征，“主客问答”被普遍地用于赋作之中，几乎成为文体赋的标签。问答之成为文体特征，除了与先秦以来的多种形式对话的文化积累有关外，还与问答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行为方式有关。来自北方的儒者发问，牟子则一一作答，这既是本土儒道文化与外来佛教文化的一次对话，也是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一次对话。

当时佛教在社会上刚刚流行，一般人并不太了解。牟子“欲争则非道，欲默则不能”，于是有此《理惑论》。作为外来的宗教与学术，要想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扎根，就必须借助中国原有、且在当时流行的学术来诠释来传播，才易为人们所理解接受。牟子用容易理解的《诗》《书》等内容来讲解深奥难懂的佛经道理，由近及远，以浅喻深，这就是后来所谓“格义”之说的先声。

牟子教人守恬淡之性，观无为之行。以《老子》之要旨，譬佛学之所说，谓佛道在法自然，重无为，因其重澹泊无为，而视道家养生之术为诬妄。汤用彤先生认为牟子之信佛道，盖亦有会于《老子》。汉代佛教，附庸方术。魏晋释子，雅尚老庄。牟子适为过渡时代之人物，认为儒道释三家在思想上是可以共存共融的，辟三教合流之先河。牟子《理惑论》，为中国佛教史上重要之一页。

《理惑论》全文采用北方儒者与牟子一问一答的形式展开论说，也正可以视作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一次对话操练。大量的北方流徙者集于交州，与本土居民、学者的思想文化的冲突在所难免，甚至说，中原文化的优越感，中原文化对岭南文化的怀疑与责难，是必然存在的。所以，牟子的一一辩驳，就不仅是为佛教文化的自辩，也正可视之为岭南文化的自证，是对当时思想文化界的混乱状态的厘清与校正。

如其中一章：

问曰：佛道至尊至大，尧舜周孔曷不修之乎？七经之中不见其辞，子既耽诗书，悦礼乐，奚为复好佛道喜异术？岂能踰经传美圣业哉？窃为吾子不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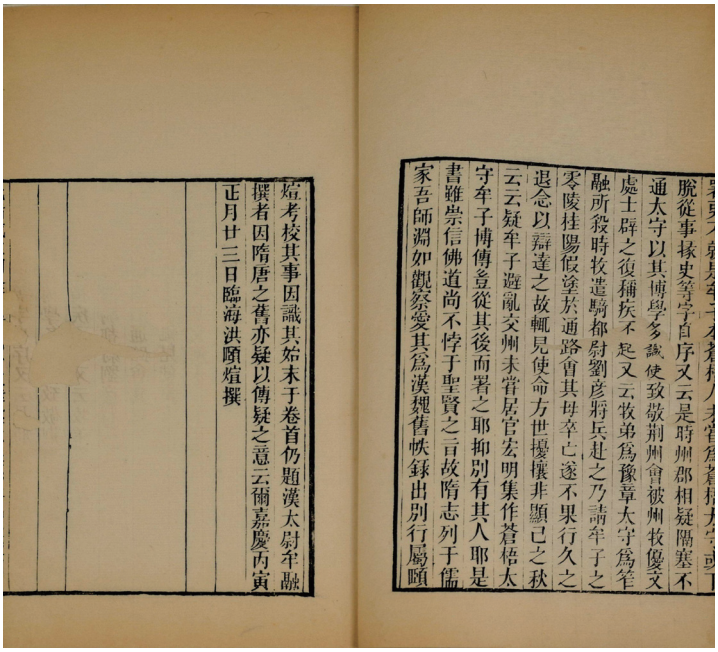
牟子曰：书不必孔丘之言，药不必扁鹊之方，合义者从，愈病者良。君子博取众善以辅其身。子贡云：夫子何常师之有乎？尧事尹寿，舜事务成。且学吕望，丘学老聃，亦俱不见于七经也。四师虽圣，比之于佛，犹白鹿之与麒麟，燕鸟之与凤凰也。尧舜周孔且犹与之，况佛身相好变化，神力无方，焉能舍而不学乎？五经事义，或有所阙，佛不见记，何足怪疑哉？

在中原文化视尧舜周孔为正经，佛道为异术的背景下，岭南的牟子却直称，书不必尽是孔丘之言，药不必只认扁鹊之方，合义者从，愈病者良，只要有道理的我们就遵从，能治好病的都是好药方。这在中原儒家正统文化看来，无疑是离经叛道的。然而，岭南牟子却针锋相对，没有固执拘泥，博取众善以辅其身，择其善者而从，思想自由开放，兼容并包，岭南文化的包容与务实，最早可以在这里找到明确的理论依据。牟子曰五经事义，或有所阙，比之于佛，犹白鹿之与麒麟，燕鸟之与凤凰，引经据典，鞭辟入里，则已经是为岭南文化超越中原文化张目。

东汉末年，以士燮为核心的交州学术，昙花一现般绽放出夺目异彩，虽然为时不长，但对儒道释三教合流观点的形成是关键的起步。在这个时期的交州成长、生活的士人，更把这样的思想观念带到了各地。学者黄栢权总结岭南佛教传播的轨迹是：源于扼两广要冲的封开，渐移三江总汇的广州，北上南北交通重镇韶关，然后扩散到全国。推动这个进程的重要人物是牟子、康僧会、怀迪、拘那罗陀、惠能及其弟子们。[6]这条佛教传播的轨迹，也基本上契合了岭南文化重心的发展轨迹。

在中国思想文化与学术的变迁史中，汉晋之际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急剧变革的时代。如王国维先生在其《汉魏博士考》中考述了当时博士制度演变后所指出："学术变迁之在上者，莫剧于三国之际，而自来无能质言之者，此可异也。"汤用彤先生也称："汉魏之际，中国学术起甚大变化。"这变化中，自然包含着佛教文化的进入，也包含着岭南文化的登堂

《理惑论》


脫從事掾史等字自序又云是時州郡相疑隔塞不
通太守以其博學多識使致敬荊州會被州牧優文
處士辟之復稱疾不起又云牧弟爲豫章太守爲笮
融所殺時牧遣騎都尉劉彥將兵赴之乃請牟子之
零陵桂陽假塗於通路會其母卒亡遂不果行久之
退念以辯達之故輒見使命方世擾攘非顯己之秋
云云疑牟子避亂交州未嘗居官宏明集作蒼梧太
守牟子博傳豈從其後而署之耶抑別有其人耶是
書雖崇信佛道尚不悖于聖賢之言故隋志列于儒
家吾師淵如觀察愛其爲漢魏舊帙錄出別行屬頤
煊考校其事因識其始末于卷首仍題漢太尉牟融
撰者因隋唐之舊亦疑以傳疑之意云爾嘉慶丙寅
正月廿三日臨海洪頤煊撰

⑥ 黄栢权：《岭南佛教传播的轨迹》，《学术研究》1997 年第8期。

入室。

五、杨孚及其《异物志》

世事的发展，常常超乎人们的想象。历史刚刚步入东汉不久，在岭南的天空下，一位杰出的本土人物便横空出世，他就是杨孚。

杨孚，字孝元，南海（今广州）人。其所著《异物志》，是粤人著作见诸史志的第一家，是岭南的第一部学术专著。然而，这样一位人物，我们既无从考究他出生于何时，也不知道他去世于何时，横空出世，不知其所自，不知其所终。好在，凭着一部《异物志》，他在天际划出的那道炫目的光彩，却永久地照亮在后人心中。

《异物志》 杨孚 撰



杨孚早年致力攻读经史，钻研颇深。东汉章帝（76—88年）时，他以贤良对策入选，授议郎。汉代诏举贤良，主要是表示广开直言之路。察举贤良是依照皇帝诏令的规定，由公卿诸侯王、郡守等高级官吏举荐，送至朝廷，皇帝亲自过问，分别高下，授以官职。在汉代所有察举科目中，皇帝对贤良方正一科极为重视。故曰，论轻重以贤良为重，论得人以孝廉为多。清仇巨川《羊城古钞·卷六·人物》有一简短传记，记载了杨孚几次主要的议政、奏对：一是反对轻率用武，二是主张廉政，三是讽切“竞事珍献”。于中不难见出，杨孚在议郎位上是颇有作为的，对一系列重要的朝廷国事，杨孚都有自己独到的见地，有胆有识，称得上一位具有政治卓见并敢于直言谏诤之人，故史有“世服孚高识”之赞誉。或可以说，不仅在职位上，杨孚已经可以与朝廷百官平起平坐；在见识上，他也完全可以与他们不分伯仲了。

生于当时的岭南，对于中原文明，却有着超乎寻常的领悟与理解。这份领悟与理解来自何方？一定是来自于他从小受到的教育与熏染。或许，对于儒家文明，于当时属蛮荒之地的岭外，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陌生与隔阂。前面述及

的刘熙等人，动辄数百的生徒，也足可证当时人们的向学之心。杨孚的出现，不可能平地骤起风雷，而定有微风起于浮萍之末的根源。

相传，杨孚晚年卸职后返回广州老家定居，住在珠江南岸的下渡头村，返乡时专门从都城河南洛阳带回来几棵当地的松树，并栽种在自家花园中，即现在杨孚井的位置附近。有一年冬天，这几棵松树上居然铺满了茫茫白雪，这在广州是从来未见的怪事，老百姓感到非常诧异，认为是杨公的品行感动了上天，因而将杨孚的居住地称为“河南”，并尊称他为“南雪先生”。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地语》中，明确指出了珠江之南所以称为“河南”，其典故乃出自杨孚种松：

> 广州南岸有大洲，周迴五六十里，江水四环，名河南。人以为在珠江之南，故曰河南，非也。汉章帝时，南海有杨孚者，举贤良，对策上第，拜议郎。其家在珠江南，常移洛阳松柏种宅前。隆冬蜚雪盈树，人皆异之，因目其所居曰河南，河南之得名自孚始。岭南天暖无雪，而孚之松柏独有雪，气之所召，无间远迩，雪其为松柏来耶？为孚来耶？予诗云：“能将北雪为南雪，为有苍苍自洛来；松柏至今虽已尽，花田尝见雪花开。”

岭南天暖无从见雪，而竟可以随杨孚而至，那还有什么是不可以随之而来的呢？故事虽为荒诞，但它所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是，对于洛阳、岭南两地，这都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意义非凡的事情，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杨孚之南返，为中原文明在岭南的传播贡献至伟，带给岭南的影响，亦可谓之深长矣。唐朝以前，“河南”作为地名特指今洛阳市及附近地区。如今，广州海珠区内还有不少如“万松园”“南雪巢”的地名，都是典出于此。不仅是“河南”的地名，以及其松柏，其飞雪，都随着杨孚而来，几乎就成了中原洛阳的一块飞地，是中原文明撒播在岭南之地的一颗文明的种子。“能将北雪化南雪”，“花田尝见雪花开”，随杨孚而至的“北雪”，在岭南已经化作一树一树的“南雪”花开，这是一幅多么令人激动的画面，一个多么诗性十足的表达，一个如此贴切形象的譬喻。这是一份眷恋，也是一份仰慕。

亦如韩愈之于潮州的“赢得江山尽姓韩”，杨孚在广州也享受到了“赢得井坊尽姓杨”的礼遇。清番禺人罗日章《汉议郎杨孝元宅》诗咏道：“遗井犹闻故老传。”杨孚的品学颇为时人所推崇。深邃的古井，涵咏着千年的美名，代代相传。这与他身为岭南地区晋升朝官的第一人，著有岭南第一部学术专著《异物志》有关，也当与其晚年的南返密不可分。他的晚年南返，或有叶落归根之心，或是以讲授生徒著书立说报效家乡，总之他的开创岭南文化之功为历代后人所仰崇。杨孚以其独特的经历与学识，对于岭南文明与中原文明的融合，对岭南文明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文明在彼此的交流互动中不断融合提升，《异物志》的横空出世，就是杨孚融合两种文明的具体成果。

六、刘宋朝的集中贬徙

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大分裂大混乱的时期。比起岭北的叛乱不断，王朝更迭频繁，岭南的经济社会发展要平稳安定得多。在文化方面，岭南的发展也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时期。虽然并没有出现大的文化名人，也不见当地人的重要撰述著录。但在江东文化的辐射下，尤其是随着大量贬谪、流寓文人的南来，岭南文化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借由这些南来文士，岭南文化得以高起点地接续上南朝主流文学的发展，而随着他们对岭南的文学书写在不断丰富，在主流的文学书写中得以逐渐建构起岭南的文学形象。

综合《广东通志》及诸史书所载考察，南朝

时流寓岭南之著名文士不下二三十人。包括如刘宋时期的王叔之、谢灵运、谢超宗、何长瑜、顾迈、沈怀远、谢纬、张融、徐爰，南齐时期的刘祥、范云，梁陈时期的王僧孺、范缜、柳恽、萧子范、徐伯阳、谢暇、章华、江总、阴铿、岑之敬、袁敬等人。择其要者列表如下：

朝代	人物	流寓岭南时间	去向	缘由	有关岭南存作
晋宋之际	王叔之		罗浮山	避难，往依广州刺史王镇之，筑室罗浮山	《游罗浮山诗》《拟古诗》等
宋（文帝）	谢灵运	433年	广州	徙付广州，诏弃市	《岭表》《岭表赋》《临终》
	谢超宗	433年—元嘉末	广州	随祖父谢灵运徙广州	
	何长瑜	？—444年	增城	嘲弄义庆府僚，除曾城令	
	谢纬	约445—455年	广州	坐舅范晔反，徙广州	
	顾迈	449—453年	广州	因泄密为同僚所陷，徙广州	“鸿飞”句
宋（孝武帝）	沈怀远	约454—464年	广州、始兴	坐纳妾，徙广州	《南越志》
	张融	463—467年	封溪	上建新安寺，独俪百钱，出为封溪令	《海赋》
宋（明帝）	徐爰	467—472年	交州	于上不敬，徙付交州	
齐	刘祥	永明初	广州	撰《宋书》讥斥禅代，徙广州	
	范云	496—499年	始兴、广州	出为始兴内史、广州刺史	《酌修仁水赋诗》
梁	王僧孺	503—504年	广州	出为南海太守	
	范缜	505—508年	广州	坐亲结王亮，徙广州	
	柳恽	509年	广州	出为广州刺史	
	萧子范	545年前后	始兴	出为始兴内史	
	徐伯阳	548—557年	广州	避侯景之乱，浮海至广州，依于萧勃	
陈	江总	551—563年	始兴、广州	避侯景之乱，往依萧勃	《衡州九日诗》《经始兴广果寺题恺法师山房诗》《贞女峡赋》《秋日登广州城南楼诗》《别南海宾化侯》《遇长安使寄裴尚书诗》《南越木槿赋》等
	阴铿	555—559年	始兴、广州	江陵失陷，南投萧勃	《游始兴道馆》《南征闺怨》
	岑之敬	555—570年	广州	奉敕宣旨，会江陵陷，故滞留	
	袁敬	555—570年	广州	江陵沦覆，流寓岭表	

从上表不难看出，在南朝宋、齐、梁、陈中，刘宋一朝的贬徙最为严重，而且多是当时的豪门士族。

其中尤以谢氏家族受祸为烈。“大谢”谢灵运直接在广州被处死，其后人被弃置于此近二十年。“小谢”谢朓的父亲谢纬，以驸马之身份流寓广州长达十年。沈怀远也流寓于此达十年之久，还有吴地的张融、顾迈等，都是一等的高门士族。

这一场场的贬徙，透露出豪门士族与皇权之争的残酷无情。庶族地主代表刘裕建立起的刘宋朝，与门阀士族还处于一种相互抵牾的状态中，彼此不断在对抗中磨合。一方面，因于门阀士族以门第才望自负、恃才傲物之习难改；一方面，刘宋朝统治者显然是有意识地要打压门阀士族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优势地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齐梁时期，彼此寻求到了相对适合的方式，调整了各自的姿态，矛盾遂趋于缓和。而皇族对于文士的尊崇也日益明显。梁陈之际的文士，大多或因为出仕为官，或因为避乱而来到岭南，直接被贬徙的已经少而又少。

就这些流寓文人的去向分布看，大体有广州、曾城、封溪、交州、始兴等。其中广州、始兴为重点区域。具体看，流寓广州的有王叔之、谢灵运、谢超宗、何长瑜、谢纬、顾迈、沈怀远、刘祥、范云、王僧孺、范缜、柳恽、徐伯阳、江总、阴铿、岑之敬、袁敬等十余人。流寓始兴则有沈怀远、范云、萧子范、阴铿、江总等人。但其实，始兴作为当时出入岭南的必经之地，恐怕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先抵达始兴，然后陆续南下广州等地。因此，在南朝时期，始兴的发展，尤其是它在文化上的快速积累，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其来有自，与其独特的地理优势，与一批接一批的文士南来是息息相关的。

南朝时流徙岭南者，大多并非如此前的皇亲国戚、位高权重者，而是当时数一数二的高门士族，其文化素养代表了其时文明的最高程度。而他们滞留岭南的时间又都不短，使得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体验、领会岭南文明的精髓及异同，促使中土文明与岭南文明的充分融合发展。文明因交流而精彩，流寓者以其较高的文明，推动着岭南的提升发展，而岭南的风物人情反过来也带给流寓者以新鲜的感受，使其创作题材获得别样的拓展。随着他们对于岭南的文学书写不断丰富起来，岭南的文学形象也从模糊走向清晰，进而走进主流的文学书写中。

七、谢灵运的南徙

唐前南徙士人里面最著名的莫过于谢灵运了。他是山水诗的开山宗师，他的努力使得山水题材成为中国诗里面一个独立的门类。对他的研究亦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对其踏足岭南的人生最后的阶段，以及其与岭南文明的关系的研究，却囿于史料的缺失等而几乎无人问津。事实上，作为一个个体，谢灵运于宋元嘉十年（433年）被徙付广州，就是一场悲剧，是走向刑场的穷途末路，是人生最后的数月时光。但作为诗人，他一生致力的诗歌艺术却因为他南徙的机缘在岭南大地流泽绵长，影响至深。

谢灵运被徙付广州，时在宋元嘉十年（433年），是没有疑义的。但具体什么时间，因缺乏确切记载，一直不甚明了。

《宋书·谢灵运传》记载了他从临川内史徙付广州时发生的一件事：秦郡府将宗齐受到涂口（今江苏六合县瓜埠口）附近桃墟村时，发现七个形迹可疑的人，经审问，其中一个来自山阳县名叫赵钦的人说：“同村薛道双先与谢康乐共事，以去九月初，道双因同村成国报钦云：‘先作临川郡、犯事徙送广州谢，给钱令买弓箭刀楯等物，使道双要合乡里健儿，于三江口篡取谢。若得志，如意之后，功劳是同。’遂合部党要谢，不及。既还，饥馑，缘路为劫盗。”

对这一事件，学界多有怀疑，认为这应是为陷害谢灵运而设下的陷阱。这里姑不论事件的真伪如何，但有一点恰恰值得我们注意，由于其目的就是要坐实谢灵运的犯事，故此中所透露的“去九月初”的时间等，理应是经得起推敲的。确有其事也罢，诬陷也罢，要坐实之，就必须在各个细节上经得起起码的推敲，这是历史在无意间透露给我们的真相。

“去九月初”里的“去”，意思就是刚过去的一月。这里透露的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谢灵运犯事诏徙广州，最迟应在九月初；一是谢灵运为“有司又奏依法收治”的时间，应在是年十月至十一月间了。《宋书》及《南史》在连接这两件事情时，用的过渡词分别是“其后”“后”，《资治通鉴》用的是“久之”，这个时间段在一个多月左右。

于是，就在谢灵运“徙付广州”的路上，宋太祖又“诏于广州行弃市刑”。

“弃市刑”，注家们多以为是斩首之刑。而据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刑法分考四》“弃市”条引注，秦汉时弃市乃斩首之刑，魏、晋以下，弃市为绞刑。由此可知，谢灵运所受的应为绞刑，而非斩刑，绞刑之罪稍次于斩刑。谢灵运死时年仅四十九岁。一代文豪犹如一颗流星，在历史的天空划过一道短暂而耀眼的光芒，倏然而逝。

谢灵运的具体受刑时间也不能确定。但《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二系之于元嘉十年（433 年）十二月的倒数第二条，应已是十二月中下旬了吧。结合其《临终》诗中“凄凄凌霜叶，网网冲风菌”的句意，以及收治之后的下诏并执行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看，这应该是合情理的。

如此算来，谢灵运踏上岭南之地的时间，大概也就是三个月左右。而即便是这三个月时间，他肯定也是不得自由的。所以，岭南的风物并没有太多地进入诗人的创作中，流传至今能考的作品，也就不外乎《岭表》《岭表赋》《临终》三首残缺篇章。即便是他此前曾无限向往的罗浮山，并感梦而作有《罗浮山赋》，这回自己“南通罗浮”，却也明白是无缘践梦的了。

岭南于谢灵运的一生而言，只是一个行刑的地方。中国山水诗的代表诗人来到了岭南，但岭南的秀美山水却没能带给诗人永嘉山水般的愉悦与慰藉，也就无法触发诗人的激情与感怀，这是令人无法释怀的遗憾。

但即便如此，以诗人当时“江左独振”的才名之盛，他带给岭南的影响却是久远深长的。谢灵运徙付广州，是举家南下的。《南史》卷十九曰：“灵运子凤，坐灵运徙岭南，早卒。凤子超宗，随父凤岭南，元嘉末得还。”儿子谢凤、孙子谢超宗也随同流徙，谢超宗当时不过两三岁。谢灵运在广州被杀，谢凤没几年也年纪轻轻病死岭南，谢超宗随母亲在岭南度过了近二十年的光阴，才得允回到建康。

谢灵运徙付广州，以及其后人近二十年的居所位于何处已无从确考。

今天珠江南岸依然有康乐村、客村（谢灵运，字康乐，小名客儿，世称谢客），伫立于此的中山大学南校区亦缘此名为康乐园，极大可能即是康乐公或其家人曾经活动居住的所在地，不然如何解释这个名字偏偏集中出现于此地呢？近年来，在此地考古发掘中，也出土了不少汉晋时代的墓葬，或许有一天，考古会带给我们更多的发现与惊喜。

当然，无论康乐公的身影是否在这里徘徊吟咏过，其后人近二十年时间是否都在这里度过，谢康乐的声名确已沉淀于此，留待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去思索、追寻。

谢灵运留下了一首《临终》诗，表达了“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的志愿。同时，又把他的一副美髯捐献给了寺庙里的维摩诘像。据《太平广记》第七十九《谢灵运须》：“晋谢灵运须美，临刑，施于南海祇洹寺，为维摩诘须。寺人

宝惜，初不亏损。中宗乐安公主，五月斗百草，欲广其物色，令驰取之。又恐他人所得，因剪弃其余。今遂绝。”维摩诘是一位佛经记载中的真实的人物，他潇洒游戏于人间，是中国文人们引以为荣的楷模、偶像。只可惜，诗人再美好的寄托，终无法如佛界之潇洒。即使只是一副须髯，也终逃不过厄运，最终沦为唐代公主们斗草使性的游戏玩具而已。地下有知，谢公恐怕又不免要生出一番“恨”意来。

谢灵运死后，孙儿谢超宗及其母亲等在广州生活了近二十年后，于元嘉末得允还建康。谢超宗的童年、青少年都是在岭南度过，人格学识的培养，显然也是在岭南完成的。岭南的文化滋养，及谢氏家族的家风传承，共同造就了谢超宗。

谢超宗回到京城，一出手就不同凡响。《南史》卷十九记载，他为殷淑妃作诔，赢得孝武帝大相嗟赏：“超宗殊有凤毛，恐灵运复出。”一代文宗谢灵运带着他的绝妙文辞，远遁于岭南，而就是短短的二十年时间，从岭南又走出了一个文采风流的谢超宗，能不令人生发“灵运复出”之叹吗？

谢超宗的文学成就，当然是远不能与其祖父谢灵运比肩的，但在当时的文坛也算佼佼者了。谢超宗与族叔谢庄同时作《殷淑妃诔》，同受到孝武帝刘骏的称许，这对于一直远处岭南的他来说，何其不易！可以想象，在岭南的近二十年时光，他在文学方面的训练并没有被太多耽误，或者说，陈郡谢氏在文义才能上的优良家风，在这位被远弃的士族子弟的身上，依然被较好地承续了下来。又或者说，谢氏家族这个当时的头等高门士族，其子弟在陡然间被远徙到岭南后，还是与当地文化达成了某种交流与平衡，共生互补。

谢超宗回到了京城，作为曾经名动江左的谢灵运的嫡孙，流徙岭南近二十年后，终于又回来了，他首先要做的当然是在京城的文坛上有所表现、站稳脚跟，不辜负乃祖的昔日荣光。若为“属文”，谢超宗确实辞气横出，齐高帝萧道成称其使人不衣自暖，对之甚欢；可一旦涉及政事，谢超宗也与其祖父一样显出其疏狂失仪。《南齐书》本传评谢超宗“为人仗才使酒，多所陵忽”，这与《资治通鉴》里论及谢灵运时说“灵运恃才放逸，多所陵忽，故及于祸”几乎如出一辙。最后，谢超宗被流徙越州（今四川西昌），行至豫章（今江西南昌），又赐其自尽。殊途而同归，一句“灵运复出”，实在也是一语成谶般地概括了谢超宗的一生命运。

再回到岭南。谢灵运来到岭南只有短短数月，绝对是匆匆过客。但以他的声名，他对于后代岭南文人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虽然我们并不容易清晰地梳理出谢灵运对岭南文学的影响轨迹，然而，当时光跨越两百多年后，当岭南的张九龄横空出世时，在他的身上我们却蓦然发现谢灵运的影子在，感受到谢灵运对其诗其人的或隐或显的影响。精神和灵魂是漫游的。谢灵运也不知道，他殁后近三个世纪可以找到自己艺术的传人，同样张九龄也无从与自己的精神前辈谢灵运谋面，但这种时空的隔阂并不妨碍晚辈沿着前辈的精神踪迹摸索自己的道路，并不妨碍跨越时空的灵魂相契。

张九龄对谢灵运山水诗的追摹，有山水诗内在发展的要求，也与诗人心迹的相似有关。因由人生际遇的变化，张九龄后期的山水诗，在取法大谢体的基础上，能将自己深刻的人生感遇灌注于山水景物的刻画之中，接续上谢灵运诗歌深沉凝重的优秀传统，而又大大丰富了其思想内涵与诗歌境界。张九龄在政治上抵达宰相之职，在文坛上也终至领袖地位，提拔、奖掖和团结了当时几乎所有的优秀文人。所以，他在诗歌上的主张与实践，必然得到当时文人们的推崇，从而蔚为风气。

谢灵运在岭南的命运是一场悲剧，但其深沉凝重的诗歌风格，却因由近三百年后张九龄的承继而发扬光大。因为张九龄的嫁接与实践，矫正

了初唐时弥漫于宫廷内外的齐梁绮靡之风，为盛唐诗歌注入风骨与词采，从而迎来了盛唐诗歌的曙光。就此而言，谢灵运无疑又是幸运的，是永在的。

八、始兴在南朝的迅速崛起

在南朝齐代来到岭南的官员中，范云无疑是其中翘楚。他在岭南为宦三年有余。论官位，先后为始兴内史、广州刺史；论文学，他是当时文坛领袖之一。因此他所带给岭南的影响，恐非当时其他人所能及。他留存下官宦岭南者的第一首吟咏岭南风情的诗作，更与此前任职始兴的一众清官良吏，接力施以良政，从而共同促成了始兴成为当时岭南的文化中心之一。

范云（451—503 年），南乡舞阴（今河南泌阳）人。他八岁时能写诗，稍长即善属文，文思敏捷，时人多疑为宿构。宋末已初露头角，是永明体诗歌的重要诗人，最早为萧子良赏接，位至尚书右仆射。

永明十一年（493 年）秋，因涉谋立萧子良事败，出为零陵内史，在任洁己，省烦苛，去游费，百姓安之。建武三年（496 年），复出为始兴内史，对民抚以恩德，郡中称为神明。永元元年（499 年）六月，以范云为广州刺史。十月，即因前任始兴内史时事，被征还下狱。可知，范云为广州刺史时间约为四个月，他回到京城的时间也在是时。如此算来，范云在岭南为官的时间三年有余。

范云的诗歌风格，在来岭南之前的永明时期已初臻成熟。无论其诗学主张，或是诗歌创作，都可见永明之风，其诗风格实近于谢朓。如《巫山高》：“巫山高不极，白日隐光辉。霭霭朝云去，溟溟暮雨归。岩悬兽无迹，林暗鸟疑飞。”《送别诗》：“东风柳线长，送郎上河梁。未尽樽中酒，妾泪已千行。不愁书难寄，但恐鬓将霜。望怀白首约，江上早归航。”尽革晋宋之涩调，又不涉梁陈之纤薄，确为永明之诗风。

于是，当范云来到始兴、广州时，他自然而然将永明诗风也带到了岭南。而且，以他始兴内史、广州刺史等当地最高长官的身份，进行创作实践，势必影响带动当地诗风的变化。他并以一首《三枫亭饮水赋诗》，将他的名字永恒地融注在粤北的山川之中，以其清新的诗风，将岭南的诗歌创作带入到主流文学的潮流之中。诗云：

三枫何习习，五渡何悠悠。且饮修仁水，不挹邪阶流。

这可谓官宦岭南者流传至今的最早的吟咏岭南风情的诗作。

在一个秋天，诗人泛舟溯浈江而上，来到了历史悠久颇有名气的修仁村，游览了三枫亭、五渡亭等。修仁村位于南雄市区西南的古市镇，原称芙蓉村。相传在西汉武帝建元年间（前 140—前 135 年）就有这个古老的修仁村落。那时，始兴、南雄仍未建郡、县治，故修仁村还要比始兴郡、南雄州名分别长 1100 多年和 1500 多年。即使从南朝齐建武二年（495 年）修仁村已有很大名气时算起，修仁之名也要比南雄之名早 189 年。

修仁、邪阶，均为水名，亦涵修行仁义、邪乱之义。诗人借水名以言己志，宜饮修仁之水，不挹邪乱之流。该诗为五言四句，诗风平易流畅，颇有南朝民歌之风韵。不过，南朝民歌内容几乎清一色为情歌，范云此诗却是状写山水以抒其志。他运用南朝民歌的抒情技巧，表达自己来到这山高水远之地的独特情怀，不见了缠绵悱恻的情爱声色，代之以修仁义、去邪流的高尚情志，诗歌思想境界为之净化，表达技巧更趋自然平实，声色与风骨兼具。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范云是如何汲取南朝民歌的养分，使诗歌在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上都得到提升，臻于成熟。

东晋时广州刺史吴隐之，路经广州石门“贪泉”时，写有著名的《酌贪泉赋诗》：“古人云此水，一歃值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与范云此诗亦如出一辙。很可能，就是受吴诗之启发，同出岭南为宦的范云，有感于修仁、邪阶之名，情动于中，乃成此诗。两者所抒情志如出一辙。有所不同的是，吴诗为纯粹的说理，而范诗则是在游览岭南的山水中切身所感，景、情、理融为一体，是从这片山水中生发出来的，相互交融的情志、艺术主体的自觉更见突出。

又据阮元《广东通志·古迹略五》载：陈侯安都宅，在城西四十里桂山之下，旧刻范云咏桂诗云：南中有八树，繁华无四时，不识风霜苦，安知零落期。今诗不存。这首诗同样为五言四句，借物比兴，用双关隐语，感情清新流转，其表现手法正与南朝民歌并无二致，而歌咏的则是桂树不因风霜而零落的坚贞之情。

岭南的山川万物，此前尚未有太多途径进入文学史，因为范云的到来，金风玉露一相逢，这片山水，便以非同凡响的姿态进入主流文学史的书写中。而范云自身也在这片岭南的山水中，不期然地完成了其诗歌艺术上的一次跃升。或许，这还是不自觉的，但这份尝试所带给他的惊喜与启示，必然在他此后的创作中不断地得到发扬光大。

范云在粤北山川中留下的这些零星诗作，有没有给两百年后出生于此地的张九龄产生影响呢？似乎没有直接的证据，但相信是一定的。正如山水无言，兀自矗立。又如绘画中的云横断岭，留下的是一大片空白，可有谁会怀疑它的真实存在？张九龄本人就是在立身求道上修仁去邪的典型，而他的诗歌创作最大的贡献，亦如范云一般，就是以其人生的种种感遇充实了其山水诗创作中的思想感情，矫正着齐梁诗轻薄纤巧的情感内容。

谢灵运雕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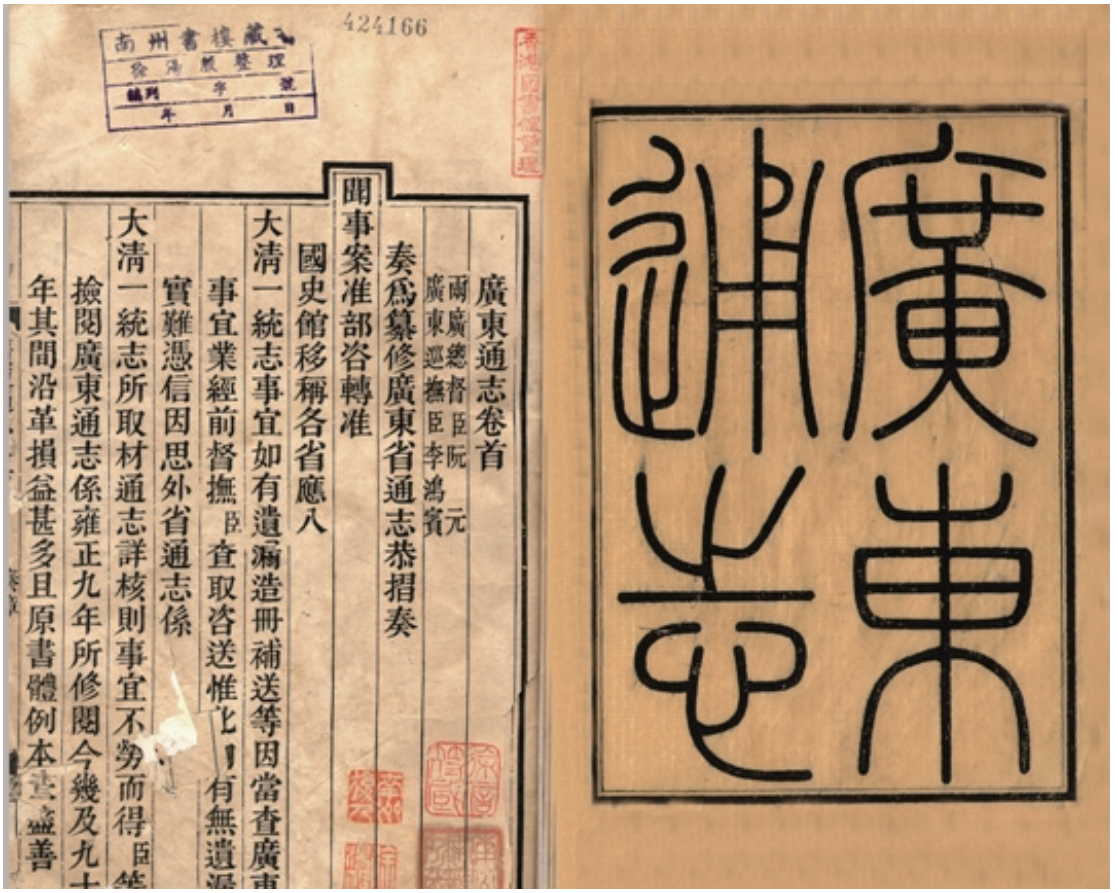
与吴隐之一样，范云的清廉也是出了名的。据《梁书》本传记载，范云在此前为零陵内史时，便持身以俭，去除苛捐杂费。及为始兴内史，恩威并施，郡中由是大治。迁职广州刺史后，即遣使祭孝子南海罗威唐颂、苍梧丁密顿琦等墓。自身既能做到廉以自律，勤以从政，同时通过对孝的大力推举，以求良风俗，助教化，对民风的淳化是极有益的促进，而于其自身创作的思想境界，也未尝不是一种升华净化。这正是他对岭南的最深的惠予。

范云的诗、文、学问及吏才，无一不精，且品行高尚。而史书于其始兴内史任上，所着笔墨尤多，记载事迹尤详，可见这一段生涯在范云的一生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岭南民风、政风和文风的发展，其种种德政必然也是贡献至伟。

始兴的真正发展要直到南朝才开始。

这与中原进入岭南主力交通线的东移至始兴直接相关。随着晋室南渡，六朝定都于金陵，政治中心东移，原来由湘江进入西江的交通线失去优势，由北江的起点今韶关溯浈水而上，翻越大庾岭再沿赣江通长江就到达六朝故都南京。因乎此，东晋南朝时期始兴（今广东韶关）取代了广信（今广东封开和广西梧州一带）的地位，一时风云际会，人物辈出，崛起成为岭南政治和学术的重要枢纽。同时，也与一众清官良吏的主政密

《广东通志》



不可分。

据阮元《广东通志·宦绩录二》，列举晋时良吏 25 人，其中为始兴相、太守的只有张茂度、尹虞、邓骞三人；列举宋时良吏 17 人，其中为始兴太守、内史的则有五人：徐豁、陆徽、檀和之、沈法系、孙奉伯。

其中晋朝的三人，在始兴任内一者时间并不长，二者没有连续性，三者所记载宦绩也并不显著。历史进入到南朝，一任紧接一任的清官良吏接掌始兴行政长官，励精图治，迎来了属于始兴的高速发展时期。

在上面列举的五人中，有四人都是在元嘉年间先后为始兴太守的。徐豁在元嘉初，陆徽在元嘉十四年，檀和之在元嘉十六年，沈法系在元嘉末。其中，徐豁与陆徽二人，都是事列《宋书·良吏传》的。

徐豁，在始兴太守任上的时间约有四五年，任上致力于减轻郡民的课税负担，使之安居乐业。陆徽要短得多，大约就是一年左右的时间。但《宋书》本传中详细记载了他给朝廷举荐广州别驾从事史朱万嗣之事。其举荐之目的，是希望将岭南政坛的“清风”带到朝廷之中。倡导清廉、举荐贤能，正是陆徽在始兴太守、广州刺史任上所极力提倡的。此举较之于一般的减税、重建，具有着更为重要的影响力，对当地政风、民风的塑造具有更本源性的作用。

刘宋后期的泰始六年（470 年），宋明帝为儿子刘昱纳皇太子妃，讽朝士州郡皆令献物，多者将直百金。时为始兴太守的孙奉伯，则“止献琴书，其外无余物。上大怒，封药赐死，既而原之。”孙奉伯何以独独止献琴书？也许其意在讽喻皇太子妃要多在琴书上下功夫，以使母仪天下；更也许，他就是要借此表明，他所治理的始兴郡对琴书文化的重视程度。远处岭南的荒僻之所，也以琴书相尚，不也说明天下太平，朝廷治理有方吗？或许，宋明帝就是最终明白了这层道理，才幡然悔悟，“既而原之”。

其实，孙奉伯本来就以书画见擅，以琴书为献，也是自然不过的事。而孙奉伯曾长期为官岭南，历任交州刺史、始兴太守等，以一地长官之身份，其对于书法艺术在岭南的传播无疑更为用心着力。从休养生息到吏治清明，到文化的倡导，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众清官良吏，是如何一步步全方位提升着始兴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水平的。

文化之浸润，润物细无声。曾几何时，这里还只是荒蛮之地，而今却可以以琴书相尚，以琴书相献。文明之进步，悄然中已成声势。历史选择了始兴，在范云之前，便已有了这一长串清官良吏，接力施以良政，从而共同促成了始兴成为岭南最早的文化中心之一。

经过了宋、齐两代，始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据《宋书·州郡志》记载，宋大明八年（464 年）的户口（编户），与西晋初年相比，始兴郡由 5000 户增至 11756 户，增长 135.12%；同期南海郡境则仅增长 34.36%。始兴户口增长率是广东各地区中最高的。这与南徙人士的聚集、始兴当地行政长官的得力治理等都是密不可分的。

到了梁陈之际，号称“南天一人”的侯安都的出现，正是始兴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产物，同时又为当地的文明发展，注入了一股清新的力量。始兴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侯安都（520—563），始兴曲江人，世为郡著姓。太清二年（548 年）秋，侯景之乱爆发，侯安都在始兴“招集兵甲，至三千人”，追随陈霸先起兵。此后，侯安都南征北战，屡立战功，并在武帝陈霸先驾崩后，果断拥立文帝继位，居功赫赫。

只是，果然应了福兮祸所伏的古训。正是从这时起，侯安都不自觉地便步入悲剧之路。“自王琳平后，安都勋庸转大，又自以功安社稷，渐

用骄矜，数招聚文武之士，或射驭驰骋，或命以诗赋，第其高下，以差次赏赐之。文士则褚玠、马枢、阴铿、张正见、徐伯阳、刘删、祖孙登，武士则萧摩诃、裴子烈等，并为之宾客，斋内动至千人。部下将帅，多不遵法度，检问收摄，则奔归安都。世祖性严察，深衔之。安都弗之改，日益骄横”。

侯安都的骄矜、骄横，注定了其个人的悲剧。天嘉四年（563年）七月六日，文帝将侯安都赐死，时年四十四岁。侯安都招集文武之士于斋内，动辄上千人，结党营私，不能不令人侧目。但他的招集文士，品评诗赋，一争高下，对于南朝文化发展的贡献，并进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于岭南的文化和文学发展，则可谓功莫大焉。这是经历了侯景之乱后文士们再次得以聚集，是流离后的再相见，是大难不死后的欢聚。

侯安都的招集文士，虽然都是在京都建康进行，但建康与岭南的交通、信息都是畅通的。其在京城的一举一动，无不牵动着岭南的神经，尤其是他的家乡始兴，唯侯安都的兴趣嗜好马首是瞻，是毫无疑问的。比如岭南的本土作家刘删，因为徐伯阳回到建康任侯安都记室后，“荐其词学”，从而成为侯安都文士之游中的座上客。这对于岭南的文士而言，无疑是一条终南捷径，也就促使岭南文士唯建康文坛风尚是从，积极主动以其时的主流文学为标高，从而为岭南文化和文学的发展注入强大的推动力。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二诗语》“诗始杨孚”条追溯张九龄之前的岭南诗风时，对侯安都的招聚文士之举便给予了“开吾粤风雅之先”的高度评价。不仅是对岭南文学的推动，由于在侯安都招聚的文士中，如阴铿、徐伯阳等不少都是刚刚从岭南回到建康，沾披岭南文化的雨露，他们把岭南与首都建康的江南文化自然紧密地牵连交融，使岭南文明与中土文明充分地沟通对话，将岭南文化与文学纳入到当时的主流文学中，从而推动着整个南朝文学的融合发展。

九、江总：岭南文学形象的最初建构

侯景之乱乃江东社会上划时代之大事。

岭南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每逢战乱便成为避乱之所。于是，一大批士庶文人纷纷选择南下避乱。我们看到《陈书》等传记中有关文人的记载，几乎都脱不了那句“侯景乱后”。有因此逃归故里者，更多的则是四处逃窜，其中，避难至岭南的著名文人大有人在，如阴铿、徐伯阳、袁敬、岑之敬、江总等，且无一例外都是先后依于当时的广州刺史萧勃及欧阳頠、欧阳纥父子。

正是在侯景之乱起后的次年，即梁太清三年（549年）七月，萧勃被陈霸先迎为广州刺史。其后，萧勃盘踞岭南近十年时间，直至陈武帝永定元年（557年）二月举兵北上被杀。萧勃之后，则是欧阳頠、欧阳纥父子的执政。一方割据，这是广州稳定发展的黄金时代。他们以一州刺史之地位，大量招募流寓文士与当地文人，诗酒唱和，其规模之大、层次之高，足以与齐梁时京城的皇室藩王门下的文学集团相媲美。千辛万苦，颠沛流离，从京城，从王室的门下走来，他们在岭外重聚首，唯把岭南当建康，广州不仅成为当时岭南的文化中心，几乎已是当时整个社会的文化中心。这是一次文化中心的南徙。要直到侯景乱平后，陈朝帝王、权臣侯安都等才重新在京城招聚文武之士，添酒回灯重开宴，昔日流离岭南的文士们也纷纷返回内地，文化的重心随之重新回到京城。

诗人江总是其中的文人代表。

江总是南朝亡国之君陈后主的宰相，两人都不理政务，只是每天在后宫饮酒嬉戏，作诗唱和，君臣昏庸腐败，致使陈朝很快即为隋所灭，因而一直为后人所诟病。

然而，这对君臣虽不是明君贤臣，却都是当

时最重要的作家。其中，为人所忽略的是，一者，年幼的欧阳询，正是因于江总的收养庇护，才得以在满门抄斩中幸免于难，并进而成长为唐朝著名的书法家；二者，江总流离岭南十三年有余，更是其时书写岭南最生动最丰富的作家，流传下来的描写岭南风物的诗赋之多之成熟，前无古人，第一次在主流的文学书写中建构起岭南的文学形象。

江总（519—594），字总持，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人。侯景之乱后，江总辗转避难至岭南，投靠时为广州刺史的舅舅萧勃。自此，江总“流寓岭南积岁”，直至天嘉四年（563 年），以中书侍郎征还朝，才回到建业。从 551 年至 563 年，江总在岭南共度过了 13 个年头。

江总现存诗歌 103 首，数量居陈代诗人首位，文 55 篇，数量仅次于徐陵。其中可考作于流寓岭南时期的，文有《贞女峡赋》《南越木槿赋》等，诗有《经始兴广果寺题恺法师山房诗》《衡州九日诗》《秋日登广州城南楼诗》《别南海宾化侯诗》《遇长安使寄裴尚书诗》等。这样的诗文数量，在此前流寓岭南的文人中，还是未曾有过的。尤其令人欣喜的是，江总在岭南的这些诗文，在艺术上较此前有了明显的提升，这几篇诗文都称得上他的上乘之作。

江总经由始兴顺北江南下广州，一路有诗纪行。经过北江贞女峡时，写下了有史以来所记载的第一首吟咏北江流域的诗赋《贞女峡赋》：

> 倦辛苦于岭表，遂沉沦于海外。迹飘摇于转蓬，情缭绕于悬旆。骇兹峡之珍怪，伫奇峰而瞩瞩。或逦迤而四成，乍嶂嵎而五曲。含照曜之烛银，沸潺湲之膏玉。山苍苍以坠叶，树索索而摇枝。澄碧源之见底，耸翠壁以临危。

贞女峡，在广东省连县南。今人或以为即是北江支流连江楞伽峡。江总此赋在技巧上已臻于



江总

成熟，文笔朴实平易，文句对仗工整。读之如身临其境，耳听如闻江流湍急雷鸣之声，目视如临两岸陡峭之危，耸然惊心。在情感上，又注之以辛苦岭表、飘摇转蓬之经历，显然有了更多更深切的人生体悟，眼前之景与内心之情互为契合，相互激发。“情缭绕于悬旆”，这段江流湍急之旅，不亦正如自己人生的颠沛流离吗？江总在岭南的山水中找到了人生的象征，提升了思想与艺术的境界，完成了一次人生的升华。岭南的山水成就了江总，江总也为岭南留下了丰富生动的诗赋，这算得上是岭南山水与流寓文人的第一次精神意义上的欣然相逢。

自 555 年至 563 年，江总离开始兴南下广州共度过了约十个年头。其间的生活状况如何，史书中仅以一句“总自此流寓岭南积岁”轻轻带过。所幸，历史的空白有诗人的作品来填补。文学，再一次展现出其永生的力量。

我们来看其《秋日登广州城南楼诗》：

秋城韵晚笛，危榭引清风。远气疑埋剑，惊禽似避弓。海树一边出，山云四面通。野火初烟细，新月半轮空。塞外离群客，颜鬓早如蓬。徒怀建邺水，复想洛阳宫。不及孤飞雁，独在上林中。

秋日的傍晚，诗人在悠扬的笛声中缓步登上高楼，迎面清风徐引，远望处，云霞掩映，似剑气上升，惊起的群群鸟禽，箭一般直冲而去，一幅鸢飞鱼跃的赏心图景。随着不断的登攀，诗人眼前的景象越益开阔，海边的丛树，山间的云岚，野烟袅袅，新月皎皎。可就在此情此景下，诗人却不免登高伤怀，黯然神伤。“塞外离群客，颜鬓早如蓬”，流离失所，岭外飘零，岁月蹉跎，颜鬓衰逝，思念故乡之情便奔涌而来。自己还不如那孤飞之雁呢，至少它还可以自由地息栖在上林苑的枝叶间。诗人是多么怀想家乡，怀想京城的山山水水、楼台宫苑，然而欲问归期未有期，四望茫茫。全诗以欢欣起，以沉痛结，感情随物自然流转，读之令人荡气回肠。

此诗是古代文人留给广州这座城市的第一首歌，高超的文学才华与身处的现实相遇、激荡，成就了这篇荡人心魂的诗篇。一开篇，便深情感怀，一唱三叹，奠定了岭南文学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思乡。

流离岭南的生活，注定了文士们在感叹自身命运的同时，就是不断地抒发对故乡的归思之情。汉学家刘若愚先生说，在遥远的异乡游荡，并不是中国人所喜欢的消遣方式。于岭南，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乡愁更成为其最流行的文学主题。

《别南海宾化侯》是江总作于岭南期间的又一篇诗作：

石关通越井，蒲涧迩灵洲。此地何辽夐，群英逐远游。高才袁彦伯，令誉许文休。悠焉值君子，复此映芳猷。崤函多险涩，星管壮环周。分歧泣世道，念别伤边秋。断山时结雾，平海若无流。惊鹭一群起，哀猿数处愁。是日送归客，为情自可求。终谢能鸣雁，还同不系舟。其如江海泣，惆怅徒离忧。

也是在一个秋日，诗人在南海，也就是现在的佛山南海里水镇郁水边，送别好友宾化侯萧云。“崤函多险涩，星管壮环周”，崤山、函谷，自古为险要关隘。“星管”，古称一周年。星，指二十八宿；管，指十二律管。宾化侯在过去的一年里，大概是历经艰辛辗转流离，最终来到了岭南。在这里，诗人与他相见恨晚，“悠焉值君子，复此映芳猷”。只是，刚刚相见，又言离别，值此世道之乱，前路茫茫，情何以堪！

“石关通越井”，化用赵佗典。传说赵佗曾投金杯于越王井，结果从北郊二十余里外的石门流出。蒲涧，即蒲涧寺，因广州白云山菖蒲涧得名。灵洲山即小金山，位于南海和顺郁水中。诗的开



头两句明确点出送别的地点，在这个尚为辽夐荒远的地方，却有群英竞相远游来此。或高才，或令誉，既有对宾化侯的称许，其时岭南的文游盛况亦可见一斑。

“断山时结雾”以下诸句，写雾、海、惊鹭等，与《秋日登广州城南楼诗》颇为相似。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评曰：“‘断山’四句景中有情，语并悲亮。”“终谢能鸣雁，还同不系舟”所传递的心情，与“不及孤飞雁，独在上林中”也如出一辙。就此推测，《别南海宾化侯》与《秋日登广州城南楼诗》的创作时间应该相差不远。

无论是诗人自己，还是宾化侯，都只能徒叹大雁的自由翱翔，只能如不系的舟船，任凭风推浪打，在江海中无助地打旋，这不正是乱世中命运的写照？比起“不及孤飞雁”，江总在《别南海宾化侯》诗中更进而顾物及人，找到了自身命运的对应物——“不系舟”，由此看来，诗人应该是先创作《秋日登广州城南楼诗》，而后有《别南海宾化侯》。

全诗由欢欣入惆怅，流转自然，景中含情，情随物转，真挚自然，最后落笔于对自身命运的忧虑，对故国家乡的思念，感人肺腑，具有相当深厚的思想内涵及高超的艺术水准。

在流离岭南的日子里，迎来与送往成为最易

南宋《春宴图》（局部）



拨动诗人心弦的时刻，是以此期间留存下来的江总诗作，几乎都是此类题材。或他乡遇旧知，或临歧别故人，每一次的迎送，都不免勾起诗人内心深沉的家国之思。无论从诗的结构或情境看，江总《遇长安使寄裴尚书诗》都与《别南海宾化侯》何其相似乃尔，则其同写于岭南时期是可以确定的。诗云：

传闻合浦叶，远向洛阳飞。北风尚嘶马，南冠独不归。去云目徒送，离琴手自挥。秋蓬失处所，春草屡芳菲。太息关山月，风尘客子衣。

裴尚书，名忌，字无畏，陈宣帝时为都官尚书。诗人在广州遇陈朝使臣，送别时写下这首诗托其转交裴尚书。

首二句也以关乎岭南的一个传说起。合浦叶，事见晋人刘欣期《交州记》：“合浦东一百里，有一杉树，叶落，随风入洛阳城内。汉时善相者云，此休徵当出王者。故遣千人伐树。”⑦六朝唐人多有用此典故者。合浦叶可以远向洛阳飞，自己却只能流离岭南，“南冠独不归”。不再像此前的以欢欣入笔，此诗直接以悲痛起。“去云目徒送，离琴手自挥”，用的是三国魏嵇康“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典，再一次使用鸿雁的意象。对鸿雁意象的反复使用，以及飞向洛阳的合浦叶，不难体味出诗人对故国家乡的思念盼归之心切。只有一夜间便能飞抵，才能稍慰其心。可现实却是，年年春草绿，自己依然如秋蓬随风飘转不定，年复一年淹留他乡，长太息以掩涕兮。该诗通篇写羁留之久之苦，盼归之迫之切，直抒胸臆，益转益悲，应该是流离岭南较后期的作品。

从《秋日登广州城南楼诗》到《别南海宾化侯》，再到《遇长安使寄裴尚书诗》，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江总在流离岭南期间的一个颇为清晰的情感发展轨迹：从“不及孤飞雁，独在上林中”的托物言志式的隐晦的表达，到“其如江海泣，惆怅徒离忧”的黯然神伤，再到“太息关山月，风尘客子衣”，则已是长太息了，诗人的自我形象不断被凸显。随着时日的推移，诗人的情感在不断深化，诗人的主体形象也仿佛越来越按捺不住，托物言志式的隐晦，已不足以表达其情，从而一步步走上前台直抒胸臆。尤其是在送别的情境下，诗人的流离之苦与盼归之切，就更自然而然地被激发出来。

毕竟，诗人在岭南流离了太长的时间。

也因此，岭南的山川风物，得以全面地进入到江总的创作视野中。其《南越木槿赋》虽然无从考究具体的写作时间，但文章写的就是岭南的地道风物，体现的是作者对岭南风物的情感与思考。

赋作极尽赞美南越之木槿花。写木槿的绚烂是用朝霞映日、珊瑚照水、千叶芙蓉、百枝灯花等各种其他的绚烂来比衬。然而，虽为众花之宝，却是“雅什未名，骚人失藻”，并未进入中原人士的视野，不为其所欣赏。末尾由咏南越木槿之美而联想到丽人，丽人宜笑不胜花，花面交相映，而以木槿之美，却无缘于此，只能“徒令万里道，攀折自咨嗟。”木槿花，野花夺目，却不为诗骚所咏，不为丽人所佩，其孤芳自赏的落寞，或许正是诗人自身命运的象征，也正是南越地位的象征。化主观情感寓于事物，赋予事物以生命的思索。

在岭南度过的十三个年头里，江总既和南来的使者、北方的友人等有酬唱之作，更与其时依于萧勃、欧阳父子的南来文人，如徐伯阳、阴铿、岑之敬等相互酬唱，共同促使岭南迎来了一个真正的文学时代。江总在这里留下了大量的诗文，尤其是开始集中书写岭南，将岭南的万物风情与自身的情感相融汇，与新体诗的艺术技巧相结合，

⑦ 刘纬毅撰：《汉唐方志辑佚》，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34页。

从而达到思想与艺术的较好统一，第一次在主流的文学书写中树立起岭南的文学形象。

天嘉四年（563年），江总以中书侍郎征还朝，重新回到建康，继仕于陈。后主即位，一再拔擢，直至尚书令，时称“江令”。身为权宰的江令，自然会将他长期浸染于岭南而成的风习，将他建构起的岭南文学形象，引入陈朝的宫廷之中，引入主流的文学书写之中，让岭南的文明之光照射进江东文士的诗筵酬唱之中。

陈亡以后，江总离乡北上，“南朝词人北朝客”，虽仕于隋，实为降虏，再次的流离生活，必然会深深地触发其内心对岭南流离生活的刻骨记忆。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说：“江总持诗特有清气，较张正见大殊。其与陈后主酬唱诗翻不多见，大抵入隋后作一往悲长，江总持诗如梧桐秋月，金井绿荫之间自饶凉气。”推崇江总诗的清气和悲情，并指出其创作以入隋为界的诗风变化。其实，从上文可见，在仕陈之前的岭南流寓期间的诗作，江总诗也是以清情见长的。尔后经过陈后主时期再入隋，可以说，江总的诗是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发展过程的。而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在当时很多的南徙文人身上，在其北归之后都有着或隐或显的体现，这也是岭南文明最灿烂的光华、最重要的贡献所在。

文明因交流而共生，而精彩。

这一批批从中土来到岭南的士子文人，或为官，或贬谪，或流寓，他们的迁徙，恰似那一只只南飞的鸿雁，“鸿雁于飞，肃肃其羽”（《诗经·小雅·鸿雁》），振动着它们未必光鲜又略显涩重的羽翼，衔着中原文明的种子，播撒在岭南这片原本荒僻的土地上，使之开出灿烂的文明之花。当时节转换，这一只只北雁，又裹挟着南方泥土的芬芳，重回人们的视野之中。而此番归来，由于独特阅历的锤炼，无论是其人生或艺术的境界，都有了根本的改变、提升。泰戈尔诗云：“天空没有痕迹，但鸟儿已经飞过。”这些南来者留在岭南文化长空中的，却是长长的不能抹去的痕迹。

今天，当我们不断地回望这片天际，其肃肃振羽之声，犹然在耳畔回响。越是回望，越是深深地感到来路之艰难；越是早期，文明的交流便越见步履蹒跚。然而，唯其如此，也越加感受到前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努力之可贵可敬。“心逐南云逝，形随北雁来。故乡篱下菊，今日几花开。”江总的这首《于长安归还扬州九月九日行薇山亭赋韵诗》，以自身的际遇，不期然中为文明的交流作了最形象的譬喻。“今日几花开”，正可借以为文明之花的隐喻。只要花开，便是灿烂。在这首小诗中，作者再一次借用“雁”的意象。如果说，岭南时期的“不及孤飞雁，独在上林中”“终谢能鸣雁，还同不系舟”“去云目徒送，离琴手自挥”，大雁还只是诗人情感投射的外在意象，这只“北雁”，则已化作诗人自身，已经与诗人合而为一。或许，再次的流离，使诗人顿感自己一生的身世浮沉，颠沛流离，不正如那反复于春秋之季、南北之间徙飞的鸿雁吗？或许，正因于此，江总终其一生，要反复地咏叹着“雁”的意象，追问“雁”的意义。而凭借着这只“雁”的意象，我们又仿佛体味到诗人身上岭南文学形象的如影随形，一脉相承。

虽然在早期岭南文明的发展中，更多的是受到中土文明的泽被，但文明的发展不会是单向度的，正如鸿雁之南飞北归。两晋南北朝后，朝廷在岭南设置的州、郡有快速增长。与之相对应，岭南这个词也在这个时候开始在各类文献史籍中蔓延开来了。这是来自岭南文明的潮流汇入。一场侯景之乱，让南朝政权摇摇欲坠，但对于岭南，却不期然迎来一次天赐良机。岭南文明与中原文明渗透互动的步伐因此加快，一个更加丰富鲜活的岭南形象已经进入到更多人们的视野中。



他是岭南地区第一位经由科举登临相位之人，也是唐代及之前官职最高、影响最大的粤籍历史人物。他以相业与诗文并举昭灼后世：他是唐玄宗心目中的“文场之元帅”，是开启山水诗“清澹”一派的盛唐诗宗；他亦是史家公认的“开元贤相”，《资治通鉴》以“尚直”一词概括其政治表现，“风度得如九龄否”更是一度成为唐玄宗选拔官员之标杆。

张九龄

清正“尚直”的诗人宰相

文 郭珊 黄楚旋



郭珊，1980年出生于重庆。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职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日报》文体新闻部，历任记者、编辑、主任助理、副主任。曾获奖项：2011年、2012年两次荣获中国台湾联合报文学奖评审奖（散文、短篇小说）。曾参与撰写以下出版物：《我这30年：10位文化名人口述改革开放》《岭南记忆：走进广东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纪广东学人》《世纪广东美术家》。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这句诗出自《唐诗三百首》开篇第一首《感遇·其一》，诗人用春兰秋桂的芬芳美质，抒发了自己追求清操发自内心、非为虚名的高雅志向。

这首诗的作者，便是唐代著名的诗人宰相张九龄。他的另一首《望月怀远》中的千古名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更是家喻户晓、广为吟诵。

张九龄，字子寿，唐代韶州（今广东韶关）人，是岭南地区第一位经由科举登临相位之人，也是唐代及之前官职最高、影响最大的粤籍历史人物。他以相业与诗文并举昭灼后世：他是唐玄宗心目中的“文场之元帅”，是开启山水诗“清澹”一派的盛唐诗宗；他亦是史家公认的“开元贤相”，《资治通鉴》以“尚直”一词概括其政治表现，“风度得如九龄否”更是一度成为唐玄宗选拔官员之标杆。张九龄在生前身后受到历朝历代从官方到民间的普遍尊崇与景仰，赢得了“自古南天第一人”的旷世美誉。

2020年适逢张九龄辞世1280周年。韶关现存有张九龄故居、张九龄墓、张九龄纪念馆等相关遗址。近年来遍布辖区三江六岸的网红打卡地点——“风度书房”，其灵感同样来源于“九龄风度”。今年1月，占地面积超1.4万亩的韶关张九龄纪念公园和韶州历史文化博物馆同时宣布动工。“九龄风度”被重新定义为“以民为本，德望为先，才杰廉明，尚直宽和”，注入了崭新的时代内涵。

天赋非凡，王佐之才

张九龄（678—740）出生于韶关一个地方官宦家庭，祖上是中原移民。七岁即聪慧能文，十三岁时就向广州刺史王方庆毛遂自荐，赢得后者“此子必能致远”的赞赏。

在韶关民间，至今仍流传着许多张九龄的传说，流传最广的便是“捉鼠解朝廷”的故事：相传，张九龄幼时每天晚上都勤奋读书，可书桌上用于研墨练字的墨块常常不知所踪，后来发现原来是老鼠频频将墨块叼走。于是他略施小计，将老鼠捉住，装进一只木箱并投入水中，并写上四行诗句：“韶州张九龄，解鼠上朝廷。若然解不到，学子不安宁。”出人意料的是，木箱竟然逆水北上，周围人见了无不啧啧称奇，纷纷感叹张九龄从小就有遵循法纪的意识，更有不同于常人的非凡威力，竟能使木箱逆水而上。虽然不同版本在情节上略有出入，但这个故事足见张九龄在百姓心中深深烙下了勤奋好学、天赋超群的印象。

与此同时，韶关还出现了另一位名人——六祖惠能。虽然他比张九龄年长四十岁，但在许多民间流传的故事里，两人相互赏识，更成了忘年

之交，留下许多交往的佳话。据传，张九龄的父母虔诚礼佛，常常带着年幼的张九龄诵念佛经、到大梵寺听六祖大师讲经说法，张九龄因此小小年纪便熟读许多经文。但奇怪的是，他无论如何就是不肯上香，也不愿拜佛。每当别人问起缘由，他便引述六祖大师所言：“功德须自性内见，不是布施供养之所求也。”（《六祖坛经》）他认为，佛像不过是泥巴或木头制成，何来天生灵性之说？故而“佛心”只能依靠个人的“内修”，从“本性”之中探寻，不是光靠表面形式上的顶礼膜拜就能达成的。听者半信半疑，便到大梵寺亲自请教六祖大师，得到的答复是：“九龄小施主天赋极高，将来定在众人之上，天子之下，所以他只朝天子不朝佛。他之所言正是贫僧之意也。”（参见朱德瑞《贤相张九龄》[①]）

此外，关于张九龄，韶关当地还流传有“以诗换故事”“撰拟对联”“为民请命”“宰相粉”等代代口耳相传的故事。这些传说故事虽有一定的杜撰和夸张成分，但在某种程度上都印证了张九龄在民众心目中的传奇形象。

另一方面，这些民间传说也有一定的史实基础，例如许多故事都是基于张九龄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的过人特质发展而来。历史上，张九龄曾多次参加不同科目的科举考试，均登高第。弱冠之年的他应进士考，一举高第；706 年秋，29 岁的张九龄赴西京先登进士及第，次年再于“材堪经邦科”登第，进入仕途，被擢为秘书省校书郎；继而又登“道侔伊吕科”高第，升为左拾遗。几经沉浮之后，官至中书令，左迁右丞相，再贬荆州长史，其政治生涯几乎横跨了整个“开元盛世”。

“今日得卿，当以经术济朕。”这句话出自玄宗之口，同样是对张九龄“王佐之才”的认同。开元二十年（732 年），张九龄以工部侍郎兼知制诰侍玄宗北巡，祠后土（举行祭祀大地之礼）之时，奉命撰《祠后土赦书》。在未打草稿的情

① 朱德瑞：《贤相张九龄》，广州：花城出版社，2011年。

张九龄雕像



况下，他成竹在胸，一气呵成，写了足足十三张纸，一改玄宗以为张九龄仅仅是“儒学之士”的看法（参见徐浩《唐尚书右丞相中书令张公神道碑》）。

又有《开元天宝遗事》记载，玄宗李隆基曾于勤政楼以七宝装饰成一个状同山脉的宝座，座高七尺，“召诸学士讲议经旨及时务，胜者得升”。而其中唯有张九龄能够论辩自如，让其他学士无法望其项背，因而得升此座，其余众人都从未享此殊荣，此事一时间被传为美谈。

犯颜敢谏，公私分明

“海燕虽微渺，乘春亦暂来。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张九龄在其所著的《曲江集》存诗中，曾自比为一只来自南方的渺小“海燕”，有幸乘春来到长安“玉堂”庭前（《咏燕》）。诗里提到的“春天”，指的便是唐代国力的强盛以及在此期间逐渐成形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典章制度——科举取士制。士人应举，不必经过推选，可“投牒自应”（自由报考）。唐高宗时期又出现了在京师以外定期选拔人才的“南选”制度，岭南更是被列为征选的重点区域（《旧唐书·职官志》云：“其岭南、黔中，三年一置选补使，号为南选。”）。这些政策为像张九龄这样出身遐远、来自社会中下层、受过良好教育的南方知识分子打开了施展抱负的空间。

《曲江集》中孤根、孤桐、孤雁之类的自喻随处可见，一方面展现出作为诗人的张九龄贞洁孤高的性情，另一方面“常恐横议侵”等字句也流露出深切的忧愤与孤独感。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忠直耿介、一丝不苟的个性有关。正如其外甥、书法家徐浩在《唐尚书右丞相中书令张公神道碑》中所言，张九龄“善恶太分，背憎者众”，以致“百犬吠声，众狙皆怒”，“每读韩非《孤愤》，涕泣沾襟”。而《孤愤》正是韩非有感于战国时期的韩国“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的局势而写成的（参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对于张九龄的“尚直”，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等史料记载，唐玄宗即位后，才蒙“圣恩”赏识拔擢的张九龄便恪尽谏官之职责，上奏指出玄宗未进行“郊祀”（又称“郊配”，即在国都郊外举行祭祀祈福仪式），不符旧礼：“自古继统之主，必有郊配，尽敬天命，报所受也。不以德泽未洽，年谷未登，而阙其礼。”（参见《新唐书》本传）他指出，自古以来，继承帝业的君主都是受命于天，因此必定要行郊祀之礼，不能因为上天还未降泽于民、年岁尚未丰收，就不去完成应尽的礼节。他还有策略地梳理历代的做法，援引周公姬旦辅佐成王、暂时摄政时尚且行郊礼的例子，以及西汉大儒董仲舒、汉朝丞相匡衡论述郊祀的言论，以供唐玄宗采纳，从而达到劝导君王的效果。虽然这些“君权神授”的言论，在今天看来未能脱离封建思想的窠臼，但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张九龄循章遵制、犯颜敢谏的从政品质。

随后，他不惧官秩低微，上书首席宰相中书令姚崇，直陈其因循私情致使用人失当，导致“浅中弱植之徒，已延颈企踵而至”（《全唐文·上姚令公书》），劝谏他应远离谄佞浮躁之人，提携品行纯厚之士，甚至敬请姚崇“清省自修”，以免助长趋炎附势之风。对于张九龄的提醒，姚崇亦予以重视，“退惟自省，惭惧亦深”（《全唐文·答张九龄》），在任人用贤问题上，多参考张九龄的建议。王夫之曾评价张九龄进奏于姚崇一事，可以看出其“行己待物”之道（《读通鉴论》），足见其“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怀。

身在人事关系复杂微妙的中央朝廷，张九龄始终坚持“愿酬明主惠”（张九龄《初发道中赠王司马兼寄诸公》）的热切盼望，“常密有陈奏，多见纳用”（《旧唐书》本传），其尽忠职守的忠臣风仪也因此愈显清晰。在《上封事书》中，张九龄把当时的水旱之灾与刺史县令的任用相联系，指斥朝廷用人之失，他写道：“今六合之闲，

元元之众，莫不悬命于县令，宅生于刺史……古者刺史入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莫不于其所重，劝其所行。”洋洋洒洒，阐明吏治清明对于民生疾苦的重要作用，而现状却引人忧虑：“今朝廷卿士，入而不出，于其私情，遂自得计。”这篇上疏直指滥竽充数者众，“多非其任，徒有其名”，引起玄宗警觉，继而引发一番人事变动，自然就不可避免地触及相关一批朝廷中人的核心利益，进而影响到张九龄与姚崇等朝中高官的关系。最终，他因“封章直言，不协时宰”（徐浩《唐尚书右丞相中书令张公神道碑》），与姚崇关系日趋紧张，不得不于716年秋辞官南归。

哪怕是对有恩于自己的“贵人”，他照样是公事公办，不顾情面。开元六年（718年），张九龄因开通大庾岭有功，重返朝廷，拜左补阙。《新唐书》载，继姚崇之后担任宰相的张说一向对其才华颇多赞美，常说“（九龄）后出词人之冠也”，多番向玄宗大力举荐。两人私下还曾互通谱系，认为同宗。

然而，开元十三年（725年）玄宗封禅泰山之时，张说趁机将其亲信列为随行人员，借机加官赐爵，遭到了时为中书舍人（负责起草诏令）的张九龄的强烈反对、不避亲仇。张九龄认为，“官爵者，天下公器，先德望，后劳旧”（参见《旧唐书》本传）。官爵乃“天下公器”，应当先考虑道德名望高的人，不以个人背景为衡量。若将公器用作犒劳旧部、拉拢人心之私用，必定会令“四方失望”，招致讥谤。张说却认为“悠悠之言不足虑”，不予采纳，不久果然引起朝廷内外的指责，最终遭到御史中丞弹劾而罢相。张九龄也因与张说往来密切而受到牵连，由京官外放为冀州刺史。

守正嫉邪，远见卓识

从727年开始，张九龄先后在洪州、桂州等地任职，至731年任秘书少监兼集贤苑学士副知院事，第三次重回大唐权力中心，此后一路升至宰相，但依旧“遇事无细大皆力争”（《资治通鉴·唐纪三十》）。特别是在重大人事任免、奖惩等问题上，他不惜屡次“犯上”，最终遭到罢黜。

对于官员录用一事，张九龄一向秉持儒家选贤任能的观点。他认为用人应视德才为先，不以个人资历功勋为标准；宜唯才取实，不以个人亲疏喜恶为依据；以实绩为重，不以个人背景名望为衡量。早年他曾四次参与吏部品评应举者等第的考核工作，素来以量才“平允”著称，“所推引皆正人”（参见《新唐书》本传）。

担任宰相期间，他曾力阻玄宗启用牛仙客为尚书。在他看来，牛仙客系自基层胥吏提拔上来，虽有地方治理的经验，但终究学识不足，“目不知书”，不具备出任尚书这样的中央朝廷柱石应有的素质。甚至在玄宗明显偏向于听从李林甫建议、怒而色变责问：“事皆由卿邪？”时，张九龄依然“固执如初”地坚持自己作为宰相“不敢不尽言”的严正立场。

而南宋洪迈所著的《容斋随笔》提到，张九龄曾经为牛仙客的父亲撰写《赠泾州刺史牛公碑》，评价称“仙客为国之良”，对牛仙客在凉州都督任上的政绩予以了充分肯定，足见张九龄与牛仙客“非有夙嫌，特为公家忠计耳”。

至于张九龄反对玄宗拜李林甫为相，虽未有具体说明，但张、李二人为官、行事，一个“守正嫉邪”，一个“口蜜腹剑”；一个不愿亏耗国用，主动辞谢皇帝赏赐的田宅财物（《让赐宅状》），一个贪墨自肥、货赂公行，可谓南辕北辙。

《开元天宝遗事》载，唐玄宗曾召集近臣宴饮观鱼。李林甫趁机阿谀，说鱼儿鲜活可爱，“赖陛下恩波所养。”而张九龄却很不“识趣”地反唇相讥，称池子里的鱼有如“陛下任人”，徒为妆点景致、助儿女之戏，令玄宗甚为不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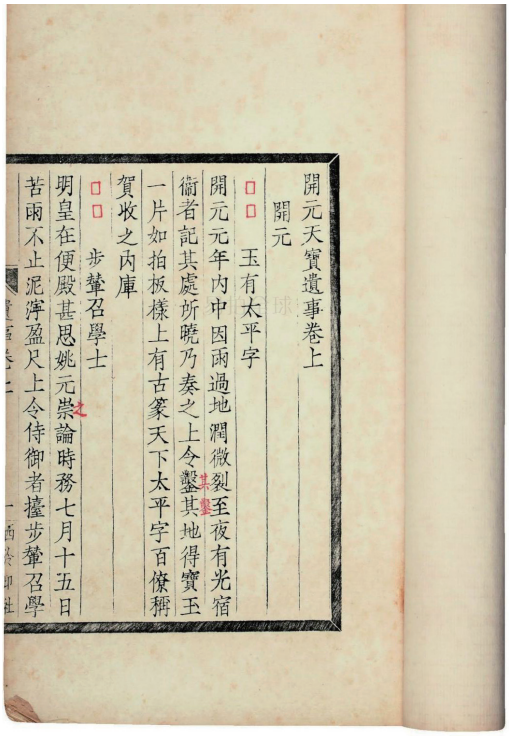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初冬，唐玄宗在东

都洛阳，本拟次年春西还长安，因故打算即刻返回。张九龄考虑到“农收未毕”，建议推迟动身，以免沿途扰民。而李林甫却深明“圣意”，说天子往来行幸何必择时，主张即日西行。

在太子废立一事上，两人更是爆发激烈冲突。李林甫为巴结宠妃武惠妃，撺掇玄宗废太子李瑛，改立武惠妃之子、寿王李瑁为王位继承人。对此，的张九龄极力劝谏，向玄宗历数历史上晋献公、汉武帝、隋文帝轻易更立太子导致国家内乱的前车之鉴，请求玄宗谨慎处理。而后，李林甫与武惠妃暗地派人传话，告知张九龄如愿襄助，“宰相可长处”，不料遭到其严词怒斥。张九龄将此事奏报玄宗，于是太子之位暂时得以保全（参见《资治通鉴·唐纪三十》）。

开元后期，玄宗渐渐疏于理政，溺于享乐，对待张九龄的态度也愈发微妙。一方面，对于张九龄在自己寿宴上献上一部论述前世兴废、意在

《开元天宝遗事》



警示的《千秋金鉴录》当作贺礼，他有意展示出宽宏雅量，下令褒奖；另一方面，又不满其频频“忤旨”，甚至怀疑其阴结朋党，遂怒而逐之。

张九龄曾断言李林甫“恐异日为庙社之忧”，又观察安禄山举止骄蹇，预言其将来必反，都被事实所应验，更突显了张九龄的见微知著与过人胆识。“李林甫无学术，见九龄文雅，为帝知，内忌之。”（参见《新唐书》本传）张九龄才华横溢，加之反对李林甫入相，被李林甫视为眼中钉，时时乘机大肆诋毁，疏远君臣关系。李林甫为相十九年，绝尽言路，党同伐异，为日后安史之乱爆发埋下祸根。

同时，安禄山以范阳偏校入奏，张九龄即与同僚裴光庭预言道：“乱幽州者，此胡雏也。”及至安禄山征讨奚、契丹反叛者失败，被执送京城，张九龄即刻奏劾称不可赦免：“禄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诛之。”（参见《新唐书》本传）而玄宗却惜其骁勇，以不能“误害忠良”为由，最终放安禄山回到范阳，直至其一步步拥兵自重，割据河朔，终致“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白居易《长恨歌》）。

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逃亡四川，此时张九龄辞世已有十多年。忆起这位公忠体国的旧臣的告诫，玄宗悔恨不已，落泪不止，对其下诏褒奖、追封官职：“正大厦者柱石之力，昌帝业者辅相之臣。生则保其荣名，殁乃称其盛德……”，还特地派人前往韶州祭奠，抚恤张氏家人（参见《旧唐书》本传）。

开通庾岭，造福于民

“始终行一意，无乃过愚公。”（张九龄《杂诗五首》）回顾其一生，张九龄对朝廷的忠诚从未改变，哪怕数次直谏为最终的罢相埋下伏笔，他依旧坚持忠耿立场毫不动摇。对此，唐玄宗也心知肚明，还曾评价他为“直道之心弥固，謇谔

（正直敢言）之操逾坚”（《全唐文·罢侍中裴耀卿中书令张九龄为尚书左右丞相制》），堪为百官仪表。《唐诗纪事》载，罢相前夕，唐玄宗特命高力士赐给张九龄一柄白羽扇。当时即将入秋，扇子很快便成无用之物，张九龄顿时明了其中的用意，立即作赋表白心迹——“苟效用之得所，虽杀身而何忌”（参见《白羽扇赋》）。

无论荣辱得失，他并未因仕途遇挫而消沉，外放期间仍尽心竭力，在农桑、赋税、商贸、基建等领域，同样表现出远见卓识。“九龄风度”亦因张九龄务实肯干的作风，彰显出鲜明的岭南人文色彩，实现了“仰望星空”和“脚踏实地”的辩证统一。

例如在任河南开稻田使期间，张九龄“教河南数州水种稻，以广屯田”（参见《旧唐书》本传），试图在中原地区普及岭南先进的水稻种植技术，缓解当时关中常有的饥荒。这个设想虽在当时未能成功，但却在北宋成为现实，增加了中原的粮食产量。范仲淹在《晋祠泉》中就曾描述过黄河流域“千家溉禾稻，满目江乡田”的景象。这足以证明张九龄在发展农业方面的防微杜渐与超前眼光。

更具典型意义的，是他在第一次南归期间，见秦代开凿的梅关古道年久失修，“人苦峻极”，便向朝廷献状请开新路，将岭南的丰富物产运转至内地，达到补充财政府库、满足江淮地区供应需求的目的。

大庾岭，为中国南方五岭之一，是一道横贯于江西大余和广东南雄两地之间的天然屏障。自秦统一中原后，岭南一直被人们视为“瘴疠之乡”，因地势险阻，与中原地区鲜有交流。时值唐朝“开元盛世”，以黄河流域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王朝势力亟需扩张发展；同时，以广州为核心的岭南地区加速与海外通商的步伐，官吏贪污腐化、中外商贸冲突事端也因“天高皇帝远”而势头渐长。因此，兴建一条沟通南北、加强中央对岭南的监管治理的交通要道已刻不容缓。此时南归的张九龄便主动“献状”，担下了修建这条便利要道的任务。

在玄宗的支持下，张九龄于开元四年（716年）冬，以左拾遗内供奉身份主持筑路工程，勘测、设计路线等工作均亲力亲为。针对“千里连峰匝，纡回出万寻”（叶燮《度大庾岭》）的大庾岭，张九龄提出避险筑路的主张，“相其山谷之宜，革其坂险之故”，大大提高了该路的通行能力。工程启动时正值农闲时节，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踊跃拥护，不到两年便提前竣工。

大庾岭路修好后，这条古代的“京广线”长十多公里，“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平坦的新路上可以并行五辆车，四通八达的道路让物资转运省去许多劳力，过往的高崖深谷也不再构成威胁，沿途还设有驿亭，因地势艰险而一度中断的进贡、通商队伍，又恢复了来往不绝的繁荣景象（参见张九龄《开凿大庾岭路序》）。

明朝大学士丘浚《唐丞相张文献公开凿大庾岭碑阴记》有言：“兹路既开，然后五岭以南之人才出矣，财货通矣，中朝之声教日远矣，遐陬之风俗日变矣。”直至1936年粤汉铁路开通之前，大庾岭路一直为沟通南北、振兴文教、促进融合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沟通长江与珠江水系的关键节点、联结海上与路上丝绸之路的桥梁纽带，泽被后世一千多年。

路通则政令通。大庾岭开通后，“商贾如云，货物如雨，万中践履，冬无寒土。”（《南安府志·南安新修岭路记》）岭南地区在唐朝乃至历朝历代中得到有序治理、加速开发，促进了大批移民的迁徙与流动，极大地推动了岭南与中原地区各方面的交流。中原的农耕技术、文化声教事业在南方播散，岭南的丰富特产、南越珍品又源源不断地运抵中原。得益于此，岭南地区与中央的联系日益密切，南北民族与文化共同融合，演变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于“穷荒”、起于“偏隅”的张九龄，不仅没有因其“领海孤贱”而妄自菲薄、轻言放弃，更是竭智尽忠、知难而进，“缘磴道，披灌丛”，毅然重开大庾岭路，为社稷、国家开创不朽功绩，对南北文化融合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有感于张九龄修筑大庾岭路的精神，后人在此地筑有“张文献公祠”来纪念张九龄。清代诗人杭世骏在《梅岭》中写道：“荒祠一拜张丞相，疏凿真能迈禹功。”清代诗人张衍懿《度梅岭》又作诗赞曰：“拔起危峰万仞雄，势临百粤控南中。人从丹壁千盘上，路入青天一箭通。古碣尚留唐相迹，荒祠谁祀越王功。”这些诗文无不盛赞梅关雄伟，以及张九龄开凿之功。

大庾岭新路开通后，张九龄命人在道路两旁广种梅树，使冬季过关旅人能在此处欣赏梅花风光。此后历代都在岭上植梅，每年新春伊始，大庾岭古驿道上朵朵梅花凌寒盛放，常有“南枝既落，北枝始开”的奇景。人们又按岭路原貌，“悉用碎石块平砌其中，而青石长条固其边幅”（《南安府志·南安新修岭路记》），使之修缮如初，让每个游览过客在欣赏大庾岭新颜的同时，不忘张九龄开凿驿道的历史功绩。

知人善任，风度清和

“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感激有公议，曲私非所求。”（王维《献始兴公》）为政不求名位爵禄，而在乎民生福祉，王维、孟浩然、杜甫、王昌龄、苏轼等文坛大家都曾为张九龄的高风亮节所动容，以诗文相颂。

张九龄历任官职皆为“清要”之属，广义而言，即“那些须用脑、用心、比较高尚的官职”（赖瑞和《唐代中层文官》）[②]。他长期处于政治核心地带，终身注重人才选拔与授职之道，“共理分荆国，招贤愧不材。”（孟浩然《荆门上张丞相》）所选士人皆深得时望，提拔了一批广为世人所知的能人志士，如中书侍郎严挺之、尚书左丞袁仁敬等，“荐士满公车”（王维《上张令公》），使朝堂人才济济。在他的垂范激励之下，韶关从唐至清，共涌现进士近 200 名，凭人杰地灵而闻名遐迩。苏轼曾赞誉张九龄曰：“唐开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者，惟张九龄一人。”（《张九龄不肯用张守珪、牛仙客》）

“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张九龄《感遇其七》）橘树果实之所以经冬犹绿，并非由于南方气候温暖，而是出于其耐寒天性。这首诗赞颂橘树，更是比兴诗人自己，表达了在逆境中坚贞不变的道德品行。王夫之曾将张九龄推许为“抱忠清以终始，夐乎为一代泰山乔岳之风标”（《读通鉴论》）。纵观张九龄其人其文，无论是外放南归、再召回京、陪驾出巡、垦治偏郡，等等，无不秉承“尚直”品性、以勤政尽责为准绳，为后人树立起文人士大夫的榜样，至今不啻为世人为官、从政可资参考的一面“明鉴”。

然而，张九龄未能逃出“自古忠臣多悲切”的命运怪圈，折射出封建皇权专制之下的诤谏监督体系的根本缺陷——吏治风纪如何，严重依赖于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意志与政治素养，谏官的进言与封驳是否有效，最终都取决于皇帝是否采纳，而皇帝也并非总能虚心接受他人指正，真正的廉洁奉公者往往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位列凌烟阁二十四臣的魏徵，就曾因顶撞唐太宗李世民而险些惹来杀身之祸。魏徵因此感慨：“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贞观政要》卷二）只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才能遏制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滋生，这也是张九龄的故事留给今人的深刻启示，值得我们重视和反思。

② 赖瑞和：《唐代中层文官》，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9月。

叶曙明，广东作家，近代史研究者，颇具代表性的广东历史文化专家，有“广东文化的代言人”之称。1980 年起开始写作，并从事图书编辑出版工作，曾任职于花城出版社、广东省出版总公司、广东潇洒杂志社、广东教育出版社。有著作《草莽中国》《军阀》《重返五四现场》《百年激荡：20 世纪广东实录》等。



山与海之间

文 叶曙明

广州，不只有早茶和十三行

八次兴毁，千年沧桑

首部广州城的文学传记

《广州传》

茫茫无涯的大海，波涛缓缓地涌起，缓缓地沉落，又缓缓地涌起，有如大地的呼吸，一起一伏；隆隆的巨响，仿佛来自大地腹腔深处，随着海浪的节奏，滚滚而来，滚滚而逝；无论吹东南风，还是西北风，无论是黎明，还是黄昏，海浪从不止歇。天地之间，除了水，似乎什么也没有了。

但终于有一天，浩瀚的水面，露出一块粗粝的礁石，最初只是一个小黑点，有时会被滔滔海水淹没，不见了踪影，但几天之后又露了出来，还渐渐扩大，渐渐高隆，成了一个小岛。小岛渐渐长大，海水再也淹没不了它了。不知从何时起，岛上的岩石缝隙间，长出第一株青翠的小草。第一粒草籽也许是风吹来的，也许是候鸟带来的，也许是从海底爬上来的，总之它就这么不可思议地来了，而且生根发芽了。

海面的岛屿越来越多，渐渐连成一片，迎接着来自遥远北方的千百条河流，河水以雷霆万钧之势，穿过南岭山脉，把无穷的沙砾推向大海。经过千万年的地貌变迁，海水退却，陆地隆起，一片陆地形成了。后来人们把这个地方称为——珠江三角洲。

广州在珠江三角洲北缘，再往北就是绵延千里的南岭，西江出肇庆羚羊峡，北江出清远飞来峡，东江出博罗田螺峡，三江来水，汇成浩浩珠江，最后通过八大门河口，奔流入海，形成了众多的溺谷和漏斗湾。南海古时有“涨海”“沸海”之称，其磅礴恣肆的气势，可以想及。清咸丰三年（1853 年）《顺德县志》有一段记载：“昔者五岭以南皆大海耳，渐为洲岛，渐成乡井，民亦藩焉。”海潮一日两涨，枯水期江水势弱，海潮从各个河口涌入珠江三角洲腹地，甚至远溯至清远山区。

在距今约六七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更多岛屿浮出水面。广州的海珠区，也在这时成为一个大岛。海珠区的七星岗，只要往地下挖几米，就会遇到藏着大量海洋软体动物的贝壳和微体化石的淤层。地理学家 1937 年在七星岗发现了海蚀崖和海蚀平台的地貌结构，从而认定这里曾是南海溺谷湾的一部分。

从地理学来看，溺谷湾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海岸在长年累月的潮水冲击下，会堆积形成沙堤。七星岗东南方的松岗，就横亘着一道高出珠江准点平原一米多的沙堤。这一发现，吸引地貌学者纷至沓来。随后，他们在赤沙、鹭江、赤岗，陆续发现了古沙堤的痕迹。遥想当年，这个熙熙攘攘的闹市区，曾经浪涛汹涌。

人们在中山四路发掘出一个秦代遗址，有部分学者判断其为造船的船台，这意味着，秦汉时中山四路以南，便是溺谷湾的滩涂水岸，否则船只无从下水。在遗址下面的淤泥中，采到了几十枚泥蚶——一种生活在咸水中的软体动物。有趣的是，它们的贝壳是闭合的，属于自然死亡，并非人们食用后丢弃的空壳。这表明当时中山四路以南的珠江水，就像海水一样是咸的。

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广州人仍习惯把穿城而过的珠江称之为“海”。天字码头、沿江路一带被称为“海皮”；渡江叫“过海”；城厢内外有多条“海傍街”。有人认为这只是方言，并非真的说大海。但早在东汉，《汉书》中就说番禺（广州）“处近海”，作者班固是陕西咸阳人，应该是说关中语的，但关中语并没有把江说成海的习惯。三国东吴中书丞华覈上表举荐交州刺史陆胤时，亦称广州“州治临海，海流秋咸”。华覈是江苏丹徒人，也不懂广州方言。另一位交州刺史步骘评价广州地理：“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他把广州形容为海岛，其实它更像一个半岛。步骘是江苏淮阴人。唐代诗人高适留下了诗句：“海对羊城阔，山连象郡高。”他是河北景县人。宋代诗人杨万里诗曰：“大海更在小海东，西庙不如东庙雄。”他笔下的“大海”，是指扶胥南海神庙一带，而“小海”则指今荔湾地区。杨万里是江西吉水人。

这些外省人都不熟悉广州方言，却不约而同采用了“海”的说法。可以推断，广州人把珠江称为海，既不是方言，也不是井蛙之见，把江河误作大海，而是千万年前对大海的记忆，代代相传，留存下来了。濒海地区，往往受咸潮影响。广州直到明朝，日常生活仍深受咸潮的困扰，每年冬季枯水期，咸潮便会从南海汹涌而至，直灌入城，连井水都是咸的，每逢夏秋台风季节，经常水漫羊城。

从侏罗纪至白垩纪，燕山期岩浆不断大规模侵入，至第三纪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广州地区形成了瘦狗岭断裂带、广从断裂带和广三断裂带这三大断裂带。沿海地貌出现先降后升的变化，从海里冒出的沙洲、岛屿越来越多，南沙、番禺至虎门出海口，大小岛屿，星罗棋布。广州著名的三石：海珠石、海印石、浮丘石，原来都是沉浮于海中的小岛。

宋人方信孺形容广州的地形是“万山滚滚尽东来”。大庾岭自北逶迤而来，至广州分为三十余峰，逐级而下，白云山为第一级，越秀山为第二级，禺山、番山为第三级。明末清初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描述：“自白云蜿蜒而来，为岭者数十，乍开乍合，至城北耸起为粤秀，落为禺，又落为番。禺北番南，相引如长城，势至珠江而止。”

番、禺二山在南汉时已经消失。考其位置，番山大约起于今越华路，沿旧仓巷、文德路向南伸至文明路，西及北京路、西湖路。禺山大约起于广大路西端路口，经财厅前、南越王宫博物馆、城隍庙，至仓边路与中山四路交会处止，以聚星里为最高处。从高处俯瞰，二山略呈丁字形，山势并不算雄大。屈大均推测，番、禺二山应该很大，所以番禺县才会以它们命名，不会只是城中这两座“特培塿耳”的小山。

但屈大均没有解释，为什么一定是番禺县以番、禺二山得名，而不是反过来？历史的真相，也许是任嚣或赵佗在这里建立郡治时，登山临水，一时兴起，才把这两座无名小“培塿”，以番禺县的地名，分别命名为番山、禺山呢？

远古时代，番、禺二山与越秀山是一体的，是同一座山的不同山头，并非截然分开的三座山，正如越秀山还有越井岗、象岗、蟠龙岗、桂花岗、木壳岗、长腰岗、鲤鱼头岗等不同的山头。1954年在越秀山镇海楼后面，发现唐代天祐三年（906年）的王涣墓，墓志有“番山之左，越井之下，以卜以筮，可封可树”之句，似乎证明越秀山也叫番山。其实，所谓“番山之左，越井之下”，更多是出于骈文骊句的要求，追求对仗工整而已。越秀山的北面是白云山。这两座山也是一体的，越秀山是白云山的余脉。蒲涧清溪，飞流直下，从濂泉向西汇入金钟塘，在上下塘转向南，在越秀山东麓一分为二，一支沿今吉祥路、教育路而下，从北京路西侧汇入仙湖（今西湖路）；另一支经今小北路、仓边路，从中山四路注入珠江，得名文溪。文溪宽阔浩大，风帆可过。仓边路一带，布满河汊水道、曲渚回湾，夹岸丰草绿缛，佳木葱茏，鸟鸣在枝，鱼跃在水。大东门以东，统称“东山”。南部虽有冲积平原（沙洲），但形成年代较晚，北部受瘦狗岭断裂带的挤压，连片的低丘台（岗），自北向南倾斜，延绵不绝，有蟾蜍岗、竹丝岗、木棉岗、柏子岗、马棚岗、螺岗、大眼岗、和尚岗、青菜岗、天圣岗、玉子岗、竹园岗、蚬壳岗、横枝岗、黄花岗、英雄岗、白灰牛、大云头、猫儿岗、象栏岗、大水牛岗、松岗、水均岗、龟岗、西元岗、木荫岗等，溪流沟壑，纵横交错，灌木丛生，野兽出没。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的《敕赐永泰禅寺碑记》，描述东山口的地理环境：“千金山列于左，印山列于右，观音、弥陀、马鞍、白云诸山当其前，州冈山拥其后，前临白云溪，后滨珠海水，高明幽雅，真胜境也。”

西门口附近，直到三国时，还是烟波浩渺的

水域。经地质钻孔，在今文化公园、天成路、大德路、宝源路、西堤、光塔路、大南路、大德路等地的地层下，都发现了蚝和泥蚶的贝壳。宝源路地层中发现的海贝，经鉴已有两千多年历史，说明秦、汉时代，这里还是水天相连。这也印证了《南海百咏续集》所说，西门口外，“汉魏时，此处尚属汪洋耳”。相传晋代葛洪在今中山七路的小岛浮丘石上炼丹，曾经从水井中捞出一丛珊瑚，大家都说这是海神献来的瑞物，于是把水井命名为珊瑚井。清代乾隆年间，有人在元妙观（今中山六路）开垦菜地，挖出了一条古船。广州，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因水而美，因水而荣，曾经是一座河道如巷、水系成网的水城。无数的河涌溪流，纵横交错，千回百转，滋润着广州大地，为这座文明古城带来无限的生机。屈大均曾盛赞广州水脉：“盖会城沙水气脉，起伏周环，有情有势，真天地造设之奇。”

岭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始于八千多年前，经历了四千多个春秋，进入青铜时代。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水处行舟的古越人，一直在南海之滨，过着狩猎捕鱼的生活，与中原纷乱不已的征战，似乎十分遥远。

“越族”常被人误以为是一个民族，其实它只是文人史家的杜撰，指向十分宽泛，最初是指商朝时活跃于河南、甘肃、陕西的某些部落族群；到战国时，变成指长江下游的越国；越国亡后，又变成泛指所有生活在中国东南部的土著。正如《路史》所说，越族“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虽然他们的语言、文化、习俗和社会结构，都不尽相同，却被一个模糊的“越族”概念统而括之。这种情况，就像 19 世纪广州人叫洋人为“番鬼”一样，并不具有任何人类学的意义。

广州人究竟是些什么人？有人说与北方人同

情满珠江



属蒙古人种，有人说是马来人种，也有人辩称马来人种就是蒙古人种的南亚类型，大家争论不休。种族的划分，为人的体格、相貌、肤色特征，赋予了强烈的社会内涵，更多时候，只是为了对不同人群作文化定位，把对角色的预期合理化而已。事实上，眼睛大小、颧骨高低、小脚指甲有没有分瓣、屁股有没有长蒙古斑，并不会引起文化的本质差异。

春秋战国时代，生活在西北黄土高原的人，把东南沿海的人称为越族，也是基于想象的一种“文化建构”，虚构成分大于事实。在这种观念之下，分布在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南部及两广地区的众多小部族，虽然互不相属，但统称为越族。它们的名称五花八门，有越常、瓯越、且瓯、南越、禽人、海癸、蛮扬等，如温州一带的人就被称为“东瓯”，广东的越族，被称为“南越”，粤西至广西一带的人被称为“西瓯”或“骆越”，有时会被统称为“瓯骆人”。

在南越人居住的两广地区，迄今已发现大量的旧石器时代文物，包括各种石制工具和人类化石，可证其文明历史，有自己的成长路径。但在中原人看来，南越也罢，骆越也罢，都是未开化的“南蛮”。战国或更早时期成书的《山海经》说南人“其为人人面有翼，鸟喙”，是近乎半人

⏩ 越秀山镇海楼（1929年成为广州市市立博物馆，1950年改名广州博物馆）



半鸟的怪物；成书于北齐（550—577）的《魏书》，也还是把南人形容为“鸟声禽呼，言语不同，猴蛇鱼鳖，嗜欲皆异”。唐朝名臣韩愈把岭南描写成“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汹汹”的瘴疠之地，一入岭南，便不作生还之想，嘱家人“好收吾骨瘴江边”。

在文化历史研究中，存在一个有趣现象：凡进入岭南的中原人，都被描述成“传播文明”的使者；如果某种优良的器物或技术，在岭南与中原都存在，那一定是从中原传到岭南的；岭南的每一个进步，都是在中原的教导下完成的；岭南文化的每一步发展，都是伴随着中原人的南迁而来的。“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在王道正统的眼里，岭南的文明史，就是一部接受王道教化的历史，最后也要通过出了多少举人、多少进士、多少状元，来接受中原正统文化的验收。这已成了民间与学界共同的思维定式。



屈大均曾说：“粤处炎荒，去古帝王都会最远，固声教不能先及者也。”似乎离帝王都会的远近，成了文明的指标，离帝王都会近则文明程度高，离帝王都会远则文明程度低。然而，帝王都的声教，并不是文明的唯一代表。各地都有自己的文明，是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以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创造出来的。这才是最恒久的、最基本的文化之源。

广州老城区（指越秀山以南地区）成陆较晚，旧石器时代，还是一片烟波。但到了新石器时代，随着越秀山下的陆地越来越多，成片的红树林，慢慢成长起来，杂花生树，草长莺飞，野猪、麂、鹿、猴和各种啮齿动物、昆虫，开始出没活动。从那时起，第一代的广州人，便在这里安下他们的家了。1954 年，海珠区中山大学的师生，在校园内的马岗顶，采集到几件新石器时期的双肩石斧和石镞，经专家考证，是四五千年前的遗存。这是在广州市区内第一次发现先秦文物。

1956 年，中山大学地理系在飞鹅岭（今华南植物园）附近也发现了石凿、石镞、有肩石斧、砺石、玉环、一些有印纹的软陶和夹砂粗陶片。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从化吕田多次发现史前社会的文化遗物。1961 年在增城金兰寺发现新石器时代至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存。1965 年在萝岗区暹岗、大岭岗南发现了几件古老的青铜器，不久又发现大批印纹陶片和石器。1999 年在萝岗发掘出很多春秋战国时期的硬陶器。

21 世纪以后，更多地处广州的先秦遗址重见天日。2000 年在增城石滩围、2006 年在萝岗隔田山、2008 年在增城猪头山、2013 年在萝岗来峰岗，都发掘出数量可观的先秦文物。2017 年

秋至2018年春，在黄埔区九龙镇汤村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之际的墓葬174座、普通灰坑111座、窑穴类灰坑19座、柱洞302个，出土陶、石、玉等不同质地的小件文物500多件。堆积之丰富，遗迹之复杂，令人叹为观止。

这些先秦遗址，大部分在东北郊，似乎离老城区越近越少，这就造成一种错觉：广州的文明程度，不如周边的深山野壖。其实原因是，直到秦朝，中山路以南、中山六路以西的地区，仍是大片水域与滩涂，退潮时烂泥盈积，涨潮时尽成泽国，人们只能选择在中山路以北，越秀山以南这段地势较高的狭窄地区居住，借着番山、禺山的山势，躲避珠江大潮和洪水的威胁。2009年在西湖路的大佛寺工地，挖出了广州老城区迄今唯一的先秦文化遗存。当年这里是番山西麓，林木繁荫，倚山临水，是个很好的聚居点。

广州自秦汉时任嚣立寨、赵佗建城，一直是岭南的政治文化中心，许多文化遗存，因城区不断地移山凿湖，大兴土木而遭到破坏，不被南越国破坏，就被南汉国破坏，逃得过赵宋，也逃不过朱明，每次战乱，都被摧残一番。民国以后，作为一个现代城市，广州进行了几轮大规模开发建设，古迹遗物更如疾风吹箨、虎荡羊群一般，十不存一了。历史的露往霜来，就这样无情地把我们的记忆，一点一点淡化。

但记忆不会被完全抹去。1982年考古人员在新市葵涌龟岗，发掘出石斧、石锛、砺石、网坠、纺轮等物，还有各种釜、罐、盘、鼎、钵、豆等器皿的残片。石器的形制，不再像旧石器时代那样单一不变，而是花样百出，用途越来越专门化；工艺也从早期的打制，发展成磨制。2000年、2002年在南沙鹿颈村挖出了大量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朝的陶、石器物和鱼骨、兽骨、贝壳等，甚至还有一具三千多年前的完整男性人体骨架。这两个遗址都在水边，自然环境与广州老城区很相似，让人可以展开想象，一窥远古时代先民的生活图景。

广州春夏秋三季，都是阑风长雨的天气，所谓“夏季东风恶过鬼，一斗东风三斗水”，加上老城区前有珠江大潮，后有白云山洪水，房子被淹浸和冲垮，乃家常便饭。为了应付这种地势卑湿、瘴气凝聚的自然条件，越人发明了干栏式房子。

在越语中，“干”是上面的意思，“栏”是房子。顾名思义，这种房子大多用竹竿、木棍、干草和泥巴搭建，分上下两层，上层用木柱架空，离地面约两米，搭梯子上下，供人居住；下层架空，用来养家畜或放杂物。有些房子倚山而建，后部建在山坡实地上，前部悬空，称为“吊脚楼”，算是半干栏式建筑。南宋人周去非对干栏建筑的描述是：“深广之民，结栅以居，上施茅屋，下豢牛豕。栅上编竹为栈，不施椅桌床榻，唯有一牛皮为裀席，寝食于斯。”他称之为“麻栏”。而在《魏书》和《新唐书》中，则称为“干栏”。晋朝《博物志》说：“南越巢居……避寒暑也。”其实主要是为了防水、防潮、防毒虫野兽，避寒暑倒不是最重要的。

在陆地生活的越人，喜欢把头发束成椎髻，或编成辫子。不同的发饰，往往成为一个部族的标志。他们用树皮或兽皮做成衣服来防寒，发明纺车后，可以纺织麻布了。大多人是赤足而行，上身穿左衽短衣，无领短袖，下身穿“无袴”短裤，其实就是用一幅布围起来，有的书称之为“桶裙”；还有一种衣服，是在一幅布上剪个洞，从头套入，称为“贯头”。越人有凿齿的习俗，青年男女到了一定年龄，就要硬生生拔掉一两颗牙齿，作为成年的标志。这无疑是一件极疼痛的事情。

虽然房子简陋，食物也很粗糙，风餐雨宿，备尝艰难，但并不妨碍越人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他们把本地出产的珠玑、玳瑁、象齿、贝壳、翠羽等，做成精巧的首饰，佩戴在身，倍显光彩照

人。在广州龙洞飞鹅岭、青山岗、菱塘岗一带，曾发现一只四千多年前的完整玉环，直径9.1厘米。在新市葵涌的遗址，有两块黑色页岩磨制的石环残段，颇为抢眼。它们原本是装饰用的石环，以当时的工艺水平来看，造型柔美，手工精致，钻孔和打磨技术，已十分高超。

广州先民讲究生活的质量，细节上并不马虎。在大佛寺的先秦遗址，清理出近两百块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的残片，可以辨认出是釜、钵、盘、罐、豆、尊、壶的残件。釜用来烹饪，罐用来贮存物品，盘和豆盛食物，尊和壶装酒水。不同的器皿，有不同的功用，大大小小，各司其职，井井有条。器物不仅要实用，而且要美观。从广州附近出土的陶器来看，器型普遍较小而且胎薄，有大口卷沿折肩的圈足罐，有圆唇弧腹圜底的杯形罐，有小口广肩鼓腹的圈足尊、圈足豆，有圆唇折沿敞口弧腹圜底釜。每件器皿都拍上花纹，尽量做得悦目娱心。纹饰以绳纹居多，包括细绳纹和线状绳纹，还有曲折纹、方格纹、云雷纹、条纹、网格纹以及三角圆点凸纹，有的绳纹互相交错，与圆圈纹、双圆圈纹、指甲纹、排列状戳印小涡纹等构成复杂而精细的图案，呈现质朴淳厚的味道，显示出一种典雅的审美眼光。这就是文明的表征。

不难想象，家里使用如此繁伙的器皿，说明他们拥有一定的物质生活水准。如果家无隔夜粮，吃了上顿没下顿，要这么多釜鼎钵罐做什么？自古“民以食为天”，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都是为了吃，食物是头等重要的。这些坛坛罐罐，第一用来烹饪食物，第二用来盛放食物，第三用来贮藏食物。住山里的人，每天奔走于山林，猎杀动物和采集野菜、野果；住水边的人，则划船出海，捕捞鱼虾蚝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都不太会耕种。只有住平原的人，才会面朝黄土背朝天，火耕水耨。广州山环水抱，大部分是冈地，可以耕种的平坦之地不多，而水陆物产丰富，人们自然会选择狩猎、渔捕、采集，而不是耕田，作为主要的营生。

广州人善造舟。《山海经》记载：“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所谓番禺者，即指今广州一带的百越先民，他们的历史，从上古时代开始，便与造船紧密相连。男人们个个体格强壮，活龙鲜健，上山是猛虎，入水是蛟龙。他们很早就学会了“刳木为舟”和编织渔网。把大树剖开，挖空中间，做成独木舟，在水上往来如风；绞动纺轮，用麻纤维编织渔网；把石制的网坠系在渔网下面，加快它的下沉，以捕捞更多的鱼蚌。渔民的装束，大多是“断发文身”，即剪短头发，在身体上刻画鱼龙纹饰，涂上颜料。《庄子》说：“越人断发文身。”《说苑》也说：“彼越……是以剪发文身，烂然成章，以象龙子者，将避水神也。”断发、剪发是为了方便水下作业，文身最初是想扮成鱼蚌同类，迷惑它们，后来变成了一种趋吉避凶的迷信。

珠江每月的初一潮涨，初四退；十五复涨，十八退。人们称涨潮期为“水头”，退潮至下一次涨潮为“水尾”。《羊城古钞》说：“春、夏水头盛于昼，秋、冬盛于夜；春、夏水头大，秋、冬小。”那时虽然没有月历，但善渔者根据天文气象，对潮水的涨退，了如指掌，“水头鱼多，水尾鱼少，不如沓潮，鱼无大小”。沓潮就是旧潮未退尽，而新潮初起最盛时，捕捞收获必大。这是他们的经验之谈。

猎兽也是先民重要的食物来源。在众多先秦遗址里，除了发现龟甲、蚬、蚌、螺、蚶等软体动物贝壳和鱼骨之外，还有鹿、野猪、豪猪的骨骼，鹿角和鳄鱼骨架。东汉广州人杨孚在公元1世纪写的《异物志》一书，记载了广州的三十多种动物，包括狐母、猩猩、

殃牛、大猪、麋狼、鼠母、鼯、灵狸、白蛤狸等，水里则有鲸鲵、鲛鱼、鼍风鱼、鹿鱼等。

对生活在山海之间的广州人来说，各种飞禽走兽、蛇虫鼠蚁，都可成馔。明代《百夷传》写到，广州人“鳅、鳝、蛇、鼠、蜻蜓、蝮、蛟、蝉、蝗、蚁、蛙、土蜂之类以为食，鱼肉等汁暨米汤信宿而生蛆者以为饮”。尽管每天日晒雨淋，饱经霜露辛苦，但餐桌上的肴菜，却一点也不单调，至少蛋白质是足够的，所以在鹿颈村发现的男性人骨，年约四五十岁，身高1.7米，体格不逊于现代人。

种种迹象表明，新石器晚期的广州地区，已有不少人烟，形成了不同的聚落，生齿日繁。聚落之间并非“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而是你来我往，交流密切，甚至还有某种形式的交易。最明显的例子是，不同聚落使用的石制器具，工艺如此相似，让人不禁猜想，它们好像出自同一个工匠之手。在西樵山就有二十几个石器加工场，俨然石器的生产中心，不同聚落的人，用各种物资去换取石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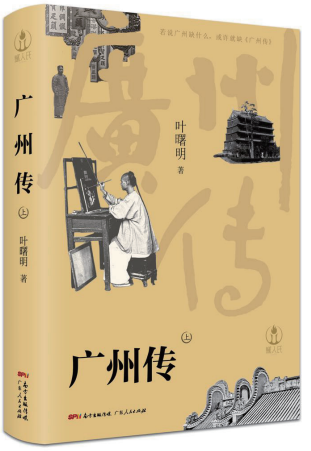
人们甚至可能已经建立起某些管理规则行为规范。在新市葵涌的遗址，找到大量残破的石器、陶器（几乎无一完整）和动物残骨、贝壳，却没有人类居住的痕迹。那么，这些人类生活垃圾是怎么来的？这是不是一个垃圾堆填区？它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人们会循规蹈矩，不嫌麻烦地把垃圾运到这里丢弃？几千年前人们是用这种方法处理生活垃圾的吗？这些问题虽然不会有答案，但也饶有趣味。每一个考古的新发现，都为后人拓展了更大的遐想空间、更多的可能性，也带来了更多的不解之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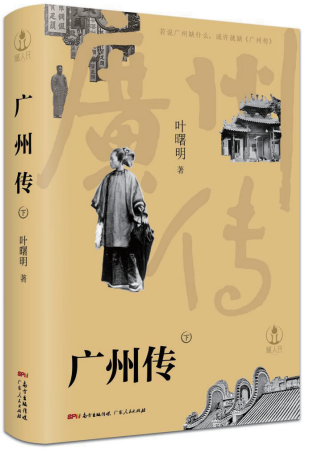
某些掺杂了神话的传说，追溯越族祖先，从大禹传至夏朝中原少康之世。两晋名臣贺循在《会稽志》中说：“少康，其少子号曰于越，越国之称始此。”少康的活动范围，在河南、山西一带。《国语》里有一段注文提出：越王“勾践，祝融之后，允常之子，芈姓也”。“芈”是羊的叫声，同样可以追溯到中原及西北。祝融的孙子季连，出生于河南，其部落生活在河南、甘肃、陕西一带，与以牧羊为业的西北羌族多有联姻。甲骨文中，“羌”是“羊”的变体，季连部落亦以“芈”为各部落的共姓。

当时一个部落有多少人呢？夏朝时，有三百多户人家、一千五百人左右，就算大部落了。由于各部落间，不断爆发争地盘与抢人口的战争，一些部落战败，各散东西，分成几个小部落，或被其他部落吞并。不断的裂变，让人搞不清各个部落间的血缘关系，所以有“三代不同源”之说。

夏末商初，曾经显赫的季连部落也被打垮了，部落中氏族分路逃亡，熊氏一支逃至甘肃东南部（今信阳市罗山县）隐藏，休养生息。他们因善于罗网捕鸟而被叫作“罗”。武王伐纣后，周天子裂土分茅，罗被封为子爵，其封土在湖北

《广州传》（上下册） 叶曙明 著





房县，名为罗国，面积约一二百里，周朝一里相当于现代的四分之三里。熊氏另外一支被封在荆州为楚国。

罗国与楚国都是季连部落的后裔，但春秋时代，楚国吞并了罗国。罗族愤然与熊氏割席，改称罗氏，以纪念故国，南迁至洞庭湖一带。公元前 391 年，楚国平定了东越，但南越因有五岭为屏，楚国不能越雷池一步，罗氏便逃入了南越的地盘，建立“缚娄国”（也就是后来的博罗）。有人认为，如今两广地区，保留着大量“罗”字地名，如罗定、罗傍、罗董、罗岭、罗湖、罗欧山、罗马山等，均为罗氏南下经过的痕迹，甚至广州的“羊城”之称，也源自季连部落的共姓“羋”。

一个与岭南似乎毫不相干的中原小部落，就这样，和广州历史挂上钩了。

五羊神话，在广州传诵千年，家喻户晓。相传有五仙骑羊，各执穗禾一茎六出，降临广州，祝曰：“愿此阛阓永无荒饥。”然后五仙腾空飞去，羊化为石。所以广州也被称为“仙城”、“穗城”或“羊城”。唐代初年，羊城这个名称，已广泛流传。初唐诗人沈佺期《峡山赋》即称广东清远峡山“切惟羊城王岭之要冲”。高适的《送柴司户充刘卿判官之岭外》诗亦有“海对羊城阔，山连象郡高”之句。在唐人诗文、笔记、杂史中，“五羊城”或“羊城”的出现，屡见不鲜。

几乎所有人谈论五羊故事时，都把它说成是农业文明从中原传到岭南的象征。这是对想象的随意阐释。比如《岭南民间文化》一书便总结说，五羊传说是一则“史前拓殖神话”，反映史前时代北方文明对岭南的“拓殖”。这种说法是完全错的。

五羊传说，最早出现在晋代裴渊的《广州记》，此书原版已佚，现仅存收在宋代《太平御览》里的残篇。裴渊写道：“州厅事梁上画五羊像，又作五谷囊，随像悬之。云昔高固为楚相，五羊衔谷萃于楚庭，于是图其像。广州则楚分野，故因图象其瑞焉。”冯沛祖的《越秀史稿》说，“五羊衔谷萃于楚庭”，是广州“最古老也是最著名的神话”。但我们从最古老的裴渊版本中，却看不到有神话色彩，无非是高固家里有五只羊，当地人觉得很稀罕而已。与裴渊同时代的顾微，也写了一本《广州记》，记述与裴渊相同。

显而易见，这两本最早讲述五羊故事的书，都没有说五羊是仙羊，也没有五仙的出现，直到南朝时，故事才被赋予了神话色彩。南朝宋人沈怀远在《南越志》中大笔一挥，写道：“昔有五仙牵五色羊至此”，不仅多了五仙，而且羊也变成了带有仙气的五色羊。沈怀远信奉道教，曾受妾室王鹦鹉巫蛊事件牵连，被宋孝武帝发往广州，几乎杀头。五仙和五色羊的出现，是他采自民间传说，还是基于自己的信仰编造的，现已不可稽考。

这个故事后来衍生出多个版本，时间跨度逾千年，细节也愈丰富。有说五羊降临于周夷王（前 895—前 880 年在位）时，有说降临于周显王（前 369—前 321 年在位）时，有说降临于任嚣、赵佗征讨岭南（前 222—前 214 年）时，也有说降临于西晋（266—316）时。情节从最初“五羊衔谷萃于楚庭”，变成后来的“五仙牵五色羊而至”，再后来变成五仙人骑着五色仙羊，驾着五朵彩色祥云，在柔美悠扬的仙乐伴奏下，从天空飘飘而降，仙人把稻穗赠给广州人后，又踏着祥云飞走了，五只仙羊却因依恋人间，留下化为石头。

然而，无论哪个版本，成书时间都不是史前，讲的也不是史前故事，与“史前拓殖”没有任何关系。岭南农业和畜牧业，不是北方传来的，广东甚至是全国最早发明种水稻的地区之一；岭南人也早就开始饲养猪、水牛和狗等家畜了。

真正与五羊有关系的，不是五仙，而是裴渊、顾微在各自的《广州记》里都提到的高固。他是历史文献中出现第一位有名有姓的广州人，楚威王时以才学闻名，做了五年楚相。明人欧大任《百

越先贤志》把他列为百越先贤之一。高固的祖先是高傒，姜姓，高氏，春秋齐国大夫，姜太公的后人。姜是羌人的姓氏，而羌人以牧羊为业，奉羊为图腾，与季连部落有不少亲戚关系。因此，高固在家里养羊，也是有可能的。

近代学者对高固其人的真实性，一直很怀疑，因为高固的名字，未见于东晋以前的典籍。民间却言之凿凿，深信五羊确实降临在高固的家里，并赠了一茎六出谷穗给广州人。北宋初年，五仙和五羊传说，得到官府加持，热度骤然提升，还在广州人认为是高固故居的地方，兴建了第一座五仙祠。

这座五仙祠的地点在十贤坊，即今北京路与广卫路交界之处，先秦时是禺山西麓。在广州人心目中，高固曾在北京路居住过，五仙骑羊也是降临在北京路。后来五仙祠一度迁往他处，但宋政和年间（1113 年前后），又搬回了十贤坊。南宋嘉定年间（1218 年前后），五仙祠迁往西湖玉液池畔（今西湖路附近），称奉真观；南宋末年迁至今广仁路；明洪武元年（1368 年）毁于大火，十年后迁建于大市街（今惠福西路）。明成化五年（1469 年）和清雍正元年（1723 年）都对五仙观进行过重修。

至此，五仙和五羊到底具体降临在什么地方，已不再重要了。在五仙观内后殿东侧的原生红砂岩石上，有一大一小两个凹穴，为古时山坡受海水回旋冲刷侵蚀而成的瓯穴。两穴互相连通，长约三米，宽约一米，状如人的脚印，凹穴下有泉眼，名为“陀泉”。人们就说，这是仙人留下的足迹，于是围绕凹穴砌石为池，名为“仙迹池”，池壁上嵌“仙人拇迹”石匾，成为广州一处胜迹。

1925 年的《广州民国日报》刊登署名“甘树熙”的文章，说他探访五仙观时，主持道人告诉他另一版本的五仙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五仙与五羊，同为一体。当初白鹅潭是一汪弱水，行舟甚险。某日有五人雇船过潭，船至半途，忽然兴起巨浪，小船摇摇欲覆。五人投二石于水，顿时风平浪静。白鹅潭从此波澜不兴，每于月白风清之时，可以见到一对白鹅浮没于波间。这五人登岸后，行至大市街，化为石羊。明、清两代，五仙观均入选“羊城八景”，分别名为“穗石洞天”和“五仙霞洞”。当然，五羊降临只是一个民间故事，所谓仙人拇迹，也不过是附会之说。与高固同时代的，还有一位公师隅，也久居岭南。明人欧大任的《百越先贤志》说他筑了一座南武城，是为广州建城之始，却没有指出具体位置，只说“乃往相度南海，将依山筑南武城以拟之”。后来很多人说，南武城就建在越秀山边，不知何所据而云。也许因为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一书说：“相传南海人高固为楚威王相，时有五羊衔谷萃于楚庭，遂增筑南武城，周十里，号五羊城”，因此他们就据高固住在越秀山下，推断南武城也在越秀山下。

明、清的记录，距离春秋时代，太过久远，且无更多旁证，哪怕是东汉时专述吴、越两国史事的《吴越春秋》，亦无相关记载。因此所谓南武城，早经清人阮元《广东通志》指为可疑，更遭到清光绪年间《广州府志》直斥“向壁虚造，不足为据”。楚国的势力范围止于五岭，未能征服两广，但觊觎之心是有的。楚威王请世居南越的高固任楚相，很可能就是为了谋取南越。如今在越秀山上立有一座“楚庭”牌坊，纪念楚国与广州的交往，可见广州人没把楚国当敌人。因此，比罗族逃难更合乎情理的想象是：高固是南海人，楚王派他回家乡，与越人联络感情，高固带了几只羊和一些谷穗稻米，作为见面礼送给岭南土著首领。人们第一次看见这种奇怪的动物，无不啧啧称奇，认为是天示祥瑞，高固也因此大受欢迎。结果口口相传，羊成了民间故事的主角，最后被升格为“仙”。

不管是罗氏，还是高固，他们带来了稻米，不等于广州没有稻米。两广种植稻子的历史，

比楚国平百越的时间更早，在很多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都发现了有肩石斧，就是耕地的工具。1996 年在广东英德云岭狮石山牛栏洞发现了 1.8 万年前的水稻硅石；1965 年在广西桂林发现 1 万年前的石杵、石磨、石磨棒等稻谷加工工具。水稻专家认为，野生水稻需要的基本自然条件，是江河入海处且具一定规模的三角洲和岸边沼泽，因此，中国水稻的种植历史，应是从沿海向内地发展的，而不是相反。

在广州周边地区发现大量新石器时代的陶罐，我们不妨想象一下，这些陶罐在当时是用来装什么的？很可能，除了盛水，就是贮藏粮食。农业愈发达，家里的坛坛罐罐就愈多。有人推断陶器是伴随着农业文明而出现的，不无道理。罗氏或高固还带来了羊，但羊始终未能成为岭南主要的家畜，越人嫌其羶臊。屈大均说：“东南少羊而多鱼，边海之民有不知羊味者。”难怪有人说，“羊城”既没有羊，也没有城。

至于“罗”字地名，是否是罗氏族人的印记，在无史实佐证的情况下，只能靠猜。楚国平东越后，洞庭湖畔的罗氏族人，已分崩离析，一支入了广东境内，一支从滇东、滇南迁入湄南河下游，还有一支向西越过神农架进入川东，定居阆中，一部分西迁到北胜县。按常理推测，罗氏四散逃亡，能翻越五岭的重岩叠嶂，穿过大片原始森林，逃过毒蛇猛兽的袭击，进入广东的人数，当不会太多，但罗字地名却遍布广东全境，远及广西。罗氏到底需要多少人，才能走遍这些地方，并且都以他们的姓氏命名呢？

语言学家说，广东很多地名，其实出自僮语，包括以那、乌、良、思、古、都等字起首的地名都是，罗字亦然。在僮语里，“罗”与“六”是相通的，如封川六田、信宜六岸、茂名六双、化县六磊坡、阳江六平山等；“六”与“禄”也是相通的，如台山禄马、南海禄境、鹤山禄峒、德庆禄滚等。这些地名最初都是口头的，没有文字，后来写入官府文书时，以读音定字，按照书写者的不同理解，便写成了不同的字。

罗氏族人即使到过岭南，也只是岭南文明的介入者，得到了岭南文明的包容与接纳，而不是开创者。中原人的到来，也许确实带来了北方的某些农耕技术，对广东的农业与畜牧业，有助推作用，但并不是说没有中原，岭南就永远要茹毛饮血。事实上，中原的某些农耕技术，在岭南未必适用，盖因地形不同，水土气候不同，种植的品种也不同。

天地间自有人类以来，广州人便生于斯，长于斯，耕耘树艺，渔海樵山，从石器时代走向青铜时代，文化一天天茁壮成长。春秋战国五百余年，中原征伐不已，江山万里，尽成战图，但广州有五岭屏障，依然河清海晏。战国后期，甚至和海外建立了贸易往来，商业活动十分活跃，海内外商贾咸集，是一个繁华热闹的商品集散地。司马迁的《史记》描写：“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后来《汉书》又补了一句点睛之笔：“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

司马迁所说的“果布”，可能是指蔬果布匹，但也有人猜测，可能是指“果布婆律”，即马来语中的“龙脑香”。如果这个推测正确，那么就为当时岭南与东南亚的贸易往来，提供了佐证。司马迁把番禺（广东广州）与邯郸、燕（河北易县）、临淄（山东淄博东北）、彭城（江苏徐州）、宛（河南南阳）等地并列为“都会”，显示出太史公独具慧眼的见识。

最让人感兴趣的是，《史记》所描写的这种景象，究竟出现在秦始皇嬴政征服岭南之前，还是之后？史学家吕思勉认为：“《史记·货殖列传》言番禺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此语必非言汉时，可见陆梁之地未开，蛮夷贾船，已有来至交、广者矣。”这一判断，被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如果不是秦王朝的南征，广东沿海完全有可能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文明体系——海洋文明。

120年前的戊戌烟云

艾　云



艾云，广东省作家协会散文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一级作家。1982年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1974年赴乡村插队务农，后历任河南省文联《莽原》杂志编辑，广东省旅游出版社编辑，广东省《作品》编辑、副编审。著有专著《此岸到彼岸的泅渡》《细节的四季》《南方与北方》《理智之年》《欲望之年》、《退出历史》等。随笔集《艾云随笔——女人自述》获1995年广东省新人新作奖。

一

1898 年 6 月 16 日，光绪皇帝在北京颐和园勤政殿召见了来自广东的士子康有为。

光绪皇帝望着眼前这个一次次上书、不停在鼓吹中国必须变法的康有为：他长相忠厚笃诚，眼神没有凛冽，有的是内隐的伤感。单从相貌上，真看不出他是一个学贯中西、思考深刻、见解犀利的儒者；他反倒更像一个砣砣肯干、勤劳朴素的农人。

光绪皇帝早在三年前就已经知道这个名叫康有为的人了。1895 年 5 月初，正是这个康有为还有他有名的学生梁启超在京城闹了不小的动静。这两个人联合各地赴京应试的 1300 名举人在松筠庵开会，然后联名上书皇帝。上书的主要内容是抗议同年 4 月 17 日清政府与日本明治政府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这个条约逼使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及附属岛屿给日本，还要将澎湖列岛划给日本。另外还要赔偿日本 2 亿两白银，等等。只有这样，甲午战争才可能结束。

光绪皇帝也是忧心如焚，可他又能怎么办？国际事务中没有道德可言，有的是欺软怕硬、弱肉强食。光绪帝看到了这份上书，他尤其对后面提出的四项解决办法多看了几眼：其一下诏鼓天下之气；其二迁都定天下之本；其三练兵强天下之辜；其四变法成天下之治。上书言：前三项都还是权宜应乱之计，唯最后一项则是立国自强之本。迁都？那不可能；但有些建议，实在值得深思。

千名举人上书，正是史载的著名“公车上书”事件。为什么叫这个名称？汉代送应试举人赴京赶考，多以公家车马送迎，后以“公车”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

光绪帝在打量康有为的同时，康有为也在仔细端详眼前的光绪帝：皇帝的面容如此俊朗清秀，一双丹凤眼蓄着温情与善良。他眼角向远处挑着，唇红齿白。他有着玉树临风的飘逸，是个安静的美男子。皇帝召见自己，这是面对面交流，因此才能如此近距离看到当今最高统治者的真容。

康有为却又感觉这个仙姿玉骨的帝王，内里实则积存喷薄欲燃的烈焰，那是想要改变中华危机局面的雄心壮志，是一个想要励精图治的君王抱负。正是他，在五天前，即 6 月 11 日发布上谕，宣布“以变法为国是”。一时间，全国沸腾，各种反响都有。看来，光绪帝鼎力变法的决心已下，他几乎是要孤注一掷了。在这样的情形下，他特意召见一直为变法提供思想资源的康有为面谈。

略略停顿了一会儿，光绪帝说：“朕已阅过你几次上书的文字。今天朕想当面听你陈述变法的意见。你尽可放开来讲，即使有过激言论，朕也不会怪罪于你。”

康有为面对着光绪帝仁慈而又渴望的目光，开口言道：“西方列强以及日本豆剖瓜分我中华野心不死，且愈来愈炽。他们敢于如此去做，全仰仗其制度的优越。整顿吏治、发展经济、教育改革，开启民智，才能富国强兵，才能洗刷割地赔款的屈辱，防止灭种亡国的危险。若此，唯变法是最后出路。”

康有为讲的是带有浓重粤语口音的官话，光绪皇帝努力在听，他听得虽然很吃力，但听懂了，他频频点头。

康有为很珍惜这次对谈的机会，他希望用简明扼要的语言讲出自己关于变法的系列主张和措施。他也谈了自己的两个指导性理想，那就是：君主立宪与国家富强。君主立宪是政治制度的改革，而国家富强则是压倒一切的目的。

康有为能与光绪帝面对面交谈真是不容易。虽说康有为是进士，但他这样的官职按照清朝祖训仍不够资格。别说受召见了，就连专折奏事也只能由官衔高的人代转。1895 年“公车上书”的

集体行动过后，他有七次上书，其中阐述变法的理由与步骤，提出富国、养民、养土、练兵的自强雪耻之策，并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正式提出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改良模式，宣传变法。这些上书，有的递到了皇帝手里，有的皇帝压根儿就没有看到。

时隔三年，康有为得以入宫觐见皇上，面陈变革主张，缘于几个方面，首先是他多年来不屈不挠鼓吹变法，在全国已有了相当大的名声，在民众和知识分子那里都有着广泛影响；再者是官员中赞成变法的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极力推荐；还有就是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在皇帝面前说了康有为不少好话。

这次，光绪帝是顶着压力见康有为，还因为反对变法的恭亲王奕䜣不久前去世。光绪帝早就想见见康有为这个岭南人，想看看这个携雷挟电的人物究竟是怎样一个形容。

凉爽的夏天吹着，让人很是惬意。宫中层叠的帷幔飘拂着，一切有着超现实的幻梦感。屋子里时而静谧时而声音朗朗。西式自鸣钟已经敲了几下，几个时辰过去了，谈话仍在进行。

今天，与康有为进行的这次激动人心的谈话，光绪皇帝身上仿佛有了新的力量，他饱满的激情正在洋溢，一些决定正在酝酿。他一定要挣脱桎梏，独立做事、做一番改天换地的大事业。

康有为何等聪明之人，他从光绪帝那逐渐明亮的眼神中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自己多年来的变法呐喊，将由这个帝王实施。他相信这个判断。

召见结束，康有为回到粤籍驻京驿馆，等候多时的梁启超赶忙迎上前去。康有为对这个心爱的弟子谈了召见的大致情形。从老师兴奋的神情中，梁启超也受到鼓舞。于是，他们坐下来慢慢喝茶，慢慢聊天。

追溯这对影响中国历史的特殊师生的特殊缘分，镜头还要闪回到十八年前。那是青葱的岁月，在岭南广州，在青砖青瓦静谧古雅的万木草堂。



万木草堂

二

梁启超由陈千秋引着来到万木草堂。康有为还在上课，两人坐在前厅等候。

没等太长时间，便见康有为上完课走过来。陈千秋起身介绍道：“康先生，这就是我向你多次提到过的岭南新会人氏、我的同学梁启超。”

揖拜过后，三人坐下。

只一过眼，康有为就对这个叫梁启超的年轻人很有好感。他年轻如朝霞一般，眼神却有着与他的年纪不相符的凝重深沉。他身上有种少年英雄的勃勃英气，仿若一手抚琴、一手持剑那文武兼备的飘逸古士。

三人坐在那里说话。这是 1890 年初春，岭南已是莺飞草长，万木青葱。草堂外有岭南最早开花的木棉。疏朗的虬枝，叶片尚未拱出绿色，而那大朵大朵洋红色花朵便在枝头突兀而坦然地开放了。木棉花瓣饱满，质地腴美，是花中之花。再过些日子，树上的叶片才会慢慢长出绿意。而木棉树又是如此高大挺拔、姿仪端宁。它的枝杈均匀有序地舒展着，平衡而洒脱，带给人大气磅礴的雄浑与秀丽结合的强烈审美意蕴。

这是一次历史性会面。从此，康有为和梁启超，这两个亦师亦友之人，日夜趱行在求变法、图富强、开民智的思想启蒙之途，为中国近代自由意志、独立思考开辟一条艰辛的道路。从此，二人将以“康梁”称谓，双星并耀、辉映史牍。

坐在一旁的梁启超发现，若是沉默，康有为就是一个很普通、很平常的人；只要他开口讲话，身上就会氤氲出一种强烈有力的气场和光芒。若是再深入讨论，通过语言，便有穿透介质、如雷霆万钧般的撞击之力。

几次交谈过后，曾经桀骜不驯的少年天才梁启超对康有为深深敬佩。这时的梁启超虽然才 18 岁，却已是举人；32 岁的康有为才是个监生，按科举等级来说，康逊于梁。康有为总是考场失意，梁启超则一路顺遂。陈千秋介绍他认识康有为时，他一开始并不以为意；待见面交流，电光火石般的学识见解，令他服气之至。他当下执弟子之礼，愿随老师仗剑寻学遍走天涯。后来，他读了康有为系列著述之后说起自己的震撼：“就像火山爆发和地震一样。”

师徒二人在相濡以沫的日子，性灵之交是他们相处的方式。康有为告诉梁启超：“中国必须改变制度。可自上而下的改变难乎其难。中国又没有形成一个中间阶层推动变革；那么，我们唯可做的，只能是开民智。而开民智，就要办教育，办报纸，写文章。这是潜移默化之功，不能喧闹，只是闷头去做。待时机成熟，就必须喧闹，引起轰动，把死水一潭搅翻，激起阵阵涟漪。”

1895 年的“公车上书”岂止是激起涟漪，而是摇撼出疾风暴雨。这一次，梁启超是马不停蹄赶到京城协助老师，发动了这场举子行动。

康梁二人已自觉将中国的命运担在自己肩上。

康有为继续上书游说，在高层和知识界倡导变法；梁启超自 1895 年后，开始主笔《中外纪闻》，笔政上海的《时务报》，又赴澳门办《知新报》，1897 年，他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司，宣传变法思想。不久后，湘人投身变法之积极的行为，正是与此分不开。

三

好了，关于康梁的背景材料交代先到这里，让历史的镜头仍前移到 1898 年 6 月 16 日的那个下午，康有为和梁启超师徒二人在祈盼，焦虑的复杂心情中，慢慢品茶。

康有为对梁启超说：“你写就的《变法通议》一文，大量介绍了西方社会的政治学说，看形势，即日应该广为播散，让朝廷上下和民间各届诸多人士看到更好。”梁启超答：“好！”康有为非

常欣赏梁启超对变法思想有着新思路新发展。

康有为接着又说：“启超，你且拿出光绪帝所颁变法上谕，我们再仔细看看。”

梁启超从案几上拿出谕书。北方初夏的阳光清澈，照得屋子很光亮。两个人俯在那里，但见上谕写着一条条变法措施：

“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开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

我不得不说，120 年前的变法上谕放到现在也不过时，也有现实意义。中国改革与变法的步履何其惟艰。因为它涉及权力掌握者的既得利益。

看完上谕，康有为和梁启超一时没有说话，都怔在那里。这不啻是猛药，它能否疗救已入沉疴的病者？这也是雷电，可它又能否唤醒昏睡冥顽之人？

但是，这依旧令人兴奋。

康有为道：“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多年来的思考，奔走呼吁，正是为了促成上边的决心。唯有政府颁布变革的政策条文，才能将我们的言论落到实处，推行开来，这作用大矣。但这里边会触及、剥夺太多人的利益，凶吉祸福，前途未卜啊！”

果然，光绪帝颁布变法上谕之后，支持者欢欣鼓舞，而反对者则是恨之入骨。而反对者的人数是如此广泛。如果裁冗员，削官职，撤衙门一旦实施，许多人都将从特权阶层沦为普通人。这几乎是要他们的命。人们鲜有从国家利益考虑，私欲、贪婪的私欲让他们联合起来，反对者形成大的阵营。

慈禧太后也被光绪帝的变法上谕给惊呆了，她万万没有想到一向驯顺听话的光绪帝竟然背着她搞了这种名堂。接着，愤恨充溢了她，这个小子，翅膀真硬了，想要单飞了。可你能飞出我的掌握之中吗？

慈禧太后在丈夫咸丰 1861 年驾崩之后，实际上已掌握了大清江山的所有权力。她经历着同治与光绪两代儿皇帝的成长。她已不是垂帘听政和摄政的间接，而是直接走上历史舞台。这个美丽与才干集于一身的女人，懂得任人唯贤，她任用能干的汉臣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以及李鸿章、袁世凯，让他们鞍前马后为大清帝国效力。她总是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地指点着江山。她认为江山是她的，她刚愎自用的性格不允许别人对她指手画脚，无法忍受手中大权旁落，更无法忍受光绪帝一意孤行抢占头功。她恼羞成怒，并且终于要下狠手了。

1898 年 9 月 21 日，进行 103 天的维新变法失败。慈禧太后余威显赫，她派兵囚禁了光绪皇帝，追杀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七天之后的 9 月 28 日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锐、杨深秀、刘光第在北京菜市口被杀。

那是萧瑟的秋天，天空阴郁，愁云密布。谭嗣同吟着自己入狱时写的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然后慷慨就义。

烈士之一康广仁是康有为的胞弟，死时 31 岁。

1898，戊戌年，这是变法号令即出，令人振奋、跃动的一年；它又是变法败北，令人长哭、悲怆的一年。它的一切，无论胜败，都留给历史宝贵的精神遗产，并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未来的走向。这是光耀史册的维新运动和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是知识分子的一次现代觉醒，也是一次自上而下政治改革的大胆实践。

一部中国近代史镌刻的史牍与碑铭，几乎处处可以寻见这里的人与事。岭南人从来敢为天下先。他们比施洗者约翰更虔诚，比推石上山的西绪弗斯更执拗，比盗火者普罗米修斯更勇敢。他们拨开荆棘，筚路褴褛，祈盼中华民族摆脱奴役、走向复兴。

黄埔军校与华侨华人

文 梁 莹



梁莹，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管理部主任，长年从事博物馆宣教工作和黄埔军校历史研究。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20 余篇。

黄埔军校作为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新型政治军事学府，它首创了全新的政治军事革命制度，培养了一大批与旧式军阀不同的现代军事政治人才，无论对中国近现代军事历史的发展，抑或对中国近代以来革命历程的转变，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已就黄埔军校的诸多面向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与探讨，各类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

然而，尽管如此，就黄埔军校与华侨华人关系这一较为重要的议题，目前似尚未见到专门系统的讨论。事实上，黄埔军校最初创办在海外华侨华人较为集中的广东地区，同时创办黄埔军校的国民党人孙中山、廖仲恺等与华侨华人间关系极为密切。因此，黄埔军校与华侨华人之间的关系不可不谓密切。在史实梳理的基础上，厘清黄埔军校与海外华侨华人间的关系，无疑将有益于后来者深入对黄埔军校相关议题的理解，同时也将有助于各方发掘华侨华人之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较为多歧丰富的面向与价值。

一、华侨华人与黄埔军校的创办

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论及华侨华人之于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意义时曾深情地表示：“华侨为革命之母”，可见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与华侨华人间的密切关系。1924 年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着手改组国民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苏联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以视“教育为神圣事业，人才为立国大本”，决定在广州创办“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建立由其亲自指挥的国民革命军。虽然黄埔军校的建立，中国共产党人与苏联顾问的帮助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但与此同时，诚如前文所言，由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以及国民党与海外华侨华人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而黄埔军校的创建，华侨华人对其无疑也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从黄埔军校建立之初的治理结构来看，军校的发起者与创办人孙中山先生本人，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便一直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他本人与众多华侨华人关系密切，华侨华人也多参与到由他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辛亥革命后，正式创立黄埔军校以前，孙中山多采取的是利用军阀与各类地方势力间的矛盾发动革命，以达成其“再造共和”的目标。然而，由于采取这一方法，始终无法建立自己的嫡系军队，革命力量始终难以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每每局势出现变动之时，军阀部队与地方势力多有脱离革命，甚至联手背叛革命之举，以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往往功败垂成。在总结多次革命实践的经验与教训后，孙中山在苏联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决定以创建黄埔军校作为建立嫡系革命军队的基础。

1924 年根据苏联顾问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建议，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了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王伯龄、李济深、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张家瑞、邓士章等人为委员的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其中筹备委员会中蒋介石、王伯龄、林振雄、邓士章等人多有留学日本等地的经历，他们与海外华侨华人颇多密切关系。同时为进一步筹集黄埔军校开办所需的各项物资经费等，孙中山又任命在海外华侨华人中颇多人脉关系与社会资源的廖仲恺为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以协助蒋介石等人筹划军校开办事宜。

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建立后，由于当时掌握大元帅府财政大权的驻粤滇军军阀杨希闵对军校建设极尽刁难，难以在孙中山与杨希闵等人之间维持

平衡的蒋介石，不久即借故辞去了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返回奉化老家以避是非。此后，黄埔军校筹办之重责，遂不得不由廖仲恺承担。

廖仲恺，原名恩煦，又名夷白，字仲恺。出生于美国旧金山，曾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日本期间，廖仲恺与夫人何香凝在日本东京结识了孙中山。此后，廖氏夫妇二人一直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为同盟会创办人之一。由于廖仲恺在海外华侨华人中颇多人脉关系网络，因此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行动，多依仗廖仲恺为之在海外华人社会中筹集经费。

在筹备黄埔军校期间，廖仲恺四处奔走、夜以继日，对军校筹备的各项细节都亲自过问。廖仲恺的工作也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叶剑英、邓演达以及苏联顾问等的帮助和支持，学校各项筹备工作开展得较为顺利。唯独学校经费筹措一项，因杨希闵等人的从中刁难，廖仲恺一方面不得不继续联络海外华侨华人同胞予以支持，另一方面又需费尽心思与杨希闵等人周旋斗争。据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女士在其《我的回忆》一书中表示：“为了办好黄埔军校，仲恺不断和当时把持广东财政的军阀杨希闵等作斗争。他常常夜里要到杨希闵吸食鸦片烟的烟床边去等杨希闵签字，然后

广州黄埔军校旧址大门



才能领到款来，送去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几百学生的学费、宿费、伙食费，甚至连服装费、书籍文具费用，都是政府供给，而这些钱就是这样子辛苦筹来的。”可见黄埔军校筹办时期在经费筹集上的举步维艰，以及廖仲恺本人的付出与艰辛。曾协助廖仲恺参与黄埔军校筹备的叶剑英元帅便认为：“当时真正懂得孙中山先生建军思想的是廖仲恺先生，而不是蒋介石。”不难看出，作为孙中山领导下国民党人中华侨华人群体代表的廖仲恺对黄埔军校创建所做出的贡献。

1924年6月，黄埔军校正式成立后，其治理结构中，除最高层孙中山、廖仲恺、蒋介石等人与华侨华人间关系密切外，学校又分设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军医、政治六部。各部之中，为数众多的正副主任以及教官等，或与廖仲恺类似，本身即为华侨华人出生，或曾留洋外国，与海外华人社会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从另一面也反映了黄埔军校的创立，与华侨华人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黄埔军校与华侨学生总队

黄埔军校除创立之初与华侨华人群体关系密切外，到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海外华侨华人青年掀起回国从军热潮，大量华侨华人子弟与青年学生返回祖国，投笔从戎，报考当时的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为外御敌辱，奋斗牺牲。黄埔军校的命运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波澜进程中，再一次与华侨华人紧密联系起来。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战争冲突的日益加剧，大面积国土沦丧，中国军队官兵伤亡人数不断增加，各部队对日作战亟需补充大量军官与基层干部。为解决上述问题，南京被日军占领后，1937年前后位处南京的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本校（以下简称“黄埔军校”）经九江、武汉等地迁往四川成都，重建校本部，并另在未被日军占领的地区成立了九个分校。由于此时日军不但大规模入侵中国本土，同时也向南洋等地发起进攻，东南亚等地华侨华人也陷于危机之中。面对国仇家恨，大量华侨华人子弟及青年学生与国内同胞同仇敌忾，纷纷返回祖国，请缨投身祖国抗战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为解决华侨华人子弟参军报国的问题，黄埔军校第四分校，开始承担起训练华侨华人子弟与青年学生的重任。

据相关史料记录，黄埔军校第四分校前身为广州分校。而广州本身即为黄埔军校的创办地，加之广东向来又为华侨华人众多之大省，从南洋、美洲等地返回祖国参加民族解放运动的华侨华人子弟与青年学生，多投考黄埔军校广州分校。因此，黄埔军校第四分校中，干部学员为华侨华人出生者最多。1938年10月，广州等地沦陷后，黄埔军校第四分校几经辗转，先迁往广西宜山。此后，随着战事的变化，第四分校又迁往贵州三合与独山。1940年，第四分校在独山县郊外约三公里的铜鼓井建筑校舍，立足于长期经营，学校得以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当时的第四分校，下辖五个总队，四个独立大队，官兵学员总计近两万人。

第四分校在独山安定后，由于海外华侨华人子弟与青年学生掀起回国从军报国热潮，投考学校者踊跃。当时的国民政府为解决华侨子弟回国参军与投考军校的问题，一方面下令黄埔军校第四分校筹设华侨入伍生团，专门接收由海外回国参军的华侨华人子弟与青年学生。另一方面，为保障海外华侨华人子弟与青年学生能够顺利回国参军，国民党政府又训令

驻海外各地区的侨务机构，为其提供相应的物质与精神帮助。

由于海外各地区的华侨华人子弟与青年学生爱国心切，报考投军踊跃，从 1940 年上半年开始到 1941 年年初，黄埔军校第四分校华侨入伍生团约招收了来自泰国、缅甸、越南、印尼、菲律宾等国家地区的华侨华人子弟与青年学生一千余人。待这批华侨华人子弟与青年学生完成入伍期的训练后，华侨入伍生团又更名为黄埔军校第四分校华侨学生总队。此后为保持黄埔军校传统延续下来的期别和番号，1941 年学校又将华侨学生总队改称为黄埔军校第四分校第十七期第二十六总队。

第四分校华侨学生总队成立之时，恰逢第四分校迁往贵州独山后未久，由于校舍与教学设备尚未规整，华侨华人学员入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自己建筑校舍与营房。由于学校所在铜鼓井周边并无可供校舍建筑之木料，入伍侨生子弟不得不先远至荒野高山中砍伐树木，将原木扛回工地，又制成建材，方能够着手进行营建工作。由于校舍营造需要专门之技术，侨生子弟多无从下手。幸赖学员中有懂得泥水工和木工者，在他们的带领与协助下，众人通力合作，三个月内第四分校华侨学生总队独立将自己的教室、寝室、餐厅全都搭建了起来。同时教学所需的课桌、课椅以及教具等，也由侨生子弟全部自制完成。

第四分校华侨学生总队正式开学后，由于贵州地理条件上多为山地，土地相对贫瘠，农业生产落后于其他省份。加之抗战爆发后，大量军民内迁，西南各省成为大后方重地，人口聚增，贵州等地军饷民食供不应求。第四分校地处独山县郊，学校军需补给无法就地筹集，必须由学校学员自行前往他处搬运。由于当时贵州交通较为落后，运输工具又相对缺乏，每到搬运军需补给之日，华侨学生总队学员总是集体步行前往，全靠人力搬运。平均每月约搬运军需物资两次，每次少则四五十里，多则百余里。华侨学生总队训练期两年下来，几乎所有侨生子弟都曾有“行千里路、抬千斤米”之记录。

事实上，第四分校华侨学生总队建立之初，各方曾一度认为华侨华人子弟与青年学生，多数家境富裕，从小娇生惯养，回国从军报国，不过是一时热情，未必能够吃苦耐劳，长期坚持。然而第四分校华侨学生总队学员们不怕困难牺牲，勇于苦干担当的精神却也改变了很多人的看法。部分与华侨学生总队同期的第四分校其他学员便坦诚地表示，正是华侨学生总队学员的优越表现，才让很多对海外华侨华人同胞有偏见者“体会到华侨同胞创业奋斗的精神有其历史渊源”。

1942 年，黄埔军校第四分校华侨总队学员全部毕业。此时正值抗日战争最激烈阶段，各部队需要大批军官与干部，华侨总队学员大部分毕业后即被派往各一线部队，奔赴前线参与对日作战。他们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与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实现了华侨华人从军报国的宏愿，表现了华侨华人爱国爱家的赤子热情，为华侨华人群体在黄埔军校以及波澜壮阔的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上，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黄埔军校作为近代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军事学府，其重要意义与价值不言而喻。同样，海外华侨华人群体，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也做出了巨大贡献。系统分析及梳理黄埔军校与华侨华人间的历史关联，不但有利于重新打捞这一段被各方相对“忽略”的史实，使各方加深对黄埔军校以及华侨华人群体的理解。同时，也将有利于后来者铭记历史教训，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广东省归国华侨联合会

Guangdong Province Federation of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海外之海

无论你在何方
每一滴水
都会像大海一样
波澜壮阔　生命无限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 140-148 号省侨联大厦 23 楼、6 楼
邮编：510620
联系电话：020-38879251
微信公众号：广东省侨联宣传文化中心

陈家祠（节选）

文 彤 子



彤子，本名蔡玉燕，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文学院签约作家，已出版小说集《高不过一棵庄稼》《平底锅的爱情》，长篇小说《南洋红头巾》《南方建筑词条》《陈家祠》《岭南人物志》《生活在高处——建筑女工记》。作品见刊于《花城》《江南》《青年文学》《作品》《作家》《广州文艺》《芳草》等刊物，多部作品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小小说选刊》等刊物转载，入选多种年度选本；有作品被翻译为英文发表；获2012年、2014年度广东省《作品》新锐奖，2013—2014年《广州文艺》都市文学双年奖，广东省“有为杯”文学奖，广东省“五个一工程”奖，产业工人文学奖金奖及琦君散文奖等。

第一回　陈孝廉羊城求学问　解元郎侧门遭羞辱

话说，陈志尧踟蹰在广雅书院外，对着出墙而来的桂树枝头长叹一声，又再长叹一声。

但见太阳西下，暗红的晚霞隐在黛色的云层内，折射出层次不同的蓝褐色。恐怕，这几日，还会下几场淅淅沥沥的雨。广东的春天甚是烦人，暮春已过，粉末般的细雨还连绵不绝地下，空气依然浓湿稠密，阴冷刺骨。

仆人陈忠焦急地望着老爷，老爷身材挺拔，裹在做工精良的长袍里，外披一件绸面罩衣，更显修长。陈忠觉得老爷还是穿中式长袍俊朗，连皱眉长叹时也觉儒雅隽秀。跟在陈忠身后的是两个挑着行李的挑夫，挑夫是在码头找的，五文钱一个，便宜。行李用笼箱装着，其中一个笼箱里放着一套深蓝色的西服，这是慧心太太给老爷做的。太太受洋教堂的神父影响，也不知道洋教堂里的神父给太太使了什么法，在额头两肩点两点，念声“愿主保佑”和“阿门”，太太就对他们服服帖帖了，比家里后院的大狗阿黄还听教训。当然了，不能将太太和大狗阿黄比较，陈忠自抽一下嘴巴，虽然没叽咕出声，但臆想都是罪过，下人哪能亵渎主人呢？不过，陈忠仍是想不通，太太为什么非要给老爷置这身洋行头？那天陈忠跟着太太去益昌祥布庄订做这套西服，价钱可贵了，陈忠心里骂，“我一年唔饮唔食都剩唔到一只裤脚。”

陈志尧转过身来，问：“好好的，为什么自己打自己？”陈忠抚抚脸，笑着说：“有蚊子，老爷！”陈志尧“哦”了一声，又背手转身望着书院用青砖砌起的围墙，青灰色波状起伏的墙瓦，圆拱的侧门，还有隐在围墙里面绿荫之下翘起的檐角。

陈忠眼珠跟着老爷的身影，转了一圈，思想又一次游离。老爷现在穿的这身长袍褂子衬着油光水滑的辫子，多好看啊！那哪是洋鬼子西服能比的？陈忠咂咂嘴，用神情表达了一下对西服的藐视。梳中国男人的长辫子，穿洋鬼子的西服，不伦不类，怎么看都碍眼。陈忠特地将那套天价的西服塞在笼箱的最下层，管它呢！要不是在太太眼皮下收拾，他才不会将这西服放在笼箱里。老爷是要高中的，这么俊俏的身段儿，到时配上官袍顶戴，肯定更英姿勃发，何时轮得到这套西服出场？想到老爷高中的模样，陈忠就有点儿得意了，美滋滋的，大嘴往上咧开，偏黄的板牙露在空气里，吸着气。

也难怪陈忠得意的，前几年，老爷会试头名中了解元，那个热闹啊！莞城全城轰动，老百姓们到了中堂镇，都要绕到凤涌来，将陈府门口堵

陈家祠



得水泄不通，都要亲睹一下老爷的风采。那些个没志气的，想沾沾运气，就不仅仅是目睹一下举人的英伟了，他们还要在陈府的门上墙上摸一把，沾点举人的才气，才肯心满意足地离开。人是奇怪的动物，没人摸时，众人目睹过举人之后，啧啧称赞过后也就离去了，但有第一个人摸了门把后，就有第二个、第三个……原本只想着过来一睹举人风采的，都去摸门把了。更有睹过风采的，听了摸了门把回去的人洋洋得意的演说，甚是妒忌，忍不住又再去一次凤涌，非得在门把上摸上一圈才心满意足地离开。摸门把，害处不大，最多扯脱把子罢了，老爷太太仁慈，即使半夜被前来摸门把的人闹得烦心，也不生气，只可怜陈忠隔天就要换门把，不胜其烦。

没承想，一旦遭遇仁慈，人的贪欲就膨胀了，更有贪婪不得满足者，觉得摸门把不足以成为孝廉，竟悄悄掀去陈府围墙的瓦片，渐渐，发觉的人多了，人们又效仿掀瓦拆墙。开始不过是偷着掀，丢一块两块瓦片，陈忠带着仆人绕着围墙兜转，发现被掀了瓦的围墙，便叫泥水匠过来拾掇了事。没承想，人心没有满足的，竟掀出瘾头了，来掀瓦的人越发多起来。一件事情，多人去做就麻烦了，人都有从众心理，认为法不责众，便猖獗起来，光天化日也敢群起掀瓦，瓦被掀得多了，墙也受到牵连，人众力推，墙哪有不倒之理？于是，墙被掀光了墙头瓦，



继而被推倒。

墙倒了，老爷再好的涵养，也坐不住了，一边让陈忠率领家丁日夜巡逻，一边报与莞城知县。陈忠和家丁们牵着大狗阿黄，每天围着陈府围墙兜转，转得头发昏、腿发软，那些该死的掀瓦人，还厚颜无耻地向他们扔石头，骂他们是狗腿子。陈忠火冲脑门，亦不记得老爷平日要怜悯苍生厚对百姓之类的教诲，放开了阿黄的绳子。阿黄“汪汪”两声，后腿用力一蹬，健硕的身子竖起来，鼻息一喷，若脱弦之箭，“嗖”的一声，扑了出去……那回，阿黄咬伤了四个人，陈忠被老爷罚打 40 大板。要不是太太慈悲，那声“愿主保佑，阿门！”真的好用，陈忠的屁股肯定花开富贵了。

那天，陈忠被几个家丁压在地下，裤子一脱，大棍就要落下。陈忠觉得委屈极了，他不过是为了保家护院，为陈府好啊！犯得着真的大棍伺候么？就在大棍要落下时，太太的贴身丫鬟翘儿突然探头进来，向他眨眨眼睛。陈忠何等聪明，翘儿早不出现迟不出现，偏偏在他光着屁股挨棍子的时候出现，肯定是有救他的法子了。也不知是不是神父口中的“主”真的在举头三尺处望着呢，陈忠情急之下，竟然大声地喊：“愿主保佑，阿门！”

负责刑罚的陈义一棍子敲在他肉墩墩的屁股上，假腔假调地说：“忠哥，你鬼叫个么事啊？唔是我手狠，老爷要我打的啊！对唔住了！”一棍子吃在屁股上，痛得陈忠全身发麻，一阵尿意冲了上来，“呜”的一声，大叫：“愿主保佑，阿门！”

当陈义举起大棍准备抽落第二下时，刑罚房的大门被人推开了，翘儿扶着太太走了进来。

“住手。”太太轻轻的一声，陈忠顿时觉得四周都阳光灿烂，所有光芒都集中在进门来的太太和翘儿身上，她们才是菩萨才是观音娘娘，救苦救难大慈大悲啊！

陈忠的屁股终于免了一劫，但死罪能免，活罪难饶。老爷听了太太的劝，答应不拿陈忠的屁股开罚，但却要陈忠独力将所有墙瓦都修缮好。陈忠真是苦不堪言，他从小在陈府长大，他的父亲陈大礼当年服侍太老爷陈漱理，太过忠心耿耿，差点成了老光棍。好在陈漱理有良心，在陈大礼老成棍之前，给他物色了一个贤惠女子，所以才有了陈忠的出生。陈大礼从此对陈府更是死心塌地，他不仅死心塌地，更从小就灌输死心塌地的思想给陈忠。所以，尽管陈忠比陈志尧迟生了十多年，但陈忠从会走路后，就如尾巴般跟随在陈志尧身后。陈志尧为人宽厚淳良，既敬陈大礼，亦厚陈忠。因此，陈忠自小只需要做好跟班的工作就行了，搬的、扛的、抬的，几乎不需要他来操办。陈忠自然也被娇惯得细皮嫩肉的，哪晓得修墙补瓦啊？

陈忠砌着青砖，举着满是泥灰的脸，望着越来越刺眼的太阳，心里诅咒那些掀瓦的人：“真是无哪出就搞哪出，如果摸摸门把掀块瓦就可以中举人的话，那我从小就在举人身边长大，老太爷和老爷都是孝廉，我在娘胎里就和大小两孝廉亲密接触，吃的、喝的、用的都是孝廉家的，也不还是一个小小的仆人？难道还能变身成举人不成？人的出生已定了今后的命运了，孝廉的儿子还是孝廉，仆人的儿女还是仆人的命，人啊！吃多少穿多少是有定数的，得要认命。”

陈忠叽咕着，又狠狠地将墙瓦一片片贴在墙头上。太阳快要落山时，墙瓦也快贴好了，陈忠用满是泥灰的手抹一把脸，举头往里面一望，老爷的书斋“瓜庐”掩映在树荫里面，“瓜庐”二字清晰可见。陈忠又抬手抹了一把额头，真想不明白，起什么名字不好，老爷为什么要将好好的一个书斋叫作“瓜庐”呢？“瓜庐！

瓜庐！”生端端的一个“瓜”，有什么好？在陈忠的意识里，“瓜”用在人的身上是傻瓜，用在物身上就是冬瓜、黄瓜、南瓜、西瓜。总之，就是不起眼不值钱不高雅不稀罕的，这可是与老爷孝廉的身份不符啊！

陈忠干脆坐在墙头上，荡着脚看墙内风景。“瓜庐”的门开着，那个叫袁湛恩的秀才，又来和陈志尧煮茶论学了。这个袁湛恩特不招人喜欢，陈忠心里是这样认为的，姓袁的家底是不错，有个茶园做靠山。但待人就不怎的，终日绷着一张麻将脸，不说见到陈忠这样的下人了，就连见到陈延芳那样的慈善名人、上等人，他都不屑一顾的样子。唯有见着老太爷和太老夫人和太太，他才显出恭敬的样子。不过，还有一个人，袁湛恩还是挺尊敬的，就是老爷的老师陈闰甫。见到老爷老师，袁湛恩是揖了又揖，恭敬尊重的态度盈于表上。至于陈志尧和袁湛恩在“瓜庐”里在讲些什么，陈忠不得而知。但陈忠看着老爷宽厚沉稳的微笑，在袁湛恩面前淡定得体的模样，心中不禁肃然起敬，连昨天老爷的大棍责罚和今日的砌瓦之役，他也不再计较。嘿！陈忠想，这样的老爷终有一日高中榜首，飞上枝头蟾宫折桂的。

陈忠的心思，陈志尧是不晓得的。广雅书院巍巍的高墙堵在面前，陈志尧数次举步又止于门前。门是敞开着的。广雅书院建成后，开始对外试招收第一批学生，作为广东省内最优秀卓越的生员，陈志尧首先接到录取喜函。在五羊城做慈善的陈延芳已经帮他在广雅书院打点好，只要陈志尧到步，递上录取帖，书院便会安排陈志尧的食住。午后，陈志尧就到了五羊城，在广雅书院门前踟蹰，录取帖就在怀内，可陈志尧迟迟不愿掏出来。这番表现，和他初次到罗浮山酥醪书院读书时的情形一样。那年他才十岁，由老仆人陈大礼背着，跟着父亲去到酥醪书院，当下了马车，马上要步入书院时，陈志尧就哇哇大哭了。他的哭闹让陈漱理百思不得其解，小儿陈志尧自小聪慧，爱读诗书，自师从陈闰甫后，学业更是精进，现已能通背四书五经，为何到了书院门前，却大声号啕呢？最终，陈志尧还是在酥醪书院住了下来，但他为何当日大哭，至今无人能知。陈志尧却是自知的，面对巍巍罗浮山，他突然有了种高不可攀的感觉，这让自小受道家文化影响的小男孩，有了敬畏之感，十岁的小男孩不晓得如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唯有以哭明心。

而今立在广雅书院的高墙外，除了敬畏之外，陈志尧更多的是不愿，这不愿来源于一种复杂的卑劣心理。广雅书院是两广总督张明远筹建的，建后虽然张总督没有明文规定，这是张姓考生的书院，但人的潜意识却爱作祟，特别是看守书院的院役，更是狗眼看人低。来递帖的考生不是姓张的，便很难得到优厚对待，那院役自作主张地关上正门，开了侧门让外姓考生进入。

陈志尧就是这样止步于广雅书院侧门之外的，此时他已贵为举人，得到了两广总督张明远大人的赏识，在广东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而且陈姓在广东是第一大姓，哪能如此委屈身段，从侧门入院？陈志尧踟蹰之余，另一想法便从心中生成，何不亦成立一间属于陈姓人的书院，方便天下陈姓考生到省会来赶秋闱呢？这想法忽地一现，陈志尧便觉热血沸腾，他生性淳厚，又是聪慧十分的人物，思想到此，便不犹豫，长辫一甩，回身对陈忠说：“走，揾陈延芳去。”

陈忠不明就里，但老爷的命令，哪敢不从？立马回身招呼两个挑夫，挑起担子跟随在老爷身后。

这厢陈志尧去找陈延芳，那厢陈延芳便寻了过来。陈志尧来五羊城时走的是水路，从莞城南出发，渡轮突突有声，直至黄埔港。船刚开离莞城南时，东江默默，温婉多情，一路绿水青山，隐约在蒙蒙细雨中，景色甚是迷人。陈志尧站在船头，背手抬胸，遥望滔滔江水，眼神如磐，坚

定无比，陈忠远远随在后面，不敢太过靠前，怕影响了老爷的思绪，亦不敢回船舱内，怕老爷突地有什么吩咐。20多年来，在陈家当陈志尧的贴身仆人，陈忠早就练就了一身过硬的站立功夫，且不说东江浪静，水若柔带，毫不颠簸，就是出到珠江口，大海里翻着惊涛骇浪，陈忠也是不怕的，仍能在船上随波浪起伏，站得稳稳妥妥。有次海上遇浪，渡船像树叶般在浪涛中起伏，陈志尧被颠簸得呕吐，但陈忠仍能脚如铁注，稳稳地站在他身边扶着，陈志尧忍不住问陈忠，是怎么练就这功夫的？陈忠灵机一动，就说是下人生来都是贱命，身子打小就得经风吹雨打日晒雨淋，唯有这样才能有资格服侍主子。陈志尧苦笑着，擦着嘴角的脏污指着陈忠说：“你啊！一嘴油腔滑调。”

陈忠偷偷撇撇嘴，他说的当然不是心里话。老爷每日五更起床晨读，他这个当下人的亦必须每日五更起床侍候。老爷手里捧着书卷，琅琅有声念诵着：“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而陈忠就在这声声子曰当中昏昏欲睡。这也难怪陈忠会昏睡，读书声虽然大，但老爷读得抑扬顿挫，听着听着，就忍不住犯困了。开始时，陈忠还暗里责怪陈义陈孝他们，晚上无事又招呼他去打天九，都说了不去的，他们仍拉扯着去，不到半夜三更不肯罢手停牌。这不，害得清清朗朗的早上，都犯着困。可是后来，即使没去打牌，但听到老爷念书，陈忠仍是犯困，陈忠心里便明了，不是打牌熬夜惹的祸根，而是老爷的诵读声使的坏。为了不被老爷发现他在犯困，陈忠唯有在犯困时，强撑着眼睛，身体随着老爷的读书声，轻微摇摆着。久而久之，陈忠就练就了站立瞪眼摇摆身体也能睡觉的“好”本领了。

以前到五羊城，陈延芳都亲自到黄埔港来接船的。陈延芳是五羊城非常出名的慈善家，他涉足的生意可大了，陈忠知道，五羊城好几间慈善行都与陈延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老爷陈志尧总是称赞陈延芳有颗普惠天下、悬壶众生的大爱之心。陈忠不晓得什么是普惠，什么是悬壶，但是光听天下和众生这四个字，就晓得这个陈延芳不简单。

陈忠随老爷曾到过陈延芳在文德路附近的住宅，西关大屋的那个豪华那个壮观，看得陈忠眼珠子都瞪出来了，差点儿收不回去。到过陈延芳的居所后，陈忠对陈延芳更是敬佩有加，这么有钱的主儿，一生能碰着一回，都是运气，更何况还有机会到其居所参观，与其席间相对！陈忠一回到凤涌，就牛逼哄哄地跟陈义陈孝几个哥们吹牛，把陈延芳吹捧得天上有地下无。陈义实在听不下去，冷不丁来一句：“这个陈延芳咁有钱，你粘了些么钱腥返来无？”陈忠一下被噎住了，是啊！陈延芳几有钱，都不关他的事儿，下人即是下人，你不会因为认识了陈延芳，就以后不用给人端茶递水啊！陈义噎得陈忠当时挺无精打采的，但是，过了一会儿，陈忠就不放在心上了。切！陈义他们是没得这样的机会跟老爷到省城开眼界，才把话说得这样酸溜溜的。对，就是这样的，他们妒忌。想到这，陈忠的心情又阳光灿烂起来了。他哼着歌儿走去后花园，仆人的偏房就在后花园的矮墙脚下，在省城跑了几个月，即使仆人房再简陋，但亦是家，是家就亲切。

穿过拱门时，瞥眼见翘儿捧着一碟桃子碎着步走了过来，陈忠忍不住大声地招呼：“翘儿！”翘儿冷不丁被人唤叫，吓得几乎把桃子丢在地上，陈忠见她惊慌的样子，心情更是大好，叫着：“翘儿，你和这些桃子一样水灵呢！”说着就往仆人房跑去了，害得个翘儿红着苹果脸站在拱门前，半天都未回过神来。

这回，陈延芳竟然没来黄埔港接船，船徐徐靠岸时，陈忠就努力在接船的人群中寻找陈延芳的身影。这个陈延芳虽然样子不是很突出，个小人瘦，但一双眼珠儿，黑骨骨的，透着光，被他

望着的人，都不由得对这双眼珠儿肃然起敬，当然，袁湛恩是例外。陈忠自信有一眼在人群中寻到陈延芳的能力，想到陈延芳，陈忠便兴奋了，每次他来接船，都是开着一台黑亮高大的洋轿车来的。这洋轿车可气派了，黑亮的铁壳儿，前后各两盏透明白亮的大灯突了出来，开起来，突呼呼地叫，比八人大轿还威风。听老爷说，全五羊城，也没几辆这样的洋轿车。总督也不过是铜锣开道，八人大轿而已。那陈延芳得是怎样的风流人物啊？陈忠虽然没得坐在轿车内，但光跟在轿车后面，感受沿途百姓们的瞩目和惊叹，那感觉就是舒爽得意。陈忠在船上时，就立定了主意，一会儿见到给陈延芳开车的那个帅气的小兄弟陈君挺，一定要问问他，为么事将车前厢的那个圆圆的方向盘转来转去，车子就像长在身下一般听使唤了的？实在太神奇了。

可是，陈延芳没有出现，陈忠失望得眼皮全都往下垂了。陈志尧似乎已经知道陈延芳不来接船，下了船，就立刻吩咐陈忠在渡头找两个挑夫来。陈忠望望几个又厚又沉的笼箱，拔腿就往岸上跑。死沉死沉的几个箱子，上船时还有陈义陈孝他们帮忙抬，下船时亏得船夫们好心帮忙，要不，光陈忠那四两力气，一个笼箱都扛不起。陈忠跑上岸，一堆挑夫就蜂拥上来了，陈忠眼尖，一眼就相中了跑最前面的两个小伙子，这两小伙虽然不算高大，但步伐稳健，走起路来虎虎生风的，一看就是有力气的主儿。陈忠果然没看走眼，这两小伙子，挑起笼箱，眼皮也不眨一下，一溜烟地跟在身后，老爷走得快，他们就跟得快，老爷走得慢，他们也不吱声，放缓脚步走在后面。

陈延芳的轿车，“嗖”的一声停在陈志尧他们的面前。陈忠见到开车的陈君挺，人便兴奋了，趁着陈延芳下车与老爷寒暄的时候，移步靠近洋车子的驾驶座，敲敲车窗，冷峻的帅小伙看了他一眼，摇下车窗。陈忠啧啧地赞叹几声，这个陈君挺今天竟穿了一身轻便的西洋便装，头上戴了一顶方帽儿，脚蹬皮靴子，真是又帅又酷。唉！这人都在这尘世上活着，可这尘世上的人命儿就不一个样，都是仆人阶层，但跟的主儿不同，其档次待遇就又不同。这个陈君挺，说到底不过是一开车的，按理说，在洋轿车出现之前，他就等同于赶马车的，都是社会上下三滥的人。可人家就偏不下三滥，有一门绝技儿，能把一个圆圆的方向盘使得滴溜溜转，这么大块头的铁壳儿都能招呼得让它往东就往东，往西就往西，这得要有多大的本事啊？用老爷的说话，这就是人才了。一个人，特别是一个下人出身的人，能被老爷级别的人物称呼为人才，那就不得了，算得上是人物，是人物的人，能不酷不冷峻么？

陈忠谄媚地笑着问：“君挺哥仔，能问一下无？这洋汽车怎能说跑就跑呢？”陈君挺翻一下眼睛，冷冷地答：“柴油燃烧能产生动力带动车子呗！”陈忠吸吸鼻子，黑铁壳儿的屁股后面，的确有个大大的洞儿，车子开动时，这个洞儿就喷出一股浓黑的气体，陈忠理解，这股浓黑的气体想必就是这个叫柴油的东西燃烧产生的烟吧。陈忠认为，凡能燃烧的东西，都能产生气体的，如厨房里煮饭的柴火，老爷书房里需要处理掉的废纸张等。陈忠对这种叫柴油的物体异常有好感，就像他对陈君挺亦异常有好感一样，虽然陈君挺和柴油或许都不太招人喜欢，但陈忠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陈君挺真俊，柴油真好闻。

陈延芳紧握着陈志尧的手，抱歉地说：“志尧贤弟，延芳接你来迟了，望不要见怪！”陈志尧笑着说：“哪里哪里？延芳兄见外了。兄台生意繁多，忙是情理之中的事啊！”

陈延芳拍拍陈志尧的肩，打开车门，招呼陈志尧上车。陈志尧上了车，陈延芳关好车门，便转到另一面上车，陈君挺跳下车，走到车后尾，打开车后厢的盖子，招呼两挑夫把行李放里面。两挑夫何时见过这样新颖高级的物件，慢吞吞地将笼箱放进车后厢，仍不愿离开，脑袋探在车厢里面，东瞧瞧西看看的，两眼珠儿都错不过来。陈忠恨得牙痒痒的，这么高级的座驾，是你们这些下三滥的货色看的么？他一边掏出铜板打发，一边挥着手让两挑夫离开。

陈延芳今日穿了一身白色的洋西服，却没戴帽子，额头刮得清亮亮的，敢情是打过蜡了，油亮得折着光，恐怕能当镜子用了。他兴奋地对陈志尧说："志尧贤弟，今日之所以唔能够来接你，皆因今日亦有贵人从旧金山返来，这个贵人可不是普通人，叫陈潮安，在海外享有盛名呢！"

陈潮安？陈志尧搜寻脑海里陈氏宗亲的名单，都没这个人存在，不由皱起眉头。陈延芳已经预料到陈志尧不认识陈潮安，于是继续说："志尧贤弟还记得吴川陈若虚老先生么？"

说起若虚老先生，陈志尧不由得坐直身躯，整理一下衣冠。这若虚老先生何许人也？他是当朝驻美利坚国公使，早年带领着第四批留学生到美利坚国留学，成绩斐然，驻美之后，又为在美华人做了不少好事实事，在华侨界内，颇有盛名。他还经历了五代君王，虽年事已高，但仍为当朝鞠躬尽瘁，深受当今皇上的赏识，是陈氏家族的骄傲，在广东陈氏家族里，那可是响当当的。因了同姓同宗的关系，陈志尧的父亲陈漱理早年在省会赶秋闱时，便有幸结识了陈若虚，两人一见如故，又是凤台后代，关系更是密切。陈漱理对陈若虚的翩翩风度赞赏有加，陈志尧从小对此若虚伯父已是十分敬仰，后与父亲一起赶秋闱，恰遇陈若虚。这一老一少，竟似多年未见的老友，谈吐起来，一点也不隔阂，从论道到论政，从儒学到道学，从科举到洋务，两人都谈得兴致勃勃，很有相见恨晚之感。相聚之后，陈若虚感慨地对多年老友陈漱理说："志尧为不可多得的当代俊杰，日后当能仕途得意，为凤台后人争光夺脸，我在有生之年能与志尧贤侄成为莫逆之交，死而无憾。"

有了这样的关系，陈志尧哪会不记得吴川若虚老先生？老先生一生致力于大清国的教育事业，德高望重，所以，陈延芳提起老先生，陈志尧便正襟危坐。陈延芳说，这个陈潮安就是陈若虚老先生特地从旧金山发电报回来推荐的，他在旧金山华人界内亦是甚得威望的。这样比喻吧，如果说旧金山的华侨们是一片茂盛的树林，那么，陈潮安则是树林中最高大的树王。

陈延芳又说，陈潮安现在是树高千丈，又年事已高，想落叶归根。在回国之前，曾和若虚老先生详谈过，陈潮安向若虚老先生表达意愿，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尽自己的一分绵力，为家乡人民做点贡献。若虚老先生第一时间就想到了陈延芳，为家乡做贡献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慈善了，在广东还有谁比陈延芳的慈善事业做得更大更让善人们放心的？于是，若虚老先生连夜在旧金山给远在五羊城的陈延芳发来邮报，老先生还特地在邮报里强调，陈潮安老先生，亦是凤台后人，早年被"卖猪仔"漂洋过海到了旧金山，经历了很多磨难，才得到今日之财富，他团结了在旧金山（三藩市）的华人，共同抵抗美利坚国洋人的欺凌，为旧金山的华人做了不少贡献。

第二回　老华侨叶落还思根
贤内助铸箱送夫行

上回说到的陈潮安，是早期到旧金山的华人，他给洋人修过铁路，挖过金矿，华人在海外吃的苦头，他都经历过。拼搏多年之后（其实也是在旧金山受的欺凌太久了）获得万贯家财却已年近花甲，难免就思根寻源。想起埋在清远天塘山的

祖先陈凤台，想起离家前，老母亲拄着拐杖白发苍苍泪流满脸哑声唤儿的样子，想起二八娇妻沉静伫立在渡口的石台上衣袂飘飘的样子，陈潮安的心就似被油煎着般痛。似被绳绑了，牵引着，恨不得马上就回到家乡，回到亲人的身边。

当然，陈潮安在旧金山，也有了家室有了儿女。几十年过去，老母亲肯定已是白骨埋黄土，当年容姿丰润的娇妻如若还在人世，也定是满头银丝皱纹如织了。可是，人啊！最容易被念想折腾，更何况是几十年来的朝思暮想？陈潮安被蚀骨的思念折磨得形容憔悴，原本还不那么显老的容貌，似乎在一夜间就老态龙钟。

美玲在旧金山与陈潮安患难与共了几十年，从未见过他这般失落憔悴的样子，私下仔细琢磨，便猜出因由。

一天夜里，月如银盘，挂在幽蓝的夜空中，有几丝云，如毛如絮，薄薄地挂在圆月之前。陈潮安坐在花园的凉亭里，举目望着月亮，身影被月色拉得长长的。旧金山的家是模仿岭南建筑特点建造的，院廊穿插，厢房围合，火山墙滴水剪边，屋檐高翼如鹏飞状，檐顶屋脊山墙两边塑满了灰雕、陶雕、石雕和木雕，这些雕塑内容丰富，人物形象生动，色彩鲜艳，做工精细。盖这组大屋时，陈潮安倒没很着心用力，都是由他堂兄弟陈潮逸请人操办的。但在月圆夜下，此时此景，置身于如此居宅内，就有种回到南国的幻象，陈潮安时常有种嗅到荔枝的馥郁香味的错觉。

美玲悄悄走过来，手里拿着一件长罩衫，虽然还未入秋，但夜深露寒，丈夫毕竟已经是年近花甲的人了，要是寒露入体，恐怕就会病疴难愈，他心中的愿望，就更难实现了。美玲轻轻地将罩衫披在陈潮安的身上，陈潮安才回过神来，轻轻拍拍妻子那双青筋突起的手。

刚到旧金山那年，陈潮安在铁路上认识了美玲。当年，美玲才十八岁，在国内，女子在这个年龄阶段，应是养着桑蚕纺着香云纱的，尖尖的十指被嫩桑叶染得葱白可爱，散发着淡淡的薄凉的香味。可是，十八岁的美玲，本应最是娇嫩可爱的年龄，却裹起胸部，剔了额头，像男人般编了辫子，穿着脏烂的短褂子，在铁路上和男人一般开山辟路，肩挑背担，把一身白嫩的皮肤，晒得黝黑粗糙，混在浑身泥土汗臭的铁路劳工当中，和一般的男性劳工无异。

陈潮安原本并没在意，身边有个现实版的花木兰。在大多数的华人劳工的心里，能多卖一天力气多活下去一天，已经是非常奢侈的事情了，谁还有心思去留意身边有没有花木兰混杂其中呢？陈潮安是无意中发现美玲的秘密的。那天，陈潮安捧着瓷碗到那个监工的洋鬼子前面去打饭，不小心，手臂碰到了刚打饭走过来的美玲，美玲“啊”的一声，手中捧着的瓷碗“哗啦”丢在地上。要是一般劳工，馊饭翻在地上都会捡起来连着沙子吃进肚子里的，可美玲偏不。掉在地上的是两个发酸发硬的面包。美玲固执地站在两块硬邦邦的面包和一堆碎瓷碗前面，嘴唇抿着，目光倔强地盯着陈潮安。

陈潮安以为她会立马挥拳过来大打出手的，因为，在铁路劳工的生活里，食物就是天，是一切。这里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因为一块面包或一口粥水而以命相斗。陈潮安做足了开展一场恶斗的准备，他将瓷碗放在一旁，拉开架势，等待美玲挥拳扑上来。可是，美玲并没有对他挥拳，而是瞪着他，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瞪了良久，突地红了，眼内如骤雨欲来。她忽然转身，飞般跑出了人群。骤雨欲来的眼神，狠狠地击中了陈潮安的心脏，震得他脑海空白，他傻了般站在一节节扭曲的火车轨道上，似有什么告诉他，这个突然跑开的瘦弱小

伙子，将会与他的生命联系在一起。

之后的每次出工，陈潮安都有意无意地接近美玲，在她搬大石时帮抬一把，在她铲泥沙时搭着多挑一肩，在她汗流浃背时悄悄递上毛巾。从来都冷着脸埋头干活的美玲，在陈潮安的关照下，渐渐脸上有了若隐若现的笑容。这笑容实在太隐蔽了，一般劳工都发现不了，但陈潮安发现了，在低头给美玲递毛巾时，无意抬头，竟发现美玲在笑，那笑容，妩媚隐恻，动人极了。陈潮安又似被重锤击打着一般，浑身又烫又热，心脏扑扑跳个不停。在这一刻，经历过男女之事的陈潮安，笃定地认为，眼前这个瘦弱的小伙子，不再是小伙子了，她和家乡的那个二八娇妻一般，有莺声娇啼，能软玉温香。也从这一刻开始，陈潮安萌生了逃离铁路，摆脱劳工命运的念头，带着美玲离开这道扭曲的铁路，离开这段不堪的扭曲的修路劳工的生活。

“噢！亲爱的。”长年在美利坚国生活，陈潮安和美玲都习惯了用“亲爱的”称呼对方，陈潮安喜欢听美玲这样呼唤他，只见她两片薄薄的嘴唇上下轻轻翻动，吐出时有时无的淡淡气息，顺着气息之间，近似呢喃般，将“亲、爱、的”这三个字，柔柔地从喉咙里拉出来，粉嫩柔软的舌头慢慢卷起，将这三个字卷送到唇齿之间，这三个字逐一在贝齿中推送，吐过轻轻开合的红唇透了出来，轻而软糯。陈潮安看着美玲平滑的脖子和下陷的锁骨，也随着“亲爱的”三个字微微律动时，心中就会涌起一股柔情蜜意。在“亲爱的”这三个字里，没有了传统束缚，没有了继承责任，没有了男尊女卑，更没有了艰苦沧桑，只有相爱的人之间默默传递出来的爱的认同、信任和呵护。

陈潮安伸手将美玲拥在怀内，两人并肩坐在曲廊上，静静地看着月亮。良久，美玲才问：“亲爱的，这段时间，你的状态不是很好，我和孩子们都很担忧。”陈潮安拥着妻子的手紧了紧，没有作声，他不晓得说什么好。旧金山这里的家，是几十年来的拼搏成果，它传承着延递着陈家的香火，已生长得与陈潮安骨肉相连，不可分割了。美玲是他的真心爱人，30多年来，患难与共，举案齐眉，她已是他血肉中的一部分，只要美玲稍稍离开一点，他就无法适应，就痛不欲生，就鲜血淋漓。可是，人偏偏有思想，偏偏会长情，偏偏爱记挂，偏偏会萌发寻根逐本的乡情念想。旧金山再好，始终是美利坚国的旧金山，不是华人的旧金山。在这里，无论你多努力有怎样的名成利就，在美利坚国人的眼里，你还不过是一条华人狗，一只漂洋过海来贱卖苦力又抢食的丧家狗。他们会用鄙夷的白眼瞪着你，用无法想象的非人的手段来折磨你，从肉身至灵魂，在他们的意识里，无论对华人的何种折磨，再惨烈，再灭绝人寰，都是理所当然的。

陈潮安思念那片生他养他的热土，越到晚年越是牵肠挂肚，想起儿时光着脚丫在竹林里穿梭、在河滩上奔跑、在草地里赶鸭的那段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想起母亲煮好喷香的饭菜站在泥屋门前大声呼唤他回家吃饭时的模样，想起小村落里孩童们互相嬉闹时无拘无束的欢笑，想起父老乡亲们慈爱的抚摸和温软低沉好听的四邑白话。现在，他已经是步入暮年，应了贺知章的那首《回乡偶书》所表达的心情：“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贺知章是经历过多漫长的根叶分离，体会过几多艰辛的生存磨砺，才写出这样能撼人心肺刻骨铭心的千古绝句的？而今，老母亲已经埋在海边的山头上，再不能见到，曾经多少个日夜，老母亲拄着拐杖，爬上山头，远眺东方，

盼有朝一日，载着儿子的船儿啊！能够靠岸！

每每想到家乡那座埋着母亲的孤坟，陈潮安就泗泪长流，撕心裂肺。人生最大的不孝，是子欲养而亲不待。陈潮安懊恼啊！悔恨啊！他无法想象，老母亲临危时，即将熄灭的眼色是多么期盼又是多么绝望。陈潮安真悔啊！他早就应该回去了，应该回去。

“亲爱的，你把头发留起来吧！”说这句话时，美玲是用美式英语说的，她说得很轻很快，但听在陈潮安的耳朵里，却异常响亮。丈夫拥着妻子的手收得更紧了，美玲用下巴轻轻点了点陈潮安的肩膀，又说：“说不定，大姐还在家里等着你呢！”丈夫不禁坐直了腰脊。几十年来，美玲这个贤惠温柔的潮汕女子，始终坚持着她是陈潮安的妾，虽然陈潮安在旧金山的生命里，只有冯美玲一个女人，他们到旧金山华人民政处做了登记，又按中国人的规矩，拜祭了天地君亲师，在鼓乐喧天中走进洞房的。但在洞房之夜，交杯酒饮过后，美玲就借着酒意对陈潮安说，无论日后她和陈潮安将日子走到哪一步，远在重洋恩平家中的那个叫婉秀的女子，她都将接受，都将尊她为姐。陈潮安感动地将美玲拥入怀内，低声说：“这是旧金山，没人会计较这些的，你就是我陈潮安的妻子。”美玲从他怀内举头起来，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眼神倔强，一字一句地说：“虽然这是旧金山，但我是中国人。”

的确，这些年来，美玲虽然在生活习惯和社交礼仪上，已经很西化，但是，在骨子里面，她仍坚守着中国女性的传统，她柔韧、温顺、服从、体贴、以夫为纲，生了孩子后，她就完全回归到家庭，将整副心思都用在相夫教子上。面对这样的一个体贴入微又完全信任依赖自己的妻子，陈潮安怎舍得离开？真是归去难，不归去也难。美玲却没有让丈夫犹豫，轻声说：“小儿媳恐怕又有了，我想搬过去思恩那边，亦好照料。”

陈潮安“嗯”了一声，美玲继续说：“思华家生的三个都是崽，思恩家都养一个男丁了，思源也生了两男娃，我希望这次是个女娃子，我们那边，都讲究梅花间竹呢！”陈潮安又点点头，美玲为他生了两儿一女，三个儿女都特争气，在各自的领域里都能争有一席之地。美玲继续说：“我都想好了，你归去后，我就立马搬过去，给思恩将娃儿带到六七岁，到时我恐怕也老得快走不动了，你要是在那边不回来也没关系了，我到时让思华回去，照顾你和大姐。”陈潮安叹了口气，说：“亲爱的，别想太多了，即使回去，也是看看，我还会回来的。”

美玲的目光，幽幽地转向高空中那轮越来越圆的月亮，幽幽地吐了一句：“可是，山高水远，这一去，还能回么？”陈潮安浑身震了震，这说话是多么耳熟啊！

38 年前，他即将离开恩平的那个小小的村落的晚上，婉秀将一头长发，搁在他裸露的胸膛上，对着银盘般的月亮，幽幽地问：“那个美利坚国，隔着茫茫大海的，这一去，还能返么？”他翻身，将年轻的身体重重地压在婉秀美好柔软的身体上，喘息着说：“返的，一定返的，等我赚了大钱，就用铜皮笼箱装着金条，坐轮船返来接你。”可是，眨眼 38 年过去了，当年婉秀一十八，而今婉秀……陈潮安实在不能说什么，他的心如明镜，他当然与 38 年前不一样，无论身份、地位、人际和财力，都今非昔比。但是，再高的地位再好的关系再多的财富，都换不回来当年的年轻啊！现在回去，的确不再困难，可是，他已是花甲老人，那张从美利坚国穿越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轮船票，即使能运载得了他回去，但还能将他从太平洋的彼岸送回来么？这周周转转，两地漂泊，似是有根却仍无根的人生啊！注定是只有如果没有肯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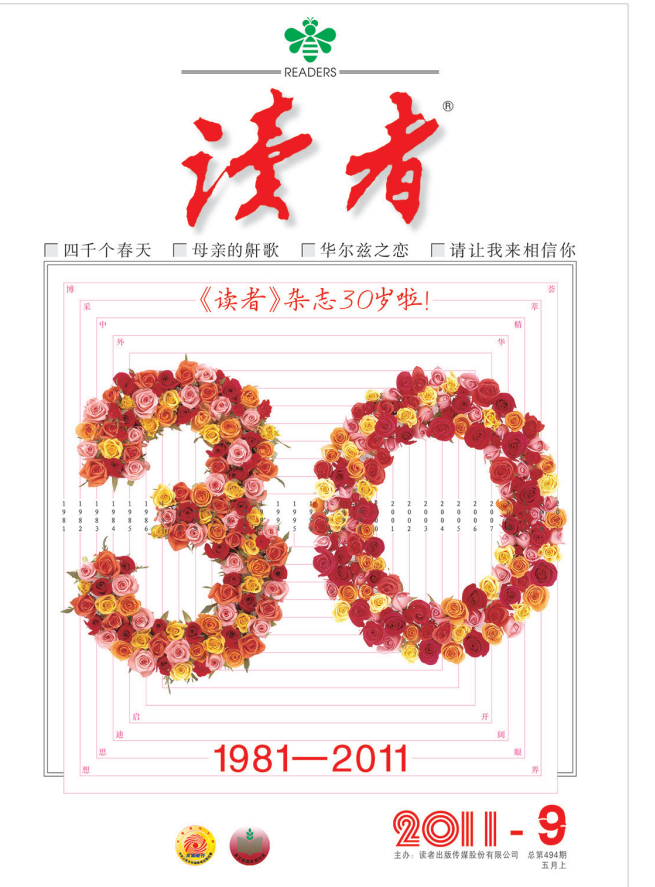
可是，知妻莫若夫，30 多年来生死与共，患难相扶，美玲的性情，陈潮安怎会不知？既然美玲已经将他离去后的生活都安排妥帖了，那么，

选择《读者》 成就你我

《读者》杂志创刊于1981年，是全球范围内发行量最大的中文期刊之一，具有『中国人的心灵读本，全家人的精神纽带』之美誉。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团体客户和广告客户，《读者》现在已经开办了团体客户形象刊业务和全国、省级广告业务，服务热线 18201020917







征稿

《海内与海外》杂志社是中国侨联主管主办的唯一一本人文性、文史性、知识性综合月刊，国内外公开发行。

《海内与海外》杂志社诚恳向各界作者约稿，欢迎惠赐展示海内外侨界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企业家、艺术家等各行各业名人的风采，归侨、华侨华人在祖国与侨居国所做的贡献，和他们在当地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各方面的现状和走向，精彩的中国故事，以及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海内与海外》主要栏目有：封面人物、本刊特稿、中国故事、特别报道、热点人物、侨界之光、侨乡揽胜、唐人街、名人访谈、大家风范、名人轶事、神州风物、人在海外、域外见闻、史海钩沉、心灵呼唤、中国在线、文化视野……

本刊声明：

1.投稿稿件自发出之日（以电子邮件发送日为准）起，三月内未收到采用通知，可转投其他媒体。2.投稿者有抄袭、模仿他人作品等侵犯他人知识产权行为，或稿件内容侵犯他人名誉权、隐私权、人格权的，由投稿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3.稿件发表后，即向作者寄出样刊和稿酬。4.凡在本刊发表的作品，本刊享有出版权与转载权。包括传统媒体、出版物、数字媒体、数字出版物、网络平台等。作者本人若要用于自媒体发布的，须在作品发表在本刊三个月后。如需转载、摘编本刊已发表的作品，均须同时获得本刊授权。5.投稿者的作品用于数字媒体、数字出版物、网络平台发表的，本刊支付的稿费已包含上述使用方式的稿费。6.凡向本刊投稿者，除附有书面特别声明外，均视为投稿者接受上述要约。

投稿方式：

电子投稿：hnyhw111@126.com。邮件主题栏标明稿件类别，字数一般不超过3000字，并请配发相关照片。

《海内与海外》杂志社编辑部

就是他安心归去的时刻了。他再次拥紧美玲，这个瘦小柔弱又倔强的女人啊！该怎么说她好呢？他将她的手紧紧握在同样是青筋满布老如树丫的大手掌内，紧紧地，紧紧地握着。

手续已经办好，马上就是归程，陈潮安既激动又不舍，临行前夕，儿女们都带着孩子们回来了，大屋里充满孩子们的嬉闹声。陈潮安着一身深灰色的香云纱唐装，立在客厅的雕花窗棂前，这雕花窗棂镶着深蓝色玻璃，玻璃上刻着盛放的牡丹，牡丹在中国，寓意花开富贵，在唐代武则天后，就被誉为国花。深蓝色的玻璃是西洋产物，镶嵌在雕了祥云的中式窗棂上，竟然产生出惊人的和谐协调的效果，这样的组合散发出来的意境，是惊艳的，高贵的。这是陈昭南大胆的一次尝试，将中西建筑雕刻艺术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这个在设计上有着惊人天赋的兄弟啊！在海外这几十年学到的积累的才艺，真不应浪费在美利坚国这片土地上。

虽然已是多年未回，陈潮安亦从一批批到旧金山来的华人口中，得知祖国的变化，特别是认识了驻美公使陈若虚后，陈潮安从这个同宗同脉的凤台后人口中得知今日之中国后，更感国家的危难困境，此时此刻，正是他们这些海外游子携手归去贡献力量的时候，花甲亦不迟。

六个铜皮大箱早就打造好了，美玲是个细心的好女人，她总能准确地捕捉丈夫的心思，自从决定让陈潮安回去后，她就换下家居服，穿上利索的西式衫裤，走出家门。已过天命之年的美玲，换上男儿衣饰，就散发出男儿的英武。当她将辫子扎成马尾，高高甩在脑后，穿着白色灯笼袖衬衣、深灰色骑士裤，脚踩咖啡色的靴子走出来后，儿女们都惊呼起来，陈潮安从众人的惊呼声中慢慢回身，也惊呆了。眼前的，是年过半百的徐娘么？如此英姿飒爽的美玲啊！为了这个家，30 多年来，她将自己的能干、美丽和热情都全部收起来了，心甘情愿隐在背后，默默地为丈夫为儿女打点背后的天地。她才是最不应被忽略的。

大儿思华的妻子亦是华人，性情如美玲般温顺婉约，不太晓得用语言表达情绪。小儿思恩娶的却是同在麻省大学读医学的美利坚姑娘戴维斯，戴维斯是个典型的美国姑娘，热情奔放，喜欢夸张地表达自己。美玲一走出来，戴维斯就高声尖叫起来：“嗯，嗯，你看，你看，妈妈真年轻真美啊！”她甚至忘记怀在肚子里的 BB，大步奔上前，拥抱美玲说，“妈妈，你是女神的化身么？”美玲对美国儿媳的赞美非常大方地受用着，30 多年来的美国生活，她早已经习惯这种西式的热情，这是陈潮安无法做得到的。她礼貌节制地回抱亲吻戴维斯，然后转向丈夫，微笑着说：“亲爱的，能送我去一下祥利家私行么？”还有拒绝的理由么？陈潮安绅士地背手弯腰，做了一个西式的请的姿势，为美玲做一辈子的车夫，他都无怨无悔。美玲微笑着，款款走到他的前面，将戴着白色蕾丝手套的手放在他上翻的手掌上，在儿女们的欢笑声中双双走出大宅。

陈潮安从心里感激美玲，即使分离在即，她都将美好全部留给了他，在这个关键时刻，这个传统温顺的女人，她又做出了非东方女人的行为，她没有像一般中国女子那样忧伤怨恨，将离情演绎得凄凄惨惨戚戚，而是用西方女子的自信洒脱和幽默，将丈夫送上归程。

在祥利家私行看见这六个泛着金光的铜皮大箱时，陈潮安的心，全都化了。那一个个坚定地铆在红木和铜皮之间的铆钉啊！每一颗都是美玲殷殷切切的祝福和期盼，它们如此坚固如此镇定地坚守在每一个转折点和接合缝边，分明得如同美玲的眼睛。陈潮安重复仔细地摸着这些铆钉。祥利的老板是二代华裔了，据老板说，

他的父亲未来旧金山之前，在家乡是个手艺精湛的木工，到了旧金山后，就成了金矿上的淘金人，每天弓着背在河道里梭着含金的泥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后来，有了一点积蓄，木工就离开了金矿，在唐人街这边，寻了个小小的位置，开始了制造中式家具的生意。老板的手艺就是从父亲的手里传承过来的。

祥利老板虽然和陈潮安熟悉多年，但亦不懂得这对即将面临分别的夫妻的心思，他滔滔不绝地给陈潮安介绍他亲手打造这六只铜皮箱子的经过，目的是为了告诉陈潮安，这是真材实料，物有所值的。可陈潮安哪有心思听他说这些啊！丈夫的心里全是妻子亲自为他打点归去行头的身影，时而是中式旗袍的曲线玲珑，时而是西式骑士服的英姿飒爽。摸着摸着，陈潮安的视线模糊了，这金灿灿的铜铆钉啊！就如当年那一粒粒从河道里梭出来的金子，全都是他与美玲的期盼和希望。

第三回　苦鸳鸯死里得逃命
荒山洞生情定终身

前文暂且按下不表，且说陈潮安与美玲的逃命生涯。

从发现美玲是女孩的那一刻开始，陈潮安就计划逃跑了。当铁路挖到山隘处时，陈潮安的机会就来了。荒山与荒漠不同之处在于，荒山能藏身，它不似茫茫荒漠，跑得再远都暴露在人前。山的隘口不大，四处荆棘丛生。喜欢钻研地质和勘察设计的陈潮逸告诉陈潮安，像这样的山况和地貌，山与山之间，应该会有很多山洞和溶洞的。陈潮安相信这个兄弟在地理方面的天赋，相信他能带自己和美玲在这片群山中找到通往山外的山洞。现在对于陈潮安来说，最大的困难不是逃跑的路线，而是怎样向美玲表白，并使她信任，劝服她和他一起逃跑。光是表白，就不是个容易的过程。

或许美玲已经意识到陈潮安发现了她的身份，她便刻意疏远陈潮安。当陈潮安过来帮她托起过百斤重的岩石时，她涨红着脸，急急地走向路基的另一边。当陈潮安在人们不注意时，将两人的瓷碗搁叠在一起帮她打饭时，她会突地跑过来，一把将瓷碗夺过，然后默默地排去队伍的最后面。美玲越是疏远就越抓挠陈潮安的心，这个自尊得让人疼爱的女人啊！陈潮安多么迫切地想寻机会和她说说话，可她就是不给机会，眼见着铁路就要修出大山了，陈潮安的心急得快跳出来了！

终于逮住一个机会了。

被劳役在荒漠和荒山中的铁路劳工是没有资格谈洗澡的，因此，大家都一样的体味浓重，一式的满身满脸的灰垢，身上除了两个眼珠儿还有点儿白的外，其他都黑成了一体，你很难从一个铁路劳工的身上，找出很明显的与其他劳工不一样的特征。但是，美玲始终与其他劳工有不同的地方，譬如洗澡，很难想象，一个在岭南水乡长大的，被温热柔软的韩江水滋养了 18 年的女子，能忍受长时间的汗流浃背而不洗澡的。但是，要躲开那么多劳工和监工的洋鬼子的眼睛，找个地方躲起来洗澡，的确不容易。她首先得找到一个愿意帮她做掩护的人。陈潮安自然是不二人选。然后，要在一个没有月亮的黑夜里，毒晕守在劳工帐篷外的几条恶犬，然后摸进黑黝黝的大山里，寻找可以洗澡的水源。

细心的美玲很快就留意到，陈氏兄弟不仅可靠，还十分熟悉地理结构，要寻找隐蔽的水源对他们来说不难。美玲注意到，陈潮逸经常会在监工不注意时，拿起一块岩石或一把泥土看了又看，嗅了又嗅。兄弟俩一有机会就把头悄悄拼在一起，研究一块泥土一颗石头或一棵特别的草树。美玲相信，陈氏兄弟的鼻子，能嗅出大山里的每一处水源，说不定，他们已经知道了这山里头，有没

有隐蔽的水池或洞穴了。于是，美玲就开始伺候时机。女人在等待时机时，会特别有耐性的。她能闭着眼睛抗拒铺天盖地而来的劳累和困倦，竖起耳朵听着巡查的洋鬼子，牵着凶猛的狼狗，从一个帐篷走到另一个帐篷。当午夜渐深时，洋鬼子亦熬不住困，将狼狗拴在帐篷前面，然后找个舒服的地方偷偷打盹去了。美玲立刻翻身起来，那套换洗的男人褂子早就折叠好，压在枕头下面，她抓起衣服和贴身的钱物，跨过一具具睡得死沉散发着恶臭的男人的躯体，蹑手蹑脚地往帐篷外走去。虽说是偷跑出去洗澡，但女人的贴身物件，一定要随时随地带在身边的，若不小心被哪个男人发现，她的身份就会被发现，那么，她在铁路劳工群体中的命运将是不可想象的。

美玲害怕身份暴露后，一年前的噩梦又再出现在她身上。美玲是被人下了迷药，贩到旧金山来的。在那艘被唤作“大鸭家”的轮船的最底舱，她和其余被迷晕了贩上船的姐妹们，都受到了人贩子们非人的凌辱。

海上漂移的日子，十七岁的美玲每天都必须替人贩子接三个客人以上，多的时候，到底是十个还是十一个，美玲已经记不清楚了，她也不愿意记忆起来。从开始的哭喊反抗到后来的咬牙承受，她身上的瘀伤，也是从遍体逐渐到完肤了。她不得不转变，不得不停止哭闹去学会承受现实。茫茫大海上，不想死去，就得委曲求全。底舱里面，每天都有女孩投海，能活着熬到旧金山的，几乎都是从地狱里苦熬出来的，在往后的人生里，她们所展现出来的坚韧的生命力，也是蓬勃的。这是再世为人。的确，有过一段猪狗不如惨绝人寰的经历后，还有什么苦痛不能承受的？

譬如美玲，在登岸之后，强忍着腹腔内排山倒海般欲出的呕吐，趁人贩子不留神，挣脱绑着她双手的绳子，没命地往人群密集处跑去。美玲拼命地跑啊跑，什么都听不见看不见，只有呼呼的风声伴随着她一路向前奔跑。她也弄不清楚，那天到底跑了有多久有多远，她只知道不能停下来，不能回头，即使追在后面的，是豺狼是子弹是大炮都不能停下来，这里不是大海了，只要这样跑下去，就会有活着的生机。停下或回头，都是死路。

美玲的逃跑，并没有遇到阻拦，洋鬼子们都非常忌讳这些刚从“大鸭家”下来的女孩们，他们认为刚从轮船上下来的女孩，身上都是肮脏的，全都是病菌。因此，当美玲跑过来时，洋鬼子们都不由自主地捂着鼻子躲开，美玲很快就消失在人群中了。一般洋鬼婆子来接船时，都会拧着一根碗口粗的水管，水管连接着一个水池，水池里面装满了有浓郁碳铵味的消毒水。女孩子们鱼贯从船上下来，迎接她们的便是这一支支水枪无情的喷射。她们会被消毒水呛得喘不过气来，从而没有了反抗的力量。美玲的突然挣脱，人贩子们始料不及，他们当然不乐意跑掉任何一个女孩，这些女孩都是他们的摇钱树，各大红灯区都非常欢迎这些柔弱如兔的女孩子们。

但他们不可能派很多人去追捕逃跑掉的美玲，还有很多女孩子需要看管。但在美玲的刺激下，被捆的女孩们都激动起来，她们早就意识到下船之后，迎接她们的会是怎样的命运，没有哪个女孩会心甘情愿命运被耻辱捆绑起来的，她们都尖叫着，使尽力气去挣脱那条绑着她们双手的绳子。人贩子们从来没有这般忙乱过，他们既舍不得将女孩们打死，但亦无法控制住所有女孩们的拼死挣扎。码头顿时混乱一片，那些提着水管，准备向女孩们喷射消毒液的洋鬼婆们，傻呆了般站在码头。待她们反应过来，女孩们几乎都挣脱了绳索，四处奔逃，码头上，立刻警笛长鸣。

这次美玲带头的混乱逃跑，一共跑掉了八个女孩。陈潮安回国之后，美玲便开始找寻这余下的七个女孩，后来经过美玲和她的儿媳戴维斯的共同努力，终于找到了这七个曾经患难与共过的姐妹，姐妹们相聚在一起，都禁不住抱头痛哭，

谁都没再提那段海上生活，可每一颗落下的眼泪里，都有它不能与人说起的辛酸。

美玲没日没夜地跑啊跑，她清楚人贩子会将她贩去什么地方。他们在船上，没日没夜地折磨凌辱她们，就是要摧残她们的意志，要她们认命，要她们服从。可十七岁的美玲，从她被人贩子用冷水泼醒遭受凌辱的那刻开始，就在心里起誓，一定要逃，一定要逃，一定要逃。

美玲做到了，她一直不停地奔跑，有路的地方就有她跑过的脚印，女孩坚忍不拔的逃命之路，从清晨跑到了日落。终于，在黑夜来临之际，跑到了一段正在修建的铁路前，她伏在一个矮浅的沙丘旁，不敢动一下。那些牵着狼狗的洋鬼子使她害怕，她不敢用一个女孩的模样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夜越来越深，身体越来越冷，美玲将手指插入沙土里，手指却碰触到什么冰凉的物件，她连忙扒拉开沙土一看，竟然是一具年轻的男尸。美玲吓得将尸体一推，爬起来想跑，但转念一想，又停了下来，俯身仔细观察这具尸体。这应该是个只有十七八岁的瘦弱男孩，很可能是修铁路的劳工，或许是熬不住工地上繁重的劳役，或许是染上了什么疾病，又或许是与监工发生了冲突被活活打死的，反正，他就这样死去了，就这样被浅埋在荒野里。他的父母他的家人，或许仍跪在大海另一边的家的神案下，虔诚地跪求菩萨，保佑他们的儿子顺风顺水，一生平安。可是啊！故国那边的父母啊！你们可知道，儿女们漂洋过海来到的国度，是没有菩萨的，他们信奉的是耶稣，

旧金山唐人街



一个被绑在十字架上的无能为力的人；他们信的是天主，是神父，那些个点着脑门和肩头念着“阿门”的人。菩萨到不了这里来的，而耶稣或天主，根本听不懂他们的祈求。所以，一切漂洋过海远离家乡的华人，他们的命运都经不起祈祷，是没有神灵保佑的。

海上见多了生死和残酷，眼前的尸体对这个十七岁的女孩来说，已经不再可怕。她冷静地将尸体身上的衣服剥了下来，然后又将尸体掩埋好。

就这样，美玲趁着混乱混进了铁路劳工的队伍，开始了她男女不分的劳役人生。

美玲溜出帐篷，为的只是能洗澡，她从没想过要逃，在举目无亲的旧金山，一个十八岁的女孩，能逃到哪里去呢？在铁路劳工群里混日子，虽然很累，但活下去就是好的。她惧怕从这里逃出去后，会被再次捉回去，被卖到那些肮脏不堪的红灯区。如若这样，她宁愿继续当一名铁路劳工，永远重复身体的劳累。

溜出帐篷后，美玲很意外，那条拴在帐篷外的狼狗，竟然没对她狂吠。她还在发愣间，一个身影已经静静地潜了过来。美玲刚想叫唤，对方已经捂住了她的嘴巴，是陈潮安，这气息，美玲再熟悉不过了。自从经历过海上的那段生活后，任何男人的气味，对美玲来说都是刺鼻的，都能使她恶心欲呕。但陈潮安身上的气味却让她觉得很安稳。那天陈潮安不小心碰翻她的瓷碗后，美玲就嗅到了陈潮安身上与众不同的味道。这或许就是冥冥中注定的姻缘，异性之间的味道能相互吸引的。美玲从不抗拒陈潮安的味道开始不抗拒陈潮安这个人，虽然，她仍在刻意逃避这个强壮黝黑的男人，害怕与他的眼睛相碰，这个男人的眼睛里有火，只需一眼，就能将她燃烧掉，她能不逃避吗？每天出工，只要见一眼陈潮安，美玲就心满意足了，有陈潮安在的工地，不再荒凉不再劳累不再孤单，美玲自我感觉越来越娇羞，越来越女性了，开始在乎身上有没有难闻的气味，开始在乎身上的褂子又破又旧，开始在乎身上头发上的每一点泥污。这晚，她对陈潮安暗示，想到大山里洗澡时，方式也是隐晦的。她只是在吃饭的时候，靠近了陈潮安，一只手用力在另一只手臂上搓了搓。只是搓了搓，都来不及分析陈潮安到底有没有领悟到她的意思，就逃也似的快步走到另一边。反正，她心里打定了主意，不管陈潮安明不明白，今晚都必须冒险一次。患难中，心灵更容易相通。陈潮安虽然端着饭碗低着头，但他真的全都懂了，那一下的搓手，将一个女孩的心意完全搓明白了。不过，他要的不是掩护她去洗澡，他要的是与她一起逃跑，一起亡命天涯，一起生死与共。不管美玲的心是怎么想的，反正，他一定要带她逃。

嗅到陈潮安的气息后，美玲的心便安定下来了，不用说，傍晚的那一下搓手，他懂了。这个男人对她是上心的，想必那条狼狗已经被他毒晕或打死了。陈潮安一声不响地拖着美玲的手，猫着身子，快步往大山的方向走去。

通往大山的路上，每一个帐篷外的大狼狗都被陈氏兄弟杀死了。兄弟俩在计划逃跑的这个晚上，绝没有想到，他们的这次行动，引发了旧金山铁路劳工的集体反抗。第二天的清早，劳工们在洋鬼子的辱骂和皮鞭下醒来，当他们被驱赶到空旷的地方，被盘问到底是谁逃跑了时，他们才知道，他们当中不但有人逃跑了，逃跑的人还顺便将那些凶神恶煞的狼狗一并杀死了。于是，劳工们便不再害怕，突然集体奋起反抗，愤怒的劳工们很快就将那些监工的洋鬼子控制住，然后，他们利用这些洋鬼子为筹码，开始了和美利坚国漫长而持久的对抗和谈判。

陈潮安拉着美玲，一路奔跑进大山内，陈潮安惊喜地发现，这个看似瘦弱的女子，竟然能和他同步，一路奔跑。握着她的手越收越紧，直至进入了大山深处，远远看见陈潮逸拄着两把铁锹站在一片黑黝黝的林木前面，陈潮安和美玲的奔

跑才停了下来。他们的脚下，并没有美玲所希望见到的水池，美玲在黑暗中皱了皱眉，被陈潮安握着的手动了动，可陈潮安的手指收得更紧了，他说：“我们是要逃跑啊，跑出这处山脉，起码要三天时间，我们没时间让你洗澡，妹子。”

一句妹子，让美玲又羞又臊，他真的什么都知道了啊！女孩懊恼极了，在心爱的男人的面前，一点点秘密都没有了。可惜这个男人在老家那边，已经成亲了。美玲是个细心的女孩，虽然表现得对陈潮安不理不睬的，但暗里仍非常留意他的一举一动。在吃饭的时候，她听陈潮安和其他劳工说过，他在恩平的老家，有个寡居的老母亲，还有年华正好的妻子，这年华正好的妻子有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婉秀。“婉秀”这名字是从陈潮逸的嘴里听来的，那天，她听见陈潮逸跟陈潮安说婉秀嫂子。美玲一下子便记住了婉秀这两个字。能够拥有这么美丽的名字的女子，会是多么的温婉秀丽啊！美玲自卑地扯扯身上已经破烂得几乎没了模样的褂子，心中难受死了。对于婉秀，她毫不妒忌，只是羡慕，这个能名正言顺成为陈潮安的妻子的女人，她前生修了多少福分积累了多少阴德，今生竟能与陈潮安这样的汉子成为夫妻。回想到那段非人的日子，美玲就觉得站在陈潮安身边，是那样的肮脏卑微。

陈潮安是非常尊重美玲的，他以当年华人在海外最高的规格迎娶了美玲，两人郑重其事地到民政处办理了登记手续。娶她，是一个男人对自己心爱的女人的最大的尊重，美玲觉得，够了，足够了。此生无所遗憾。

跑就跑呗，反正，这命也是跑回来的，死过一回的人，是根本不在乎再死第二次。陈潮安说要逃跑，美玲想都不想就点头了，以前跑是没有想过未来没有任何希望孤独一个人盲跑，这次跑，因为有了身边这个紧紧握着她手的男人，这是有未来有希望跑，前方虽然还很黑暗，但是，跑过这重重的大山，黎明就来了。两人共同为一个目标奔跑，没有孤独，只有互相扶持和……爱。对，那个漆黑的晚上，他们三人在黑而幽深的大山里跑，慌不择路。黑夜很黑，大山里的黑夜更黑，没有柴火没有光，只有两把偷跑时顺手带的铁锹。但是，他们是为爱而奔跑的，所以，他们并没有觉得四周有多黑，荒山有多大，脚下的路有多危险。他们穿越着群山，心里满满的都是希望都是温暖都是光芒，的确，在心里满载爱与光的人的眼里，是看不到险恶和黑暗的。

两把铁锹在关键时刻起了重要作用，它为他们铲灭了路上的荆棘，为他们挖通了通往光明的山路，为他们填平了难以跨越的沟坎，为他们杀灭了突然出现的蛇兽。在黑暗的大山里，人在没有任何工具辅助的情况下，是很难找到方向的。要是只美玲一个人跑，或许只能在山里面转来转去，但方向难不倒这对先天就对地理地质痴迷的兄弟，当寻不到方向的时候，陈潮逸负责找树，陈潮安负责寻水，他们能从树的形态或水的微小流动中找到方向。夜越来越深，也越来越冷，虽然是奔跑着，但短小的褂子始终抵不过大山黑夜里的寒冷，美玲抱着肩，看着在前面为她开路的兄弟俩。他们只拿了两把铁锹，但他们却不需要她动一下手指，这是到旧金山的一年多来，美玲第一次被人当女人看待的。他们开山辟路砍柴平土，一路搀扶着美玲，有几次蹚水而过，陈潮安都主动地弯下腰来背美玲，美玲很别扭，女孩子不好意思啊！但陈潮安却说，夜半三更的，女人的脚不能涉水沾寒。美玲趴在这个男人结实宽厚的背上，感受着那一起一伏的蹚涉，是那样的安全、稳定和幸福啊！这是一个男人真心诚意给一个女人的呵护，美玲泪水含在眼眶内，却不敢抽噎，只怕这打落的泪水，湿了心爱的人儿的肩膀。她轻轻地将头靠在陈潮安的背上，陈潮安用力托了托承着她屁股的双手，脚下的路，走得更踏实了。

走到第三天，陈潮逸看了看四周的树木，又

捡起一块石头看了看，说：“马上可以出山了。”可陈潮安不赞成马上出山，他建议大家躲回去昨天晚上藏身的那个山洞去。昨晚他们太累了，就在山里找了一个干燥的山洞，点了一堆篝火，围着篝火就睡去了。陈潮逸举头望望走过来的路，又回头望了望山外灰扑扑的天，说：“要是不赶快出山，马上就有好几天的大雨了。”陈潮安摇头说：“现在不能出山，他们肯定守在山外的。在洋鬼子的眼里，华人不如狼狗值钱。”

陈潮逸点点头，的确，他们用铁锹，一共杀了十条狼狗，这些狼狗平时对劳工们都很凶，但它们不会对陈氏兄弟凶。为了能顺利出逃，陈氏兄弟每天吃饭时都刻意剩下些饭食，然后装作不经意地倒给狼狗们吃，监工的洋鬼子们不觉察，以为是他们不小心打掉的饭食，被狼狗抢食了，他们还哈哈大笑，觉得陈氏兄弟傻呆，活该。但真正傻呆的人是他们，狼狗可不管你是有心喂食还是无意丢下，总之，谁给它吃的它就与谁亲近。当然，狼狗们是不能料想到，这嗟来之食会招来杀身之祸。当它们看到陈氏兄弟靠近时，还摇着尾巴上前示好，没想到，这次摇来的不是食物，是硬邦邦的一铁锹。陈氏兄弟已在白天时将铁锹磨得锋利无比，他们对这些狼狗的身体结构又了如指掌，一铁锹下去，必致命，这些狼狗连“呜”的一声还来不及叫唤，就命丧黄泉了。

陈氏兄弟欠了十条狗命，恐怕洋鬼子们要杀他们十次也不解恨的。陈潮安他们不知道大山外面，他们劳作的工地上，此刻正在发生着暴乱，美利坚国政府正忙得焦头烂额的，哪还有时间和人力到山外来围捕这几个逃跑的劳工？陈潮安他们又原路返回，山洞是悬空在半山腰上的，上去的山路非常崎岖，洞口外面只有几棵山草遮掩着。昨晚为了让美玲顺利上洞，他们砍了很多树木，撕下树皮，搓成绳子，让美玲绑着腰，然后才带着她上去的。砍下的树枝树叶经过一天的吹晒，都焉掉了，陈氏兄弟用铁锹把枝叶砍成一段段，捆好，一把一把地往洞山送。他们预备了要在这个山洞里住一段时间，柴火和食物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

柴火储存够后，兄弟俩又回头寻到之前走过的野水塘，在海边长大的男人，水性就是好，一会儿，他们就从水里摸上足够的鲤鱼。美玲在岸上，负责把鲤鱼摔死、剖肚、去除内脏，用削尖的树枝和搓好的绳子，把鱼都串起来。陈潮逸从水里冒出来，一抹脸上的水珠，笑着对陈潮安说：“大佬，阿嫂是会过日子的人呢！”美玲的脸“唰”地红了，之前听陈潮逸跟陈潮安说嫂子，嫂子是婉秀，美玲当时心里酸酸的，极羡慕这个叫婉秀的女人。现在，陈潮逸直接喊她阿嫂了，这就是对美玲的认同，她无须再羡慕婉秀了。或许，婉秀还要羡慕她，虽然婉秀是陈潮安明媒正娶的合法妻子，但他们一个在东一个在西，隔着不见尽头的大海，跨越了大半个地球，此生能不能再见，都很难预测。美玲满足了，即使没有名分，那又有什么呢？起码她能和这个男人朝夕相对，患难与共。

山里猎物很多，在大雨来临之前，他们打够了食物。入夜，狂风在山腰之间呼啸着，大雨倾盆把整个大山都遮蔽着，山洞里呜呜地回响着远处海风的呼啸声，临海的山脉，在台风来临时，都会怒海狂波，地动山摇。但地动山摇亦无法阻止山洞里躲着的人幸福地烧烤他们一天的收获。灵巧能干的美玲，用树枝和树皮扎了一个结实的木门。陈氏兄弟把木门装在洞口，狂风暴雨就被隔绝了。松枝杉木燃起来的篝火，温暖了孤寂的山洞，用松枝串着烧烤的鲤鱼和野兔，在噼啪的火光里吱吱地冒着油香。

陈潮安撕下一只兔腿递给美玲，美玲接过来，低声说：“谢谢！”陈潮安飞快地拿眼光瞥一下美玲，说：“如果能遇到老虎，那就好了。”美玲娇嗔说：“乱说话。”陈潮安认真地说：“我是真的希望的，如果能杀一只老虎，虎肉腊了可

以储存过冬，虎皮制干了就可以给你造御寒的衣服，那样，我们就可以在这山洞里过一辈子了。”

美玲羞红了脸，坐在一旁啃着鱼头的陈潮逸哈哈大笑：“看来我是多余的了。等雨停了，我就出山，留你们两个在这里做神仙眷侣。”陈潮安呵呵地傻笑起来。美玲低头慢条斯理地撕着兔肉吃，此时此刻的她，真愿意外面的雨能下一辈子，或洋鬼子们将山封一辈子，那样，她就可以和心爱的男人在这温暖的山洞里共度一生。

吃过东西休息够后，陈潮安便用松枝点着火把，往山洞的更深处走去。陈潮逸问他干么事，他说：“这个山洞的泥土干燥得异常，什么都可能存在呢！我进去挖挖看看。”陈潮逸摸摸洞壁的泥土，放鼻子下嗅了嗅，说：“嗯，而且，或许这个山洞能挖通的。”于是便提了铁锹跟在陈潮安后面，美玲安心地低头编织着揉得软软的树皮，她希望能在下一个夜晚来临之前，织一张带着树木香的被子出来，她甚至想象得到，她和陈潮安同盖在这张树皮被子下的温暖和美好。

大雨下了三天，陈氏兄弟挖了三天洞穴，美玲安静地编织了三天的树皮被子和垫子，她将烘干的树叶收集起来，铺好，然后在树叶上放上树皮垫子，将织好的树皮被子叠好，放在垫子之上。晚上，两个男人挖得满身尘土回来，看见铺在地上的“床”，不禁笑了，很明显，铺在地下的是一张“双人床”和一张“单人床”。陈潮逸捅捅陈潮安的腰，打趣说：“我都说阿嫂能干的啦！新床都做好了。”

陈潮安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偷瞥了美玲一眼。美玲装着看不见听不到，将一木碗雨水递到陈潮安前面，让他洗脸，又回过头来拨弄“石碗”里的鱼汤。陈潮逸洗干净脸和手脚后，又吃了一块野兔肉，喝了一碗鱼汤，打着饱嗝问：“阿嫂，我是该自己睡还是同大佬睡？”美玲羞得拿脚踹他，低声说：“管你怎么睡？”陈潮逸又恶作剧地说：“哦，我明白了，阿嫂是想我抱着睡！”说着就装模作样地凑过来，美玲一把推开他，羞涩地骂：“去你的，谁要你抱了啊！”

陈潮安顺势将美玲抱在怀内，刚还刚烈的女子，一下子如兔子般温顺了，半带娇羞半将就地靠在陈潮安的怀里。陈潮逸翻翻白眼，故意说：“外面的雨是要停了，但我的心里却滴着雨啊！罢罢罢，眼不见为净啊！”说着，弯腰卷起那张“单人床”和树皮被子，扛了铁锹就往洞的更深处走去，陈潮安叫：“你去边啊？”

陈潮逸回头挤挤眼说：“我觉得洞里面的泥土更干燥舒服些。”

陈潮安心领神会，便没再说什么了，的确，洞里的泥土更干燥了，这几天来的挖掘，洞里的情况使陈氏兄弟很诧；按理，越往洞的深处挖起，泥土应该会逐渐湿润才对的，但这个山洞却不一样，异常干燥。

黑夜里，一阵急促的喘息过后，男人对女人说：“我要娶你。”女人迷离娇懒：“那她呢？”男人说：“能不能活着回去都不知道，或许她已改嫁他人了。”女人说：“怎会呢？我是她，就绝不会改嫁，一定会等你的！”男人说：“那，我就两个都要。”女人的声音更娇懒了，甚至是魅惑：“即使做妾，我都心甘情愿。”男人“噢”的一声，又再翻滚起来，荒凉的山洞里，春意盎然。

紧密搂抱着的情侣还在甜蜜的梦乡里沉睡着，陈潮逸突地跑了出来，兴奋地大叫：“大佬，快起来，快起来。你们看看，你们看看，这是什么？”

陈潮安睁开眼睛，揉了揉，陈潮逸递过来的物件逐渐清晰了，那不过是一把黄土，没什么特别的，又闭上眼睛。

陈潮逸继续拍着他的被子说：“你看看，你再看看，大佬，这泥沙同之前我们挖的有么不同？”陈潮安慢慢坐起身，仔细看了看陈潮逸手中的泥沙，疑惑地问：“有什么不同？”陈潮逸干脆从地下再抓一把泥沙起来，对比给陈潮安看。

陈潮安的眼前，出现了一深一浅两种颜色不同的泥沙，他一下子跳了起来。

陈潮安说：“真的有可能是我们猜测的那样。我们再挖挖看看。”兄弟俩扛着铁锹，急急忙忙地往洞里面去了，美玲坐起来，穿好衣服，用烤得焦香的鲤鱼熬了个汤，端着往山洞里面走，这是她第一次进山洞里面，一直她都不晓得这两个男人在里面干什么。她更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挖这个山洞呢？虽然，它很有可能通向山外，但他们离走出这群山，不是已经路程不多了么？山洞里面，新挖的地方都被兄弟俩用树枝棍子撑着，棍子撑得很规律，安全地撑着山顶的压力，陈氏兄弟还在路上点了松枝，松枝燃烧着，那么，山洞里面的氧气是够的。一路堆着的泥土，由浅至深，越来越显深黄色。美玲什么也不懂，之前她不好意思送饭食进来，是她与陈潮安的关系还没明确，经过昨夜后，就不同了，对这个男人怎样亲昵照顾，都是理所当然的。

两个男人正使劲地挥动着手中的铁锹，挖着堵在前面的洞壁，他们非常兴奋，非常投入，连美玲走近都不晓得，直至美玲喊了一声：“潮安。”陈潮安才停下铁锹，擦一把汗回头，对美玲笑着说：“你离远点儿，就站在那里看着就行了。一会儿，就会有奇迹出现了。”

美玲满心欢喜地立在不远处，她以为，男人所说的奇迹，就是穿山的洞口，将会有一道光明迎接在洞壁的另一边。

但陈潮安所说的奇迹并不是穿山的洞口，随着两个男人合力挥锹挖下一片泥土后，一阵沙尘腾起后，眼前的景象逐渐清晰，出现在他们面前的，还是一堵洞壁，但与一般的洞壁不同的是，眼前的这堵洞壁，隐隐约约地镶着几道金黄色的线。美玲的心跳了跳，再跳了跳，从平常的规律的跳动，逐渐加快，加快，快得像心脏立马就要从腹腔里跳出来一般。

生活如眼前的金黄色，金光灿烂地展示在眼前。

陈潮安扔掉了铁锹，奔过来，不管不顾地抱起她打转，滚烫的鱼汤打了一地，他们都顾不得了，陈潮安狠狠地亲着美玲，激动地说：“亲爱的，宝贝儿，你真是我的福星啊！”

这是一个金矿洞啊！只要继续往下挖，将会有数不尽的黄金出现在他们的眼前。在过海之前，他们都听说，旧金山遍地都是黄金，他们就是奔着这个寻金的梦不远千里漂洋过海而来。

千千万万的华人冒着生命危险，来到旧金山这片处处是黄金的地方，虽然千千万万的华人在做着淘金的重活，但又有几个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黄金？陈潮逸跪下来，捧起一抔黄土，虔诚地举过头顶，向着洞壁说：“这是圣克鲁斯山脉，永远有奇迹产生的山脉。”是啊！会产生奇迹的山脉。若是陈潮安没发现美玲是个女人，他就不会产生带她逃跑的念头；若不逃跑，他们还是铁路上的修路华工，就不可能知道，大山深处，埋着灼灼黄金。

现在，他们必须做的是两件事情：一、立马将挖掘出来的洞穴填埋好，恢复原来的模样，然后将山洞口隐蔽起来，不能让第二个人发现。二、他们必须马上出山，要到别的金矿上做淘金工人，他们必须掌握一身过硬的炼金技术，还要置一套炼金的工具。陈潮安的计划更宏观，他必须采足够的金子，帮助他打开通向旧金山政府的大门，他必须将这个荒山买下来。

于是，三人又合力，用了三天的时间，将山洞还原为原来的样子，又从山洞下滚石头上去，将山洞口堵死，覆盖上枯草。一切处理妥当后，三人便出发了。他们相互扶持着，一步步往太阳升起的方向走去。这次，他们不再是逃，不再是跑，而是走，双脚坚定地踏在旭日东升的山路上。

就这样走出了大山，走上了漫长的淘金之路。

《汕头华侨捐资兴学记述（1949—2018）》前言



文　林伦伦

林伦伦，广东技术师范学院二级教授，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国家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核心专家组成员、广东省首席专家，广东省语言文字工作咨询委员会主任。

2018年，汕头市华侨史学会换届，感谢领导和会员们的信任，我忝任新一届会长。

会长既然当了，就得干活儿，我从来就不是那种占着东司不放屎的脚数（角儿）。

跟市侨联领导和侨史学会的常务理事们开了个座谈会商量先做些什么事。

于是，列个一、二、三、四……条出来：开研讨会，出论文集，出系列专著……而这本《汕头华侨捐资兴学记述（1949—2018）》就是系列专著中之一种，市委分管领导陈丽文、侨联主席谢惠蓉、副主席李洪钊等领导十分支持这个项目，帮忙找经费、搜集各市相关资料和田野调查工作，让我们解除了“无米之炊”的担忧。经过近一年大家的群策群力，终于可以不揣谫陋、献丑于大家座前了。

编著这本书，有如下三大难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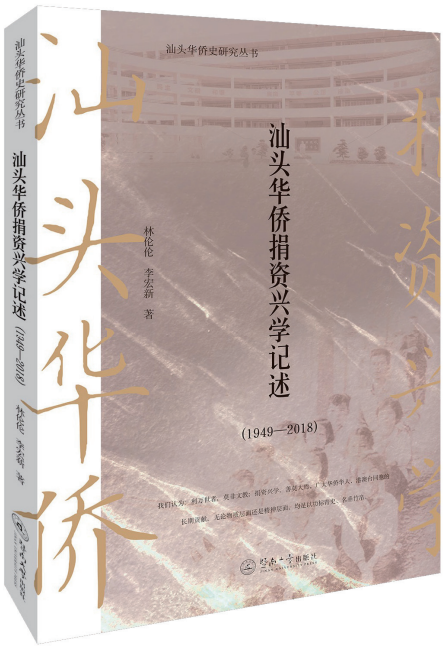
一、对“汕头”行政概念的划界难。从历史的坐标看，要把“汕头”这个行政概念分管的行政区域厘清，并非易事。我们的写作计划是“汕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分管到哪里，我们就写到哪里。但现在却是潮汕地区分为三个地级市，而且中间的“汕头地区”、“汕头专区”与“汕头市”也分分合合，行政区划随时发生变化。所以，我们不得不在每一个阶段里都有一个“时代背景”专节交代当时的行政区域变化情况。这似乎与本书主题关系不大，但又不得不交代清楚。为此，耗费了我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二、对各个阶段的分界线划段难。从书的目录看，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革开放前夕，改革开放—1991年潮汕分市，潮汕分市—2018年，这时间貌似界线分明。但其实不然，因为不少学校（幼儿园）接受侨资捐助的时间经常是跨阶段的，所以难以按阶段“一刀两段”。尤其是学校在不同阶段里有合并、撤并，还有改名，甚至数易其名的，做起调查来就更难。为此，我们又做了接近于“教育史”的基础工作，需要把每一所受捐学校的来龙去脉和现在的名称搞得清清楚楚且对得上号，生怕有张冠李戴之误。

三、对资料的搜集和甄别、取舍难。编著这本书，我们定下的原则是捐资款项一定要看到可资证明的材料方可入书，如官方文件、媒体报道、方志、行业志、碑铭资料等等。市侨联专门为此下发了搜集材料的通知，但缴交上来的资料寥寥可数，可资采信的资料就更少。所以，我们只能从市侨联、教育局、政协文史委员会、潮汕历史文化中心、汕头大学图书馆、潮汕文献特藏室等单位去沙里淘金，有时为了一条材料就得耗费好几天的时间。而田野调查工作也不是很顺利，有些学校以为我们是要去找什么对学校不利的资料，警惕性很高。李宏新同志不但为此几近废寝忘餐，而且做田野时还被误做“狗仔”而被报案。

但令我们兴奋的是，也正是由于有这“三大难点”，所以当我们最后克服困难，做出成果来之后，便发现有了如下的“两大创新点”。

一、这是第一本以“汕头”为空间定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年”为纵坐标来写的华侨捐资兴学的著作。我们毫不讳言，这是一本专门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在“汕头”捐资兴学的著作，是为爱国爱乡的华侨华人、港澳同胞树碑立传的；当然也是为党和国家正确的侨务政策，为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各级侨务和教育部门的同志们歌功颂德的。虽然，对某些历史阶段的错误做法我们也做了客观的记述，但瑕不掩瑜，总体来说，本书是充满正能量的。



《汕头华侨捐资兴学记述（1949–2018）》 林伦伦 李宏新 著

二、本书的资料是相关题材的研究成果中最丰富翔实的。虽然，囿于我们的人力和时间条件的不足，遗珠之憾肯定有。尤其是，第一、第二阶段里，“汕头”作为行政区域名，还包括了现在潮汕三市的市、县、区，现在的我们实在难以穷尽性地去搜集和获得所有的华侨华人、港澳同胞捐资兴学的资料。但就目前看来，从“汕头”的视角观察，从改革开放到现在的 40 年里，本书的材料还是较为丰富翔实的，所以我们才有胆量在本书后面编制了《改革开放—2018 年今汕头市域侨胞捐资兴学主要事例》的附录。

当然，编著本书过程中，还有一些问题我们最后也觉得解决得不是太满意的，这里也给大家“说清楚”，希望能获得当事人、单位和读者的理解和原谅。例如：本书的所谓“捐资兴学”，主要界定在学前教育—高中阶段，高等教育就不“记述”了。但最后又考虑到汕头大学和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不得不“记述”。于是，我们把它们附在学前教育—高中阶段的后面，根据两校的网络宣传资料和媒体报道资料做了十分简略的“记述”。而对韩山师范学院（陈伟南、林进华等先生捐资兴学款额巨大）和在现如今的汕头市范围内的汕头职业技术学院、粤东高级技工学校都未涉及。另外，如上面所述，潮汕三分之后属于揭阳市、潮州市，而“三分”之前又属于“汕头”管辖的县、市的一些资料搜集未能详尽。希望大家能帮助我们继续补充资料，使将来本书有机会修订之时更加完善。

末了，要把本书的写作过程交代清楚，功过分明、文责自负。本书的选题和编著意图是编辑委员会讨论决定的，编写大纲是林伦伦、李宏新讨论决定的，资料搜集工作主要是李宏新和汕头市侨联的同志们和另外一些同好完成的（详见李宏新撰写的后记），资料的甄别分析、图表照片制作、本书初稿的撰写是由李宏新完成的，最后的修改、定稿是由林伦伦完成的。

感谢上述提到的和尚未提到的对本书资料搜集、撰写、出版有过支持、帮助的同志们，也预先感谢给本书指出错漏、补充有用资料的同志们。

最早的潮商

文　李宏新

李宏新，独立学者，文艺学家，作家，诗人。出版有《潮汕华侨史》、《先秦潮汕研究》、《1991：潮汕分市纪事》、《潮韵》和《潮汕史稿》（主编）、《汕头华侨捐资兴学记述》（合著）等专著。获第九届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第五届广东省民间文艺学术著述奖，第六届、第八届潮学奖，2010、2012 年度汕头市文艺奖，2016 年度“广东省优秀民间文艺学家”称号等。



本文的“潮汕”，指的是今汕头、潮州、揭阳三个地级市；“潮商”，是潮汕籍贯商人的常见简称。

一

潮汕居民从商的历史相当悠久。

先秦时的潮汕地区便存在产品交流，以物易物的原始商贸活动随之产生，从事这类活动的人，一开始也许并非专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步形成较为固定的“专业”者，可视为潮商的祖先。

这一切，从商品流通肇始。

标志着岭南原始农业初步形成的代表性遗址之一、距今约 6000 年前的陈桥村遗址[①]，出土有目前所见、距今 10000—5000 年间南海周边典型遗址中数量、种类最多的骨器。骨器的取材、生产、加工链条完整，从各种方面来考察，这里俨然存在一处专业骨器作坊，产出的成品应非仅仅自用，而是流通周边。[②]

出土有广东“结构明确、保存较好、数量最多的新石器晚期陶窑”[③]，距今约 4000—3600 年前的揭阳虎头埔遗址，其独步岭南的制陶工艺已呈专业化、商品化。而众多虎头埔类型遗址密集分布于榕江流域，所产陶器溯流江海，北上西去：北往梅州平远、河源和平，远达韶关曲溪；西至惠州、东莞、佛山，



㊗ 澄海龟山汉代遗址出土的玛瑙珠、玛瑙耳珰

直抵香港屯门。这些，还仅仅是已探知的流通地点。

潮汕地区首个被公认的考古学文化、意味着“潮汕地区是岭南地区中最早接受中原华夏文明系统浸润地区”[④]的浮滨文化，在这里形成一个等级分明的浮滨方国。[⑤]浮滨文化由本土文化与域外文化（源头为中原商文化）融合而成，带有商文明、商人的文化基因。同时，浮滨文化应是潮汕文化的底层积淀。多年来，浮滨器在珠三角地区及香港大屿山、东湾仔等地陆续出土，这些缘海而去的器物背后，便依稀闪现着第一代“潮商”（海商）的模糊身影。

文化陶符是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它们与原

① 杨式挺、邱立诚、冯孟钦、向安强著：《广东先秦考古》，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46、372页。

② 李宏新著：《先秦潮汕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59—66页。

③ 刘成基：《虎头埔陶窑的初步研究》，载揭阳考古队、揭阳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李伯谦、邱立诚主编：《揭阳考古（2003—2005）》，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17页。

④ 杨式挺、邱立诚、冯孟钦、向安强著：《广东先秦考古》，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75页。

⑤ 饶宗颐：《从浮滨遗物论其周遭史地与南海国问题》，载黄挺编：《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6—83页。

始文字的起源密切相关，饶宗颐先生曾将之放在更广阔的中西方文化视野考察，认为人类在未有文字之前，会经过纹饰、以及十分漫长的符号阶段。[6] 浮滨文化陶符由虎头埔——后山类型陶符发展而来，迄今整理出来的达数十种，它们刻在器表，有学者认为已经具有商品“商标”属性，即是：生产者将自产产品打上专有印记，以区别于别家产品。当然，这些属于学术探讨性质。

实际上，除了了解到器物实物、原始产业化的形成、物流线路以及产品流向之外，我们所知甚少。这没办法，整个岭南区域在同期文字材料上近乎一片空白。

我们甚至不知道先秦潮商们使用什么货币，以及是否使用货币。

二

能够确定潮商开始使用金属货币的年代，是汉代。

“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嬴蛤，不待贾而足”，[7] 这条难得的岭南涉商记录来自西汉文献。它给人的印象是：直至此时，包括潮汕、岭南在内的南方地域并无须过多依赖商贸交流。

但这并不代表着这里没有商贸活动，金属货币的发现便是佐证。

迄今为止，潮汕发现的两汉金属货币，无论数量还是分布点，在岭南同期考古发现中即使不是最多的，也是比较凸出的。这一定程度反映出：潮汕商贸活动仍有进行，属于岭南区域中相对活跃的地区。

潮汕发现的两汉金属货币简表

发现地点 / 收购	数量	铸造年代	在潮汕流通年代
惠来水尾潭山	五铢钱20枚	新朝	东汉
澄海上华（收购）	布币2枚	新朝	不详
澄海上华（收购）	仿五铢钱	不详	不详
澄海上华走马埔	若干五铢钱	汉代	部分汉代
澄海盐灶车前站	若干五铢钱	汉代	部分汉代
澄海（上华）龟山汉代遗址	五铢钱1枚	东汉	汉代
澄海上华南山与龟山之间的台地	五铢钱2枚	东汉	汉代
揭阳新亨九肚村龙东溪汉墓附近	五铢钱36公斤	汉代	汉代

商贸盛处有商人。

潮汕商贸向以沿海为重点，两汉时期也是如此，而尤以海、河交汇处为关键。发现有大量货币的澄海上华，当时处于潮汕滨线前沿，其间的澄海龟山汉代遗址，位于韩江两大出海口之一的东溪河西岸，更是属于海、河交汇交通要地。另一方面，该遗址建筑物级别高于广东同期关隘城堡军事设施、低于宫殿式建筑，存有潮汕唯一高级别汉代“官署”以及大量居屋遗迹。[8] 这里应该是汉揭阳县治，尽管其施政未能实质性覆盖整个潮汕，但不失为当时潮汕商贸集散地。

龟山汉代遗址整体体现出来的是汉（民族）文化面貌，这里的经商主体应该是汉人。当时的流通情况是：潮汕域外商品自海入、腹地货物由

⑥ 饶宗颐著：《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27页、引言第1页。

⑦ （汉）司马迁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70页。

⑧ 邱立诚编：《澄海龟山汉代遗址》，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36—149页。

河出，加上当地自产产品，三者在龟山附近交流，再流向各方。在数量、品类众多的遗物中，至少有铜镜、削（处理竹简文字用）、玛瑙制品（珠、耳珰各 1 件）等应是从潮汕域外流入，其中的玛瑙制品原产地为海外，则是潮汕地区参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实物例证。

惠来水尾潭山发现的五铢钱产于王莽新朝时期，这种货币的使用时间不长，其在潮汕的年代应该是东汉。五铢钱是 1978 年建筑队施工时发现的，其堆积信息等材料全无，因此我们难以做出具体判断。不过，发现点紧邻水道，可与之联系起来的是：不远处的虎沟出有体现百越文化的米字纹陶瓮和戳印五铢钱纹陶片等，存在两汉或之前的土著聚落。我们结合其他可靠信息，作个猜测：这批钱币跟潮汕土著的对外商贸有关，其经商主体应是延续自先秦的土著商人，东汉时期的交易品包括日用陶器。

比较遗憾，直至两汉，关于潮汕的商贸、商人情况，我们仍然没法见到明确的同期文献记录。

三

隋代出现了涉及潮商的简略记载，其中较为可靠且广为人知的材料，来自于唐初修纂的《隋书》。

隋大业六年（610），陈稜率兵自义安郡（郡治在今潮州市市域）出海，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隋书》中数处提及此事，大约过程是：605 年，隋兵上报东南海面有人烟；607 年 4 月 6 日隋派小部队入海寻访，至台湾掠一人返；608 年，隋招抚台湾，不得，于是取岛上日常穿戴物件回大陆；610 年 3 月，陈稜等跨海出击，屡战皆胜，内迁几乎所有的土著。[9]

《隋书》的记载透露出不少信息，涉及潮商的大概有：首先，义安郡与台湾商贸交往早已有之，因此，当陈稜率领的中央政权船队磨刀霍霍直抵台湾时，台湾土著才会误认为义安方向来的是海商船队（“以为商旅”），并且纷纷前来与其商洽贸易（“往往诣军中贸易”）；其次，潮商早就熟悉本地至台湾的海路，陈稜才会以潮汕人口为向导，并由此地出海（“稜将南方诸国人从军”等）。

明万历二年（1574）脱稿的《东里志》，就上述《隋书》的记载作了进一步的阐发，称：“富商得以逡巡海道，与夷人交通，夷人亦得扬帆万里，与中国关市，皆自兹役起之也。其云自义安浮海，则必维舟岛屿，隆、深、云、青四澳，皆所经历矣。”[10] 这也是现存潮汕方志中涉及外贸、潮商的较早明确记载。

《东里志》修志者认为：中国对外贸易发轫于隋代（实际远早于此）；潮商出海，南澳岛上的隆澳、深澳、云澳、青澳是必经的港口；由潮汕直出台湾海峡，便可借助风汛，上达东亚、下抵南洋。此后四海之内，皆潮商所及。

确实如此。随着时代的发展，历代文献上的潮商，“或时候风潮朝贡，蛮、胡贾人舶交海中”（唐代）[11]，“岸海介闽，舶通瓯吴，及诸藩国”[12]（宋代），“东西界闽广之冲，

⑨ （唐）魏征、令狐德棻等撰：《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第67、74、1519、1824—1825页。

⑩ （明）陈天资编修，印行东里志领导小组、饶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东里志》，内部发行，2001年。

⑪ （唐）韩愈：《送郑尚书赴南海诗并序》，载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86—887页。

⑫ （元）周伯琦：《肃政箴》，载（明）解缙等编：《永乐大典》（精装十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473页。



虎头埔窑址出土的窑器

南北接山海之会。毂送蹄輷，无日无之”[13]（元代），明代的“驾双桅，挟私货，百十为群，往来东西洋，携诸番奇货”，[14]“千艘万舶，履焉为夷”（清代）[15]。

直至当下，天下潮商依然自强不息，勇立潮头。

---

[13]（元）黄刚大：《三阳驿壁记》，载（明）解缙等编：《永乐大典》（精装十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486页。

[14]（明）郭春震纂修：《（嘉靖）潮州府志》，载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编：《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13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80页。

[15]（清）金廷烈纂：《（乾隆）澄海县志》，清乾隆三十年（1765）刊本，卷二，第14页。

梅州客家：
有围屋有耕读，还有侨商与海洋



文　江　冰

江冰，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原院长、资深教授，文化学者，文艺批评家，专栏作家。入选中国作家协会新锐批评家、广东省十大优秀科普专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最有影响力学者排行榜。现为广州市人民政府聘任广州城市形象品牌顾问、广州都市文学与都市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出版有《中华服饰文化》《当代文学的三次浪潮》《都市魔方》《都市先锋》《这座城，把所有人变成广州人》《酷青春》《老码头》等著作。

01

从广州发车，两小时进入山区，车行一半，直指梅州。窗外农田平坦，远处青山如黛，视野开阔，景色如画，心情颇好。眼前高速公路簇新清洁，路旁村庄成排农舍，衬着山坡上丛丛树林；树林之上蓝天白云，白云之下满目翠绿，山丘修竹灌木，远山树木成林。绿色为树，白色为云，蓝天底色，三色搭配，构成车窗外的主色调。

今日小寒，但广东温暖如春，即便进入大山仍无一丝寒意。“要问客家何处来？客家来自黄河边；要问客家居何处，逢山有客客居山”。重山叠嶂，白云深处，就是客家家园。

并非客家不喜平原，而是平坦处已被土著与先到者占住；并非客家不喜沃土，而是资源有限生存竞争，客家没有现成的饭碗。于是，进深山勤奋拓荒，攀大岭重建家园，构成客家生命常态。

02

客家人与广府人、潮汕人，并称为广东三大民系。现有广东客家人口 3000 万，占全省人口 30%。客家亮眼名片有二：围龙屋与客家菜。广东梅州自古为客家人聚集地，誉为“世界客都”。

客家文化体验第一站，梅州保存最完好的承德楼围龙屋，如今为星园酒家。他们打出“品客家菜，看客家屋，做客家人”的独特品牌。酒家特色在于经营者就是围屋的继承人。

承德楼围屋奠基于 1885 年，建造人为东南亚梁姓华侨巨商。围屋占地面积 3780 平方米，双层土木跑马楼结构，三堂二横一围龙，八厅八井十八堂。楼上楼下共有八十三间房间。

> 文化承传亦如基因，总在或隐或现中发生作用：悠久而漫长。

每个房间都按不同主题装修，造型独特。文化主题鲜明的宴请厅，大小不一，各具特色。主人告知餐厅好处在于人气养楼，欣欣向荣。

承德楼用心保护，各类大小陈设尽量保持传统原汁原味，充分传达客家风味。仅楼顶维修一项，就用传统阴阳老瓦五十万片，全屋双层 83 间房，三代工匠师傅维修，最后一代也六十多岁，目前已无传人。

客家菜是中国八大菜系粤菜的一个分支，乡村田园风味浓郁。靠山吃山，临水求鱼。讲求食材鲜美，大鱼大肉兼顾清新时蔬，肥而不腻，爽滑可口。星园酒家对此颇多心得，既承传古法又有所创新。

今晚开席，传统盐焗鸡、酿豆腐和梅菜扣肉“老三篇”主打。盐焗鸡用围龙屋造型大盘，文化符号鲜明；酿豆腐两面煎黄，品相创新；梅菜扣肉风味独特，扣肉入口即化，鲜香滑嫩，本地梅菜香味浓郁且微微带甜，与猪肉绝配。

还有诸多客家菜品丰富多彩，其中印象深刻的是：招牌炒香螺，山坑螺肉鲜嫩，螺味十足；蔬菜显出新鲜优势，完美田园环保印象。艾叶蛋饺，一片清香，山野风吹拂。

肉丸萝卜丝丸双蒸，既粗犷又细腻，肉丸并不将猪肉馅完全做细，萝卜丝则是细丝可口；更有传统蒸味酵粄，按古法甜咸浇汁兼备，满口清香，直抵田园深处。

客家菜极少添加过重过浓佐料，用自然蒜葱调味，讲究养生保健。外形古朴、花色简单，自有一份天然色香味形的纯真特色。加一壶客家酿酒，暖暖的甜甜的，仿佛轻轻呼唤：家园在，胡不归？

03

黄遵宪纪念馆。黄遵宪（1848—1905）晚清诗人，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助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喜以新事物熔铸入诗，有“诗界革新导师”之称。

黄遵宪在客家文化中地位颇高，梅州老城梅江区称誉“诗画梅江”，诗为黄代表，画为林凤眠。黄的故居前广场保持质朴风格，一尊雕塑庄重而平和。

黄药眠故居。

黄药眠（1903—1987），现当代著名作家、文艺理论家，抗战时期在桂林因辅导无数文艺青年，被尊为大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北师大教授，1957 年错划为右派。故居在防洪坝下，一片老房子，名人故居不少，比如“将军第”等。

诗书继世源流远，孝友传家福泽绵。留余堂，门厅悬挂五个“文魁”牌匾，充分呈现家族科举兴盛。家族中出了现代作家张资平，为“中国言情小说开山祖”，创作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部长篇小说”。

文化承传亦如基因，总在或隐或现中发生作用：悠久而漫长。

没料到梅州老城区有如此之多的骑楼街，民国时代应当繁盛一时。蕴含往昔岁月的各式老店，仍然拥有各自老顾客。

饥饿农耕时代的老食品依然火热上市，芋头条南瓜条切丝油炸，味道都是三四十年前的老味道。客家汤圆热情接待，免费品尝，亦是老味道。

梅州民宿，艺术家设计，文青最爱，小资钟情，移步换景，处处匠心。细细品味，方知日常生活亦可借艺术超越提升，以美学，致生活，美在生活细枝末节中。涌入拍摄团队，一问，电影《围屋喜事》进行中。

林风眠故居，两排朴素民居，其中一间为林住过的房间。林祖父、父亲均为当地有名石匠，



黄遵宪



黄药眠

其父工艺上乘，深得赞誉。林在家乡读完中学，19岁赴上海，后留学法国。

林亲侄女林素玲，78岁，身体健康，拿出1991年赴香港探望林老合影，深情回顾：对我们很好，年年亲笔写信，还有赠画。握住老人粗糙的双手，仿佛感受昔日岁月：世事坎坷沧桑，回忆温暖依然。

林风眠在“文化大革命”时自毁作品，恐火烧烟多，将几百幅画浸入浴缸泡烂，抽水马桶冲掉。焚琴煮鹤，不堪回首。后蒙冤入狱，据说捆绑双手，不仅不让作画，连吃饭都低头舐食——但他没有绝望自杀，活到重见天日。

林在世界画坛极有影响，其仙鹤与仕女图拍卖价高达千万。李可染、赵无极等中外名家都是他的弟子。

他在国内美术界为开创大师，引进裸体模特写生等西方课程。中国美院学生访故居，自觉脱鞋进入，以示敬仰尊重。

04

丘姓村庄，白宫新联村。联芳楼，印尼侨商回乡建设，所有材料来自外国，两个家族合建，于1934年竣工，耗费2400两银元。建筑有巴洛克风格、伊斯兰风格、客家民居等多种风格。

村中出了乾隆皇帝帐前带刀侍卫，官至三品。曾自建一桥，桥前立碑霸气：凡过桥者，文官下轿，武官下马。



村前小学，四所私塾合并办新学，校门前小山坡，有带刀侍卫练功处。

新联村，牛角屋，1884年奠基，十年修建。隐姓埋名堪舆大师照风水设计。依山形，破常规，牛角神奇一撇，围屋并不合拢，却巧妙地与屋后山坡合抱成圆。登高俯瞰，果然如牛卧山间，屋后还有两口古井，形同牛眼。

风水先生预言每个方位有二十年风水，故，东西南北皆有门，依皇历开门，所以门多。每天关门都要几个小时，大户人家门有机关，常人不知，无法抽开门栓。

当过七年老师的郑文珊讲解细致，她告知：村子挽水西流，通梅江到松口进汕头下南洋，所以此村民形成外流途径，不但人丁兴旺，而且非富即贵，风水极好。目前已有企业入驻投资，拟将神奇牛角屋装修改建为民宿，再续旺盛风水。

玉水村，曾经古驿道，有当铺旅馆，为几百年货物集散地。潮汕海盐到梅江，由客家妇女从码头挑到江西换米；民国时，男主人多下南洋谋生。松柏楼，康熙年间当铺，门楼高大，墙体坚固。可见，当年驿道驿站市场繁荣。

两棵榕树，村西村东，遥遥相对四百余年，亦是玉水村一个标志。榕树婆婆，红皮无须，树冠若丘；对面榕树公公，枝干雄浑，遮天

客家围屋



蔽日。村庄传统农产品三华李，年产 300 万斤。

竹园堂，有功名，承朱子家训；其间又蕴含红色文化；朱德元帅当年攻打梅州撤退去井冈山，在此过了一夜。另有围屋完整的崇善堂，处于群山环抱小村中心。只见堂前菜畦水井，堂内供案牌位，一片安详宁静。

72 岁屋主人告知：崇善堂是爷爷在旧金山挣钱回乡盖的房，但三十多岁被土匪绑架撕票；父亲亦去国外谋生，每年回乡一次，我这辈几个儿女老家长大。如今我的儿女都读书进城，就剩下我与老伴守着老屋。

我欣喜地看到玉水村“美丽乡村”建设初见成果，旅游观光、民宿饮食，更有石斛、花卉、水果、拓展训练基地渐成规模，加上古驿道驿站遗址、红色文化遗址、明清老宅，以及季节性满山李花桃花……

小小山村，青山绿水，满园春色。如今五百年古村焕然一新，前景可观。

客家腌面加三及第汤，标配早餐加客家名牌小吃。难得此店虽小，烹调认真。汤与面均是一小碗一小碗单做，汤料上好，猪肉猪肠猪肝三样，膏汤煮沸加枸杞叶或艾叶；碱面一团团备好，沸水煮熟，猪油葱花拌食。面香汤鲜，亦是童年老味道。其中猪油醇厚，别有一份芳香。

05

客家博物馆，比十年前大气。十年前自我指称的那个打不出的 ai 字下，摆满客家妇女事迹与实物，造成深刻印象：客家妇女乃天下最辛苦女性，几乎承担家庭所有重担，男子似乎就是出外生意或征战。

提升改造后内容丰富，客家来源、特征与影响大为加强。五次南下、重祭礼重祖先重耕读、围龙屋重族群重防御重风水、客家菜、山歌、汉剧，等等显示汉族“衣冠南下”一个族群如何生存并流散全球。

> 这，或许亦是今天客家文化增强影响力与传播力的思考起点与有效路径。

梅江区作协主席朱红娜告知：可以南下的大多是世家大族，有经济实力文化传统。所以，客家人大多具有文化底蕴，是文化家族。

唐宋四人对广东影响深远，韩愈之与潮州，苏轼之与惠州、包拯之与端州，刘元城之与梅州。但梅州人内敛，很多人不知刘元城，官位在包公之上，但宣传不多。

几天访问，我对梅州客家侨乡印象深刻。此言不虚：客家人遍及世界，国内五千万，海外五千万。看来，整个广东的“海洋性”恰恰体现在几百年不间断地海外谋生与海外移民。客家“迁徙”不仅局限于华夏，“视野”亦是世界：宏阔而深远。

梅州人从前回乡走香港坐船到汕头，再水路到松口镇，松口镇陆路返乡。梅州人出洋也是沿此路线出去。故有一种说法：客家人“海洋性”与开放性比潮汕人略逊一筹。此说法未得考证，请教各方大家。

有专家认为：梅州客家人的开放性比潮汕人差一些，普遍崇尚读书、从政，求稳，讲规则，却也有骨子里的软弱。

但另一方面，梅州人视野相比其他客家地区来说又开阔几分，接受新事物能力也较强，并不封闭和固化，这与梅州人敢于走出去，受到新思想的熏陶有关。

这，或许亦是今天客家文化增强影响力与传播力的思考起点与有效路径。吾愿与梅州文友共同探讨与实践。

深圳私人地图

文 安石榴



安石榴，20 世纪 70 年代初出生于广西藤县石榴村，90 年代初期开始外出闯荡。在深圳、广州、北京、银川、沈阳、贵阳、南宁、桂林等地，或长或短漂泊过。现暂居广州。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写作及发表作品，已出版诗集、散文集、评论集、地方文化旅游专著 10 余部。

在一座城市之中搬迁自己

人生就像一张在各人生命时光中持续填充的地图，按照经历分布着一个个若明若暗的地点，每个人就在这张地图间进行命运和记忆或长或短的旅行。在我迄今描画的个人地图上，有一个地点异常鲜明，堪称嵌入我青春时期一枚拧紧的钉子——这个地方叫作深圳。

众所周知，深圳是一座富有传奇色彩的新兴城市，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还是中国南部海岸线上一个寂寂无闻的小城镇，随后在几年之间迅猛崛起，成为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光环夺目的前沿阵地，也成为全国各地庞大人群趋之若鹜的寻梦之城。1979年1月，广东省设立深圳市；1980年8月，国务院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1981年3月，深圳升格为副省级市。

1993年春节过后，我怀着对深圳的满腔憧憬，坐上从家乡广西梧州开往东莞虎门的飞跃客轮，又从虎门搭乘中巴来到深圳龙华，由此展开我在深圳长达七年多的生命历程。其时，我高中毕业相近两年，在乡村短暂务农后又到省城南宁游逛了一段时间，正处在人生不知何去何从的青春彷徨时期。那个春节，村里几个先行“落广”（即去广东）的伙伴争相向我描述他们在深圳的打工生活，使我对那座相距不算遥远却犹如在云端中的城市瞬间产生热切的向往。说起来，那时我连“圳”字的读音尚不知如何去念，更不知字义为何意，特意去查了字典，才知道“圳”原来指的是田间水沟，“深圳”就是“深水沟”。我要奔赴的去处，竟然是一个昔日的“深水沟”。但不能不说，这个在原意上显得土里土气的“圳”字，在感觉上却散发着无比神秘而时尚的气息。

从1993年那个跟随流水方向展开追寻的春天开始，到2000年年底迁移广州截止，我在深圳驻留的时间超过了七年。如果说深圳是我人生地图上一个醒目又深刻的注点，那么我在深圳七年间留下印记的各个地点，则是这个着重标记的注点之下一个个无序的小注点。我明白这是一张纯私人的地图，只在我的头脑和内心显示，所指向的注释也只对我个人有效，但那些地点却是真实的公开的，在深圳行政区划地图中确切存在。

多年之后，回望深圳那段占据了我青春黄金部分的时光，我已淡失了当初的冲动和激情，也消解了当时的迷惘与慌张，然而随着追忆的展开依然止不住心潮澎湃。假如一定要为这一段挟带着盲目、凌乱却又显现出觉醒、成长的岁月梳理一个关键词，我想最适合的莫过于“搬迁”——在一座城市之中搬迁自己，在被动或主动的搬迁之中认清自我，在无奈、机遇与觉悟之间寻求生命的安定。

那些年，我把对深圳的投入与热爱表现在连续的搬迁上面。这种搬迁除了生计、生活的奔走之外，更重要的是灵魂的撞击和激情的煽动——我太喜欢那种到达与未知的感觉了，它使我觉得好生活正在等待着我。七年多我住过多少地方啊，几乎每隔几个月我就要换一次住处，每到一个新地点我都会莫名兴奋，充满干活和做大事的冲动。老实说，七年来有好几件可能会让我回味一辈子的事都是在搬迁过程中酝酿成功的，我确实算得上是个一边行走一边思考的人。

我几乎为自己住过的每一个地方都赋予过热情洋溢的诗篇。我熟悉深圳的每一处角落，我是深圳的活地图，在大街上给别人指路我比交通警察还要老练和热情。毫无疑问，那时我热爱上深圳了，尽管这座漂亮的城市一再将我拒绝，但这有什么要紧呢？说实话，我从未在乎过自己是不是深圳人，生活的过程才是重要的。很多人一生都弄不懂自己置身何处，弄不懂在那里生存的意义。我也不知道，但我至少还保持着追问和寻找。

以前，应该说在我更年轻的时候，我设想在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之间搬迁自己，那时候我

想奔赴的是像文艺复兴时期的巴黎那样的都市，我总觉得有一种隐约的、像迷香一样的文化气息在远方召唤着我。后来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最真切的、最令自我迷醉的文化气息是从自己身上散发出来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磁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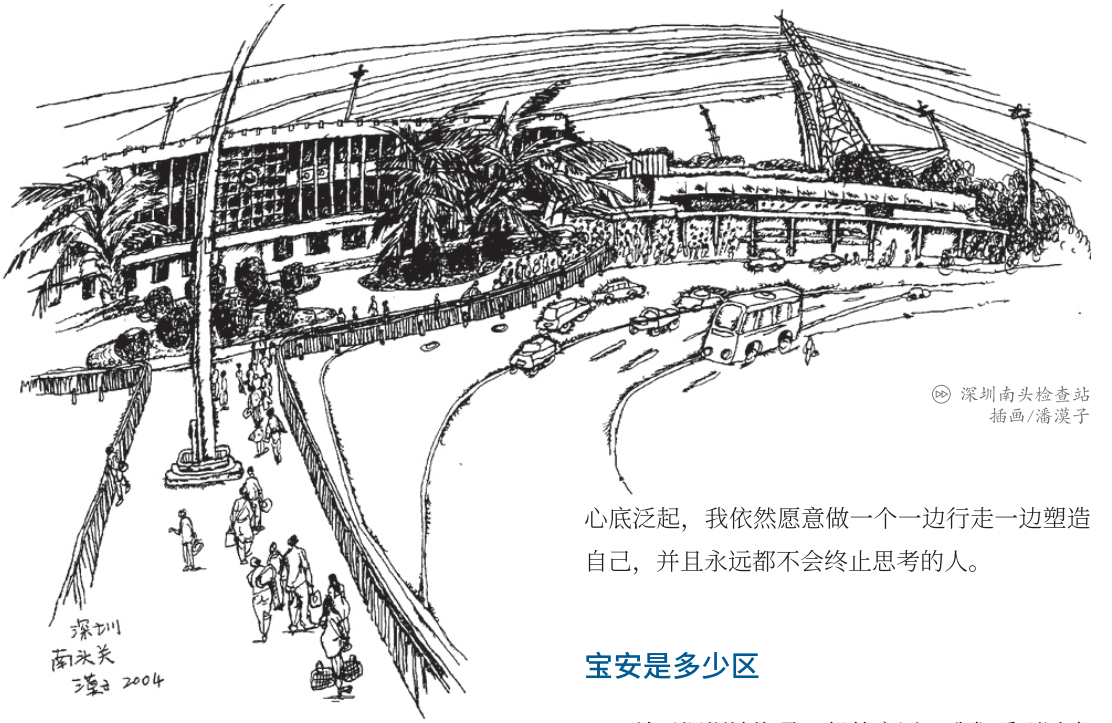
买房子真是一件大事。我不知道对诸如此类的误解该说些什么，有太多的人几乎一生都在为房子而奋斗，好像活着的意义就为了找一个洞穴钻进去一样。而我多么渴望能够彻底地敞开自己，多么渴望能够摒除门户与偏见，自由、快乐地生活在美丽的广袤的大地上。是的，我以后也有可能会不得不为房子而呕心沥血，或者会为今天的搬来搬去，把有限的血汗钱贡献给无限的房东而后悔。但我确实在搬迁之间得到了快乐与激情，我确实在连续的调整之中一次一次提升了自己，更重要的是，我确实需要通过多种挪动和激励来削弱、消除自己体内潜伏的惰性。

当然我指的搬迁不仅仅是搬家，但搬家给我的体会更加真实和直接一些，唯有无家可归的人才真正体会得到关爱的分量有多重，唯有把家背在身上的人才真正明白安顿下来的快乐有多深！每次搬家，我都累得够呛，我往往要花上至少一天的时间先收拾好，然后到街上随便请两个民工来搬，到货场请一辆货车来拉。我从不请搬家公司的人，他们总是漫天要价。我也从不请朋友来帮忙，那样不光累了朋友，我还得扮出一副感激的表情请客吃饭，假情假意不说，反而要花更多的钱。

我租住的地方多是深圳本土人的私人住宅，俗称民房，屋子里大都空空荡荡的。因为租房子的历史越来越长，我的家当也越来越多。每次搬走，想扔掉它们又觉得可惜，因为到新房子后照样得购置，所以我越来越像一个蜗牛，背负的壳越来越重。我最向往的是能够有这样的房子，屋子里所有的生活用品一应俱全，只需要带上自己的私人物件就可以入住，再离开时也只需背一个包袱就能上路，就像出门到别处小住几天一样。后来真的有了这样的房子，但基本是价格昂贵的酒店式公寓，像我这样纯粹为栖身图谋的租客实在可望而不可即。

搬迁还能带给我种种真实的、置身于生活温情之中的感受，包括那些值得回味的生活情节、细节的创造。每每搬到一个新住处，我都会充满兴致与盲目地把自己的东西挪来挪去，像第一次得到一个单独房间的孩子一样兴奋地布置着自己的居所，有时甚至会在半夜醒来，打量四周，觉得某件饰物摆放得不好，爬起来重新安排一个位置。而每一次，我都等不及安排就绪，就打电话给朋友们，邀请他们过来，趁机把所在的地方渲染一番。朋友们都熟知我这一点品性，有人开玩笑说我就像一个城市的导读者，去到那里，相识不相识的人紧跟着都会熟悉那里。有好几次我住的地方相当偏僻，朋友们来时，我一个一个出去接。当我每次站在路口，看到朋友们展开着笑容走近时，都会感到一种幸福与满足。是的，我并不是孤独的，尽管我寄身异乡，屡屡流离失所，但不管在哪里安顿下来，也不管是多么短暂，都会生出一种做主人的感觉，获得“有朋自远方来”的喜悦。这与我对自己的要求是相符的，我曾经说过一句这样的话：“无论去到什么地方，都要像主人一样活着。”

我把自己在深圳居住过的地方一律命名为“边缘客栈”，这个名字缘于 1996 年我组织出版的一部诗歌合集《边缘》，并为此写了一首算不上工整的古体诗：“边缘唯一栈，去留两相难。此身终是客，浪迹不知还。”请相识的书法家刘大明将“边缘客栈”四个字连同这首诗写成条幅，装裱了，配上镜框，我去到哪里，这面牌子就挂到哪里，真像是一面悬在愿望与梦想之上的旗帜。我印制过一种“边缘客栈”的名片，像传单一样散发出去。我曾在一家内



深圳南头检查站
插画/潘漠子

部发行的文艺小报举办过一次“边缘客栈诗展”，前言中列举了一大堆经常出入“边缘客栈”的朋友名字，后面是朋友们写的诗，也有专门为“边缘客栈”而写的。我有很多关于“边缘客栈”场景及活动的记述文字，所有的场面就像家具一样永远存放在我记忆的大厅。

除去居住地的搬迁，我还到过深圳不少隐秘的去处，被种种来路不明的情愫所触动。我甚至两度探访一个处于半山，几近与世隔绝的村庄，村庄叫“半天云”，隐蔽在南澳海边的悬崖深处，终日云雾缭绕，硕大的老藤和参天的古树神秘诡异；我曾从蛇口大新码头出发，沿深港之间的边防范围管理线一路东行至盐田港避风塘，其时这条线路仍属军事禁区；我曾在一个个静寂无人的深夜，独自在泛着各种松懈气息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徒步……是的，我曾经是深圳这座城市每一个明亮和阴暗之处的游走者，一个身体和灵魂都在不停搬迁和奔突的人。我明白，不管我获得怎样的安顿和快乐，搬迁的念头总有一天又会在我心底泛起，我依然愿意做一个一边行走一边塑造自己，并且永远都不会终止思考的人。

宝安是多少区

关于深圳沧海桑田般的变迁，我们看到过太多这样的句式，例如“20 年前，它还是一个偏远落后的小渔村。”“由一个偏僻小渔村到国际大都市。”也难怪，2019 年，才不过是深圳建市 40 周年，但要说它之前是一个小渔村，那就大谬特谬了，要知道，深圳市的前身，是广东省宝安县，这可是一个始建于东晋咸和六年（331 年）的古县，在其一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管辖范围曾一度包括今天的深圳、东莞和香港。

当然，今天所指的宝安，与古老的宝安并不可等同而语，甚至与深圳撤县设市前的宝安县都有所区别。1979 年深圳建市后，宝安县建制短暂撤销又恢复，辖深圳经济特区之外的部分，县政府驻地设在南头关外的新安镇；1992 年年底宝安撤县建区，划分为宝安、龙岗两个行政区。

宝安是我在深圳七年多最熟悉并留下深刻印记的地方，是我的深圳私人地图上一个最为重要的注点。自 1995 年 6 月至 1998 年年底，我在宝安停留了三年多的时间，占据了我在深圳整个驻

留时间的一半。可以说，在宝安的生命历程，奠定了我此后人生的理念及方向，使我由一个虚妄、浮躁的青年渐趋沉稳，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学习和上升的契机。

宝安区政府所在地，也即之前的宝安县城，与特区内（通常也被认作市区）只隔着一个南头检查站，一道被称为“特区管理线”的铁丝网从检查站两边无限延伸，像连起的绳索一样将众多奔赴深圳的梦想迎头截住。像我一样，很多人在满怀踌躇地到来之前，并不知道进入深圳市区还得通过需要专门通行证的检查站，很多人往往被不知所措地截在外面。所以宝安在人们的普遍认定中，同时又等于是深圳的边缘或外围，无论任何时候，从宝安进入深圳市区，通常除司机外，每个人都得下车，从检查站的过关通道排队通过，非深圳户籍人口须交验特区内的“暂住证”或专门办理的“边境管理区通行证”，后者较为普遍，俗称“边防证”。我想每一个来过深圳的人，对于边防证都不会陌生，由边防证而衍生的五花八门的事件，一定也听说过不少，中间的哪一个说不定就是亲历者。那一张小小的纸片，沾染了多少梦想的无奈，抑制了多少激扬的情绪，真是无从得知！

因为是 20 世纪 80 年代的旧县城，宝安多少还有点内地小城的味道，相对要显得安闲静谧一些，所以很适合一些残留着内地情结的人。颇有意思的是，宝安在城区规划上别具一格，仍然以“区”为划分单位，分为一区、二区、三区、四区……在宝安生活了三年多，我竟然从未弄清楚过宝安到底有多少个区，据说不下于八十个，可望发展到一百多个。我内心一直盘桓着一个荒诞式的反诘提问：宝安是多少区呢？这个深圳各行政区中区域面积最大的区，与“区”当真有着纠缠不尽的牵扯，更为夹杂不清的是，宝安的“区”的划分，是按各个地方的开发先后而确定的，随着城区的整合和扩建，渐渐显得顺序穿插、倒插，使人无所适从。比如马路的这边是五区，那一边却是四十二区，本城区的居住者倒还罢了，外来者要搜寻起来，实在煞费脑筋。在宝安生活的三年多时间中，我与好几个区发生过亲密接触，并写下过一首传诵一时的诗作《二十六区》，算是对宝安的“区”做了点贡献。

1995 年 6 月，我从一场年轻人特有的淘金梦中醒转，落泊穷途之际，收拾荒废的纸笔和情怀，投奔宝安文化局主办的文学刊物《大鹏湾》，当时《大鹏湾》酝酿改双月刊为月刊，由内部交流公开走向市场，我以一个失败的小生意人兼文学青年的身份，成为一个拓展销售业务的发行员，在书刊批发商和小书店之间遭尽白眼。《大鹏湾》号称“中国最早的打工文学刊物”“创世界者的港湾”，自 1996 年起至往后几年，确也风靡一时，成为珠三角庞大打工人群争相追捧的读物之一，最高峰时期印数达 10 万多册。而我也终由一个发行员熬成记者、编辑，参与及见证了这本刊物的光辉岁月，并由此完成了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

《大鹏湾》杂志在公开发行之前，印数大约在 5000 册左右，每期印出后一部分向各单位、机构赠阅，一部分发放到各街镇的文化站，文化站又分送到各家工厂，在打工群体中形成了一定影响，收到很多来稿来信。由此，杂志社决定深化面向打工者的刊物定位，申请改为月刊，并成立发行部。那时，杂志社仅有三个编制，主编叶崇华、编辑张伟明和美编颜晓萍，郭海鸿作为一个编制外聘用的编辑，理所当然地接受了组建发行部的任务，我和另一位在石岩组织“加班文学社”时结识的四川人刘云，就这样来到宝安，成了《大鹏湾》杂志的首批发行员。

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由于《大鹏湾》从未进入过市场，几乎所有的报刊代理商都不愿意接受批发，我和刘云只好一家家书店去跑，说动书店老板以当月代销、下月结算的方式以 5 本、

10 本的数量尝试销售，考虑到杂志的定位和在打工群落中的已有影响，我们的目标最先是工业区的小书店，从深圳关外的工业区开始，再到关内的工业区，又到东莞、中山、珠海、惠州等地的工业区。杂志印出后，我们又一家家去送，令人兴奋的是首期杂志铺下去即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第二期开始便有不少书店主动增加数量，一些报刊批发商也找上门来要求代理，到第二年（1996年）第一期杂志开始发行时，印数已达到 3 万册。不久，一家颇具实力的发行商通过洽谈，承包了全部的发行及广告代理，发行部随之解散，刘云离开杂志社，而在此时，张伟明恰好要到西北大学作家班进修，于是我顺理成章地进入编辑部当了编辑。

在从事发行工作期间，我一边还担任着编辑部举办的文学培训班的辅导老师，主要负责诗歌、散文的批改。文学培训班以函授的方式举办了六期，每期半年，后来不少声名鹊起的打工文学作家，都曾参加过培训，而我一直都是诗歌、散文方面的辅导老师。当时编辑部在二区的文化大楼内，属于宝安最早的文化机构所在地，四方形的旧式内庭院建筑，早就残旧不堪了，文化局的其他部门也早已撤走，搬至新的办公大楼，留守的《大鹏湾》编辑部就像是一件被扔下的破旧家具。实际上，编辑部所占据的空间，也仅有三楼一角的几个房间，再有就是五楼的两间宿舍，起先，我和刘云就住在五楼，后来，编辑部新来了一位美编罗向冰，同样住到了五楼。

文化大楼的一楼，有一个很知名的发廊，暗地里有“发廊培训中心”之称，据说宝安许多发廊的大牌发型师最先都从那里出身，生意素来非常红火，里面光是洗头妹就有十几个。而大楼内那些弃置的房子，则租给了旁边一家酒店用作员工宿舍，这样，每天在文化大楼进进出出的，几乎都是一些身着酒店工装的花红柳绿的女孩子，楼层的窗口及走廊上，成天飘荡着旗袍、乳罩等五花八门的服饰。我们几个住在里边的“文化人”，常常在这种景象中抬不起头来。有一次，我们在外面和前来拜访的作者聚会，酒量欠佳的罗向冰喝醉了，散场时已不省人事，深夜寻不着的士，被我们用饭店的一辆板车拉回文化大楼，竟招来不下二十个女孩子的围观，一时传为笑料，我们也算是颜面尽失、斯文扫地了！

离文化大楼不足千米之距，四周楼房遮挡与围绕之间，隐蔽着一片低矮的小树林，穿插着月桂、夹竹桃、番石榴、垂柳等树木，小树林旁边，是一个大约两百见方的池塘，大大小小的荷叶铺满了水面，荷塘中间，居然还有着一道九曲桥。这一块闹市中罕有的风水宝地，被人充分利用开了一家饭店。我来到宝安的第一个晚上，郭海鸿就在这里为我设宴接风，之后，这个地点理所当然是我们聚会交饮之所，成为我们工作之余一个最重要的生活舞台。饭店名曰“桂香园”，不怎么形象，但也算适得其所了。夏夜的荷塘中蛙鸣阵阵，明月从枝叶细密的缝隙中洒下来，悬在枝条上的灯泡发着散淡的光，一派婉约和朦胧，我们通常就在这样的氛围中长久地饮酒，度过异乡一个个失魂落魄的夜晚。桂香园饭店也因我们频繁的光顾流连而声名渐播，终成为宝安一个私下的文化盘桓之处。想起来，我们对“桂香园”的渲染的确不遗余力，郭海鸿甚至写过一篇就叫《桂香园饭店》的文章，在当时文化圈中影响一时的《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周刊》刊发出来，使宝安之外的许多人都从文章中目睹聆听了桂香园的月色和蛙声。

桂香园带给我们的快乐是具体和有声色的，我们就像是一帮驻店的酒客，每日在此专事饮酒和谈论。我眼中历历再现一个个谐趣的场面：满腮胡子、虎背熊腰的美术教师李新风，“嗖”的一声跳到树上去扮猴子；叶增从窗口爬出去想捉迷藏，一不小心“咕咚”一声跌进水里；周涛平又举起酒瓶唱《潮湿的心》；郭海鸿在叶汉东

的旁白中，得意扬扬地表演青蛙被水蛇追赶的叫声……1996 年 6 月和 1998 年 6 月，诗合集《边缘》和《外遇》诗报筹划出版的第一次聚会均在这片小树林的掩映中进行，《深圳商报》1998 年 10 月份对“外遇”诗群的追踪采访也在这个荷池边上画上句号，包括《西乡文艺》出版的数次稿件讨论，都是在树林间的觥筹交错中完成的。《西乡文艺》的主编、《调到深圳又如何》这部小说集的作者孙向学，恰好就是我们的铁杆酒友之一，他为我们贡献了不少的快乐与酒钱。

二区、二十六区、七十四区是宝安曾给予我亲密时光的三个区。1997 年 6 月，为了建立一个更自由和广泛的交往空间，同时为了回避一场盲目恋爱余下的惆怅失落，我撤离文化大楼五楼的单身宿舍，到城区靠山一隅的七十四区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一个人离群索居。这套处在一幢民宅顶层的房子，就是“边缘客栈”的第一个据点，此后，我将所有租住的房子一律命名为“边缘客栈”。因为朋友和诗歌，“边缘客栈”最终获得了种种赋予，这是我始料不及而又在意料之中的。七十四区很快发展成我和朋友们聚会活动的一个重要地点。每天早上，我从七十四区出发，坐五路公共汽车到二区文化大楼上班，傍晚再从二区坐公共汽车返回七十四区。在这样的周而复始和循环往复中，我穿越了宝安多少个区，无从说清，值得说明的是这一行走过程意味深长。这一内心淤积的感受在《二十六区》这首诗中得到了体现，二十六区是我当时频率较高的一个夜间出没之地，朋友叶汉东在那里开了一间小杂货店，我们一干人常常坐在小店门口无所事事地饮酒。有一个晚上，一位新加入的好事者听说我写诗后感到好奇，怂恿我即席赋诗，喝得已有点状态的我当即站起来，大声“写”出了《二十六区》这首诗，追究起来，这完全是我与宝安特有的“区”在暗中冥冥相撞的结果。

宝安给了我随处闪出的遐想和恍惚，有一个晚上，我和一帮朋友照例在桂香园饮酒，到最终各人散去时，已是夜阑人静了，我抑制住心头的酒意，慢慢走回住处，当我站到文化大楼五楼的宿舍门口，掏出钥匙要开门时，才恍然醒觉原来自己已经搬到七十四区去了，不禁哑然失笑。那晚我一个人在街上游荡了很久，徒步丈量了一个又一个区，直到天色将明才回到七十四区。此后，类似这样的酒后游荡，在我于宝安三年的栖居生活中发生过多次，我相信当时我的灵魂是超出体外的，与这个小城、这些街道的灵魂在寂静和漆黑中结伴而行，碰撞出灵感与火花。

从上沙向下沙漫步

每一个沉陷深圳的人，对房子大抵都会有深刻的感受，这种感受的源头恰恰不是那些琳琅满目中尚且争相崛起的楼盘社区，而是与心情、境遇同样错落无着的城中村。作为城市最后的消失的村落，深圳的城中村安置和粉碎了多少人踌躇满志的奔赴及怀想，无从说起。唯一能够揣测的是，当许多人终于在梦想的一隅拥有一扇属于自己的窗口，又在某个难得的闲暇时分感受瞬间的明媚时，眼底必定会悄然掠过城中村搅拌着凌乱、焦虑和热烈的阴影，内心不由隐隐怀念那一份蘸满向往的时光，追寻幸福在不可企及之时所呈现的魅力和意义。

2005 年，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当代城市规划专家约翰·弗里德曼造访深圳，在参观了市中心、华侨城、下沙村等地后，出乎意料地说出了这样的话：“最能代表深圳、最能体现深圳精神、最能表达深圳生活之活力和魅力的，就是城中村。”

深圳最知名又最隐晦的城中村，除市中心的巴登街外，无疑就轮到位于华侨城的白石洲和处在深圳湾畔的上沙、下沙了。上沙、下沙、沙嘴、沙尾几个紧邻的村落统称沙头，外围绵延着美丽的红树林，内围则有滨河路上下相隔，在滨海大

道未接通滨河路之前，这一地带确实称得上是深圳市区一个神奇的边角，如同被无形割离的一块半岛绿洲。1999 年年底，深圳湾畔耗资近 30 亿元的滨海大道通车，大大降低了沙头与中心区的隔阂，城市规划者也开始酝酿填补这块遗落的“夹缝地”，然而即使后来声息如何相通，也始终掩饰不了那种偏安一隅、繁华内敛的游离与迷离气氛。

沙头与香港灯火相望，笙歌相连，更因港人的频繁出没而倍添暧昧的色彩，而下沙更被私下称之为“小香港”，这一点从下沙遍布的迎合港人生活习惯的饮食、娱乐设施即可分出端倪。据说，下沙的本土居民十有七八都是深港两地来回居住的，在这种特殊的生活方式渗透之下，造就一个不需要怎么名副其实的“小香港”，实在不足为奇。

上沙村有着 800 多年的历史，原名“椰树下”，顾名思义就是椰树下的村庄，后来改为“上沙头”，简称为“上沙”。上沙与下沙仅仅一步之距，但给人的感觉却有很大的落差。不知什么原因，下沙总给人一种划地为城的印象，从上沙一步踏入下沙，往往随即就会受到一股磁场般的牵引，如同进入一个慕名已久的景区……在一个个迷蒙无状的夜晚，我亲眼看到，下沙的街口，错落停靠着数辆出租车，随时招徕着从里面走出的乘客。这种知名景点或酒店、大厦之外常见的景象，在下沙这样一个难以名状的村口，居然日复一日地上演着。

在沙头所辖的几个村落中，下沙就如同富足而有致的老大哥一样招来其他几个弟弟的羡慕，尤其是半步开外的上沙，更是唯下沙马首是瞻。这一情绪至少波及众多在上沙栖居的外来闯入者，致使他们在有限的百无聊赖时分常常不由自主地向下沙漫步。我本人就培养过这种缺乏来由的癖好，1999 年 10 月至 2000 年 8 月间，我曾在上沙两进三出，陆续居住了近一年的时间。那时候，由于《深圳人》杂志因故停刊，杂志社解散，我失去了稳定的经济来源，生活入不敷出。尽管这段时间我的生活几乎被动荡与不安笼罩，但仍保持着一个习惯，就是从上沙向下沙茫无目的地漫步。在无数个心境寂寥的晚上，我趿着拖鞋踱下上沙出租屋狭小而灰暗的楼梯，穿过一条被大片地摊挤出的杂乱通道，进入下沙灯火闪烁的街口，去遭遇里面被想象人为附加而又说不出的情形。联想起来，从上沙进入下沙，真像是走进一个众目睽睽的入口，如同闪入某些歌舞厅一直处在无形窥探中的门廊。

对于看客般的游逛者来说，下沙旧祠堂前的广场算得上是一个绝好的夜间逗留之处。下沙一早就以本土村落的面貌与方式实行着对都市社区文化的渗透，村中建有博物馆，还保留有祠堂、牌坊等古迹，并有与园林、休闲、运动相结合的村中心广场，于踞守、朴素中又散发着现代社区的气息。在那座始建于明代的黄思铭公世祠和陈杨侯庙前面，常会看到村里举办的一些活动，有舞狮、舞龙、武术、粤剧等民俗表演。据悉，这里也是下沙村人每年元宵节举行“大盆菜”宴会的地点。“大盆菜”沿袭宝安县的旧称又叫“新安盆菜”，顾名思义就是一盆菜，通常由 15 道菜层层装盆而成。相传南宋末年，宋帝逃避元兵追杀流落到香港九龙一带，当地村民把各家各户的残菜剩饭一盆盆拿出来，让饥肠辘辘的宋军饱食了一顿，于是就有了香港、深圳一带吃“大盆菜”的习俗，下沙村人更是自立村以来就有元宵节吃“盆菜”的传统。2002 年元宵节，下沙村在旧祠堂前摆宴 3800 桌，宴请世界各地宾客 4 万多人，由此开创了全世界最大规模的民间宴会，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如此盛大的宴会场景，当真令人叹为观止。其时我虽然已经离开深圳，但还是从报纸上看到了照片，目睹那个曾经无数次流连的熟悉之地，不由得感慨万端。

我在上沙居住的时间尽管不满一年，但却历

经了两番出入，期间转换过三处房子，而生活及情绪的波动似乎更大一些。相对而言，上沙的房子出租得稍算便宜，比较适合收入不高或者工作不稳定的租客，尤其是像我这类常常在某段时间深居简出的散漫好闲之人。遗憾的只是城中村的房子并不适合闲居，它外部的脏乱与内部的暗窄都一再削减着赋闲的心情，能以满意的价格租到一个通风或者采光良好的房子，则为不幸中的幸运，自然环境就不必奢望了。就这个意义说来，我在上沙发生过接触的三处房子，有两处还算合乎无奈的理想，能够见缝插针地眺望一下临近的红树林，领略对岸香港相隔朦胧的屋宇和灯火，并且能够沐浴晚夕涌来的海风水气。我曾对朋友们描述过其中一处房子的“海景”：搭一张凳子站到窗户高处，透过几层错落的屋顶，即可看到深圳湾外的树林、滩涂和海水……从另一角度去看，此情此景，怎么都有点像从囚室里向外张望！在数个月朗风清的夜晚，我默默地站在凳子之上，扶着窗栏，久久凝望外面无言的静谧和清凉。深夜从窗口吹入的风，常常拂过我飘忽的梦境，好多次，我从梦中睁开眼睛，月白风清，一片迷惘，不由得心不自抑，免不了有时悲从中来。

与朋友一同趴在窗户“看海”的情形，定格成我在上沙短暂的蛰居岁月中一个永恒的图像。每次有朋友过来，我都会招呼他们先站到凳子上稍事观望，一边渲染一番那种凭窗远眺、明月高悬、心怀广宇的臆想情景，然后领着他们走出屋子，从上沙向下沙一路漫步。如果说我是上沙一个不合事宜的闯入者，那么之于下沙，我则是一个秘密的看客，也许没有一个人会像我这样乐于在一个地点无所事事地来回转悠，还要将这一盲目的癖好轻率地转嫁给朋友。在上沙的一段日子，我的确是在无所事事中度过的，在前路迷茫以及心境空虚中挥霍着莫名的青春时光。

在我当时居住的楼下，有一间小小的鸭粥店。粤西的电白鸭粥很有一些名气，在深圳这个乡愁充斥的城市，自然能引起一众相关胃口的共鸣，也必然带出某种蔓延的效果。在我的印象中，深圳最知名的一间鸭粥店在莲花二村附近，我曾和朋友去过数次，很有物美价廉的感觉。上沙的鸭粥店不如莲花二村的地道，但不失特色，极具家常味道，并且通宵营业。那里常常是我夜间独自消耗时光和心情的地方，夜深了，店主将桌子移到街道边上，让食客们敞开情怀，慢慢消磨。当然像我这种乐于在此耗费时辰的食客是极少的，大多数人都把这里当成简单的消夜的场所，仅仅是为了填充一下加班或应酬回来显得疲惫虚空的胃。

进入 2000 年秋天，随着生活的日渐彷徨，我在深圳陷入的疲倦也渐见迫切，开始酝酿离开。在朋友的规劝下，我于犹疑中撤离上沙村，搬到深圳书城后面的金塘街暂行调息。上沙、下沙在我生活中的介入尽管短暂而空白，但却在头脑中植入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我看来，这两个知名而隐晦的城市村落，代表了深圳城中村诸多共通的迹象，足以使人一窥见豹，更使众多曾经置身其中的人体验到生活的无限滋味，拥有人生另一层面的认识和力量。

蔡屋围到巴登街一带

我在深圳栖居生活的最后一个驿站，也即“边缘客栈”的最后一个据点，是蔡屋围金塘街，与众所周知的巴登街仅一路之隔。蔡屋围到巴登街一带，素来是深圳市中心繁华含着隐晦的地带，弥漫着经济、文化、格调、迷乱、糜烂等最为光怪陆离的气息。众多在深圳传奇崛起中被赋予了某种象征色彩的知名去处，如深圳书城、地王大厦、深交所、深圳大剧院、新闻大厦、晶都酒店、台湾花园、红叶剧场、岁宝百货、八仙楼、本色吧、根据地酒吧等，就近距离地错落在这一称得

上狭小的区域中，单就此看来，这一地带就是一个光芒隐匿的所在，如同一张随时刻录深圳辉煌和梦想的光盘，收集呈示着一座城市与人们生息相通的愿望及荣光。

深圳市行政中心区向福田大规模迁移，是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之后的事了，在此之前，隶属罗湖的蔡屋围一带绝对风头无匹，之后也不能说有所黯淡。假如剔开生活、生存内部那些真实而灰暗的体验，那么这一带确实称得上是身份与理想的荣耀之地，这寸土寸金的地段，往往使人们忽略了内中掩藏不住的凌乱和蒙受的阴影。是的，在深圳，没有出入过地王大厦或深圳书城，就不算逛过市中心；没有在巴登街租住过，就不算了解城中村的生活；没泡过本色吧，算不上沾染过深圳的酒吧文化……当然这些只是私下的戏说，但由此可以感受到一个地段虚无缥缈的荣光，当然也包括现实的放逐，巴登街所演绎的声色犬马与追逐物质梦想、猎取身体欲望的人们，总是那么声息可闻，牵引互通。

金塘街和巴登街应该



深圳地王大厦
插画/潘漠子

算作是连为一体的，属于这一黄金地带仅存的城中村区域，一侧靠近深南中路，另一侧紧贴滨河路，再过去就是与香港相隔的深圳河。只是金塘街的出租屋稍稍显得整齐一些，看得出一种无奈之下的规划踪迹，而巴登街的出租屋则交叉错落，曲径回环，内里乾坤不可追寻。当然，街道上的门面和行人、车辆是被繁华有序的现代气息笼罩着的，看不出各怀心事的样子。我无意以个人目击收集的灰暗和暧昧，来抹杀或者影射蔡屋围到巴登街一带所呈示的炫目光辉，只是，在这些富有象征性的堂皇建筑所遮挡的一个背面，有那么一个时期，恰恰散发着我的目光和遭遇，而那些有目共睹的景象又轮不着由我感受说出。有过多少个清冷人稀的凌晨，我带着长夜煎熬的疲倦来到金塘街口的桂林米粉店，目睹晶都酒店三三两两走出的妖艳女郎在曙光渐现中匆匆散去，有好几个还常常与我在米粉店相遇；我还在巴登街深夜的一个街角，目击过一群大抵都是卖花的小乞丐，聚在一起召开“会议”……我相信，这样的景象，并不会有太多人能够亲眼看到，而我又仅仅是无意看到并且忍不住说出来而已。

大约在 2000 年七八月间，在新闻大厦某扇门楣里干活领薪水的朋友彭天朗，为了照顾他常常深夜归来的工作及生活方式，在金塘街靠红叶剧场的里侧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然后写了一纸《搬到金塘街的几大理由》，极力怂恿我从上沙搬出去同住。在此之前，我一直滞留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并未寻思过要进驻中心区，当然主要还是由于城市中心的房子租金昂贵，搬出去后，有朋友还对我开玩笑说你终于“进城”了，一言捅破我在深圳捉襟见肘的栖居生活内情。接下来，有过数次这样的场景，深夜加班归来的彭天朗和常常彻夜涂鸦或者胡思乱想的我，在金塘街口的桂林米粉店相遇，于是一同喝上几瓶啤酒，一边窥视店外店内不时走过或流连的春色无边的艳丽女子，目睹曙光一层层在前面的街道和楼房上铺开。

许多个无所事事的夜间，我和彭天朗或者几个朋友徜徉在蔡屋围到巴登街一带，在大剧院、岁宝百货、本色吧邻近来回转悠，释放无聊和散漫的心情。由于金塘街地处闹市区，又与书城仅有数步之遥，所以往往会有朋友不期而至，在一个个无须预知的时刻摁响我们的门铃；或者打来电话，叫我们到书城去碰面，然后在四楼文学书店一同度过一段浏览翻阅的时光，最后提着一袋买好的新书，穿过黄昏降临的街道，沿路沽酒买肉，到金塘街出租屋完成又一个周末的聚会。谢湘南应该是当时摁动门铃最多的人，其时他远在沙头角，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奔赴市区。2000 年 12 月第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们还为他入选中华文学基金“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刚刚出版的诗集《零点的搬运工》举行了一个诗歌方言与摇滚之夜，在缤纷的酒意中，一屋子的诗歌发烧友们脸红脖子粗地朗诵起诗集中的诗歌，由普通话、四川话、湖南话、广州话……最后用摇滚的方式，用崔健、用唐朝、用黑豹、用米高•绩臣的方式……火热的场面和情绪，感染了前来干涉的邻居，拱手表示理解后退去。

也正因为地处闹市中心的缘故，不光是朋友间的聚会，一些公众的集会也随之引发我们的热情。深圳自发组织的公众欢乐游行，一般都从大剧院广场集合起步，顺深南中路至上海宾馆再折回来。中国申奥成功的那个晚上，大约十时，我和彭天朗从外面赴约饮酒回来，在市政府路段看到熙熙攘攘的游行人群，恍然醒觉当天是申奥公布结果的日子，不问即知是成功了，一时兴起，于是胡乱加入人群，彭天朗顺手从别人手中抢了一面红旗，动作招摇地跑上前面。那晚我们一直随人群狂欢到最后散开，并把那面抢过来的红旗一路扛回金塘街的出租屋。

巴登街又称巴丁街，具体含意不得而知，实际上，在人们的约定俗成中，巴登街泛指以前的

巴登村地段，而不仅仅是路标上的巴丁街。巴登街沾染上文化色彩的去处，出了名堂的，除本色吧外，就是八仙楼了。八仙楼经营重庆火锅，相当正宗，有一段时期还推介过一种叫“巴人咂酒”的纯酿酒，入口甜美，味道醇正，但后劲十足。记得我第一次喝“巴人咂酒”，是由店主张之先亲自介绍的，半斤装的瓶子，他居然得意扬扬地说每个客人只能喝一瓶，不能多喝，否则必醉无疑，颇有“三碗不过岗”的意思。张之先是张大千先生的侄孙，是一个知名的摄影家，擅长拍摄人物和荷花，也许正因了这一身份及其交游的缘故，才使文化圈的人士纷至沓来。八仙楼分上下两层，上楼的拐角处，立着一尊张大千先生的雕像；二楼则挂满了张之先拍摄的名人肖像，大都是国内文艺界有些分量的人物。到八仙楼去吃饭，首先就等于同时看了一次人像摄影展。说起来，在深圳我还遇到过另一位擅长拍摄名人肖像的摄影家，名叫肖全，出版过一部颇具影响的肖像摄影集《我们这一代》，他曾于深圳大学内的《街道》杂志社工作，而我与那份杂志也曾有一点点渊源。

至于巴登街大名鼎鼎的本色吧，我仅仅去过一次，具体情形早就模糊了。说实话，那时我们还没有什么泡酒吧的概念，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手头拮据，可望而不可即。据说本色吧以音乐演艺著称，主打爵士和摇滚，经常有香港及内地的乐队前来演出，有时还有国外的一些乐队，后来成为中国著名摇滚乐队之一的深圳本土乐队“深南大道”，最早就是在本色吧驻唱。我的朋友、诗人和平面设计师欧宁，听说就是早期本色吧的文化策划者之一，只是那时与他见面不多，也从未听他提起过。

在金塘街居住期间，因为并不做具体的事，应朋友的屡次邀请，我已断断续续到广州去主编一份杂志，开始在广深之间来回奔走。这是紧接着我



深圳深南大道
插画/潘漠子

逐渐成为珠三角城市群一个游走者的前奏，也是后来我常常在两个城市间以工作生活的名义往返的开端。2001 年元旦之后，因广州的杂志业务增长，事情渐见忙碌，而深圳这边唯一剩下的就是没有来由的依赖及留恋。我意识到该是彻底离开的时候了，在深圳耗费了七年以上的时光，我即将进入而立之年，而长久于一座城市的纠缠除了年龄的增长和一些肤浅的阅历，我基本上一无所获，广州适时向我投来一道奔赴的光。

2001 年 1 月 13 日，深圳的朋友们在红宝路和风酒楼为我举行了一场告别的宴会，当晚一场酒宴持续了数个小时，有近 30 位朋友相继到场，粗略记得有彭天朗、谢湘南、王顺健、罗迪、潘漠子、黑光、谷雪儿、谢宏、巫国明、乌沙少逸、王刚、戈林才、黄俊华、薛云麾、戴海燕、张嘉敏等，还有一些中断联系很久的朋友也闻讯赶来。那晚，我剪掉了长发，把胡子剃得干干净净，身着一件米黄色的唐装，连常戴的黑边框眼镜也换成了金丝边眼镜，形象的骤然改变似乎透视了一种无法言喻的意味……谢湘南后来写了一篇记述当时场景和情形的文字，那些燃情的话语，使我在每次读到时都止不住热泪盈眶。

走在深南大道上

“大道深南，比分南北，横贯西东。东临新秀，西出南头，中拥地王。尽揽鹏城中心繁庶，遍享天海四方光华。集经典建筑于一线，盛现代功能凡一体。新政与人文并举，商业及文化共鸣。昼则繁花似锦，鸟鸣车欢；夜即灯花车火，流光溢彩。不夜传说，绵亘千载。”

这是我为“深圳八景”之一“深南溢彩”所撰写的释文，2004 年 6 月，历时半年有余的“深圳八景”评选揭晓，在 32 个候选景点中，大鹏所城、莲山春早、侨城锦绣、深南溢彩、梧桐烟云、梅沙踏浪、一街两制、羊台叠翠八个景点脱颖而出。我和另外七位深圳作家受邀为全新出炉的“八景”分别撰写了一篇仿照文言文的释文，以及一篇感受性的散文，刊登于《南方都市报》深圳版专门推出的“八景特刊”上。

“深南溢彩”指的是深南大道，刚来深圳没多久，它就以特殊的方式嵌入我的印象和记忆，某天我在《深圳特区报》上读到过一首题为《深南大道》的诗，诗作者是陈寅，一个我似曾相识的名字。至今我已记不得诗中的句子，但“深南大道”这个介入诗中的词却一直紧紧抓住我不放。可以说，从那时候开始，深南大道在我的心目中，就已经不仅仅是一条城市的街道，不仅仅是深圳市区内最长最宽阔的道路。我总觉得这个词（我更愿意把它当作一个词）的后面还存在着一些别的什么，包括一座城市的标志及象征，包括行走、生存、栖居等意义，也包括诗歌、艺术的发生。在深圳生活了几年之后，我对这座城市众多脍炙人口的旅游景点和建筑并无产生特别深入的印象，唯有对深南大道的感受越来越深刻。每次从深南大道上走过，我都会没来由地激动，我甚至觉得深南大道就是我身上最大的一条血管，那流动的血液一直是那么滚烫，充满生活与理想的激情。

这么多年来，我居住过的城市不算太少，只要每在一个城市待上一段时间，我都会爱上这座城市的其中一条街道。我借助这条街道感受这座城市的呼吸以及心脏的跳动。我觉得，一条显著的街道往往能够折射出一座城市的环境、内涵及更深远的人文。深南大道是我在深圳生活几年不自觉爱着的街道，我觉得它实在太长、太宽敞了，每每超出我的想象，让我即使徜徉再久也始料莫及。想起来，我对一条街道之所以会生出如此确切而又不断模糊的感觉，原因也许是由于罗大佑的那首歌《皇后大道东》，第一次听到这首歌，

我的激动无以言表，从来没有人能够把一条街道歌唱得如此叩动人心。每次走在深南大道上，我都会想起这首歌，然后在心里默默篡改着歌词“深南大道东到深南大道中……”

1993 年春夏之交的一个日子，我刚来深圳，到位于华强南路和深南中路交汇处的人才市场求职，我应聘一家文化传播公司的文案策划，招聘人看了我的资料并作了简单的交谈之后，写了张条子要我到公司去复试。公司在三九大酒店内，我问招聘人该怎么走，他往楼下指了指说：“你从下边的深南中路一直往东，三九大酒店就在这条大道的尽头上。”于是我沿着深南大道徒步往前，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要坐车，我想大概不会有多远，一条街道再长也长不到哪里去。结果我走啊走啊，不知道走了多久，中途有好几次着急起来要坐车时，又想既然已经走了这么远，应该快到了……后来我终于看到了三九大酒店，我站在酒店门前回头望去，笔直延伸的深南大道车流如注，阳光一路灿烂而热烈地照耀着，两边的建筑整齐有序……我的内心忽然泛起一股难以述说的情感。

后来我屡屡奔走在深南大道上，它两旁遍布的街巷就像一个个含有指向性的入口，一次又一次地向我预示着获得安顿的希望。我频繁地出入深南大道旁边的楼房商厦，为得到一份渴望的工作而不断碰壁。我就像是在深圳地图上漫游一样，以深南大道为纬，出发、到达并辨认着一个个地点。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收获也许就是使我由此对深圳的地理了如指掌，我对市区内外道路街区的熟悉程度，绝不亚于一个成天转悠的业务推销员。我几乎能脱口说出从深南大道到各处去的路线，一般上还可以附带着说出该乘坐哪一路公共汽车。刚来深圳的时候，我甚至培养过这样的爱好，花上一块钱无所事事地乘坐某路公共汽车，从起点一直坐到终点，并且几乎把各个路线的公共汽车都坐了个遍。记得大多数的公共汽车都或长或短地要穿过深南大道，每次经过这熟悉的路段时，我都会生出一种找到方向的归属感。深南大道宛如一道经纬分明的瞭望线，它使我对这座城市层层叠入的纵深处由模糊陌生而渐趋明朗熟悉。

深南大道全长 17.2 公里，东起连接莲塘、沙头角的新秀立交桥，西至与宝安对接的南头检查站，1979 年起依托连接广深的 107 国道、从蔡屋围至上步路段开始改造，其后陆续向两端扩展，于 1994 年全线贯通，被誉为深圳的“长安街”。深南大道从来就是深圳市区交通的重要枢纽，它就像是一条笔直的河流把深圳市区分成南北两半。在我的印象中，它还是深圳市区最早和最繁忙的道路之一，直到现在，依然是人声车马喧嚣的要道。我目睹了深南大道的几次扩建过程，目睹了它由狭小、凌乱、灰暗到后来的宽敞、明净、堂皇。正因为这样，才使我对它繁花一样的景象更加感动珍惜，那些撞入双眼的美与缤纷轻易就切进内心，转化为情感的呵护。尤其是在夜晚，深南大道两旁的路灯与霓虹次第亮起，如同一条金碧辉煌的花火通道，两边的建筑被霓虹勾勒的轮廓宛似宫殿一般排列着。我喜欢看一辆接一辆的汽车奔驰而过的情景，在璀璨的灯火中，深南大道多像是一条梦幻与荣耀的跑道。

截至 2000 年年底，我在深圳居住了整整七年多的时间，还不包括之后的频繁往返以及短暂的停留。我常常对自己和别人说，深圳已成为我居住时间较长和较为熟悉的地方了。我一次又一次地走在深南大道上，像走在回家的路上一样快乐而亲切。在这七年多之中，大约有三年的光阴我是在紧靠市区西面的宝安度过的，每次进入市区，一过南头检查站，就踏上深南大道，它就像是一条朝着向往和渴望展开的履带。那些年来，深南大道上每一处细微的变化都没有逃出我的关注，我太熟悉这条宽阔明净的街道了，它两旁的

风景多么美，深圳所有知名的景点和建筑几乎都围绕在它的身旁：新安古城、深圳大学、深圳科技园、世界之窗、欢乐谷、锦绣中华、中华民俗文化村、香蜜湖、报业大厦、高交会馆、五洲宾馆、赛格大厦、深圳大剧院、深圳书城、地王大厦……尽管我极少进入这些景点及建筑之内，但我觉得我很熟识它们，它们就像是深南大道边上的一棵棵树，我目睹它们的生息，亲近它们的呼吸和心跳，它们一遍又一遍地迎接着我走过的目光，我们相互微笑、致意，像互不作声的朋友，不断地交流着内心的默契。

归根究底，深南大道在我眼中，最显著的景象却不是这些变幻的风物和情景，而是奔跑的汽车。曾有一位于某贵族学校任教的朋友对我说，他们学校的每个周末，都等于在举办名贵车展。而深南大道则不亚于一个持续不息的流动的汽车展场，我在写于 1999 的诗《深南大道》中将之比作一条沾染着梦幻色彩的“黑色的汽车跑道”，设置了一幕名车荟萃的“角逐与炫耀”的景象。隐约记得陈寅的诗中出现过“一辆红色摩托”，大抵也有这种时尚、小康式的“行走秀”感受罢？进入 2000 年前后，深南大道沿线开始修建地铁，对比我诗中于汽车奔跑后面出现的“坦克”和“推土机”，真是饶有意味。

至今我还耿耿于怀一个未完成的设想，我想肯定会有那么一天，我从深南大道最东端的新秀立交桥出发，一路徒步往西，走到深南大道的另一端南头检查站，或者从南头检查站走到新秀立交桥。2010 年之后，深圳二线关撤除，南头检查站已名存实亡，据说深南大道西面也已延长，但在我心目中，依然确认着那两个曾与我无数次产生碰撞的起点和终点。我没有诸如苦行、考察之类的想法，我只是在还我一个冥冥暗定的心愿，为我曾经如此强烈的热爱树立一个确切的理由。我想，做一件这样的事，对于我们平淡的人生来说是有意义的。

地点：八卦岭

我所说的地点必定具有怀念或奔赴的意义，它不是简单的地名的替代，也不是毫无旁证的空泛的美誉。于我而言，就等于一个生命的驿站，人生旅途中一处景致，一场难忘的聚会或一段揪心的记忆……八卦岭是我在深圳所撞入或撞入到我内心的地点之一，尽管我屡次与之擦肩而过，但每一回都令我情愫暗生，那种潜移默化的深刻强烈上来，渐渐令我欲罢不能，像甜蜜的伤口一样常常不经意地碰起。

八卦岭位于深圳市区的北面，恰好处在罗湖区和福田区的交接地界。从公众意义上来说，它是深圳最早建成的城市区域之一，1982 年，大批从部队转业而来的工程兵正是从此拓地开荒，缔造了深圳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艰苦奋斗”为内涵的“拓荒牛”精神。八卦岭工业区也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第一批大型工业区，是深圳最先创立的包装印刷行业生产基地之一。

我与八卦岭的结缘始于 1993 年初夏，那时我来到深圳不久，在关外横岗的一家港资皮具厂做了一周的车间工人，实在忍受不了那机械单调又沉闷压抑的流水线工作又跑了出来，百般无着，在有限的几个熟人间辗转借住。当时在八卦岭的是我儿时的一个伙伴，他在一家钟表公司上班，公司的宿舍在泥岗村，十几个人一间的宿舍，被铁架床占得满满的，我和儿时伙伴就挤在他狭小的床上。宿舍不允许外人来住，朋友想方设法为我弄来了一个他们公司的厂牌，戴上厂牌，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出入了，顺便说一下，像我这种情形的并非只有我一人。但上班时间保安都会到宿舍巡视，如果待在里面就有露馅的危险，而下班时人多，宿舍区又并非只有一家公司租用，通常不会被认出来，因此我每天都是早上跟他们一起出去，晚上等他们下班后才回来。我常常由八卦岭的这边跨过北环大道的天桥，再由泥岗村口的

牌坊下进去，泥岗村宿舍的后山上有一条腰带一样的水泥路直通银湖，在这条水泥道上，看得见整个八卦岭工业区，也可以远眺深圳市区鳞次栉比的楼群。为了等他们下班，我常常一个人徘徊在这条道上，目光孤独而空荡地移过城市的上空。那时的八卦岭在我心目中，无异于一只挪亚方舟，我不断地在一栋一栋厂房的门前转悠，渴望着其中的一扇门能像磁场一样将我吸进去。

1993 年 8 月 5 日下午，我正在八卦岭工业区之间行走，突然一声巨大的炸响仿佛就在近旁蹿起，地面和楼房瞬间抖动了起来，厂房外侧的玻璃哗啦啦往下掉，我和周围的人一下子被惊住了，下意识地跑到相对空旷的街道中间，定了定神，发现不远处的清水河方向升起了巨大的蘑菇云，夹杂着浓烟和火光……这就是 1993 年深圳清水河大爆炸，后来才知道，发生爆炸的是清水河化学危险品仓库，在第一次起火爆炸后一小时左右，又发生了第二次爆炸，事故造成 15 人死亡、100 多人重伤、3.9 万平方米建筑物毁坏、直接经济损失 2.5 亿元……八卦岭距清水河大约四公里，我也算是近距离感受到了那场接下来被写入《中国特大事故警示录》的严重灾难，在记忆中留下了阴影。

八卦岭也许称得上是深圳市区最鼎盛并且最引人注目的工业区。这里不知接纳了多少南来北往的寻梦者，也不知滋生过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有那么多形形色色的人潜伏其间，在机器和人声的喧嚣中演绎生命的精彩与无奈，有的像流星一般瞬息划过，有的像逐渐发亮的星辰一样就此悬在璀璨的星空。八卦岭确实造就或庇护过一些当初籍籍无名而如今家喻户晓的人物，比如凭一曲《阿莲》而一举成名的歌手戴军……1996 年夏天，以写一本《青春寻梦》而成为众多打工者偶像的打工作家安子，在工业区的一栋厂房内开了一家兼顾娱乐与人才中介的俱乐部，就叫“安子的天空俱乐部”，那时，“安子的天空”被为数不少的外来务工者认为是一片希望的蓝天。创办伊始，便吸引了大量打工者光顾及引起外界的关注。俱乐部常常举办舞会、卡拉 OK 比赛及打工者生日晚会，每月的第三个周末举行诗歌朗诵会，等等。应安子的丈夫、诗人客人的邀请，其时已成为打工文学刊物《大鹏湾》编辑的我曾去参加过一次诗歌朗诵会，气氛相当热烈，客人声情并茂的主持把现场一次又一次推向高潮。我想，曾经置身其中的人是不会忘记那种简单却温暖的动人情景的。

1999 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陪当年曾在八卦岭栖身过不短时间的词曲作家罗文光旧地重游。罗文光在八卦岭的时候也是个众所周知的人物，他的才情与义气令人敬慕。只是他已弃艺从商，大约五年之前就已离开，其间再也没有回来过。当我与他一起站到八卦岭的街道上时，他唯有慨叹人面全非了，当年招摇满眼呼声一片的人，现在面对的竟全是陌生脸孔，旧邻故友们也不知各散何方。我们到“安子的天空俱乐部”去看了一下，问起安子、客人，居然谁都爱理不理。后来我们在一家小餐馆里默默对饮，最后落寞满怀地分手。罗文光说他还得去广播电台看一看，以前电台可没少播放他写的歌。看着他的背影，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八卦岭阳光的灰暗与迎面吹拂的凉意！

但八卦岭终究是热情满怀的，它确实能够给人一种沉浸的充实与快乐。因为编辑工作的关系，我跟八卦岭的打工朋友们有颇多接触，其中有多位曾是联系密切的作者，如后来去了《知音》杂志工作的王默然等人。在《深圳人》杂志供职期间，我曾采访过八卦岭工业区几个由蓝领起步而奋斗出辉煌的外来打工者，写过一系列的报道文章，也曾应邀参加过其中一家公司内部的圣诞晚会。在工业区团委，我听到了不少感人至深的故事，如同一些与自身生命相关的情节一样被长久地打动。我还见到了他们自己编辑的油印刊物，那种油墨的馨香使我忆起学生时代的纯美、诚挚

和激情，我甚至为这份刊物写过热情洋溢的刊首寄语，并挑选过其中的几篇文章转发到《深圳人》杂志上。

1997 年下半年至 1999 年 4 月这一段时间，我的朋友黄廷飞就在八卦岭的一家工厂里上班。黄廷飞是我在深圳结识较早的朋友之一，他来自重庆，原来是一名乡村教师，喜欢写诗，参与了我们在深圳自行编选的诗歌合集《边缘》和《外遇》诗报的出版。因为他的存在，八卦岭成了我想念的地点，我曾不止一次专程到八卦岭去和黄廷飞会面。我们喜欢在一个狭小的酒馆里饮酒。通过廷飞，我又认识了八卦岭的李玲、张仙英、彭文清等一些朋友，廷飞也曾带着八卦岭的朋友来过我的住处。后来廷飞离开了，我与这些朋友们仍然保持着往来，只是去八卦岭的次数明显地少了，再去的时候，我们的话题忍不住要涉及廷飞。八卦岭同样是一个孕育着相聚和别离的地方，于黄廷飞，于我，于许多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都成了一个难忘的地点。

我无意在这里过多忆及与八卦岭的某些往事，只是想说，作为一个地点，八卦岭在我的内心已是挥之不去。每个人的一生都会有一些重要的地点，这些地点予人的意义，肯定具有转折性或跨越性，至少有过灵魂的触动，有过生命中难以承受的轻与重，有过成功、喜悦、友谊、幸福；有过失意、彷徨、迷失、悲伤。一个人的故事与一个地点联系在一起，这个地点就必定会沾染上这个人的气息，这个人就必定难以摆脱这个地点所投射的光与影。有时候，一个地点是一个人头上戴之不释的皇冠；有时候，是小说中套在舞女脚上的红舞鞋；有时候，是童话里的皇帝的新衣……不管情景如何改变，地点与人物都像是一本书（或者更像一场电影）与主人公。或许某些人会令自己从某个地点中脱身而出，会把自己不愿提起的经历像擦黑板一样篡改、重写或彻底抹去，但他逃脱不了这个地点对他造成的桎梏。我要说，一个地点对一个人的荣光，或者一个地点对一个人的唾弃，都是不可逃避的，也都不值得津津乐道，人生没有彻底的相附或相忘。

对于八卦岭，对于深圳，我都不过是个过客，但我在这行走之中经历过相遇和相知，看到过灯火像心底的泪水一样升起。而那些曾让我沉浸其中的地点，更是唤起过我战栗般的热情。所以，对于生活在八卦岭或曾在八卦岭生活过的人来说，地点的意义与我的感受肯定相同。作为一个过客，我对八卦岭的情感注入是局部的，但对于置身其中的许多人，投入的程度肯定与我不同。我看重这种情感的注入，也为我、我们能拥有切入自身的地点而祝福、祈祷和歌唱。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中间必定有着光明的指引。

去东门

“去”含有奔赴的意思，在我眼中永远是一个带着向往意味的动词，如同一种隐约的召唤。每接触到这个词，我的内心都会忍不住躁动，油然生出动身的念头。我习惯把这个动词放在我所热爱的地点前面，这样，那个地点就带有我热切的想望，恍若故事中的地点，一路延伸着美好与沉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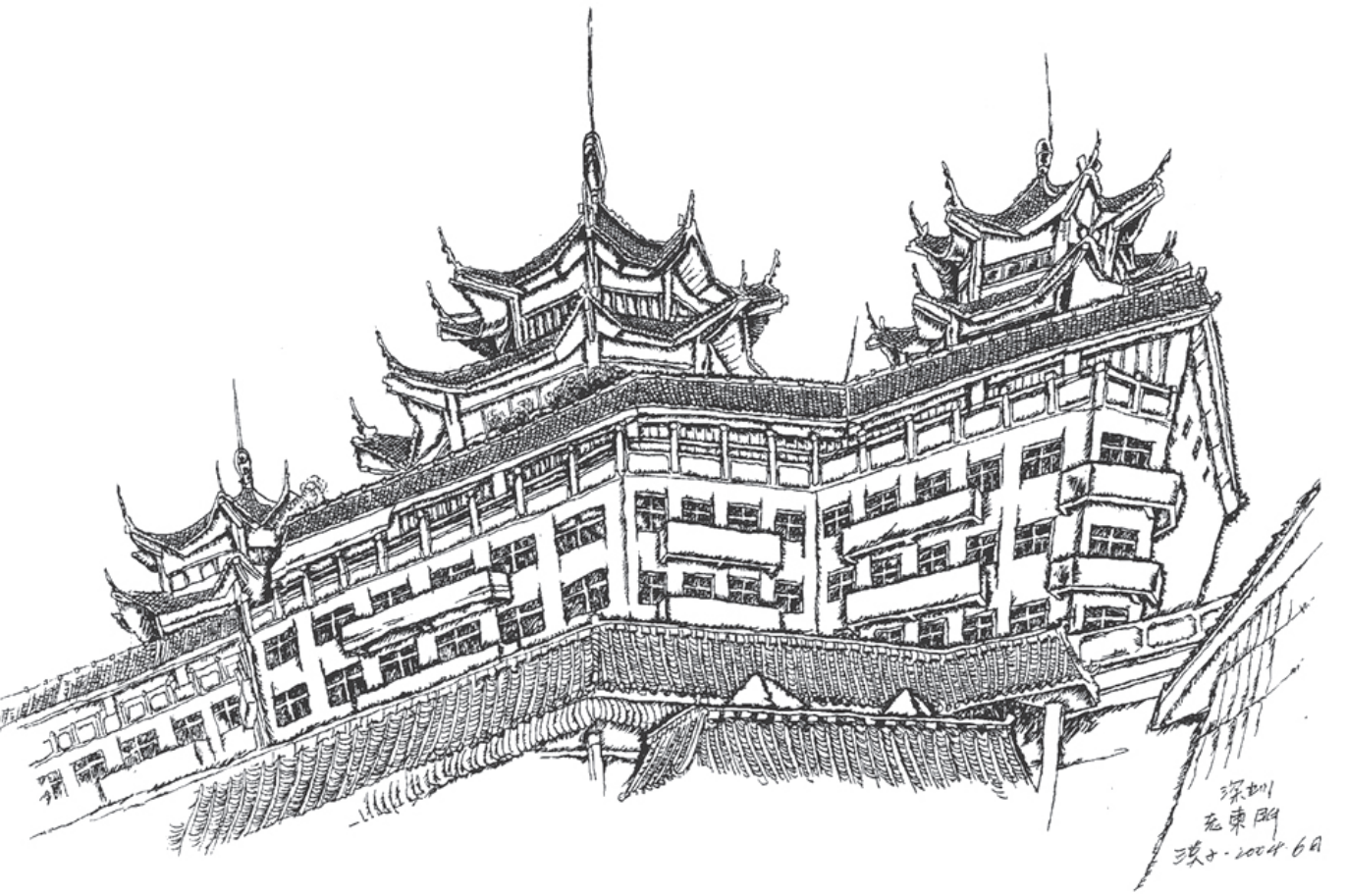
在这里，我要说的是东门，但是一开始就为一个前缀的词而走神。东门在我心目中真的就是梦境中的街道，那些云朵一样涌动的人群，繁星一样闪烁的店铺，像在水中不断浮出的忽闪忽现的面孔及笑靥，多像星河中的景象，置身其中就像是在缓慢地飞翔。真的，我从来没有把东门当作过一条俗世的街道，当成一个售卖廉价商品的鱼龙混杂的地带。没有一个地方会彻底符合人们的想象，但只要内心怀着美好，那个地方就会呈现出美好的一面，彼此的亲近情愫就会在美好的触碰中慢慢打开。美是无所不在的，俗世浊流中

的美需要用自身的对美好的向往及体验才可以得到共鸣。

东门位于深圳市区的东面，它的得名就是指东面之门户，具体来说即是指其前身——深圳圩的四个门户之中的“东门”。大约在明代中期，周边的赤勘（今蔡屋围）、罗湖、隔塘（今水贝）、湖贝、向西、黄贝岭、南塘等几个村，在村落之间建起集市，名为“深圳圩”。明末清初，深圳圩已是方圆数十里范围内的重要商业圩市，分为民缝街、上大街、鸭仔街、养生街等几条街市，以现今的东门中路、人民北路、解放路、湖贝路等街道为构架。民国期间形成“深圳新圩”，范围包括今天的和平路、建设路、人民南路、火车站等。1950 年，改圩为镇，1957 年，县政府驻地始迁于此，成为当时宝安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深圳圩”是对深圳最早的历史记载，先有深圳圩，后成深圳镇，今天的深圳市也即由此而得名。

东门这个名字，绝对沾染了一些与之俱来的神秘及吉祥色彩。紫气东来，东门作为商贾之地，

深圳老东门
插画/潘漠子



一贯兴旺不衰，这本身就有一种意象及先入为主的意味。是的，东门从来就是一个雅俗共赏的购物天堂，作为深圳早期最著名的商业街之一，东门的繁荣不知晕眩过多少南来北往的商客，撩拨起多少人的购物热情与奢望，牵引过多少人的目光及遐想。从古朴拥挤的老东门到如今雅致有序的东门步行街，东门的发展近似于一个商业小镇的成长史，繁华是它永恒的景象，而它就在兴旺热闹中不被察觉地渐渐扫去起初的简朴无序。耽于其中的人是不会明显察觉到这种变迁迹象的，只有那些处于来去之间或者故地重游的人才会得到那种焕然一新的感觉。

在我个人印象及认定中，起初的东门无异于深圳市区的中心点，尽管它实际上处于市区的东线上，并且随着后来华强北商圈的崛起以及城市行政中心西移，它渐渐失去了独占鳌头的位置。相信来深圳稍早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感受，尤其是那些滞留在关外的人。记得大约在 1996 年以前，那时东门汽车站尚未拆除，各地到深圳市的客车几乎都到那里停靠。汽车站同时也是一个综合的公共汽车始发站，不光有发往市区各线的公共汽车，也有开往市郊及邻近市县的汽车。那时候，东门似乎是进出深圳的必经之处，特别是那些由近郊出入市区的人，大都约定俗成把东门当作中转点。东门毫无疑问是当时最引人注目和最为人熟悉的地点，到了东门，就融入了市区最热闹的氛围，就呼吸到了生活商业的气息，感受到了生活潮流的涌动……而对于休闲购物的人们来说，东门更是最先选择的去处。

东门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人们对深圳这座城市的怀念落点，不管是历史性的回顾还是个人的往事追溯，东门都是最有踪可遁的一道轨迹。东门的老房子曾一度引起人们对深圳旧城的探究，记得当初政府动议要拆除东门老街重建时，报纸上曾连篇累牍发表过很多关于拆还是不拆的讨论。对于深圳这座年轻的现代化都市来说，当时的东门老街无异于一道历史的风景，是涂抹于深圳光洁额头上的一道沧桑的颜色。尘埃落下，东门老街终究拆除了，改造后的东门步行街，于 1999 年国庆正式启用，接着呈现于人们视野的，是现代装潢中保存着传统韵味、古朴气息的商业街区，当初簇拥混杂的摊档店面已悄然改为整齐划一的小巧商铺，数座有规模的商城错落其间，商品经营琳琅而有致，穿插着为数不少的专卖店，体现出繁而不乱，专业性多样化相结合的特色。值得称道的是保留了部分古建筑和古树，如始建于明清时期的天后庙、思月书院，此外还增设了一些具纪念意义的雕塑，如青铜浮雕《东门圩市图》，细致呈现了古老的深圳圩风貌风情。

东门对我个人的情感介入始于 1993 年，那一年我刚来深圳，在关外的港资工厂上班。实际上当时我是极其渴望到市区来工作生活的，在关外的停留只不过是一时的无奈。我向往市区的氛围及气息，因而几乎每个休息日我都往市里跑，而所去的地方通常就是东门。我习惯于顺着熙熙攘攘的解放路往里走，在博雅艺廊和解放路书店长久地逗留。那时我仍然保留着大量购书与读书的习惯，我在深圳收藏的书籍大多数都是初来时那几年买的，也几乎都购于东门解放路书店。我常常是在上午一个人空手到达东门，到傍晚时分提着一袋书坐车回去。很早的时候，我就发现解放路书店对面不远的一家小书店在卖九折图书，而且是新书。这家小书店的“新书永远九折”的标语至今仍萦绕在我脑海中，我猜想，这可能是深圳最早卖折价书的一家书店，只可惜那里的好书不多。

有一次，记得是云南的大型文学刊物《大家》创刊号出来的时候，我在东门汽车站的书摊上买了一本，在车上一路看着回去。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先生窥见即跟我谈起对这本杂志的感受，他恰好读了这本杂志。我们由《大家》谈到当代文学，

谈得入港，竟至于那位先生过了站也不知道，待猛然发现匆匆叫停跳下车，竟连名字及联系方式都不曾留下。那是我在深圳第一次与人谈文学，当时我已暂时中断了写作，辍笔日久而重勾旧好，内心不免惆怅失落，倍感世道孤单。

东门给我最深刻难忘的是1993年的一个秋夜，那天我从布吉到八卦岭去看一位朋友，聊天间隙，下起倾盆大雨，一直到晚上8点钟左右雨才小下来。因为第二天要上班，我不顾朋友挽留，执意要回10多公里之外的布吉。我照例先坐公共汽车到东门转车，但我万万没有想到，车到人民桥的时候，街道变成了一片汪洋，车子没法过去，我只好下车涉水而行。细雨仍在不停地下，我淌着没膝的积水穿过解放路来到东门。东门同样是一片汪洋，我站在汽车站的前面傻了眼，车站上一部车都没有，平素热闹欢腾、灯火明亮的东门一片静寂漆黑！那时候我真的体会到了一种苍凉，这在今天的东门绝对不会再有的。无奈，我只好顺着马路，沿布吉的方向步行回去。我看到有不少人像我一样在步行。一路上路面深浅莫测，时而是一片水域，时而是一段烂泥地，田贝、水贝路段积水相当深，淹到了大腿，布吉立交桥地带的泥浆厚得没过了脚踝。我手里提着鞋子，浑身沾满了泥浆，就这样光着脚板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夜很黑，时而又打落一阵细雨，吹来一阵风，我湿透的身体感到了些许寒意。不知道走了多久，当我终于到达工厂时，已是凌晨两点左右了，疲惫与饥饿一齐猛烈袭来，我几近虚脱。那一次，东门真的跟我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但我仍然向往东门，热爱那里的环境及氛围。我情愿在东门拥挤的人群中闪闪绊绊地走上一阵，在那些五花八门的廉价商品面前来回浏览，我觉得置身其中有一种体验生活温情的快乐。平凡的人们，平凡的物质，却是生活最根本的折射，反而能够给予人旷世的情趣。我想，古人所云“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真的是睿智之言，充满俗世为人的禅机。

后来成为了步行街的东门没有了以前的混乱拥挤，但商业更是旺盛，更有条理。我喜爱它的宽敞明净，喜爱它暗红色的色调，喜爱它低矮雅致的房屋构造，喜爱它玲珑精致的休闲座椅……东门渗透着温暖与静谧的气氛，它是那种使人沉静自得的闹市。每次到东门，在幽雅的街道上走上几圈，我都会生出一种怡然自得的幻觉，仿佛看到一个懒散而又智性的自己，斜披上衣，脚拖木屐，缓慢而顾盼地行走于喧哗之中。这时候，我就是一个置身于俗世之中的出世者。而东门仿佛也在印证我的幻觉，我确实在东门买过好几双木屐，也确实趿着木屐悠闲地在东门的街道徜徉过，那种情景将是我一生都认为弥足珍贵的。

我不太热衷购物，除了会买些书籍、小工艺品及必需的生活用品之外，基本上是孑然一身来去自如。因此，对东门，我也没有太多购物的欲望，我只是喜欢徜徉其间，在物的包围中体会超然无物的境界。我喜欢这样，以形式精神对日常事物的参与而去获得更大的精神乐趣。

眺望红树林

深圳最引人注目的树林不是在山上，而是在海边，就是处在深圳湾外的红树林。这一道簇拥在水陆交接之间的特别林带，像一条湛蓝的腰带缠在城市的腹部，又像一条墨绿的围巾绕住城市的脖颈。在此之前，我对红树林一无所知，它一直都生长在我想象能及之外，那种神秘与隐匿遥不可及。我固执地认为，到达红树林的唯一方式只有眺望，除此之外，所有的常识、了解甚至实地探访都属于揣测与遐想。在我眼中，红树林就是一道不可言喻的暗红，这种归于梦想的颜色，永远变幻着神奇与诱惑，总有一种隐约的召唤使人欲即不至、欲罢不能。

来到深圳的第一年，我就得知深圳湾外有个红树林。那时我滞留在关外的宝安，每次从深南大道西端进入市区，过了华侨城，到达竹子林路段时，便会看到一个指向海边的蓝色牌子，上面写着“红树林”。第一次我就被这个名字吸引住了，我真的以为从那里过去，就会看到一片红色的树林，由此对一个未知的去处陷入恍惚。我想，红色的树林会是什么样子啊？像一团燃烧的草堆，抑或夕阳下的荒原？遗憾的是，几年来辗辗转转，我一直游离在深圳的景物之外，终日奔走在高楼大厦的阴影之中，被仰望的炫目和梦想的晕眩所牵制，不光去不成红树林，连诸如世界之窗、锦绣中华这样的地方都没有去过。在深圳七年多，我几乎熟悉了市内的每一条街道，足迹遍及每一个街镇，探访过众多或远或近的村落，并觉得已与其中的某些地点声息同在。但我又几乎对深圳那些声名响亮的景点一知半解，也提不起多大的热情及亲近的兴趣。唯有去不成红树林才构成过我的遗憾，从最初触及名字的一瞬起，就在心底打下了结，非亲历其间不可解。

接着听说红树林处在深圳与香港两地之间的边防管理线上，可算是一道铁丝网内的风景，等闲人轻易不得进去，可望而不可即，心底的结不由得越打越重。又因为当时身处二线关外，不常在市区活动，所以也难有闲暇到红树林去一探虚实。向往的念头婉婉转转、忽浓忽淡地在心头盘桓着，渐成若有若无而又难以放开的牵挂。

红树林给我的另一幸福与遗憾交织的记忆，是2002年6月，当时，迎合联合国“国际环境日”在深圳举行的国际纪念活动，我牵头策划了一个“中国特区绿色诗歌笔会”，由福田区环保局主办，来自广州、珠海、汕头的20余位诗人在红树林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诗歌创作与朗诵会，所创作的作品在《深圳特区报》上以专版推出。但不知什么原因，主办方福田区环保局最终竟置对与会诗人的当场承诺于不顾，不仅不予报销往返费用和不支付稿酬，连事先承诺的策划费用也抹杀了，其后我们几次追讨均没有结果。

机会终究还是来了，1998年下半年，我进入深圳市区工作，第二年年初，便公私兼济地为所供职的《深圳人》杂志策划了一个专题：迎合回归一年之后的香港，走访深港之间的边防范围管理线，揭开这条烙满历史印痕的百年轨迹的神秘面纱。于是，经与深圳边防部队接洽，我在武警六支队宣传干事的陪同下，从粤港管理线的最西端南头大新码头出发，沿铁丝网一路东行至最东端的盐田港避风塘，进行了为期两天的采访。那两天对我来说真是福灵心至，我完全被沿途的风光沉醉了，没有人可以想象得出以新潮现代著称的深圳市区边缘，居然有着如此令人神驰的自然风光，尤其是红树林，简直开启了我被都市繁杂掩塞的愚冥。

我终于进入了红树林。当我站在低矮而茂密的红树林带外侧，情不自禁地伸手抚摸红树细细而厚实的叶子，确实感到了一种渴望已久的温情的传递，那种暖入心肺的、像脉搏一样的输送使我战栗。那一刻红树在我眼前恍然高大起来，密密匝匝的树丛间仿佛敞开了一片辽远的水域。在整个红树林区，我们缓缓开着车子，像一只小船在芦苇丛中轻慢地滑行。我趴在车窗上，贪婪地看着眼前这一片对着我轻声慢语的小树林，这一切多像梦幻的游移。红树的顶上，无数的白鸟或飞或栖，演绎无限生动的情景。那一刻我恨不得化为其中的一只白鹭，永远徜徉在红树林鲜活无比的树丛浅水间。

深圳的红树林是目前国内唯一位于市区、面积最小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国家级的鸟类保护区，被国际生态专家称为“袖珍型的保护区”，全长约9公里，总面积约368公顷。1984年，深圳红树林保护区正式创建，1988年被定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接着又被“国际保护自然与自然资

源联盟”列为国际重要保护组成单位之一，同时也是中国“人与生物圈”网络组成单位之一。在此之前，在这里的大片天然红树林旁侧，是当地渔民用来养鱼的基围鱼塘和种植的果园，仅有一条狭小的道路相通，对面即是香港的米埔自然保护区。

红树林名称的由来，源自一种红树科植物——红茄苳的特征，这种树的木材、树干、枝条、花朵都是红色的。红树林泛指像红茄苳这类生长在热带、亚热带地区的河口、海岸沼泽区域的耐盐性常绿灌木或乔木树林。红树林又有“潮汐林”的别称，涨潮时，海水浸没河口区域，淹没红树林的生育地。红树林的树身下半部都泡在水中，只露出上半部，看起来像是长在水面上的森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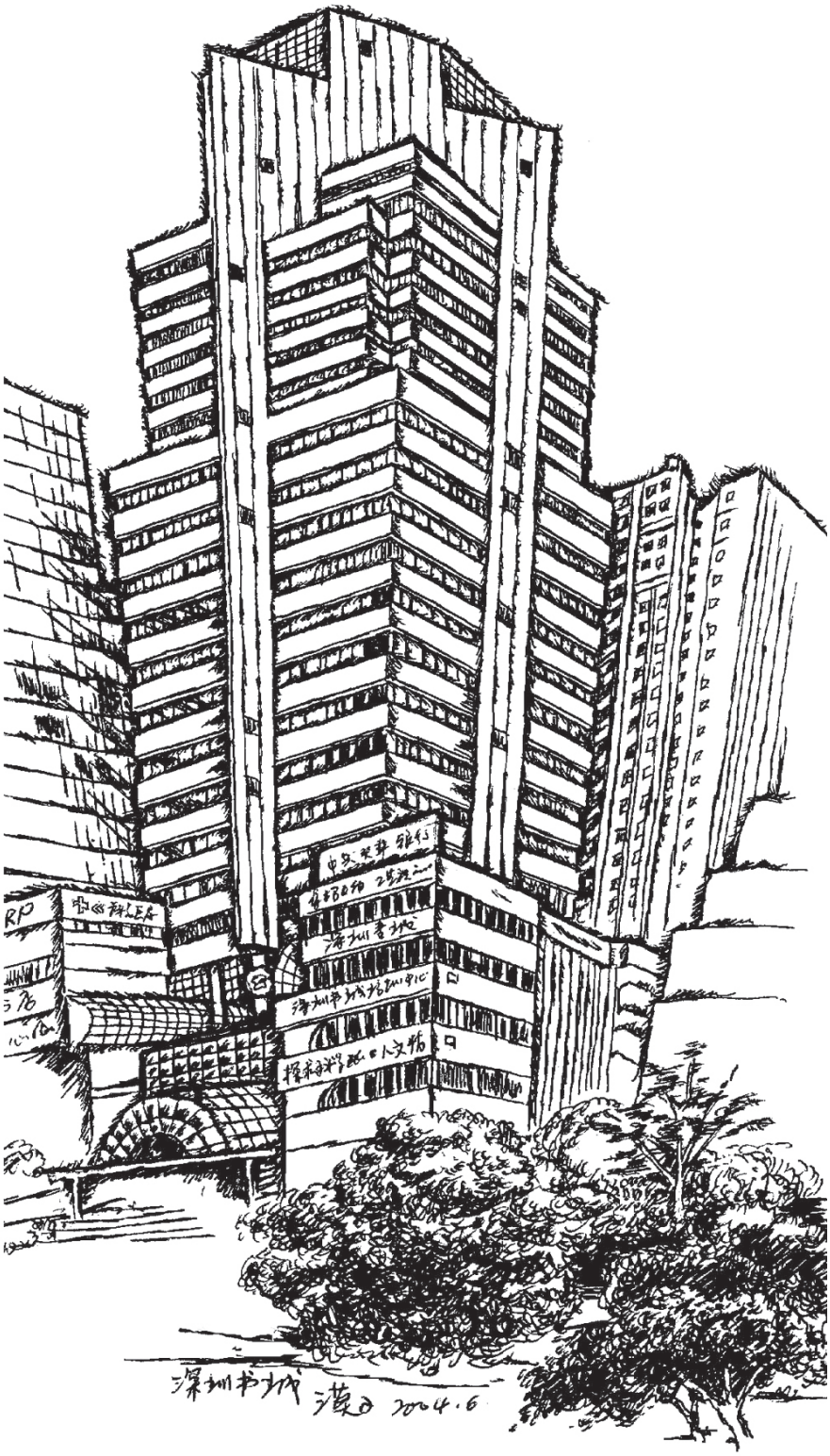
有意思的是，红树林植物是“胎生”的，这种似乎只有动物才有的繁殖方式，是红树科植物独特的本领。胎生的红树林经由开花、结果产生种子，种子成熟了，并不从树上脱落，相反的，包藏在果实体内的胚芽开始发育，渐渐变为带有胚茎的胎生苗。胎生苗从母体吸收营养，继续生长到成熟可脱离母体，落下并插入软泥中，开始发根长叶，展开生命的新页。即使有些胎生苗落下时并没有插入泥中，也能乘着潮水，漂流他方，重新落地生根。

红树科植物的种类约有 30 余种，深圳的红树林就生长着木榄、秋茄、桐花、海莲等 27 种。除红树科植物群落外，还生长着其他 50 多个不同品种植物，此外还有各式各类的生物，主要生物有鱼类、甲壳类、贝类及鸟类，尤以鸟类为盛。深圳的红树林里栖居着白鹭、翠鸟、喜鹊、红嘴鸥等上百种鸟类，最多时曾有 180 多种鸟类，其中 20 多种属于国际、国内重点保护的珍稀品种。这里一直是珍稀鸟类的天堂，也是来自西伯利亚的候鸟南飞澳大利亚的最后一个栖息地，据称每年有白琴鹭、黑嘴鸥、小青脚鹬、大小白鹭等百余种、十万只以上的候鸟南迁于此歇脚或过冬。远远望去，红树林上方众鸟翻飞，草树簇拥，水天一色，令人心醉神驰。

1999 年 10 月，我辞去了杂志社的工作，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不上班的一周内，我就撤离了闹市区，搬到红树林边的上沙村，在那里租住了一间小小的屋子。屋子在顶楼，有一个极小的四顾空旷的天台，可以眺望不远的海湾、远处的蛇口半岛发及对面的香港，也可以回望深圳市区鳞次栉比的楼群，眼前的一切都是那么美。而最令我激动的是一眼就看得见红树林，它就在我眼睛的下面，又永远处在我的想望之中。我买了一副高倍的望远镜，常常在早晨和傍晚时分用望远镜观看红树林。在我眼中，红树林永远都是那么清晰、清新，绿得使人精神振奋、眼睛明亮，而一想到红树绿叶下隐藏的红色，我的眼中又多出一道梦幻的色彩。盘绕在红树林上方的鸥鹭仿佛是一个个洁白的音符，而红树林一直都是一张碧绿中泛着暗红的琴。置身在红树林的旁边，我的耳畔不停回荡着天籁间最美妙的乐章。是的，这种观望与聆听是我迄今得到的最好的精神治疗。

在红树林边生活，我一面接受着平静的抚慰，一面又总是抑制不住的心潮澎湃。我像古代文人一样在自己的居所题了一首仿作古体的诗，就用毛笔写在洁白的墙壁上：日出沙头边，处处人不似。朝见红树新，晚来观风起。

曾经有一个傍晚，我与几位朋友沿着滨海大道散步。穿过马路边上一块刚刚推出的空地，我们居然发现有人在低洼处用木板搭起了一道长长的小桥，桥头有一条小路直通红树林。正是日落时分，红树林内分外静谧和旷阔，惊起的白鹭，起落竟然一点声响都没有。落日的余晖从远处的水面一路铺展而来，把树丛洒得金黄透亮。我们在草地上端坐良久，谁也没有说话，任由天籁的声音静静地抵达我们的心灵。是的，那一刻，我



深圳书城
插画/潘漠子

们都经历了一场大自然的洗礼！

堆积的书城

深圳书城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堆积，再去时感觉仍是堆积，迄今为止，说起书城，也只有一些堆积的幻像飘忽在眼前。如同一些书本的道具，码在堂皇明亮的大厅，使人晕眩、仰止，而绝难生出饥饿者扑向面包的那种感觉。我私下里曾这样想，也许对某些人来说，深圳书城所起的作用就是消磨阅读者的理想，从而提高购买的盲目与欲望。置身书城里头，我从来都没有获得过那种一贯的小心翼翼翻动书页的卑微，有的只是一种淡漠或者敬而远之的心理。当书本让人产生厌倦或者畏缩的时候，阅读的快感及意义早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唯有从读者的位置上走开。

我一直认为，一个虔诚的读者与一本书或一座书店，彼此之间是声息相通的，真正的读者与书店从来就不会陌生。现代阅读，尤其是数字化阅读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渠道及方式，使越来越多的人变换了读者的角色，也使一座书店在城市中失去了显著的位置。但这并不能说是妨碍，而应该是一种趋向。深圳书城也算处在闹市的中心，但远不如一街之隔的地王大厦从容和显赫，也不如旁侧的深交所迷离与变幻，更因为周边莫名充斥的商业文化包装而淡失与之俱来的文化格调，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

在进入书城之前，我感受最深的是横跨深圳书城与地王大厦之间的蔡屋围天桥，那是一本摊开的社会及生活之书，每天都能使人阅读到意外而精彩的内容。据我了解，在某段时间，蔡屋围天桥可能是深圳买盗版书最快捷的地方，几乎每有一本书遇上风吹草动，就能在蔡屋围天桥上买到盗版，包括一些暂时被禁止发行的书籍。2000年，瑞典文学院宣布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久，我就在天桥上买过盗印台湾版的《一个人的圣经》和《灵山》，印刷与装订相当粗糙，要价也高，但在当时网络上尚难以搜寻到，大陆又没有正版发行的情况下，还是聊胜于无。在此，我没有赞许或支持盗版的意思，不过是说出我所亲历的一些事实。

数年来，我与不同城市的数座书店建立过朋友式的美好交往，在深圳这座占据了我一段重要阅读时光的城市，也曾有好几处隐匿的书店进驻过我的内心，包括由此滋生的书人书事。但深圳书城这座起初镀满期望的大型商厦式书店，从出现的头一天开始，就使我积蓄多年的阅读理想遭受致命的打击，我第一次在未打开书页时就感受到迎面的嘲笑。这种沮丧的心情延伸到我后来的一首诗中：“我没有看书，是书在看我 / 我站在书架前 / 不敢正视书本嘲弄的眼神 / 我胆怯的手指触摸到 / 封面的硬度和定价的厚度 / 我抽出一本书抖了抖 / 打开只剩下一页页白纸”（《在书城》）。

当然这些也许是我个人的无端误解，深圳书城在国内书店的重要地位及其开创的多项领先功能，例如“一站式文化消费服务”“五星级书店”等，早就被确认为行业的标杆。然而于我而言，却不得不承认，深圳书城就像一根镶金的教鞭，对我处在盲目而拮据中的阅读实行了拷问。像我这种习惯于猫在书店昏暗的角落，为淘出一本意想不到的廉价旧书而沾沾自喜的人，实在无法面对那种堂皇和有序之间的情致。不必避讳，我从来没有得到过系统的读书教育和购书指引，完全凭着个人的接触喜好，沉浸于凌乱及晦暗不明中眼前一亮的那种感觉，一旦出现了某种遵循的规则，反而会显得无所适从。从前我一直后悔自己没有经历过系统而广泛的阅读，现在我有点无道理地以此为荣，尽管这样的自许可能更深暴露了自身的肤浅。深圳书城显然按照传统的教育或者取悦方式为不同读者设置了各种购买的指引，遗憾的只是我无法从中发现

自己所需要的指引。

记得深圳书城落成及开业是在1996年11月，当时为了迎合开张，还同时举办了第七届全国书市。据媒体报道称，深圳书城的开业与第七届全国书市的举行，缔造了深圳读书（或称购书）的“传奇”，人流量、订货总额和销售总额均创下了历届书市最高纪录，还创造了“第一次在省会城市以外举办全国书市”“第一次免收出版社摊位费”“第一次展会图书销售量突破2000万元”等7个全国第一的历史。为期11天的书市，虽然限量出售入场券，仍然每天人满为患。为了不浪费当时在《街道》杂志担任发行主管的朋友胥弋的赠票，我在闭幕式的前一天赶到现场，结果被汹涌的人潮牢牢挡在阅读之外，来不及浏览一遍就匆匆逃离。据说自此以后，深圳掀起的读书热潮一直有增无减，由此深圳专门设置了一个一年一度的“深圳读书月”，遗憾的是我一直都弄不清楚是什么时候，往往要看到报纸上出现宣传才醒觉，而第二年依然是茫然不知；深圳书城的“火爆”场面也招引了很多前来签名售书的牛鬼蛇神，包括海内外或男或女或老或少的作家、明星、主持人种种，至今我能记起的有余秋雨、刘墉、赵忠祥、倪萍、赵薇、周杰等，感觉上似乎是明星和主持人来得多些，而真正写书的反而来得少，当然也大概是由于作家的出现比不上明星或主持人能够引起轰动。再听说深圳书城每次来人签名售书都几乎能达到“洛阳纸贵”的效果，说白了就是大都能将带来的书全部换成纸币，附带着还流传出一些“哄抢”“挤伤人”之类的小花絮。我也曾无意中碰上好几次有人在签名售书，在层层叠入的人墙外张望一会，然后转身走开。

于我而言，深圳书城堆积的不仅仅是道具一样的书本，还有许多无言的情绪和往事。有过大约两个月时间，我在与书城斜对面的新闻大厦上班，每每穷极无聊之际，便会悄然下楼，信步走向书城，在四楼的文学书店泡上一段偷懒的时光。实际上我极少出现被激起阅读和购买热情的时候，但出于当时对工作的厌倦，仍然乐意在其间来回流连，当然难免有时也会眼前一亮。有时会发现某个熟人的新书赫然摆在书架上，不由得拿下来分享一番，甚至帮衬买上一本，趁机想想假如是自己的书，遭受的会是什么样的命运。还有过几个月时间，我搬至书城后面的金塘街居住，每次有朋友前来而又找不到地方时，我都会叫其在书城等，于是书城又成了我常常与朋友会面的地点。有一点是必须承认的，尽管书城一再消磨着我阅读的理想，但与志趣相投的朋友一起徜徉其间，还是十分快乐的，当我们从书架上抽出某一本书，悄然展开谈论或调侃，那种获得的乐趣仍然不言而喻。

在我栖居深圳的七个年头中，购买的书籍也不算少了，可以说，深圳的读书经历改变和提高了我的阅读品位及人文素养。但我购于深圳书城的书却并不多，而大多是从一些零散的书店购取的。我记忆最深刻的几个书店，最先是东门解放路书店，后来随着东门老街的改造而拆除了（1993年，我曾在解放路书店淘到一套南京出版的“纯文学文丛”，由此记住瓦兰、程尚、蓝天等诗人的名字，事隔七年之后，我在广州遇到瓦兰，当时淘书的记忆依然如昨）；在宝安城区工作期间，我常去的书店则是离住处不远的新青年书店，书店的经理很快成为我的朋友，接下来，他常常迎合我的喜好来电话告知又到了什么书，有时甚至带着新到的图书直接来到我的住处；而最令我难忘的该数南山的愚人书社，因为朋友胥弋的引荐，我结识了愚人书社的经理杨双喜，并在接下来的交往中成为好友。（杨双喜曾免费送过我不少书籍，包括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版的全套《博尔赫斯文集》和两种不同版本的《尤利西斯》，我还应他的邀请去参加过在深圳大学举行的愚人书展；愚人书社在南山图书馆内有一个分店，谢湘

南在南山图书馆工作期间，我曾介绍他去找杨双喜借书；愚人书社当时于南头关口还有一个图书批发部，因为离我的住处不远，我常常光顾，以最优惠的价格购买过一批书籍。）杨双喜和胥弋后来都去了北京，他们留给我的最深记忆，是一段无法磨灭的购书读书生涯。

书是最容易堆积的事物，包括对灵魂的堆积及对地方的堆积。每一个地方的书店，对于当地的读书人来说，又无疑是一个堆积着精神迷恋及轶事的地点。深圳书城之于我，自然也堆积着一些青春心迹，但堆积得更多的，却是刺穿滥情的疼痛。

从“二线关”入城

我花了七年多的时间，尚不知道有没有把深圳的二线关走遍。七年来我的足迹抵达过不少匪夷所思的地方，内心随同前路的渺茫变得顾虑重重，两颊染上岁月与落泊的风霜。按理说来，一座与我相互折腾了七年多的城市，已不应该再有什么未卜的关口，而我竟然还弄不清深圳到底有多少个入口，有多少道洞开的城门等待在经历的大路中间。

深圳是一个以开放接纳著称的现代都市，但深圳又像是一个城墙高耸的古代城池，在梦想策马而入之处，设下一道道拦截的关卡。具体来说，这些关卡叫作“特区检查站”，俗称“二线关”，在我看来，深圳的二线关就如同于古代的城门，几乎每一个入城的人，都必须交验专门办理的“边境管理区通行证”。记得初来深圳时，我还是一个诗情洋溢的青年，满腹迷惘的才华，活像一个在踌躇满志中赴京赶考的古代士子，却不料被一道特区检查站挡在二线关外，不得不先在关外寻求立足，由此来回辗转，涂改前程。

印象中早期办理进入特区的通行证并不容易，需要持介绍信和身份证到户籍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审批，并且得有合理的事由，如出差、务工等，公安机关会视请求确定通行证使用期限，通常在七天以上一年以内，过期就得续办。当然续办通行证并不一定要返回当地，深圳也有一些代理机构，例如各省市的驻深办事处，只是这些各地驻深办大都设在特区之内，粗心大意者往往发觉通行证过期作废时，已是无法前往。因此，准备不足或者不明就里的人，要办理唯有返回相隔遥远的家乡，这对于那些在不知所以中乘兴而来的投奔者实在是迎头一击。

或许不少人在概念上会有些混淆，错误地将深圳市与深圳特区等同，其实不然，深圳市于1979年1月由宝安县撤县而成，范围包括原宝安县所属区域；深圳特区则于1980年8月设立，范围大致包括今天的罗湖、福田、南山、盐田等区域，东起大鹏湾边上的梅沙，西至深圳湾畔的蛇口工业区，总面积327.5平方公里。也就是说，深圳特区只是深圳市的一小部分，约占全市总面积的六分之一。1982年6月起，在特区和非特区之间，修筑了一道全长83.5公里、高达3米的铁丝网，称为“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又称“二线”，沿线开设16个陆路关口、1个水上关口及23个耕作口，并有160多个武警执勤岗楼。“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于1985年3月正式交付使用，沿线的陆路关口就是“二线关”，正是这一道漫长的管理线，将深圳分为特区内和特区外，俗称“关内”和“关外”。

二线关进关时所查验的“边境管理区通行证”，通常称作“边防证”，这个证件只是针对非深圳户籍的外地人，深圳本地居民持身份证即可进入，此外非本地居民如果持有特区内的暂住证也可进入，但持特区外的暂住证同样无法通行。深圳特区使用边防证方可通行的日子，大约持续了10年多，到2005年开始非正式取消，无论是什么地方的人，凭身份证即可通过关口；2010年7月，深圳特区版图扩大至全市范围，边境管理

线不再作用；2015 年 6 月，深圳实施二线关交通改善工程，拆除了几乎全线各个关口的检查通道设施；2018 年 1 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撤销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至此，经过 36 年的变迁，“特区管理线”终于成了历史。当然，在此期间，由之演绎的种种往事，尤其是对于曾有过切身际遇的人们，有些记忆永远难以抹除。

说实话，对于二线关上曾有的 16 个陆路关口，也就是特区检查站，我至今都无法完整地说出来，唯有与其中一些关口的交集挥之不去。在我的印象中，这些检查站是陆续开通的，而东西两头的布吉检查站和南头检查站，当属最早开通和最广为人知的两个，客车行人大多由此入城。其次应该就是西面的同乐检查站和北面的梅林检查站，但同乐和梅林两个检查站均是随着广深高速公路以及梅观高速公路的相继开通而分别通关的，时间也大抵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其时深圳作为一座梦想之城已经沸腾了十几年。除此之外，处于西北面、东北面、东面的白芒、沙湾和梅沙三个检查站，似乎是分别按照货运或其他便利而开设的，不属于人流的主要入口。在深圳七年更多的出入中，我走过的特区关口基本就是这七个，平均每年一个，而次数和际遇则永远无法说清。当然，在缺乏预料的某些时刻，我也偶尔走过一两个罕为人知的几乎是隐蔽的小关卡，而另一些地点，比如非法带人的“蛇头”以摩托车“寻幽”或者“钻洞口”等不寻常方式带入处，就不在我所述说和探究的范围了。我们无从得知，后来许多在深圳城中大摇大摆的人物，他们当初进入这座城市的方式，可能就是一次侥幸或者苟且的历程。

假如不是从资料中获悉，我根本就无从确定深圳特区到底有多少个关卡，这就是我所说的花了七年还多的时间，尚不知道有没有把深圳的二线关走遍的理由。七年中我办过多少个进入特区的边防证，也早就记忆模糊了。我只知道这些年来为办边防证欠下了诸多人情，付出了无数感激的话语，忍受了很多的不耐烦，往往得拐弯抹角托上有相连关系的熟人，或者干脆等到春节回家乡时再办，再有就是去家乡省份驻深圳的办事处。办边防证还得受使用时间的限制，即使像我这样的长期停留者，每次通常也只能办三个月或半年，最多也就是一年。有时候，能不能办到边防证或能办多久的使用期限，甚至成为衡量一个人在深



梅林一村
插画/潘漠子

圳混得好不好的标准之一。

在关外居住的时候，有好多次，我在急着要入城时，才发觉边防证已过期了，匆忙找人办理，往往因为要得过急而令别人为难，难免遭受几句责备。如果一时办不到而又不得不进城，就只好到关口转悠，吸引“蛇头”的注意。“蛇头”是对带关者私下的称谓，这些人身上通常能掏出一沓空白的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的边防证，花上数十元到一百元不等，就可以临时购买一张，即时填上。当然运气不好者很可能会白费一场，被检查人员冷冰冰地告诉说证件是假的，一把撕掉，然后带到值班室接受以罚款为主的处理。也有一些“蛇头”是仗着与守卫武警相熟而直接收钱将人带进去的，当然也不排除有与某位守卫武警串通分赃这样的嫌疑。也有一些“蛇头”是在隐蔽处“另辟蹊径”的……五花八门，不得而知。多年来，活跃在各个人流拥挤的关口、随时伺机与迟疑者或滞留者搭讪的“蛇头”，已成为人们一个心照不宣的认知。

我始终无法抹去这样一次记忆，2000年夏天，桂林的朋友刘春偕同妻子黄芳从中山转道深圳，意欲探访我在深圳多年的生活情景，却不料因不知要事先准备边防证，在同乐关守卫武警上大巴查验时被勒令下车，抛在关口不知所措，在我的建议下转到南头检查站。我站在南头关口刚下过一场雨的湿润地面上，一一联络所认为的可能有办法的朋友，最终彷徨无策之际，忽然想起在某次酒宴上曾会晤过一位省边防局的处长，于是又在辗转中将电话打至广州，这位处长还算帮忙，接通南头检查站值班室的电话，让值班室临时帮办了一个仅限一周的通行证。由此，从桂林远道而来的刘春夫妇才得以在深圳的天空下，与我们度过几天诗酒相酬的时光。

布吉关是东面进入深圳市区的主要门户，连接郊区龙岗以及邻市惠州、河源等地的国道，梅林关未开通之前，市区北郊的龙华、观兰、平湖各镇的人们，也通常由此入城，而梅林关的辟山开通在为布吉关分担了大量人流与物流的同时，更造就了梅林关外人气、地气的空前旺盛；南头关则主要迎接取道宝安西来的人们，与布吉关一同成为人流量最大的关口，这两道关口通常是交通电台报道最频繁的地点，尤其是在人流车流出行的高峰时段；同乐关扼守住广深高速入城之处，入关则直达北环和滨海两大主干道，占尽便利之势；白芒关连接石岩镇，与西丽相通，更多的是方便关外工厂发往香港的货车；连接东面横岗、龙岗各镇进入深圳水库地段的沙湾关亦如是；梅沙关由大、小梅沙东出葵涌、大鹏、南澳各镇，公路一路傍海延伸，风景宜人，更多走动着到东部海滨去休闲度假的人们……走马深圳由东环北向西的二线关，大体就是这样的情景，而南面与香港相隔的则属一线关了。

可以这样说，由二线关入城，才算真实地投入了深圳的怀抱，由此徜徉开去，一个又一个传说中的地点随即历历出现在眼前。只是这种徜徉是需要付出不可预知的时间和代价的，如我，就花了整整七年还多的青春时光。古人云“走马看遍长安花”，然而深圳不是蕴藏历朝遗风的长安，二线关也不是那高高耸起的古老城门，追究起来，自然不能是“走马观花”，而只能是长久的阅历以及打动了。

穿行粤港边防管理线

在深圳厮混过的人，无论遭遇什么样的经历，也不管逗留多久，大抵都免不了对“二线”生出切身的感受，而“一线”却往往止于道听途说。对更多的人而言，“一线”近在咫尺，却相隔天涯。这一条蘸着百年沧桑的历史之“线”，如同一道亘跨在海市蜃楼之外的彩虹，让人通常在可望不可及之中又生出无限的想望。

“一线”比“二线”蕴含着更深的内涵，

并且延伸的历史更为久远和神秘。一般说来，有“一线”方有“二线”，如果说“二线”代表了中国改革开放探索阶段一个特殊的界定，那么“一线”则代表了国家一段饱含沧桑的历史及其存在的因由，也代表了一项变障碍为共通的决策进程。从 1997 年香港回归开始，一线在建设轰鸣中的拓变在某方面又衬托了国家的发展与繁荣。

1969 年，驻守在深圳的广东边防武警总队第六支队在荒芜的粤港边界线上拉起一道简易的铁丝网，这就是最初的“一线”。“一线”原指深圳东起南澳葵涌、西至宝安固戍的长达 260 公里的陆路边境线。1988 年以后，确定为东起盐田避风塘、西至南头大新码头绵延约 70 公里的边防线。“一线”的名称，也由最初的中英之间的边境线改称为粤港之间的边防范围管理线，统称为“粤港管理线”，实际上就是深圳经济特区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之间的分界线，而最明显的分隔就是深圳河和梧桐山。一河之隔、一桥相接、一峰相连、一湾相望、一街相通……左炮台、赤湾港、深圳湾、红树林、罗湖桥、梧桐山、中英街、大小梅沙……成为这条管理线上鲜明夺目的风景，随着深圳的传奇崛起，一直牵引着人们无休止的揣测和遐想。

1997 年香港回归之后，粤港管理线几经变迁，在深圳的城市建设中不断向外迁移，截河填海、辟山修路，使得原来一些铁丝网内的风景真切接近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最明显的如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即是。然而，和着历史纷争的沧桑烟雨，糅合改革开放的风云变幻，一线从“边境线”到“管理线”的变迁，在很多人眼中，到底还是充满旷远的神秘和未尽的惊奇。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亲身探究这条是是非非的百年轨迹，即使到了粤港管理线业已卸下敏感面纱的今天。透过远去的金戈铁马鼓角争鸣，历史的硝烟，依然像一团无法散尽的雾气一样笼罩着诱惑与神奇。

粤港管理线上弥漫的神秘，并不完全在于历史造成的禁忌，而更多应是那些遥远而隔阂的流传与生长。我曾有幸目睹过沿线的景象，在兴奋惊奇和神思交错中进行过一次由始至终的探访之旅，时间在香港回归一年之后的春天，其时我接受《深圳人》杂志的采访任务，从最西端大新码头出发，穿越南山、福田、罗湖、盐田几个区的边缘地带，一路东行至最东端盐田港避风塘，并就几天下来的耳闻目睹写下了一篇长达 8000 多字的纪实文章。这篇文章就刊登于《深圳人》月刊 1999 年第 2 期，内中对沿线变迁、景物风光的大量描述以及一批搭配的图片，较早在公众视野里展示了粤港管理线鲜为人知的景况，可以说是相当珍贵的。

至今我脑海中仍历历闪现我在粤港管理线上穿行的情景，这一经历于我在深圳七年的居留中，算得上是一次奇特的际遇。在大新码头道路最尽头的岗楼之上，我看见一派芳草萋萋、平野荒凉，久久黯然无语；在赤湾宋少帝陵和林则徐打响鸦片战争第一炮的左炮台，远眺水面辽阔、波澜相拥，怀古之情激烈而怆然；在蛇口半山军营和港外的军舰之上，感受军营生活的紧张与新奇，内心思绪万端；在铁丝网隔开的红树林带，站在仿佛是群树托起的岗亭上面，但见众鸟翻飞、绿树摇风，不由心旷神怡；在著名的罗湖铁桥旁侧，凝视河对岸香港元朗鸡犬相闻的农田屋舍、袅袅炊烟，一时百感交集；在梧桐山麓，看到环山腰的铁丝网几乎被无边的荒草遮没，山谷中的营房旁边数片菜畦猪舍，竟不知置身何处；在盐田港码头，穿行在成片堆积的集装箱中，走近一个像竖起的集装箱一样的岗亭，感觉一时交错不明……这一切，并不都在我的文章中得到呈现，但在我内心抹之不去，而有一些景致，恐怕就在我的转身之隙便不复再有了。

粤港管理线上出入深圳和香港的“一线关”，最知名的当数深圳火车站侧边的罗湖口岸以及位于沙头角的中英街，其次就数福田保税区外的皇岗口岸了。据说罗湖口岸每天往来深港的人流都称得上熙熙攘攘，尤其是节假日，到深圳或广州、东莞等地购物和度假的境外人员更是蜂拥不息。香港回归之后的数年来，港人喜欢在周末假日到深圳大肆搜购物品，已是众所周知的现象，连报纸都曾经很当回事地做过专题报道。又有很多香港人在深圳、东莞一带置业买楼，常常阖家过来度假，一方面转换生活环境，一方面又能避开香港相对昂贵的消费。如此种种，真是何乐而不为，而一步相隔深港的罗湖口岸，京九铁路贯通相接，交通便利快捷，也难怪罗湖口岸人流如织了。唯一遗憾的是，罗湖口岸每到午夜 12 时即开始闭关，致使出入者都必须将时间限制在当天关闸关闭之前，听说有不少晚上从香港过来深圳消费的年轻人，经常会选择周末在深圳逗留通宵，到第二天早上通关再回去。

罗湖口岸就在深圳火车站的侧边，不远处矗立着横跨深圳河、象征着广九通瞿的罗湖桥。罗湖桥梁最早是一座木桥，在桥中间用红色油漆画线为界，1906 年广九铁路修建时成为铁路桥，以中孔第二节为界，一边属香港，一边属深圳，由中英双方分别修建。1911 年 8 月 14 日，罗湖铁路桥联轨通车，第二天，首列从广州开出的火车驶过罗湖桥直抵香港尖沙咀总站。后来，罗湖铁路桥历经拆毁和重建，接着又随着新铁路桥的建成，最终于 2003 年宣告彻底退役，被整体迁移到原址不远作为历史文物永久保留。1981 年，在罗湖铁路桥的旁边，又修起一座罗湖人行桥。1986 年，现代化的罗湖口岸联检大楼双层人行桥于铁路桥东侧建成，上、下层分别为出境、入境通道。

中英街处在深圳东部的沙头角镇，原名“鸿鹚径”，本由梧桐山流向大鹏湾的河流河床淤积而成。1898 年，英国政府与清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人强租新界，沙头角被一分为二，东侧为华界沙头角，西侧为英（港）界沙头角，故名“中英街”。这是一条长不足半公里、宽不过几米的小街，街心以“界碑石”为界，街边商店林立，有来自五大洲的商品，琳琅满目，物美价廉，因此成了购物的天堂。深圳特区设立后，中英街又被称作“特区中的特区”，需要办理“特许通许证”才能进入。1983 年，中港双方签订开放中英街协议，使这条特别的街道迎来了空前的繁荣。1997 年，回归后的中英街东侧属深圳，西侧属香港，成为“一街两制”的缩影。

皇岗口岸与广深高速公路近距离对接，相隔深圳市区繁华地带，尚有着一段距离，因此往往是车辆出入的最佳通道，尤其是往来粤港之间的货柜车，据称这是全国唯一一个 24 小时通关的口岸。1997 年 4 月 21 日，解放军驻港部队首批 40 名先遣人员就由皇岗口岸进入香港。回归当日早上，大批队伍分别由文锦渡、皇岗等口岸浩浩荡荡开入香港，当时一线沿途口岸地带，一度凝聚了几乎全世界的目光。据介绍，皇岗口岸一带，也是数十年以来偷渡者伺机逃逸的地带，是曾经的数次“逃港潮”的主要发生地，守卫在这条线上的广东边防武警六支队战士就曾在附近前后捕获过一批蛇头和偷渡客。在我走访粤港管理线期间，带队的六支队宣传干事就向我指点过几处偷渡者惯常选择的地点。

我至今依然无法说出粤港管理线上到底有几个“一线关”，即使在将这条线路整个穿行了一遍之后，我仍对其中的一些地段怀着揣测和茫然。在我看来，无论是历史还是现状，甚至将来，无论经历怎么样的沧桑变化，粤港管理线上飘荡的岁月或时代烟云仍将萦绕不去，散发出亘久不灭的神秘与想象。

广东侨联工作 经济科技品牌

侨创南粤

汇集侨资侨才侨智，凝聚侨情侨心侨力，共享机遇，共创多赢，服务经济建设，推进社会发展。





广东侨联工作 文化交流品牌

风韵南粤

弘扬中华文化，支持海外传承，以文化人，以韵感人，
讲好美丽中国故事，助推人类共同发展。



广东侨联工作

联谊联络品牌

情系南粤

拓展内外朋友圈，画好最大同心圆，以侨为桥，以情聚谊，共促中外人文交流，增进中外友好合作。



广东侨联工作 仁爱公益品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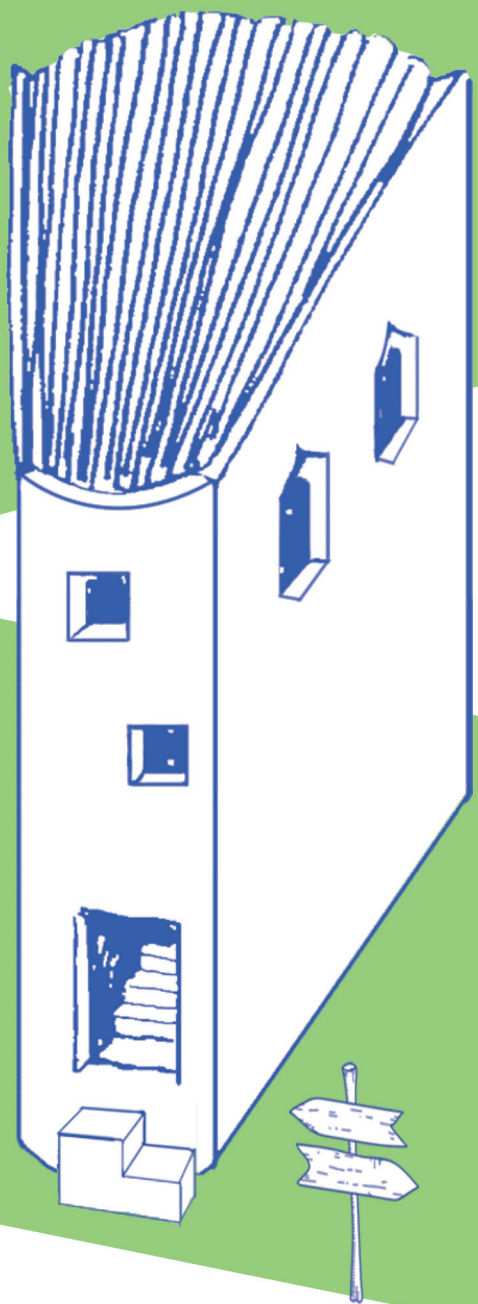
侨爱南粤

爱侨护侨助侨，因应侨界需求，以人为本，以爱润心，引领侨界大众，共建华夏一家。



YUEKE 阅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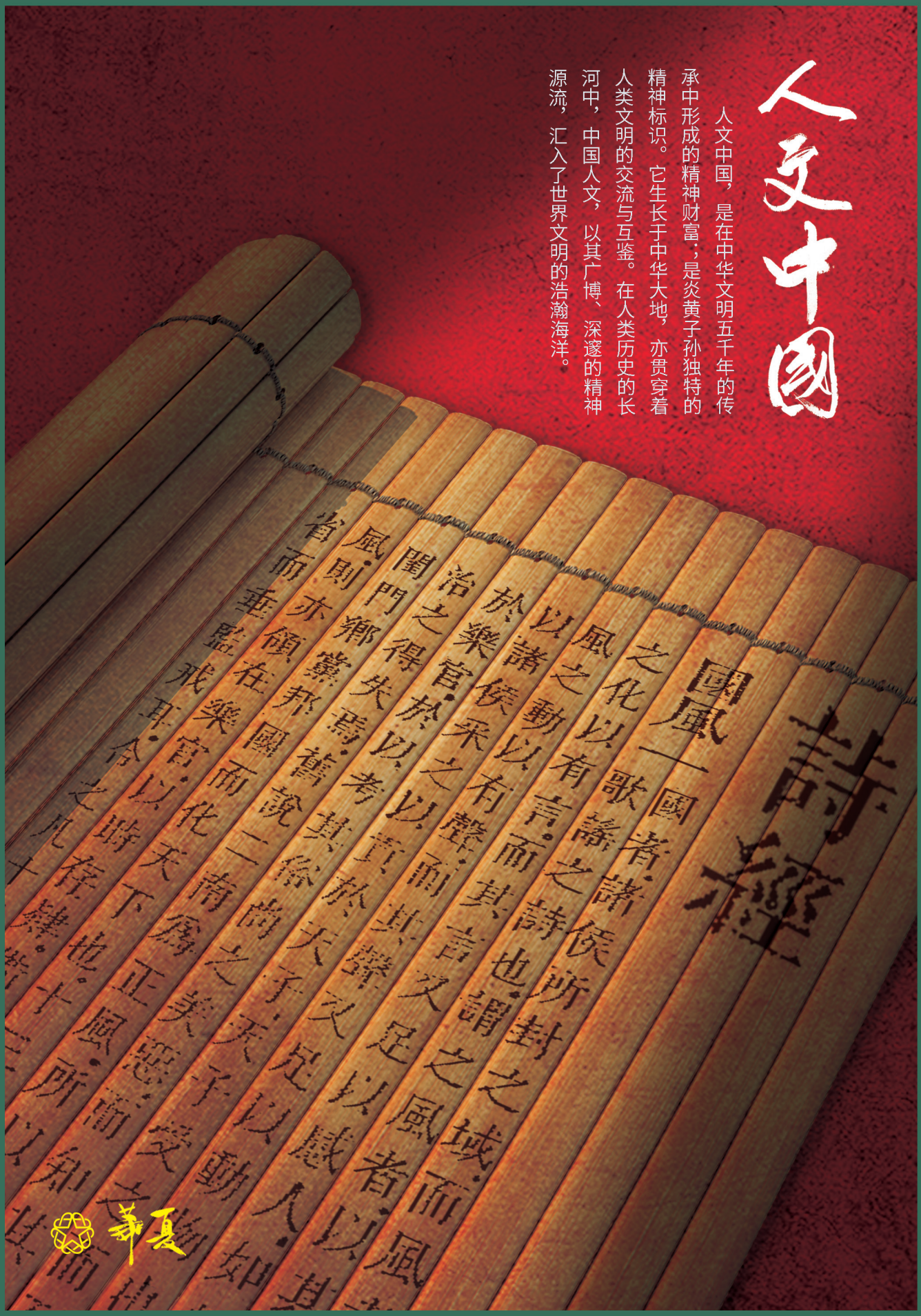
书有道 阅无界



书有道·阅无界

要出书

找阅客


人文中国
人文中国，是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传承中形成的精神财富；是炎黄子孙独特的精神标识。它生长于中华大地，亦贯穿着人类文明的交流与互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中国人文，以其广博、深邃的精神源流，汇入了世界文明的浩瀚海洋。
詩經
國風
華夏